

編譯論叢

第二卷

第一期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Vol. 2 No. 1

國立編譯館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編譯論叢

第二卷 第一期

Volume 2 Number 1

2009年3月

March 2009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編譯論叢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發行人 Publisher	藍順德 國立編譯館館長 Shun-te Lan, Director-Gener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諮詢委員 Advisory Board (依姓氏筆劃排序)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Daiwie Fu,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Te-hsing Shan,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楊維楨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暨經營決策系榮譽教授 Wei-tzen Yang,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Tamkang University 劉敏華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Minhua Liu,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鄭師中 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人文社會組與大學用書組主任 Shih-chung Cheng, Senior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Textbook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饒邦安 國立編譯館簡任秘書 Bang-an Rau, Senior Secretar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主編 Editor	何慧玲 Emily Her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依姓氏筆劃排序)	何慧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前所長 Emily Her, Former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李爽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Sher-shiueh L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林慶隆 國立編譯館自然科學組主任 Ching-lung Lin, Director, Depart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賴慈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Tzu-yun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執行編輯 Managing Editor	吳培若 Pei-jo Wu
助理編輯 Assistant Editor	蔡雯婷 Wen-ting Tsai
特約英文編輯 Contributing English Editor	劉芳君 Fang-jyun Liu 蘇正隆 Jerome C.Su 賴怡樺 Yi-hua Lai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編譯論叢

第二卷 第一期
Volume 2 Number 1

2009年3月
March 2009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編譯論叢

第二卷 第一期

2008年9月創刊

2009年3月出刊

研究論文

- 1 翻譯空間：論傅雷的「神似」理論
吳錫德
- 27 論日譯漢之翻譯簡化
林慧如
- 53 結合微觀與宏觀的英漢翻譯教學法——兼探討紐馬克《翻譯教程》適用於大學部英漢翻譯教學之程度
張瓊瑩
- 77 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以中港臺及日韓大學為例
楊承淑
- 101 專業口譯需要字正腔圓嗎？
張鳳蘭
- 151 臺灣大專中英口譯教學現況探討
胡家榮 廖柏森

譯評

- 179 繪寫康熙——*Emperor of China* 及譯本《康熙》文體評析
蔣宜臻

譯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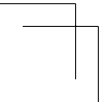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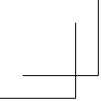
- 189 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
胡功澤

書評

- 249 口譯評估
陳子瑋

報導

- 257 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 (FIT World Congress) 與會報告
賴慈芸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Volume 2 Number 1

First Issue: September 2008

Current Issue: March 2009

Studies

- 1 Space of Translation: On Fu Lei's Theory of "Spiritual Similarity"
Hsi-deh Wu
- 27 Simplific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Huey-ru Lin
- 53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Chiung-ying Chang
- 77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ok Archives: An Examin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eng-shu Yang
- 101 Do Interpreters Need to Sound Like Broadcasters?
Feng-lan Chang
- 151 Teaching College Level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Clarence M. Davis Posen Liao

Translation Review

- 179 Portraying K'ang-hsi—Stylistic Analysis of *Emperor of China*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K'ang-hsi*
Yichen Chiang

Translation Comment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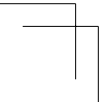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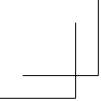
- 189 On Different Renditions of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ith a Full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into Chinese
Kung-tze Hu

Book Review

- 249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Tze-wei Chen

Reports

- 257 Report on Attending XVIII FIT World Congress, 4-7 August 2008, Shanghai
Tzu-yun Lai



翻譯空間：論傅雷的「神似」理論¹

吳錫德

傅雷（1908-1966）是華文世界的翻譯名家，也是當代譯介法國文學卓有成就的重要譯者，一生譯著等身，譯質超群，更是一位從實踐中提煉出理論的翻譯家。他的「神似說」，即「以效果而論，翻譯應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51），是當前翻譯學重要的研究議題，它是繼嚴復提出「信、達、雅」理論（1898）後一個新的補述觀點。不過，「神似」的說法略嫌含糊籠統，不易掌握。本論文擬以當前最新的翻譯理論論述「翻譯空間」來梳理和對應傅雷的「神似說」，包括在「信達雅」基礎上的重要突破，亦即，文藝美學的要求（即「雅」的操作）以及譯文接受理論的新觀點。最後，本論文試圖以當前翻譯美學以及詮釋學中所強調的「譯者主體性」來補述他的「神似說」從而提供學界一個較清晰明確的翻譯理論和操作模式。

關鍵詞：傅雷、神似、翻譯空間、介入、權力、翻譯美學、貼合、翻譯立場

收件：2008年6月16日；修改：2008年8月8日；接受：2008年10月2日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E-mail: hsideh@ms39.hinet.net。

Space of Translation: On Fu Lei's Theory of "Spiritual Similarity"

Hsi-deh Wu

Fu Lei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ranslators in the Chinese world as well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nslator of French literature of his time. He emphasized "spiritual similarity," stating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like the reproduction of a painting, demanding spiritual similarity, not formal similarity"(1951). This stance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discussion among the Chinese theorists of translation. It served as a supplementary comment to the famous tripl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preached by Yen Fu: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owever, Fu Lei's term, "spiritual similarity," seems ambiguous and elusiv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Fu Lei's theory and his expansion on Yen Fu's dictum by employing contemporary notions such as "space of translation," the demand of aesthetics (e.g. that of "elegance") and the theory of reader respons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By integrating Fu Lei's idea of "spiritual similarity" and the recent research on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in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and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shed further light 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offer a new model of operation.

Keywords: Fu Lei, spiritual similarity, space of translation, intervention, power,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surrender to, standpoint of translating

Received: June 16, 2008; Revised: August 8, 2008; Accepted: October 2, 2008

壹、前言

傅雷（1908-1966）是華文世界的翻譯名家，也是當代譯介法國文學卓有成就的重要譯者，一生譯著等身（500萬餘言），譯質超群，更是一位從實踐中提煉出理論的翻譯家。他的「神似說」，即「以效果而論，翻譯應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51）²，是當前翻譯學重要的研究議題，它是繼嚴復提出「信、達、雅」理論（1898）³之後一個新的補述觀點。傅雷是在重譯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高老頭》後，總結提出他的譯述心得「神似」說。這個觀點尤其受到羅新璋的高度認同，在他的〈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一文裡闡章論述，認定它是我國自漢唐譯介佛經以降，「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一脈主流（羅新璋，1984，頁 1-19）。之後，劉靖之亦相當應和此一觀點，指出：「過去 80 年裡，我國的翻譯理論始終是朝同一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達到翻譯上的『化境』。」（劉靖之，1996，頁 19-20）不過，董秋斯持不同看法，認為中國現有的翻譯理論「是一些供臨時參考的翻譯條例和片段的經驗之談」（董秋斯，1984，頁 25）。香港學者朱純深認為，羅新璋的提法易陷入「誤區」，因為它缺乏世界共性和哲學論理（朱純深，2008，頁 3-24）。孫歌更直指，我國過去的翻譯是「從一種語言裡為我所用地搬運內容到母語裡來的路」，是一種單語的「引進」，而不是那種「貼合」（surrender to 或譯「貼服」）原文，因而感覺到舉步維艱的翻譯之路（孫歌，2000，頁 xxv）。

本論文擬僅就討論傅雷的「神似」說，申論這一觀點是否就是當前後現代翻譯主流理論中所強調的「貼合」說，以及將之放諸「翻譯空間」這項知識交流場域裡，在權力與政治的作用下，以更宏觀的學術思辨來梳理並討論傅雷的翻譯觀及翻譯立場，以及從「空間論述」中分析傅雷翻譯的侷限和他個人的「救贖」。

貳、「翻譯空間」的論述與範疇

眾所周知，翻譯向來不只是一種語際間的溝通。即便只是單純的「輸入」，在邁往譯入語的操作過程中，也充滿了「知識 / 權力」的較勁：為何要譯它？誰來譯？如何譯？給誰看？目的為何？等等，這些因素幾乎會在同一時間點匯集在文本的轉譯操作上。簡言之，翻譯是一項實實在在的文化活動，因此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操作。或者說，翻譯涉及一種社會行爲，是權力的分配、整合和爭奪，最後也可能演變成爲一項高危險的工作⁴。

翻譯從來不會客觀，也無從客觀。

「譯者不可能做到絕對的中立，翻譯必定是在特定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下進行的。首先，譯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上述因素集合體的產物；其次，他在從事翻譯時，環境對他既有影響，又有約制。翻譯的過濾作用在於干預權力，於是便產生了權力的二次分配，譯者擁有的分配權力是一種制約機制，同時可以使他不動聲色的從事意識形態的操縱……」（孫藝風，2004，頁 279）

這當中當然存在著許多誤讀、竄改、挪用、替代等等「不忠實」的操作。簡言之，譯者的活動始終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功能，同時又對彼時的社會生活產生影響。「譯者的動機與社會文化語境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翻譯工作的行爲就是在這種語境下進行。因此，若僅僅從某種社會語境的視角內判斷翻譯活動，這是不可能的。」（王文斌譯，2005，頁 17）

翻譯的過程也是一個多重性的論述空間，其內部亦充滿著緊張的關係。「翻譯的政治性存在於它的多重張力與現實政治張力之間的不簡單對等關係之中，在現實政治張力場中，國民、國家、社會制度、階級、種族、性別等，構成了基本的論述和思考框架。」（孫歌，2000，頁 xxiii）因此，「翻譯空間」就是翻譯轉換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包含訊息傳播在內的

所有因素及其論述；它包括兩種文本的內容與呈現，即源語的訴求和譯入語的吸納過程。或者說，翻譯活動的主客觀環境具體表現為一種「介入」的行為，以及一種「權力」的競逐現象。

當代知識的「權力」與「制約」的觀念來自傅柯（M. Foucault）「知識考古學」的啟發。「空間」的社會性與權力的意涵由列斐伏爾（H. Lefebvre）所揭示。至於權力競逐與「社會資本」的「場域」概念則由社會學家布迪厄（P. Bourdieu）加以闡述。正是受到這三位法國當代後現代理論家的論述所啟示，比利時裔的美國籍比較文學教授勒菲弗爾（A. Lefevere）於1990年代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新議題，即翻譯研究不應侷限於翻譯本身，而應把翻譯看作是一種文化發展的策略來研究。他率先把翻譯研究與權力、意識形態、贊助者和詩學結合起來，並提出翻譯就是「改寫」（rewriting），是創造另一個文本形象的一種形式。他指出：「翻譯當然是對原文的改寫。所有的改寫，不論其動機如何，均反映出某種觀念和詩學，並以此操縱文學在特定的社會裡以特定的方式發揮作用。」（Lefevere, 1992, p. vii）

勒菲弗爾強調：翻譯涉及權威和合法性，最終與權力有關。翻譯不僅是開向另一個世界的窗口，翻譯也打開了一個渠道，儘管這樣做往往有些勉強。通過這一渠道，外國文化能滲透進本國文化，並向本國文化挑戰，甚至會顛覆本國文化。因此，國家往往要找一些信得過的譯者來翻譯一些重要的書籍，但稱職與否是另一個問題（郭建中編，2000，頁159-160）。總之，在勒菲弗爾看來，翻譯不僅是一種詮釋，還是一種「改寫」，甚至是「挪用」，因而充滿了政治角力。另外，艾瓦雷茲（R. Alvarez）和維達（M. Vidal）則更明白指出：

翻譯從來也不可能中立的，而是帶有一定的思想，並受制於「權力遊戲」（games of power）；翻譯因而制約了某種社會對某件作品、某位作家、某個文學或某種文化方式的接受（Alvarez & Vidal, 1996, back cover;

引自廖七一，2000，頁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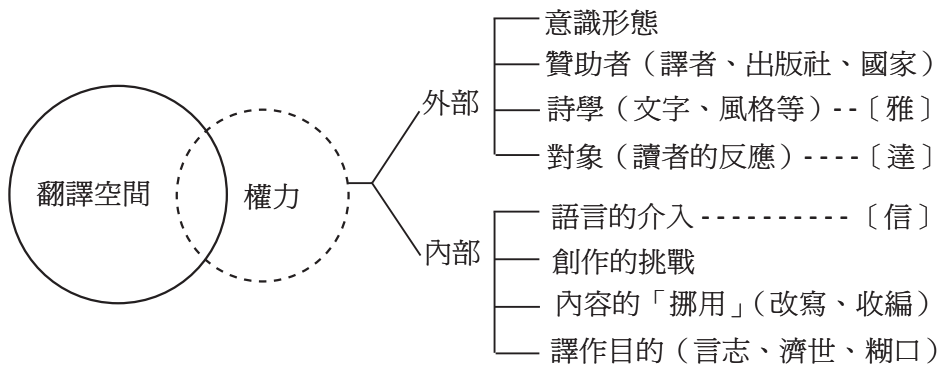


圖 1 翻譯空間的內、外部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如圖 1 所示，「翻譯空間」就宛如一場知識與文化權力的競技場，所有涉及輸入這些異文化和生產的環節都會牽涉其間，而非只是我們傳統上認定的譯者，或者相關出版的單位或企業而已。它的外部內容包括：意識形態、贊助者、詩學、對象；內部內容（即指譯者本身）則包括語言的介入（當中的主要操作在於確實執行「信」的承諾）、創作的挑戰、內容的「挪用」、還有最根本的意圖——譯作的目的。這些因素都會有著不同的程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譯作的品質及譯本的流通。至於「達」（讀者的反應和接受程度）和「雅」（詩學、文字、風格），則毋寧說是由外部因素來決定，而非傳統上我們一向所認定的是譯者個人的自我要求。

此外，由於受到當代解構論、後現代、後殖民論述的影響，已有許多的學者關注這種跨學門的文化學研究。義大利裔的美國學者韋努蒂 (L. Venuti) 在其《譯者的隱身》(1995) 一書中主張，翻譯應該儘可能「存異」，而非「求同」。他認為，如果我們用通曉慣用的本國語來翻譯，讀者在閱讀時，便常會陷入幻境，以為自己乃是在和「原作」對話，譯者因此而亡於所譯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譯者簡直就像是被原作給「殖民」

了（方夢之，2004，頁 399-400；李爽學，2007，頁 27）！事實上，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異化」的行為，因為它必須透過另一種「異」的語言文字，另一種「異」的觀點和理解來詮釋，且譯者永遠會是不同於原作者的「另一個」人⁵。因此，所有的譯本皆獨立於原著，所有的譯文也是另一種獨立的文本。

孟加拉裔的學者斯皮瓦克（G. Spivak）更進一步主張，翻譯要主動「貼合」原文。尤其從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視角，她深刻體會到，語言在國際上的地位從來就不是平等的。她指出：「（譯者）在個人生活細節裡所體驗的，有關對正確文化政治的深刻認同，有時是不足夠的。語言的歷史、作家所處的歷史時刻，以及翻譯中和用於翻譯的語言的歷史，也必須予以玩味。」（斯皮瓦克，1993，頁 263）如此觀之，翻譯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國際文化競逐，充滿著劍拔弩張的角力。語言似乎就是這場文化生死存亡、你爭我奪的角力場當中的一個工具。

參、傅雷的「介入」

從「翻譯空間」的範疇和操作來看，傅雷在從事翻譯活動時，其「介入」的情況是極為深刻的。從他的選書考量、對原文的理解、譯作態度以及譯文表現等，都清楚地留下痕跡。一般而言，譯者的「介入」可區分為外部的選擇（即政治性的介入）和內部的選擇（即藝術性的介入）。翻譯直接涉及「選擇」應無庸置疑，只是過往我們較留意語言和文字上的轉換和操作而已（如「信、達、雅」）。外部的選擇涉及選書及動機；內部的選擇則偏向翻譯立場及譯品的呈現。

一、政治性的「介入」

循著近代中國譯介外國作品的慣例，傅雷也不能免俗的在其譯作完成時，補上一篇「譯者弁言」。這些譯序當然就是譯者「介入」翻譯活動

的一種形態。在譯序中，傅雷若提到該部作品的梗要，也會很技巧地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即社會批判，透過「微言大義」表露出來。有時，也會在譯序裡談論他的翻譯立場，最著名的就是〈《高老頭》重譯本序〉（1951），在該文裡他提出了著名的「神似」說。

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實際工作論，翻譯比臨畫更難。臨畫與原畫，素材相同（顏色，畫布，或紙或絹），法則相同（色彩學，解剖學，透視學）。譯本與原作，文字既不侔，規則又大異。各種文字各有特色，各有無可模仿的優點，各有無法補救的缺陷，同時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怒安，2005，頁1）。

1957年，傅雷在刊於《文藝報》的〈翻譯經驗點滴〉裡，幾乎再清楚不過地公告自己的「翻譯立場」：

文學的對象既然以人為主，人生經驗不豐富，就不能充分體會一部作品的妙處。而人情世故是沒有具體知識可學的，所以我們除了專業修養廣泛涉獵外，還得訓練我們觀察、感受、想像的能力；平時要深入生活，瞭解人，關心人，關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趨地跟在偉大的作家後面，把他的心曲訴說給讀者聽。因為文學家是解剖社會的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頑強（怒安，2005，頁11-12）。

事實上，這是相當正常的觀點和態度。從詮釋學的角度看，既然翻譯是一種「詮釋」的過程和結果，譯者自然會有所理解和評論，而最終出現自己的立場。這正是歐洲學者施泰納（G. Steiner）所云：「譯者侵入，提煉，再滿載而歸。」（Steiner, 1975, p. 298）再者，即便沒有對翻譯有過系統思考的人，也會對翻譯有一種特別的概念，對翻譯的意義、作用、目的、形式和方法有一種個人的觀點（許鈞、袁筱一，2001，頁286）除此之外，譯者的立場還有一些非個性的因素，因為譯者總有其歷史的、社

會的、文學的或意識形態上的所屬。法國學者伯曼（A. Berman）指出：

「第一，任何一個譯者都為某種翻譯衝動所驅使，才從事翻譯活動的，不同的譯者以不同的方式受制於這種衝動；第二，任何翻譯都是為了完成一定的任務，達到一定的目的；第三，一定的翻譯環境（周遭對翻譯的認識與看法）也以不同的方式作用於譯者，譯者必將之內化，只是內化的程度不同——這就是他所構劃的翻譯立場。……。一旦確立，譯者就在該立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從而使他譯出的每一個字都成了一種誓言。」（Berman, 1995, p. 75；引自許鈞、袁筱一編，2001，頁280）。

在此，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傅雷早期的翻譯，他「選擇」譯介羅曼·羅蘭（R.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1941）等書，還有羅素（B. Russel）的《幸福之路》（1942）、杜哈曼（G. Duhamel）的《文明》（1942）等都有著深刻的社會使命。他希望《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出版能提振國人的抗敵精神。至於後兩本書，從題目即可看出其意在「指引」社會的意圖（謝天振、李小均，2005，頁93-105）。1949年以後，傅雷幾乎將翻譯的重心集中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上（他一共譯介了巴氏小說220萬言）。之前他已先譯了《高老頭》（1946）和《亞爾培·薩伐龍》（1947），但似乎只是「探試」階段。坦白說，傅雷捨「新浪漫氣息」的羅曼·羅蘭，就「社會寫實主義」的巴爾扎克，本身即充滿著政治性考量。

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初，傅雷的態度是相對保守的，寧可坐鎮書齋，從事譯介，也不願拋頭露臉，爭取政治發言。他本人也承認，最初「他主要考慮政治問題，當時國內的情況，翻譯巴爾扎克最安全。……。他翻了，也很喜歡。」（謝天振、李小均，2005，頁93-115）簡言之，當時的傅雷很具「政治敏感度」，他選擇了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路線，也自我做了某些修正和妥協。

二、藝術性的「介入」

翻譯涉及語言藝術的美學操作，譯者的「介入」鑿痕斑斑，而且勢在必行。它是一種積極的創造思維，無論在語文的選定，還是風格的確立，皆昭然若揭，因而，自來即不斷出現「翻譯即創作」的爭議。不過，就實質而言，譯本終究不是完全等同於原文的「異本」，且即便譯本有時也可能優於原著，但翻譯的創造性活動都要受制於原作的制約，亦即，翻譯應是一種「有節度的創作」(limited creation)。而譯者就只能在這個命定了的範圍裡爭取最大的「操作空間」。通常，他就在原文的字裡行間尋找微言大義，或者在譯文裡暗渡陳倉，技巧地置入自身的觀點和認知。不過，他的目的必然是以「藝術性」為優先考量的。林以亮說過：「翻譯工作者在語言工具之外，起碼應具有以下三個條件：常識、判斷力、敏感。」(林以亮，1975，頁202)可見翻譯也絕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已。余光中做了一個極傳神的比喻，他把譯者當作構思尋句的詩人。他說：

嚴格地說，翻譯的心智活動過程中，無法完全免於創作。例如原文之中出現了一個含義曖昧但暗示性極強的字或詞，一位有修養的譯者，沉吟之際，常會想到兩種或更多的可能譯法，其中的一種以音調勝，另一種以意象勝，而偏偏第三種譯法似乎在意義上最接近原文，可惜音調太低沉。面臨這樣的選擇，一位譯者必須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賴他敏感的直覺。這種情形已經頗接近創作者的處境了(余光中，1969，頁67)。

這位著名詩人兼譯者認為，我們至少也應將翻譯視為一種「有限的創作」(即「有節度的創作」)。為此，創作也應可以視為一種「不拘的翻譯」或「自我翻譯」⁶。他說：

在這種意義下，作家在創作時，可以說是將自己的經驗「翻譯」成文字。不過這種「翻譯」，和譯者所做的翻譯，頗不相同。譯者在翻譯時，也要將一種經驗變成文字，但那種經驗已經有人轉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

的經驗已經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確定的涵義，不容譯者擅加變更。譯者的創造性之所以有限，是因為一方面他要將那種精確的經驗「傳真」過來，另一方面，在可能的範圍內，還要保留那種經驗賴以表現的原文。這種心智活動，似乎比創作更繁複些（余光中，1969，頁 7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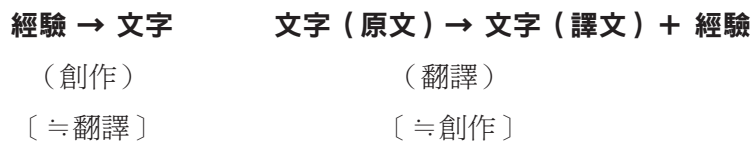


圖 2 翻譯與創作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余光中（1969）⁷。

由圖 2 所示，翻譯的心智活動較之單純的創作尤為艱辛。首先，譯者必定會受到原文的制約，而且還要在譯入語的世界裡尋找最為對等、最貼切的字句和表達方式，以期忠實傳達原作裡的「經驗」。總之，譯者的藝術性「介入」，主要在於譯文語言的充分掌握、譯品的最佳呈現，以及個人翻譯立場的彰顯。

傅雷是相當重視其譯文表現的譯者，1951 年 4 月 15 日在寫給林以亮的信中提及：「我並不是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的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儘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不是容易做到的，而且要譯者的 taste 極高，才有這種判斷力。」又說：「我以上的主張不光是為傳達原作的神韻，而是為創造中國語言，加多句法變化等等，必要在這一方面去試驗。」（怒安，2005，頁 30）傅雷在語言上的嘗試與開創可說相當積極。他試著打破習慣用長句來翻譯，也試著改善他的「對話」譯文，希望能更活潑生動；也擔心自己譯的巴爾扎克「流於公式刻板的語句」（怒安，2005，頁 44）。

此外，在 1963 年寫給羅新璋的信中，傅雷自陳其譯文的目標在於「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怒安，2005，頁 85）。其結果是：「傅譯本超出了原著（巴爾扎克）的語言水平」（陳偉豐，1983，頁 213）。傅雷除了是羅曼·羅蘭在中國的「代言人」，也是巴爾扎克在中國的最佳譯者（金聖華，1995，頁 275-286）。傅雷的中譯本有些還勝過於原文（羅新璋，1984，頁 991）。

羅新璋在〈讀傅雷譯品隨想〉一文裡也直言「傅雷的翻譯觀，本身就含有再創作的思想。翻譯不光是個運用語言的問題，也得遵循文學創作上的一些普遍規律。」（羅新璋，1984，頁 990）而傅雷在給羅新璋的那封信裡也坦言：「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逐譯。」（怒安，2005，頁 85-86）在如此高標準的自我要求下，不難理解傅雷的翻譯工作已到了全神投入，甚至「附身」的境界⁸。

事實上，就是這種「投入」及「介入」的精神讓傅雷的譯作自成一格，並樹立起翻譯文學的典範（鄭克魯，2005，頁 226）。但也同時遭人批判，所謂譯文有著濃厚的「傅雷風格」（金梅，2001，頁 444-445）。連羅新璋也指出：「傅譯容易引人詬病的，或許是譯文的風格。」（羅新璋，1984，頁 992）也就是說，傅雷的譯品自成風格，彷彿「性格演員」，讀者一眼便能瞧出其乃出自傅雷之手。或者譯文太典型化，或者分不清出自哪位原作者的作品，不過，這類過度介入的現象亦在所難免。余光中以他親身經驗為例說道：「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譯，則他的譯文體，多多少少會受自己原來創作文體的影響。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類文中沉浸日久，則他的文體也不免要接受那種譯文體的影響。」（余光中，1969，頁 73）所幸，傅雷自身亦有此警覺，且對語言變化的敏銳度及探問是持續不斷的。此外，假以他的文學造詣、敬業及博學，依舊贏得讀者的信賴及高度青睞。

此外，傅雷也是一位相當自負的譯者。他在評論好友楊絳的譯作

《吉爾·布拉斯》(Gil Blas) 寫道：「覺得語氣輕重和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譯者的個性、風格，作用太大了。」(怒安，2005，頁 43-44) 傅雷也說過：「我的(巴爾扎克)譯文的確比原作容易讀。」(怒安，2005，頁 37) 這些或多或少也「洩露」了譯者的意圖(他是在與原作者競賽)及其介入程度。總之，譯者永遠受制於原作，「文學作品的翻譯者還要具有謙虛的態度」(林以亮，1975，頁 211)。傅雷經常拿譯者與音樂家相比擬，音樂演奏者(譯者)的責任就是盡力將樂曲「詮釋」(interpret)得跟原作那樣好，而不是跟他競賽。不過，一名積極的譯者始終都會推陳出新，尋找當中的些微差異(nuance)，以建立起自己的個人風格。

肆、傅雷的翻譯美學：「神似」說

傅雷在「藝術性介入」方面的成就才最爲人們津津樂道。他是在重譯《高老頭》後，從實踐中提煉出「神似」說這項彌足珍貴的譯學論述。不過，我們似乎應將他的這項「神似」說當成一種「翻譯美學」，而不是某項翻譯定理或立場。「翻譯美學」是「在充分認識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翻譯審美主體(譯者)基本屬性的基礎上，剖析客體的審美構成和主體的翻譯能動作用，明確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之間的關係，提供翻譯中審美再現的類型和手段，以指導翻譯實踐。」(方夢之，2004，頁 296)也就是說：「翻譯美學理論的任務，就是運用現代美學的基本原理，分析、闡述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美學問題。」(劉宓慶，1993，頁 242)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正如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一文裡所闡述的，語際的轉換總是動態、飄浮不定、多義、多值，且多元的，並且會隨著時空變化有所更新替換，其中尤以語言的變化爲最。這也就是何以傅雷在與友人通信中，不時提及自己對語言變化和適用的掌握不足之慮(怒安，2005，頁 44)。

此外，如果我們仔細探究傅雷之所以提出此一論述，歸根究底，還

是基於語言上的考量，也就是在語言和文字方面的特別感悟所致⁹。此外，他也極為重視讀者和閱讀效果，因而特別在意譯文的表達及其藝術效果。他在該序文裡說明了原委：

《高老頭》初譯（1944）對原作意義雖無大誤，但對話生硬死板，文氣淤塞不暢，新文藝習氣既刮除未盡，節奏韵味也沒有照顧周到，更不必說作品的渾成了（怒安，2005，頁3）。

傅雷在與友人的通信和若干文章中，先後多次申論「神似」的意涵。首先，他曾強調並非主張一切「神似」，而捨棄「形似」；其次，他的「神似」是在翻譯過程中碰到不易轉換的地方的一種不得不為之的「權宜之計」¹⁰。

以甲國文字傳達乙國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點，必須像伯樂相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而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文，其韵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只能儘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於不及（怒安，2005，頁2）。

在這段說明裡似乎已見真詮。這段話很容易讓人想起錢鍾書於1963年（1978年修訂）發表的〈化譯〉說：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言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他又補述說：「但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錢鍾書，1978，頁83-86）

傅、錢二人熟識，彼此又專治西洋文學，且惺惺相惜。另外，有關翻譯心得彼此亦有書簡往返，自有聲息相通的體悟。我們認為，就時序而言，錢鍾書的「化譯」說應是傅雷「神似」說的補述。兩人皆反對死譯、硬譯，主張可採善譯、輔以意譯。兩人也都力主強化譯入語的表述，傅

雷曾云：「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怒安，2005，頁3）。此外，兩人也都奉行忠實，要讀破原文。不過，傅雷更明白主張要「貼合」原文，也就是語言學家趙元任所言：「誰翻譯的跟原文最近就是誰翻譯的最好。」（趙元任，1967，頁414）

翻譯操作中的「神似」說，並非源自傅雷，1920年代茅盾和陳西滢皆有提出「神韻重於形貌」的主張。僅因傅雷譯著享譽文壇，他說這些話的影響也就更大一點（陳福康，2000，頁391）。尤其，傅雷身體力行，一生譯介了500餘萬言，因而更具說服力，也是實踐與理論合一的最佳佐證。不過，「神韻」的觀點明顯來自繪畫，研習美術批評的傅雷用來自然貼切。只是，我們發現他的「神似」說毋寧是界定在「語言藝術」的操作與表現，而循以繪畫藝術裡的「風格」說。蓋傅雷曾強調：「風格的傳達，除了句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傳達。」（怒安，2005，頁30）在翻譯的觀點上，一般對「神似」的認知指的是：「必要時擺脫原文語言形式的束縛，如辭彙、語法、慣用法、修辭格等方面的羈絆，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上，用地道的譯文傳達出原文的藝術境界。」（方夢之，2004，頁69）1963年，傅雷在〈致羅新璋論翻譯書〉裡說得更清楚：「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和諧；至於節奏與 tempo，當然以原作為依歸。」他還語重心長的提醒：

總之譯事雖近舌人，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鑑賞能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常識（即所謂雜學），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能深切領悟（怒安，2005，頁86）。

是以，傅雷明顯較為積極力主深入原文、貼近原著，也較重視譯者的條件與自身藝術的養成。的確，「文學作品的最佳譯者，常常被認為是那些最與原作者『吻合』的人。譯者必須『擁有』原作的的神韻，化源語語篇作者的意向為『自己的東西』。」（王文斌譯，2005，頁16）傅雷所提

出的「化爲我有」，實際上已經接近詮釋學裡的「視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¹¹。或者，如錢鍾書說的「脫胎轉世」(transmigration)，即「軀體換了一個，而精魂依然故我」(錢鍾書，1978，頁83)。總之，譯者融入原文乃宿命使然，問題的關鍵往往在於如何將原著精神轉化爲己有，並讓讀者感同身受。其中關乎一種動態的操作和準則。傅雷的「神似」說恰是足以彌補這道空白，它應是在儘可能「貼合」原文的情況下，一種有節度的創意性操作。既非全然的「歸化」，亦非全然的「異化」。文學翻譯的主要精神，不正是在於求同且存異¹²，在「歸化」中有「異化」，而「異化」不離「歸化」！

文學藝術作品「神韻」的掌握與賞析，往往是經由語言文字的理解、風格的領悟以及美感經驗的共鳴而得以達成。透過譯文的轉換和呈現，有時會捉襟見肘，力有不逮。在此，就得求助於譯者對原文風格的掌握和美感經驗的領悟，來營造另一個新風格，從而捨棄了原文的形式及其原有的風格。而此時「善」(神)和「美」(韻)就會以譯文的可能呈現爲優先考量。當中的「善」(神)便是所謂的「神會」，也是「傳神」。它應是在覓不得語言上對等用語之外，尋找另一種藝術風格的表現，換言之，一種「神似」(貼合)的操作。

理解原文 —— 真 (= 意) —— 形諸文字 (譯文)

領悟風格 —— 善 (= 神) —— 營造〔新〕風格

美學體驗 —— 美 (= 韻) —— 藝術表現

圖3 傅雷的翻譯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如圖 3 所示，傅雷的「神似」說應是建立在「吃透原著」和「化爲我有」的前題下，在這一基點上，譯者自然要徹底理解原文，領悟原作風格，並深入進行美學體驗。然後才行諸文字，營造新風格，呈現某種藝術價值的表現。這當中，「意、神、韻」的掌握不僅會超出「信、達、雅」的範疇，更可直指「真、善、美」的善譯境界。誠如傅雷在論及「傳神」的侷限所云：

傳神云云，談何容易！年歲經驗愈增，對原作體會愈深，而傳神愈感不足。領悟爲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爲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惟恐不盡，描寫惟恐不周；此兩種 *mentalité* 殊難彼此融洽交流。同為 *métaphore*，一經翻譯，意義即已晦澀，遑論情趣，不若西歐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怒安，2005，頁 84-85）。

在寫給林以亮的信上也直言，「譯者文學天賦比什麼都重要」、「非詩人絕不能譯詩」及「翻譯比起演奏還難」。此點也正如法國詩人、藝評家兼譯者波德萊爾（Ch. Baudelaire）所言，凡事皆需有「神來之筆」（*de chic*）的天份。換言之，「領悟風格」似乎「存乎一心」，即「神會」也。如此也才能營造出另一個「新」風格。

總之，傅雷的「神似」說，除強調要儘可能貼合原文外，似乎也蘊藏著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儘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爲中文。」（傅雷，2001，頁 175）質言之，傅雷的「神似」說，基本上就是一項極深刻的「介入」，而且是一種「藝術性的介入」。它既是「信、達、雅」的具體訴求，且要求更主動的深入原文，並擴大到譯文的美學表現（它是隨社會發展而變化的）及藝術創新；它絕不會只是如繪畫「臨摹」般，那樣刻板、被動、無生氣的抄工或拷貝，或者如音樂演奏那種難於「突破」的「詮釋」（*interpretation*）。在此，傅雷不僅展示了他較不爲人知的藝術「介入」，

也交待了他的藝術野心——視翻譯為創作的意圖。

伍、傅雷的侷限和宿命：一個譯者之死

譯者首先必須完全貼服於原文。他必須在文本中苦苦求索，窮其語言盡處，因為那修辭作用的一面會指向文本的靜默，在那裡語言不受限制地散軼開，而文本則以其特有的方式防止它的發生。有人以為這是關於文學或哲學虛無飄渺的言論。可再多強硬的說法也不能迴避這一事實，即翻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行為。譯者必須付出努力贏取成為親密讀者的權利，否則便不能貼服於文本，不能對其特有的呼喚作出回應（斯皮瓦克，1993，頁 258）。

對照當代文化翻譯研究學者斯皮瓦克這段話，似乎與傅雷的「神似」說遙相呼應。它要求譯者必須完完全全投入原文，即傅雷所說的「吃透原著」、「化為我有」，如此方能譯出原文的精髓。不過，綜觀傅雷的譯介生涯，在瞭解文本的「政治性」意圖上似乎不夠敏感，因而在「文化翻譯」的操作上失去了準頭，尤其在文意的「挪用」（appropriation）技巧上未予以深究，而出現空有文章，卻無以致用的窘境，甚至惹禍上身¹³。蓋任何文本（不論是源語或譯入語），皆有其政治意圖：「如果你只是草草學懂一門語言，以為翻譯就是傳達內容而把別的東西給了讀者，那你便是背叛了文本，且露出了頗為可疑的政治含義。」（孫歌，2000，頁 xxi）在討論到〈近代文學譯介的中文化選擇意向和模式〉，郭延禮歸納出幾項特徵：第一、源語以英、法、美、德、俄為主；第二、譯介對象名著不及 10%；第三、偏好譯介民族主義作品；第四、重視傳統審美情趣，普遍有著本土化現象（即「歸化」）。尤其後項，譯者為適應中國人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情趣，經常對原文任意刪節和改譯（郭延禮，2007，頁 254-273）。此外，孫歌指出，中國近代翻譯不僅是單語式的「引進」，或做簡單的「挪用」，且多為「不忠實」的翻譯（孫歌，2000，頁 xxiv-xxv）。有趣的是，若拿

嚴復和林紆的譯作相比（只是前者屬文化翻譯，後者屬文學翻譯），前者大致堪稱是「翻譯」（當然也有若干明顯「挪用」情事），後者則純屬「挪用」，但國人看重的卻是後者。這項結果本身就是對翻譯行爲的一大挑戰。我們是否要深入原文，忠實貼切的傳達原著裡的藝術性，甚至如何技巧地轉化文本的政治性意圖？看來這些正是傅雷的重要思考和挑戰。最後，他選擇了「忠於原文」，結果卻受到無情的壓迫。

所有的翻譯都是有目的的行爲，翻譯也絕不是簡單的溝通行爲。「求同」與「存異」之爭，不知困惑了多少世代的譯者。傅雷尤屬代表，他在1951年4月15日寫給林以亮的信上說道：

民族的 mentality 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卻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辭彙不容易湊合。本來任何譯文總是在「過與不及」兩個極端中蕩來蕩去，而在中文為尤甚（怒安，2005，頁29）。

之後，1963年4月14日，在寫給梅紐因的信則說：

我儘量嘗試譯得忠於原文，而又不失藝術性，務使譯文看來似中文創作，惜仍然力不從心。翻譯之難，比起演奏家之演繹往昔大師的傑作，實在不遑多讓（怒安，2005，頁82）。

兩文相較，我們不難發現傅雷的困心衡慮，在於如何選用貼切的中文傳達原文裡的藝術性。這正是傅雷的困擾所在，因為他太看重原著的藝術風格了！儘管如此，傅雷還是做到了。他的譯作得到極高度的肯定，且傳頌至今。可是他本人卻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首先，他的優質翻譯挑戰了彼時別人的譯作（而他也從不吝於批評別人）；其次，他力主忠實，傳達的是西方的時代精神和先進文明（這些在當時並不完全見容於共產主義新中國）；再者，他堅持以翻譯為志業，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自居的態度，如此也就一再地壓縮了他的翻譯空間，甚至生存空間（謝天振、

李小均，2005)。

傅雷後期的翻譯（1949年以後），品質不斷提升，但「空間」卻不斷壓縮。之前，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書，甚至自力出版（開了一家「自己出版社」）。後期，國家機器完全取代了「贊助者」（譯者和出版社），國家的意識形態趨於一統，成了最高指導原則，甚至對於譯文的「挪用」也有一定的「指示」。任何在語言及翻譯上的突破，皆視為次要，甚至「禁忌」。但是，傅雷既不肯被「收編」，納入主流體制¹⁴，又太過堅持文人傲骨，因而被打入批判對象，當然也就形同被處以「緩期死亡」。

當時，傅雷自認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管世事，專心譯作，做出溫和的「歸順」，殊不知「翻譯」是何等危險的工作，它輕易地就挑戰到當局的意識形態、當局的知識、當局的美學，甚至國家安全……。因此，他的翻譯活動受到最嚴苛的控管和質疑。他唯一賴以為生的譯稿收入便日益縮減。他曾不只一次向友人吐露，翻譯對他而言，根本就是為了糊口¹⁵。1965年10月26日，他寫信給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兼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石西民，表面上說的是，自行要求不再翻譯先前簽訂的巴爾扎克小說，實則是發出最沉重的吶喊，同時抱怨他的生計出了問題：「58年春交稿之《皮羅多》，61年校樣改訖後，迄未付印；64年8月交稿之《幻滅》三部曲，約50萬字，至今亦無消息；更可見出版社也拿不定主意。」最後，傅雷終於說出：「所恨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著落。」（怒安，2005，頁93-94）

讀之，不覺令人鼻酸。傅雷這位可敬的譯者，積極的翻譯大家，他的「翻譯空間」竟會被壓縮到如此地步，從匡世濟民，到舒展才華，淪落到謀生糊口，而且還無以為繼¹⁶！

陸、結語

「翻譯空間」乃是一種「權力」的概念，它包含了許多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條件，這些因素和條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都會影響到翻譯作品的流通，甚至譯作的品質。這些也隨著翻譯觀念的演進、學說思考的探索，而不斷地擴增。譯者的「操作空間」自然較集中在「藝術性的介入」，這是傳統的觀點及對譯者的普遍期待。不過，外部的空間（即「政治性的介入」），不僅涉及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也涉及商業和社會品味等等。此外，後者往往彷彿一個大框架，有時還會牢牢地套住並影響到譯者個人的「藝術性的介入」。簡言之，「翻譯空間」乃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

一般而論，嚴復的「信、達、雅」譯事三原則僅涉及譯者個人的條件與視野。傅雷的「神似」說則擴大了某些因素，更加強調譯者的積極作為、譯者的主體性、有節度的創作，甚至譯者的翻譯立場等等。尤其，傅雷的翻譯態度不僅積極，且他本人是相當自覺的。他的「神似說」應可視為一種翻譯美學，它是動態且多元的。它也符合當前文化翻譯理論裡的「貼合」說以及詮釋學裡的「視界融合」理論，從而能夠提供一項參照，以及一種積極的藝術介入模式，讓翻譯過程有了更適宜、更具操作性的模式、手法和態度。簡言之，傅雷的「神似」說的原創性在於：他透過藝術性的介入，從語言的角度探索文字轉換的空間，以及風格的樹立、美感經驗的探求和體驗；他尤其重視翻譯的主體，在於文字和風格；他極為看重源語的掌握，也積極考量到讀者的接受與感受。

任何翻譯都是有目的的社會行爲，是一種目的明確的「介入」，包括適當的「挪用」，以及與原作者之間的某種較勁。傅雷身歷其境，也有過深刻的體驗。再者，任何翻譯本來就是對原作的挑戰，這項挑戰本身就是「翻譯空間」的重要內涵，因為譯本是可以稱得上是「異」於原著的「新作」。傅雷正是透過他的文才、他的藝術敏感度、他的博學、他的真

誠，「製造」出用中文寫作的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還有其它他翻譯過的外國作家）。他不僅成了這些外國作家在華文世界裡的代言人，還可以游移在兩個世界、兩種文化之間。這應就是傅雷在語言翻譯藝術上的具體成就。不過，傅雷的侷限在於他似乎未對語言的敏銳領悟那般小心斟酌，仔細推敲，而輕忽了翻譯過程中外部諸多因素的變化。總之，他忽略了文本的跨文化對話空間的本質，錯估了文本所蘊含的政治性主張，尤其漠視文本的「權力」意涵。只一味地忠於「輸入」西方的文化和文明，以至於受制於外部諸多翻譯空間的掣肘，而無法盡情發揮譯才。

質言之，傅雷生不逢時，他的翻譯經歷言志、濟世、糊口，最後抵於個人的「救贖」（即意志堅定地以翻譯為唯一的志業，並視為個人對生命本質的提升）。他把一生的詩才，寄托在文本的「來生」（afterlife），也寄望於個人的「死後生」（nachleben），也就是說，從另一個側面自我展開，以達成他的理想和影響。

註釋

1. 本論文部分內容曾於2008年5月在南京大學召開的「傅雷誕辰百年紀念暨『傅雷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2. 傅雷係於1951年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上海平明出版社）中提出此一觀點，收錄在怒安（2005）《傅雷談翻譯》的1-3頁。他因「不滿譯文風格」，重新翻譯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這本近19萬言的代表作。第一版係於1946年由駱駝出版社發行。1963年，他又再譯一次，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
3. 見劉靖之（1996），〈重神似不重形式：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載於《神似與形似》的3-22頁。「信、達、雅」一向被華文譯者視為翻譯最高準則，由嚴復在《天演論》（1898）譯例文中提出。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陳福康，2000，頁105-120）。另據學者推論，嚴復此說應受18世紀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泰特勒（A. F. Tytler, 1747-1814）的翻譯三原則（《論翻譯的原則》（1790））的啟發：1. 譯作應完全複寫出原作的思想；2. 譯作的風格和手法應和原作屬於同一性質；3. 譯作應具備原作所具有的通順（引自譚載喜，1991，頁163-164）。
4. 十六世紀法國詩人杜雷（Étienne Dolet）因堅持柏拉圖幾句譯文須採意譯，而惹上殺身之禍，於1546年被視作異端給活活燒死（李爽學，2007，頁47）。
5. 即便作者「自譯」其原作，由於兩種語言的表達習慣和文化意涵等語言和文化諸多因

素的迥異，往往也會是一個不同於原作的「新」作品。

6. 余光中此處的說法頗類似普魯斯特的體驗。1904年3月，這位法國20世紀的大文豪在尚未從事創作前，寫信給巴雷斯（Barrès）說：「我還有兩本羅斯金（Ruskin）的書要譯，然後就要嘗試翻譯我自己可憐的靈魂，如果在這期間它還沒死去的話。」（Kriteva, 1998, p. 75）；普魯斯特在《重現的時光》（*Le temps retrouvé*）書裡，談到他自己時說：「這是一部最重要的書，真正獨一無二的書；就通常意義而言，一位大作家並不需要去杜撰故事，既然它已經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他只需要把它翻譯出來即可。作家的職責和使命也就是翻譯者的職責和使命。」（Proust, 1989, p. 469）。
7. 本圖源自余光中（1969）〈翻譯和創作〉一文的第72頁。本文作者略作更動，將翻譯與創作之間的關係，改用「近似」（≈）的符號表示。
8. 林以亮曾引述傅雷對他說過的話：「無奈一旦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林以亮，1975，頁207）
9. 根據陳福康說法：「關於翻譯的語言問題，傅雷是在魯迅、周作人以後論述得最好的一位。」（陳福康，2000，頁394）
10. 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還特別以加注方式援引了一個例子：「《哈姆雷德》第一幕第一場有句：Not a mouse stirring. 法國標準英法對照本《莎翁全集》譯為：Pas un chat。豈法國莎士比亞學者不識 mouse 一字而誤鼠為貓乎？此為譯書不能照字面死譯的最顯著的例子。」（怒安，2005，頁2）
11. 伽達默（H.G. Gadamer）認為，譯者總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裡的知識和信仰帶進原文這個陌生的世界。……並且通過擴大我們的視界直到它與陌生世界的視界相會合，以獲得那個陌生世界的知識，從而使兩個視界融合（謝天振，2000，頁75-77）。
12. 「求同存異」之間的「同」與「異」（亦即異國情調的掌握）也是一種動態的標準，它主要隨著社會開放度有所調整。開放伊始，異與同經常對立；開放中期，偏向「求同」（即「歸化」）；全面開放，獨鍾「存異」。若操作不當、認識不清，也會出現致命的傷害。另外，社會的開放度也會與個人的「翻譯空間」成正比；愈開放的社會，譯者的內外部操作空間皆遠遠超過封閉時期。一旦譯者不察，踩到「誤區」，「異國情調」的「度」的掌握也會出現不良的後果（吳錫德，2008，頁1-18）。
13. 1947年4月，傅雷翻譯斯諾（Edgar Snow）的《美蘇關係檢討》，由知識出版社出版，僅印二百本。譯者代序〈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先連載於《文匯報》。傅雷的觀點非常明確：「抱住了自己的良心，不問對方是誰，只問客觀事實；既不親蘇也不親美，但誰損害了他們的國家的利益，就反對。」為此傅雷受到左派人士的非難。1957年反右運動，又翻出此舊案，批判傅雷走中間路線，親帝反蘇。結果迫使傅雷必須做出「交待」，此事也埋下日後被優先整肅的因子（國家圖書館古籍館，2008，頁103）。
14. 以周作人的例子，當局對他法外開恩，允許他專事希臘文翻譯。因而被納入「體系」，他的希臘文譯作也不會對當局的「權力」構成威脅。同樣的，錢鍾書雖專治古文，也被「要求」擔任中詩的外譯工作（大部分是毛澤東的詩詞），這事對當局還挺有用處的，所以較能免於被迫害的災禍。

15. 1952年4月9日，他寫給極敬重的畫家前輩黃賓虹：「爾來迫於生計，日夜忙於譯書。」（怒安，2005，頁52）；1953年11月9日，寫信給林以亮：「此次重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大半是為了吃飯，不是為了愛好。」（傅雷，2001，頁189）
16.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傅雷首當其衝，遭紅衛兵搜查、抄家。夫婦倆俱受批鬥，折磨達三天四夜。9月3日，在人格和尊嚴備受凌辱的情況下，夫婦倆一起懸樑自盡。

參考文獻

- 王文斌（譯）（2005）。B. Hatim & I. Mason著。《**話語與譯者**》。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
- 方夢之（2004）。《**譯學辭典**》。上海：外語教育。
- 朱純深（2008）。《**翻譯探微**》。南京：譯林。
- 余光中（1969）。翻譯和創作。載於陳鵬翔（主編），《**翻譯史·翻譯論**》（頁66-87）。臺北：弘道文化。
- 吳錫德（2008）。論文學翻譯過程中「異國情調」的操作。《**外國語文研究**》，8，1-18。
- 李爽學（2007）。《**得意忘言**》。北京：三聯。
- 林以亮（1975）。文學作品的翻譯。載於陳鵬翔（主編），《**翻譯史·翻譯論**》（頁196-214）。臺北：弘道文化。
- 金梅（2001）。《**理想的藝術境界**》。深圳：海天。
- 金聖華（編）（1995）。《**傅雷與他的世界**》。臺北：書林。
- 怒安（傅雷）（2005）。《**傅雷談翻譯**》。瀋陽：遼寧教育。
- 孫歌（2000）。前言。載於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頁vii-xxxii）。香港：牛津大學。
- 孫藝風（2004）。《**視角 闡述 文化**》。北京：清華大學。
-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2008）。《**潔白的豐碑：傅雷百年誕辰紀念**》。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許鈞、袁筱一（編）（2001）。《**當代法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
- 郭延禮（2007）。《**文學經典的翻譯與解讀**》。濟南：山東教育。
- 郭建中（編）（2000）。《**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
- 陳偉豐（1983）。談傅雷的翻譯。載於金聖華（主編），《**傅雷與他的世界**》（頁208-216）。臺北：書林。
- 陳福康（2000）。《**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語教育。
- 傅雷（2001）。《**傅雷書簡**》。北京：三聯。

- 斯皮瓦克 (1993)。翻譯的政治。載於許寶強、袁偉 (選編), **語言與翻譯的政治** (頁253-281)。北京：中央編譯。
- 董秋斯 (1984)。 **翻譯研究論文集 1949-1983**。北京：外語教研。
- 趙元任 (1967)。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載於陳鵬翔 (主編), **翻譯史·翻譯論** (頁394-417)。臺北：弘道文化。
- 廖七一 (2000)。 **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南京：譯林。
- 劉宓慶 (1993)。 **當代翻譯理論**。臺北：書林。
- 劉靖之 (1996)。 **神似與形似**。臺北：書林。
- 鄭克魯 (2005)。略論傅雷的翻譯成就。載於怒安 (著), 傅敏 (主編), **傅雷談翻譯** (頁225-239)。瀋陽：遼寧教育。
- 錢鍾書 (1978)。林紓的翻譯。載於錢鍾書 (主編), **七綴集** (1990) (頁83-122)。臺北：書林。
- 謝天振 (2000)。 **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謝天振、李小均 (2005)。 **傅雷：那遠逝的雷火靈魂**。北京：北京出版集團。
- 羅新璋 (1984)。 **翻譯論集**。北京：商務。
- 譚載喜 (1991)。 **西方翻譯簡史**。北京：商務。
- Álvarez, R. & Vidal, C. A. (Eds.)(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erman, A. (1995).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 Kriteva, J. (1998). *L'avenir d'une révolte*. Paris: Clamann-Lévy.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 London: Routledge.
- Proust, M. (1989).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V, Le Temps retrouvé*. Paris: Gallimard.
- Steiner, G.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論日譯漢之翻譯簡化

林慧如

本文針對 Mona Baker (1998) 所提翻譯文本三大普遍特徵 (universal features) 中的簡化現象 (simplification) 進行研究。首先，透過對多位譯者的觀察，探討簡化成因是出於「選擇性調整」(optional shifts)、還是「義務性調整」(obligatory shifts)。其次，針對四篇由準譯者 (譯研所修習第四學期課程之研究生) 譯出的語料，進行簡化手法的分類及分析。同時，再加上一篇成熟譯者所譯的文本做為檢證之用。藉此觀察簡化的屬性特徵及其內部結構，以探索其成因並進一步將簡化的操作梳理成可從源語端順次排列到譯語端的線型描述。

語料分析結果顯示，三種簡化類型的使用頻率依次為刪除、弱化、簡縮。刪除的意義在「去蕪存菁」；弱化則出於「突顯訊息焦點」之需；簡縮的主要意義在於「修辭功能」，如「同義避複」及成語的運用。其中最重要的簡化手法就是訊息刪除，所佔比例超過全體之六成。從各種簡化手法的分布來看，譯者所做的訊息取捨，明顯偏向於譯語端。由源語端向譯語端依序排列，內容包括：「知識背景共有」、「語意重疊」、「訊息強弱調整」、「觀點改變」、「源語特質」、「順應譯語」、「譯語修辭」等。

關鍵詞：簡化類型、簡化成因、線型描述

收件：2008年4月30日；修改：2008年6月30日；接受：2008年10月2日

Simplific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Huey-ru Lin

The study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simplification in translation, one of the three universal features in translated texts, brought forth by Mona Baker (1998). First, through observation of several translations, the study discusses whether the cause of simplification is “optional shifts” or “obligatory shifts.” Second, four texts translated by quasi-translators (students of the fourth semester students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are categoriz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simpl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one text translated by a senior translator will be used as a benchmark. By examining the features and structure of simplification, the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cause an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simplification in a linear way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alysis of the texts shows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simplification appear in the order of deleting, weakening, and shortening. To delete means to “get rid of the redundant”; to weaken means to emphasize only the focal point of a message; to shorten means to “modify”, such as the avoidance of synonyms and the use of set phrase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simplification, the deletion of messages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60%. Judging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simplifying techniques, when translators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simplify messages, they take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nto considerat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causes of simplification may include “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 “overlapped meaning”, “adjustment of the force of a message”, “change of per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language”, “accommodating target language”, and “rhetoric of target language.”

Keywords: type of simplification, cause of simplification, linear description

Received: April 30, 2008; Revised: June 30, 2008; Accepted: October 2, 2008

壹、前言

譯者居於源語作者與譯語讀者之間做為溝通橋樑，而在訊息轉換過程不僅涉及語言差異的問題，更受到文化、歷史、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當源語的訊息內容以他種語言表達時，可能受制於譯語端語彙空缺、譯語語法形式、譯語常規、甚至讀者接受度等因素，而面臨形式與內容無法得兼，必須運用翻譯技法將源語訊息加以調整的情況。從而，本文擬針對日漢翻譯過程的譯語簡化（simplification）現象進行研究。

儘管譯語的簡化現象早在 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於《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即正式提出。只是，前人對「簡化」研究多著重在描述簡化內容（what）而少從如何簡化（how）的角度切入。其次，就語言方向而言，Mona Baker 從英語翻譯語料庫（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簡稱 TEC¹）所得到的研究結果，雖可相當程度對照到中文，然而對中文部分著墨畢竟有限。再者，過去對翻譯簡化之研究多從源語和譯語的比較著手，而較少探討譯者所扮演角色。從而，本文之簡化研究擬以下述兩點為探討重點：

一、語言方向與簡化的關係

本研究擬從確認以及檢驗的角度出發，補強前人研究，尤其將探究不同語言方向的簡化程度是否存在差異。關於語言方向和翻譯簡化的關係，重點在釐清日漢翻譯的簡化現象是否受到源語端或譯語端的影響，是基於語言屬性特質的不同、語法形式的差異，還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所導致。

二、簡化成因與譯者角色

前人對翻譯簡化的研究多偏重對於翻譯策略的描述，對於簡化

成因著墨較少。其次，譯者是譯語形成的主體，甚至 Blum-Kulka and Levenston (1978, p. 399) 也說運用簡化策略規避辭彙空缺是譯者的職責所在。因此，探討簡化現象亦應納入譯者因素，從譯者行為觀察譯者的翻譯選擇，而譯者的翻譯選擇是純粹受到語言系統差異的影響，所進行的義務性調整 (obligatory shifts)，抑或出於譯者主觀認定的選擇性調整 (optional shifts)² 也應一併觀察。

貳、文獻探討

以下評析翻譯簡化的前人研究，奠定簡化研究之理論根據，並從中確立後續探討簡化成因、操作方式等層面時所應掌握的重點方向。

一、Nida 之研究與翻譯簡化

Nida (1964, p. 166) 認為翻譯並不存在絕對對等，譯者應該盡力做到最貼近的自然對等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調整」(adjustment) 即是譯者追求自然對等的手段。

Nida 對於使訊息趨於簡化的調整，稱為減譯 (subtractions)，判別基準主要根據結構是否消失 (structural losses)，以及文法、語意型態是否符合譯語要求 (Nida, 1964, pp. 231-233)。七種減譯現象³ 包括：

1. 省略語意冗餘 (repetitions) 的成分；
2. 省略特定指涉 (specification of reference) 或使用代稱，尤其聖經中重複出現的人名；
3. 省略連接詞 (conjunctions)，使前後句子由從屬關係轉為並列結構，或是以對等語連接；
4. 運用轉折詞 (transitionals)，將承先啓後的敘述簡化；
5. 改變源語範疇 (categories)，以達到自然譯語的目標；
6. 捨去稱呼語 (vocatives)，以尊重不同語言對稱呼語的差異；

7. 捨去在譯語端不具特殊意義的常套句 (formulae)。

首先，從 Nida 對於減譯與否，以「結構是否消失」為判別基準來說，Nida 的減譯事實上偏重在譯語的從「量」簡化，而未顧及譯語之「質」的變化。

其次，Nida 對於減譯的論述，基本上是以譯語端觀點為標準。究其語料大量來自聖經翻譯，為達傳教之目的，為使不同語言、文化、歷史背景的人可以瞭解聖經的內容，以調整訊息做為輔助可說是一種必要之手段。從而，Nida 之減譯固然說明了基於譯語端需求的翻譯簡化，從另一角度來看，倘若文本類型有別，抑或非基於同一翻譯目的時，是否譯者的翻譯選擇將有所不同？而且譯者的考量除了譯語端因素，是否亦受制於源語端因素？Nida 之減譯調整顯然未論述及此。基此，本文對於譯者之翻譯選擇除了譯語端考量以外，亦將兼及源語端因素之探究。

二、Mona Baker 的翻譯簡化

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提出簡化、清晰化與規範化等翻譯文本的三大普遍特徵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⁴。針對翻譯簡化部分，係從辭彙 (lexical)、句法 (syntactic)、風格 (stylistic) 等三大面向加以剖析。

首先，在辭彙方面，Mona Baker 提出六項辭彙簡化的基本原則，包括：

1. 以上義詞 (superordinate terms) 取代譯語的對等下義詞 (hyponym)⁵；
2. 以譯語的近似概念 (approximation of the concepts) 做為替代；
3. 選用普遍性、熟悉的同義詞；
4. 從功能對等角度，轉移源語用詞；
5. 以迂迴表現替代概念相符的高難度詞語 (high-level words) 表達方式；

6. 以釋義方式填補文化差異。

Mona Baker (1998) 的辭彙簡化基本上是以詞語「替代」為出發點，而 Nida 的減譯則重在詞語的「刪略」。換言之，Mona Baker 的簡化偏重在詞義範圍、輕重的改變以及概念的清楚或模糊，而 Nida 較偏重在可刪除、省略的詞語類型。就訊息「量」的角度，刪略固然是一種簡化操作；然而，詞義的範圍、輕重以及清楚與否，亦可視為訊息從「質」的層面所產生的簡化。所謂語言簡化，應不侷限於「量的減少」，或是「質的稀釋」，兩者均屬簡化成分之一。從而，本文對於簡化之定義將把質與量同時納入考量。

關於句法簡化，Mona Baker (1998, pp. 288-289) 援用 Vanderauwera 1985 年的研究，指出複雜句法的簡化包括非限定式子句 (non-finite clause) 譯為限定式子句 (finite clause)，以及中止符號 (suspended periods) 的運用 (Mona Baker, 1998, p. 288)。本文研究之日漢語言組合有別於 Vanderauwera 之德英語言組合，德英同屬印歐語系，尚且發生上述句法簡化，而日漢語言，一為粘著語、一為孤立語，語言差異甚於英德，那麼句法簡化不但也極可能存在於日漢翻譯過程，甚至可能存在更大幅度的簡化；是否除上述結構改變以外，另涉及句式改變或其他形式的變化，本文將就此進行觀察。

三、楊承淑之研究與翻譯簡化

口、筆譯的翻譯過程，前段涉及理解、分析部分應無太大差別，最大差異應在於產出方式以及所受的時間限制。同步口譯邊聽邊譯的特點，使譯者經常處於資訊不足狀態，而必須將訊息儲存而後提取，亦即使譯者的訊息對應經常出現「一對多」、「多對一」的譯法 (楊承淑，2005，頁 20-39)。反觀筆譯由於時間較為充裕，在形式、詞義、句法的對應上要求更精準，因此訊息對應應以「一對一」為主。而且，由於筆譯不若口譯經常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先行產出，而後再伺機補足，因此簡化的訊息單

位亦可能相對較小。據此，後續探討筆譯的簡化時，相較於訊息的對應方式、簡化位置，應更著重觀察譯者對訊息單元的簡化手法。

語料方面，楊承淑（2005）以分屬不同口譯類型、口譯過程以及語言組合的語料，探究口譯簡化與語料類型、譯者的相關性。基於筆譯並無口譯之同步、逐步、轉譯等多重類型之別，為便於觀察、比較譯者的翻譯選擇，並探究日漢筆譯的簡化現象與「選擇性調整」、「義務性調整」⁶之關聯性，應以蒐集多位譯者的同一翻譯文本為最適語料。

關於簡化之定義與類型，相較於 Mona Baker 以及 Nida 等人的研究，多著重在描述簡化內容（what），楊承淑（2005）的檢驗方式較偏向於如何（how）簡化。基於本研究擬探討簡化的原則與規律，除瞭解日漢翻譯的簡化內容以外，更須探討簡化成因，參酌楊（2005，2006）對於簡化的定義與分類，可提供本研究具體的檢驗標準。

楊承淑（2006，頁 182）擴充原先對訊息簡化的分類⁷，並和增補手法形成一對一的對照形式，經簡化手法的重新分類，簡縮與刪除兩項拆解成「省略」、「合併」、「緊縮」，並根據 Nida 的見解重新定義「刪除」，提出「流失」項目。基於緊縮、流失、轉置等類型，其成因顯然與口譯的相關性較大，且緊縮、合併同樣具備重組訊息的操作屬性，再者筆譯之簡化較少跨句之訊息重組，因此就筆譯之研究而言，應無須將原先的訊息簡縮加以重新定義與歸類。其次，儘管筆譯亦有將訊息轉入情境的「轉置」操作，但是僅適用於置入上下文語境時。總結以上，本研究有關簡化類型與定義，擬區分為以下三種：

- （一）訊息簡縮（reduction）：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
- （二）訊息刪除（deletion）：去除冗餘或重複的訊息。
- （三）訊息弱化（weakening）：訊息部分刪除或淡化。

參、語料分析

本文擬透過實證，根據翻譯事實觀察日漢翻譯的簡化現象。基於譯者成熟度以及題材類型可能對觀察結果造成影響，語料選擇（詳參表 1）以文本類型多樣化為原則，並包含成熟譯者⁸之譯作，以彌補觀察缺口。其次為觀察不同譯者對同一文本的簡化處理，採取多位譯者的譯本。

一、語料背景說明

前四篇係取自翻譯研究所的課堂習作，為彌補觀察缺口，語料 5 採取成熟譯者受託翻譯的譯作，該語料篇幅僅略少於前四篇的總和。除驗證用的語料 5 僅有一份譯本以外，其餘語料 1 至 4 皆各取得六份譯本，實際參與譯者共計 14 位，30 人次。

表 1 語料背景資料

語料代號	1	2	3	4	5
語料作用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初步觀察	比對驗證
文本類型	新聞報導— 人物特寫	新聞報導— 環保新聞 特寫	新聞評論— 社論	名人講稿	知見心理學 推廣手冊
語料篇幅 (源語字數)	1381	1100	956	2675	4858
譯者人次	6	6	6	12 (前半、後半 各 6 位譯者)	1
譯者代號	A,B,C,D,E,F	A,B,C,D,E,F	A,B,G,H,I,J	前半： A,B,G,H,J,K 後半： A,B,I,L,M,N	O
筆譯經驗	6 位準譯者	6 位準譯者	4 位準譯者 2 位新進譯者	9 位準譯者 1 位新進譯者	1 位成熟譯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訊息簡化成因

語料分析過程將外在屬性特質相近的簡化事例予以歸類，經過梳理發現影響譯者之簡化操作有以下七種成因，以下將基於共同簡化成因之操作手法加以彙總，並配合實例說明：

(一) 基於知識背景的共有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以「 訊息融入前後文 」的手法藉著代稱取代前後文頻頻出現的高頻詞。例如「京のアジェンダ 21 フォーラム」簡縮為「上述論壇」，或「幸せな成功者」簡縮為「她們」。	操作前提是文本語境所形成的共有知識平臺，使簡化不致影響讀者的理解。這種簡縮手法跨越句子的侷限，因此「訊息融入前後文」應從語篇的觀點視之。而簡化因子乃來自源語端。
刪除	關於「 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 」的手法，刪除對象是主題性的重複詞語、連貫詞、或是雙重修飾語的取大捨小，例如將「良い社風」的「良い」成分去除。	這類刪除都是立足於讀者與譯者共有背景知識的前提，因此訊息內涵可從上下文得到回補，亦即訊息具有可回復性 (recoverability)。而從刪除的語境訊息多屬第二次、第三次出現的訊息來看，訊息刪除也受源語語序的影響，因此應該相對屬於偏向源語端的簡化操作。
弱化	「 雙重語意的取大捨小 」，例如將「直後」譯為「之後」，「開催場所」譯為「會場」或「球場」，「痛感」譯為「感覺」等，操作僅保留核心語意，流失次要訊息。	刪除部分訊息的依據來自於知識背景的共有。而知識背景的形成則來自於前後文，因此弱化因子偏向源語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避免語意重疊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p>「訊息融入前後文」的另一層意義在於避免相同詞語的一再重複。例如將「京都」譯為「當地」、「京のアジェンダ 21 フォーラム」處理為「上述論壇」,以及「幸せな成功者」譯為「她們」等。</p>	<p>這些例子說明了「避免語意重疊」是日漢翻譯的重要簡化成因。相對來說,源語一日語對於詞語的重複與否,似乎比較不是關注的重點。</p>
刪除	<p>基於避免語意重複的刪除手法除了「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係針對主題延續的重複詞語、並列句中的重複詞語,例如「要る物と要らない物」,其次尚有對「言談與思維動詞」的刪除,例如「～と思います」。</p>	<p>言談與思維動詞之所以可刪除,是因為話者思維已包含在語意內涵當中。這些刪除皆以「重複」為要件,基於譯語的訊息先後通常比照源語,對同一訊息通常是保留前者刪除後者。因此,刪除與否決定於源語端。</p>
弱化	<p>「修飾成分去除」的弱化操作,乃是將「いつも」、「まったく」等程度副詞刪除而使得譯語訊息強度趨弱。例如「日本ツアーにきている韓国や臺灣の選手の気持ちが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ね」譯為「參加日本巡迴賽的韓國與臺灣選手的心情,我終於也能夠體會到了」。</p>	<p>「副詞」的流失就外在形式,可視為訊息的「刪除」,然而從其作用在使訊息強度轉弱,而將這類刪除視為訊息的「弱化」。這種「修飾成分去除」的弱化操作,通常副詞的訊息成分已經包含在前後文語意當中,因此弱化前提乃建立在語意重疊的基礎上,弱化因子同樣決定於源語端。</p>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基於源語特質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刪除	「 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 」，例如「ほど」以及「程度」等。這類詞語轉入譯語往往顯得冗餘，而刪去並無損訊息完整。例如「費用も ISO の十分の一程度」譯為「費用僅需 ISO 的十分之一」。	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的語法意義高過實質語意，在譯語無存在必要，從譯語回譯也找不回來，應視為由源語特質所決定的刪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 基於訊息強度的循序調節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弱化	「 訊息處理的先弱後強 」例如「人は皆、…」，譯為「人常因為…」；將「偉大」譯為「有成」等。從詞與詞的對應而言，譯語訊息看似較弱，其實擴大訊息對應範圍時，流失、減弱的訊息可從上下文得到補償。	這種弱化手法雖是順應漢語的功用原則—訊息的「由輕到重」(湯廷池, 1988, 頁 122-130)，然而訊息強弱的調整與否，乃出於譯者主觀判斷。因此，弱化因子應歸於譯者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 基於觀點改變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透過「 敘事觀點、方法的改變 」將觀點調整為譯語端讀者的立場，例如把「効果があつた」譯為「好」；又如日本報紙所載「日本ツアーにきている」譯為「旅日」，其觀點顯然已從日本的本地觀點，轉移為臺灣讀者的視點。	改變敘事觀點可說是譯者調整譯語讀者和源語之間距離的方法。其次，譯者亦可藉改變敘事方法使譯語更為簡潔明快。 這些簡縮手法都是將敘述方法改為符合譯語常規的表達方式，是偏向譯語端考量的操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六) 基於順應譯語型態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語料 1 有許多譯者主動介入「 詮釋並行語言 」的操作。例如『体力にまかせ九週続けて大会に出場したら「あんたバカじゃない」なんていわれてしまった』為間接敘述中穿插直接敘述，而譯語「……被人說成頭腦有問題」則統一為間接敘述。	標點符號可視為文字的「 並行語言 」，譯者藉著去除引號，將敘述方式由直接轉向間接，讓譯語讀者維持在同一視角，這種譯者介入除了個人的判斷以外，其實也受到源語、譯語敘述風格差異的影響。簡縮因子同時來自源語、譯語端考量。
刪除	刪除「 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 」，把源語一再出現的人物名號、敬稱，例如「さん」、「選手」予以刪除。	稱呼語的使用與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⁹ ，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會對譯者產生詞語搭配的「選擇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 ¹⁰ ，刪除明顯是根據譯語端考量。
弱化	譯者藉「 去除並行語言 」手法，去除引號使訊息強度降低的例子，例如「…との会談で一致したのは、『移設先は県内』ということの確認でしかなかった」譯為「會談中…僅是確認了境內遷移的共識罷了。」	日語和漢語對於引號的使用有其相通之處，而最大不同在於漢語可做反諷或質疑之解釋 ¹¹ 。因此，這類手法應從語用層面考量是否在譯語端造成不必要之錯誤聯想，弱化因子決定於譯語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七) 基於譯語修辭需要

簡化類型	操作手法	說明
簡縮	以「 結構精簡的訊息置換 」手法簡縮訊息者，例如「忍び寄る見えない敵」譯為「生理極限」；亦有進一步以成語形式替換的，如「成功者の仲間入りをしている」譯為「成功在望」。	成語是漢語凝聚訊息的極致表現，因而這種訊息置換應視為站在譯語端讀者的角度，由修辭所主導的簡縮手法。一般而言，型態優先於修辭，先求達意而後美化，因而基於修辭的簡化應發生在翻譯流程之後段。
刪除	「 刪除文本重整後的冗餘訊息 」手法運用在譯語跳脫源語重新構句時，有時難以兼顧訊息完整而刪除部分訊息，有時基於詞語搭配的考量而將訊息刪除。例如「人類は、永い間貧しさとの闘いの歴史でした」譯為「人類長久以來都在解決貧窮的問題」。	有時比照源語形式，可能產生語意曲折難懂，甚至語意模糊的情形，因而如此操作可說藉由去蕪存菁、捨輕就重的方式達到修辭效果。
弱化	「 詞義範圍擴大，語意趨於模糊或淡化 」的弱化手法，例如「親友」譯為「朋友」；其次「 語境訊息的調整 」手法，例如將「それがいま」從功能對等角度譯為「然而」。運用「 文本重整 」方式導致部分訊息流失者，例如「普通の能力の人ではできそうもない難しいこと」譯為「太富於挑戰性」。	這幾種弱化手法當中，「文本重整後的訊息部分流失」通常是針對較大訊息單元，而訊息之所以流失，主要是因敘述方式改變而產生詞語搭配的限制。其餘兩種手法多以詞為單位。其次，三者共同之處在於「修辭」考量，使譯語文本朝讀者靠近，展現更高的可讀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以上對簡化成因的分析，訊息「簡縮」的對象屬於單位相對較大的詞組、子句，而簡縮與否則屬個案性質，亦即多屬於譯者可自由裁量的選擇性調整。訊息「刪除」通常以詞語為單位，刪除成因多來自訊息重

複。從譯者行為來看，譯者對於重複詞語的刪除偏向選擇性調整；而在刪除言談、思維動詞以及對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上，兩者皆與語言系統的差異有關，譯者刪除手法的運用也展現高度的一致性，屬義務性調整。

至於「弱化」操作方面，操作的對象通常非核心訊息，譯者可藉此調整語篇強弱度。其次，譯者對「並行語言的去除」、「修飾成分去除（副詞）」的處理一致性較高。亦即，儘管弱化操作皆屬譯者的選擇性調整，然而譯者對於程度副詞的處理方式，往往出現不約而同的傾向。

肆、研究結果

本節將針對語料分析過程所觀察到的譯者共同行為、譯者的介入情形，以及順應譯語對簡化的影響等三個層面說明研究結果。

一、譯者的共同行為

簡縮的共同手法最常表現在訊息單位較大之「結構精簡的訊息置換」（下頁表 2）上，顯示譯者面臨結構解析的困難時，往往會從訊息承載量最大、用字最精簡，也是譯語讀者能立即有效領略的成語、慣用語、諺語等尋求替代方案。

訊息刪除的共同手法除了針對語言、文化差異而進行的「刪除日語的言談和思維動詞」、「源語與譯語敘述風格的差異」、「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的詞」操作以外，其次要屬對語境訊息的刪除（下頁表 2），譯者的共同行為說明了譯語極力規避重複。

訊息弱化的共同手法明顯表現在「修飾成分去除」（下頁表 2），亦即程度副詞的刪略。日譯漢過程譯者選擇將副詞內隱的解決方案，可能是為追求譯語的自然與可讀性、正確性，而在語境、共同知識背景等得以補足訊息的前提下，選擇捨去程度副詞。

表 2 譯者共同手法分析表¹²

簡化類型	簡化手法	源語訊息	語料編碼	譯者人數
簡縮	敘事觀點、方法的改變	「有り難い」という気持ちが湧いてきて	4-53	2
		何としてでもいい会社にして将来に繋いでいこう	4-54	3
	並行語言的詮釋	「あんたバカじゃない」	1-14	2
		「結論の先送りでは困る」	3-8	3
	結構精簡的 訊息置換	意味の無い人生をおくっています	4-9	4
		普通のことを極めていく	4-13	2
		実践してもすぐに成果に結び	4-25	2
		すぐに益がなければ意味が無い	4-44	2
		「有り難い」という気持ちが湧いてきて	4-53	2
		何としてでもいい会社にして将来に繋いでいこう	4-54	3
刪除	刪除日語的言談和 思維動詞	と言うしかない	3-17	2
		ということを認識すべきだ。	3-20	3
		と思います	4-11	4
		と思います	4-19	6
		と思います	4-23	3
		と思います	4-45	5
		と思います	4-46	4
		と思います	4-48	4
		と思います	4-49	4
		と思います	4-57	6
	と思います	4-62	6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京都市内	2-11	2
		対策	2-17	2
		いま	3-4	2
		基地	3-6	5
		副次官	3-8	3
		まず	3-10	2
		自体	3-10	4
移設		3-14	3	

刪除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しかし	4-3	2
		人	4-7	3
		整頓	4-18	2
		全体	4-18	2
		物	4-27	5
		丁寧	4-39	3
		外部から	4-42	4
		せずにはおれない	4-53	4
	源語與譯語 敘述風格的差異	さん	1-2	5
		選手	1-30	6
		さん	1-32	6
	刪除語意抽象、 淡化、虛化的詞	ほど	1-16	3
		程度	2-7	5
		はず	3-16	2
姿勢		3-17	2	
筈		4-17	3	
刪除文本重整後的冗餘 訊息	所が多く見受けられます	4-17	2	
	歴史	4-33	3	
	時代	4-34	2	
弱化	並行語言的去除	「浩美スマイル」	1-4	3
		「県内移設ありき」	3-10	2
	雙重語意的 取大捨小	開催場所	1-12	2
		思い込んでいます	4-8	2
	修飾成分去除	だけ	1-15	3
		よく	1-24	3
		新しく	1-39	4
		そのまま	3-11	2
		いつも	4-19	3
		皆	4-23	4
		要領よく	4-60	3
	詞義範圍擴大 語意趨於模糊	親友	1-15	2
		取り組む課題の一つ	2-17	3
		共同利用実験	2-19	2
	訊息處理的「先弱後強」	皆	4-7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譯者介入

(一) 以成語濃縮訊息

本文觀察到譯者將源語中非成語、慣用語的訊息簡化為成語、四字符，而且如此簡化往往針對同一訊息，表示這種簡化在譯者之間具有相當的共同性。基於對應源語訊息並非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內容，也無關語法、句式差異，因此簡化應可說是譯者主體性的展現。

(二) 改變敘述觀點

譯者改變敘述方式以調整視角，使源語的直接敘述轉變為間接敘述，讀者視角由第一人稱轉向第三人稱。操作的結果首先可能使讀者立場更符合實際情況，因為畢竟譯語讀者很可能無法像源語讀者一樣，和源語作者處於同一時空背景或情境。因此，這種譯者介入調整固然是一種向譯語常規靠近的做法，換個角度來說，更是譯者在衡量讀者立場之後的主動介入。

(三) 訊息分布與訊息量的均衡配置

語料中觀察到譯者壓抑前言以突顯後語，使訊息分布的強弱對比更明顯，突顯核心訊息的做法；此外，亦有考量與前句的銜接性而在句首增益訊息，句尾則將重整文本之後的冗餘訊息予以刪除的譯例。如前所述，這些對訊息輕重以及訊息量的調整其實都是符合語用的功用原則；其次，這些操作多出於驗證用的語料⁵，亦即專業譯者之手，顯示譯者對訊息輕重與分布的調整除了需要更高層次的翻譯技法配合，也可說是譯者基於美化譯語所做的簡化操作。

三、順應譯語和簡化

Nida 的減譯基本上是以訊息在譯語端是否具有特殊意義做為簡化與否的判別依據，本文在順應譯語的簡化方面則有以下不同觀察：

（一）譯語端語法規則決定刪除順序

站在去除源語重複這個翻譯文本共同規範的基礎上，本文觀察到刪除重複詞語還受到漢語語法規則的制約，亦即對「正反問句之並列結構」(coordinate structure) 的刪略原則¹³。這種刪略方式並非出自於譯者個人主觀，亦可從多位譯者的一致性處理手法得到佐證。簡言之，刪除重複是翻譯文本的普遍特性，而刪除方式則可能存在語言差異。

（二）受制於譯語端詞語搭配限制的簡化

譯者處理有別於譯語風格的長句訊息，例如日語常用句式「という」，改寫為譯語端較為自然的句式之餘，往往無法同時兼顧詞語搭配，而使源語訊息產生簡化。根據語料分析結果，因詞語搭配困難而產生的簡化有兩項：一是刪除文本重整後趨於冗餘的訊息；另一項為因應句式改變而產生的詞語搭配困難，不過這必須建立在不影響語意的前提下。

（三）為避免譯語端讀者誤解而產生簡化

過去翻譯研究較少提及簡化與標點運用的關係，然而 Peter Newmark 表示，標點的運用會影響對文本的詮釋（賴慈芸編譯，2005，頁 74）。本文則觀察到譯者對引號的去除，究其原因在於漢語對於引號的運用，往往用於反映諷刺或質疑的意涵。去除引號可避免讓譯語讀者做出超乎源語意涵的聯想。因此，這項簡化操作是譯者基於譯語端的特殊解讀方式而介入的簡化操作。

伍、結論

本節根據語料分析的結果，試將簡化的操作原則與規律做一整理（下頁表 3），並針對日漢語言組合對簡化翻譯的影響，亦即日漢語言組合之簡化「個性」部分提出研究發現。

一、譯者的翻譯選擇

簡化手法之於譯者，代表了不同的翻譯選擇，亦即譯者的溝通取向。為更清楚掌握譯者的翻譯選擇，本文將語料分析所提出的七項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列表對照，同時為進一步說明譯者選擇和源語、譯語的關係，並將簡化因子以源於源語端、譯者主觀，乃至於譯語端做一順向排列。表 3 之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之對照表，既然係根據多位譯者的簡化操作梳理而來，從翻譯實務角度來說，亦可視為一種簡化操作的規律。

表 3 簡化成因與簡化手法對照表

譯者選擇		源語 ←	譯者			→ 譯語
簡化成因		知識背景←語意重疊←源語特質←訊息強弱←觀點改變→順應譯語→譯語修辭 共有				
簡 化 手 法 標 記	簡 縮	訊息融入前後文		敘事觀點或 方法改變	並行語言 的註釋	結構精簡 的訊息置換
	刪 除	刪除上下文或 主題的背景訊息	刪除語意 抽象、淡 化、虛化詞	源語與譯語敘 述風格的差異		刪除文本重 整後的冗餘
	弱 化	雙重語意 取大捨小	訊息處理 先弱後強	並行語言 的去除	語境訊息 調整	詞義範圍擴大 語意趨於模糊
		修飾成分 的去除				文本重整 的訊息流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3，從簡化因子來自源語或譯語端來看，翻譯簡化往往先發生在接近源語端的「知識背景共有」、「語意重疊」的情況，這些相對屬於譯者具高度一致性的簡化操作，訊息單位偏向詞、詞組等較小單位。隨著譯者的主動介入，訊息簡化可能發生在對訊息強弱的調整、觀點改變、

順應譯語、譯語修辭等層面，訊息單位也相對從詞擴大到詞組、句的層級，而產生脫離源語句法的簡化操作；因此，這些也相對偏向譯者主觀的選擇性調整。其次，簡化手法的落點分布並不平均，表中簡化手法的落點相對偏向右方，亦即偏向譯語端者居多，說明譯者的翻譯選擇相當程度決定於譯語端的考量。

二、譯語對修辭要求所引發的簡化

（一）漢語的「同義避複」

反覆是漢語的修辭手段之一，可以用來增強韻律、深化語意、銜接語篇，而重複往往只是透過機械的手段，彌補聽覺或理解的障礙¹⁴。

由上頁表 3 來看，包括簡縮類型中的「將訊息融入前後文」、刪除類型中的「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以及弱化類型中的「雙重語意的取大捨小」簡化因子都源於知識背景的共有，簡化之所以發生都在避免重複。總結來說，譯者可能基於漢語避免重複的修辭原則，產生簡化需求，簡化依據則由共有知識提供，所以讀者不因簡化而產生理解障礙。

漢語之避免重複亦可從數據得到佐證，本文語料的簡化有六成以上屬於「刪除」類型，而「刪除上下文或主題的背景訊息」又是其中簡化頻率最高者。

（二）漢語習於引經據典

成語是在長期的社會語用過程中產生，因此結構相對固定，不能任意改變詞序。由於形成和歷史文化有密切之關係，成語意涵豐富，除了字面意義以外，往往還隱含典故。因此，運用成語，在合作原則的運作之下可使用最精簡的文字喻化、抽象或引申出某種含義，成語的修辭功能也從中產生¹⁵。

表 4 譯入成語的簡化操作¹⁶

操作手法	訊息特點	簡化示例
結構精簡的 訊息置換	將訊息內容 極度凝 聚成爲 成語、四 字格	① 1-28 忍び寄る見えない敵… → 1-28A 生理極限 ② 1-36 しりすぼみで終わっちゃう… → 1-36B 不了了之 ③ 4-9 意味の無い人生をおくっています… → 4-9G 虛度一生 4-9H 虛渡一生 4-9J 虛擲人生 4-9K 磨耗人生 ④ 4-13 普通のことを極めていく → 4-13G、H 精益求精 ⑤ 4-25 実践してもすぐに成果に結びつかないこと… → 4-25A、H 無法立竿見影 ⑥ 4-35 貧しい中で物を求めている → 4-35A 物資匱乏 ⑦ 4-44 すぐに益がなければ意味が無い → 4-44A 重短期績效 4-44N 短視近利 ⑧ 4-46 評価されないことはやらない → 4-46A 唯利是圖 ⑨ 5-37 成功者の仲間入りをしている → 5-37O 成功在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4 來看，許多例子即使沿用源語形式直譯，也不至於產生詰屈聱牙的翻譯腔，有趣的是儘管這些應屬個案性質的選擇性調整，然而將譯語轉換為成語或近似結構的四字格者，卻往往不只是單一譯者的行為。而且，訊息簡化結果即使不是完全相同，如 4-13G、H 同把訊息簡化為「精益求精」，4-25A、H 一致簡化為「立竿見影」；否則也是用詞、結構相近的四字格如 4-9G、H、J、K 之分別譯為「虛度一生」、「虛渡一生」、「虛擲人生」、「磨耗人生」。

這些例子指出兩點值得關注之處。首先，即使不存在語言形式差異、

文化空缺的問題，譯者仍傾向以成語來置換訊息。其次，動機相同結果也未必一致，然而譯者卻不約而同選用同一或極為近似的成語、四字格。引用成語的功效在於「言簡意賅、增強文勢、豐富話語文化內涵」（陳汝東，2004，頁 114），換句話說就是在增加文字張力，表現更豐富的文字意涵。而根據閱讀理論的訊息產出，將接收到的訊息再度產出時，往往只留下語意內容而擺脫形式、語法¹⁷。當上述修辭目的與核心語意同時作用時，譯者選用成語做為替代訊息實屬理所當然，既然成語乃是相沿習用之下的共同文化資產，文化背景相同的譯者將訊息對應到同一成語亦可謂順理成章。

（三）源語屬性特質所引發的簡化

觀察刪除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的簡化手法，屬於兩人以上譯者的共同行為者（表 2），包括「ほど」、「程度」、「はず」、「姿勢」等語法意義高於實質語意的詞語，這種簡化方式無疑和語法差異有關，但究竟為僅適用於日漢語言組合之特殊情況，抑或普遍存在於日語對任何其他語言？針對此一疑問，以下從日譯英文本的訊息處理尋求解答。

根據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原文和英文版對照表（下頁表 5），形式名詞在英譯本裡幾乎都已經消失；例如例 1 的「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在英譯本當中為「on approach to」，顯然沒有「ところ」的對應訊息，例 3 的「気がするくらい」在英譯本中僅譯為「feel」，也未譯出「くらい」。不過，有時為了語言表現的多樣化，也可能將語意淡化的詞對應譯出，如例 2 的「不思議なもの」在英譯本為形式對應的「a funny thing」。

對照日語小說英譯本以及本文語料，可以發現日漢翻譯以及日英翻譯對於語意抽象、淡化、虛化詞同樣傾向刪除，因此刪除原因不應完全歸於特定語言組合，嚴格來說應是受到源語的屬性特質所制約。

表 5 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英譯本的形式名詞處理

語例 編號	對應 訊息	源語／英譯本對照
1	ところ	僕は三十七歳で、そのときボーイング 747 のシートに座っていた。その巨大な飛行機はぶ厚い雨雲をくぐり抜けて降下し、ハンブルク空港に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った。
		I was thirty-seven then, strapped in my seat as the huge 747 plunged through dense cloud cover on approach to the Hamburg airport.
2	もの	記憶というのはなんだか不思議なものだ。
		Memory is a funny thing.
3	くらい	それらはあまりにもくつきりとしているので、手をのばせばひとつひとつ指でなぞれそうな気がするくらいだ。
		I feel as if I can reach out and trace them with a fingertip.
4	こと	私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てほしいの。
		I want you always to remember me.

資料來源：村上春樹（1991）。*ノルウェイの森*（頁 5-17）。東京：講談社。
Jay Rubin (2000). *Norwegian Wood* (pp. 3-9).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四）簡化類型與代表意義

「簡縮」重在長訊息的簡化，其操作手法是透過源語結構的精簡，將訊息置換為語意凝聚而意涵豐富的成語，其意義在「發揮修辭功能」。「刪除」方面，統計數據顯示避免重複是造成訊息刪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去蕪存菁」可視為訊息刪除的代表意義。而訊息弱化從語用角度來看，是譯者藉著調整訊息的強弱、輕重以符合語言的功用原則。因此，弱化的最大意義在「突顯訊息焦點」。因此，簡化操作不代表源語的減損、扭曲，而是以「簡縮」美化譯語；以「刪除」減少冗餘；藉「弱化」突顯核心。

冗餘與不足本就並存於所有語言溝通形式，也是語言轉換過程中譯者必然面對的矛盾，只不過本文係以簡化為研究主題，故未論及翻譯的清晰化現象，事實上王克非（2003，頁 410-417）研究發現，無論英譯漢與漢譯英都呈現目標文本擴增的特點。亦即，翻譯的簡化與清晰化並存於譯語文本，彼此就像一體兩面的關係，由譯者在這過與不及的兩端調節訊息輕重、多寡，確保訊息仍然質純而適量，不因調節而扭曲失真，也不因修補而過度擴增，努力做到「簡化與清晰化的對應與協調」。

（五）結語

本文最終目標在協助譯者掌握簡化成因，靈活運用技巧，達到更有效的溝通。從快速而正確處理大量訊息的角度思考，經條理化的簡化成因以及明確的操作手法應可提供翻譯實踐一些具體可用的參考準則。未來研究的進行方向可從「日譯漢」延伸至「漢譯日」的翻譯簡化研究，並從「語際」比較擴及「語內」比較。

註釋

1. TEC 翻譯語料庫蒐集了各語言譯入英語的文本，分為四個子庫：小說、傳記、新聞、期刊。詳見 <http://www.llc.manchester.ac.uk/ctis/research/english-corpus/>
2. Mona Baker (1998, p. 228) 指出，選擇性調整 (optional shifts) 與譯者風格、意識形態、文化因素有關。
3. 減譯的中文譯詞及其相關描述參考楊承淑 (2006, 頁 168-169)。
4. 該翻譯百科全書係由 Mona Baker 主編，而有關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 部分 (pp. 288-291) 則由 Sara Laviosa-Braithwaite 所撰寫。為避免重複冗長的說明，以下提及翻譯的普遍特徵時，將以資料出處的觀點，標示為 Mona Baker (1998)。
5. Mona Baker (1992, p. 20) 對上義詞、下義詞之區分是根據語義範疇的層級，上義詞指一般性詞語而下義詞則指詞義明確、特定者。
6. Mona Baker (1998, p. 228) 指義務性調整 (obligatory shifts) 源於語言系統差異者。
7. 楊承淑 (2005, 頁 20-39) 提出五項口譯的簡化類型：簡縮、刪除、弱化、合併、轉置。
8. 本文依據參與譯者的筆譯經驗區分為準譯者、新進譯者與成熟譯者。準譯者指翻譯學研究所修習第四學期課程的學生，新進譯者指取得譯研所碩士學位從事翻譯工作未超過三年者，成熟譯者指從事翻譯工作超過三年者。

9. 稱呼語具有「交際引導」、「社交指示功能」、「溝通雙方身分、地位、關係的認同功能」、「情感指示功能」，以及「社會文化標誌」等功能（鄭濤，2002，頁113）。
10. 湯廷池（1982，頁16）指出語法除了規定詞類與語序以外，還要規定詞與詞之間的「共存關係」（cooccurrence relation）或「選擇關係」（selection relation）。
11. 參考金田一京助（1987，頁1273）以及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編（1988）。
12. 語料1～4計有63個訊息單元出現兩位以上譯者採同一簡化手法的情形，以簡化類別來看，簡縮佔10個、弱化佔15個，其餘皆為訊息刪除。為配合說明之便，同時為避免語料篇幅過於冗長，表2僅列出譯者予以簡化處理的訊息內容部分。
13. 湯廷池（1988，頁127-128）指出漢語對於「並列結構的順向刪略」，是把詞組結構中相同詞語出現於左端者，採取從左到右的順向刪略，亦即留前刪後的刪除方式。而並列結構中的相同詞語如果在詞組結構的右端，通常就採逆向刪略，刪除首次出現而保留二次出現的同一詞語（湯廷池，1988，頁127-128），換言之亦即「留後刪前」。
14. 本段參考陳汝東（2004，頁183-185，406-411）。
15. 本段參考陳汝東（2004，頁113-115）。
16. 表4為本文從語料1～5當中，所觀察到之訊息簡縮為成語、四字格的所有譯例。
17. 參考門田修平、野呂忠司（2004，頁101-110）。

參考文獻

- 王克非（2003）。英漢／漢英語句對應的語料庫考察。**外語教學與研究**，35（6），410-417。
-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編）（1988）。**著譯者必讀**。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 陳汝東（2004）。**當代漢語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
- 湯廷池（1982）。**國語變形語法研究：第一集 移位變形**。臺北：學生書局。
- 湯廷池（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學生書局。
- 楊承淑（2005）。同步口譯的簡化類型與規律。**國立編譯館館刊**，33（1），20-39。
- 楊承淑（2006）。口筆譯的簡化與增補規律。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舉辦之「第11屆臺灣口筆譯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65-185），臺北市。
- 鄭濤（2002）。稱呼語的語用翻譯研究。**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13-115。
- 賴慈芸（編譯）（2005）。P. Newmark 著。**翻譯教程 翻譯的原則與方法（A**

- textbook of translation)。臺北：培生教育。
- 門田修平、野呂忠司（編著）（2004）。英語リーディングの認知メカニズム。東京：くろしお。
- 金田一京助等（編）（1987）。くぎり符号の使い方。載於新選国語辞典（頁1273）。東京：小学館。
- Baker, M.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lum-Kulka, S., & Levenston, E. A. (1978). Universals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28 (2), 399-416.
-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結合微觀與宏觀的英漢翻譯教學法 ——兼探討紐馬克《翻譯教程》適用於大學部英漢翻譯教學之程度

張瓊瑩

大學階段的翻譯教學乃培養專業翻譯素養之基礎，本研究的動機是爲了發展更有效的英漢筆譯教學法。根據觀察，傳統大學部的英漢筆譯教學法偏重由下而上 (bottom-up) 微觀式的單句練習與翻譯技巧之傳授；在分析了翻譯師資與教學資源問題後，本研究提倡以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爲基礎，佐以由上而下 (top-down) 宏觀式的教學法，以彌補傳統式教學之不足。研究爲期一學年，對象爲臺灣某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 49 名；資料收集以教師日誌、學生問卷及成績評量爲主。研究結果發現宏觀式之教學方式儘管爲學生帶來較高的挑戰，對於提升專業的翻譯能力有明顯之成效。

關鍵詞：翻譯教學法、筆譯教學、翻譯教科書、紐馬克、翻譯教程

收件：2008 年 8 月 26 日；修改：2008 年 12 月 17 日；接受：2009 年 1 月 12 日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Chiung-ying Cha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glish-Chinese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classroom,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Micro (bottom-up)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larg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mutual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However,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Macro (top-down) approach can better provide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 students so that they are more prepared for the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oday. Thus,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propose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it explores th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their learning processes.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from September 2007 to June 2008, and 49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Micro approach was employed in Semester One while the Macro approach in Semester Two.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Newmark's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as assigned to the clas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Macro approach of teaching. Data was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e instructor's reflective journal, assessments of students and a survey, which was comprised of 5 open-ended questions.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obtain major themes from the three forms of data.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icro approach, the Macro approach offered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 students' competence.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improved and expanded their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ey did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He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Macro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framework for undergraduates in an English-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textbook, Peter Newmark

Received: August 26, 2008; Revised: December 17, 2008; Accepted: January 12, 2009

壹、前言

翻譯課程於全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因而在師資與教學資源上面臨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臺灣學界也有同樣困境。本研究之動機乃為發展有效的英漢筆譯教學法，以期學生所習得之翻譯實踐與觀念盡可能地貼近市場實際的翻譯活動。在分析了翻譯師資與教學資源的問題後，本研究將微觀式的技能傳授搭配宏觀式的翻譯視野與實務訓練，期望除了培養基本的翻譯技巧外，兼能建立學生對翻譯之專業態度與認知。其中，後者的教學方式以功能派翻譯理論為基礎，從翻譯的目的與語言功能為出發點來講授翻譯課程，故選定紐馬克（Peter Newmark）之《翻譯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作為教科書，以彌補傳統式偏重單句與技巧講解之不足。

貳、文獻回顧

大學部的翻譯課程究竟該如何教？以及該教什麼？一直是學界關切的主題，筆者認為，可先從當前的翻譯師資與教學資源兩個面向來探討。

一、師資與教學資源皆受外語教學影響

翻譯課程的師資問題在於，目前大學部應用外語系裡的翻譯課程多由英文老師教授（Wang, 2007），而不是兼具翻譯理論與實務經驗，同時又具備翻譯博士學位的人選擔任專任老師。翻譯是一門新興學科，所以當前持翻譯博士學歷者相對較少，此乃無可厚非；但目前臺灣各大學的師資聘任以具有博士資格者為原則，如此一來專業的專任翻譯師資自然不足，而具專業背景之兼任老師的流動率高，在不能長期耕耘的情形下，教學成效自然受到影響（李憲榮，2006）。

至於教學資源，王慧娟（Wang, 2007）針對大學部應用英語系學生對翻譯課程的需求研究中指出，教授翻譯課的老師面臨之最大挑戰，就是沒有系統化的教學方法及教學內容可依循；他們的專業是英文教學，而非翻譯教學，而翻譯是如此新穎的學科，因此很難覓得充足的教材與教學研究作為參考。

再看中國大陸的情形，對岸的翻譯課程主要也設置在外語系或英語系底下。學者張美芳（2001，頁1）指出：「在我國，翻譯教學一直是外語教學的組成部分，直接受到各種外語教學法及其理論的影響，因此，翻譯教材設計也自然受到外語教學大綱的原則的支配。」張教授針對1949年至1998年之間在中國出版的115種翻譯教材進行分析，她發現到，「大多數教材編纂者仍然沒有把語言教學和翻譯教學區分開來……講到翻譯的實際問題時，總是又回到語言教學的軌道上去。」（張美芳，2001，頁149）

以上提出的師資與教學問題，不單只存在於臺灣與大陸，西方學者柯林娜（Colina, 2003, p. 1）也說：

Numerou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day show an increased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as an area in which to develop new course, majors, and minors, and sometimes translation programs, often with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Many of th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face a serious problem: the lack of sound, consistent pedag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eria on how to approach the issues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course design.... The situation worsens when those in charge of translation courses are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ors, many of whom have been exposed to translation only as a language exercise in thei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nd have no training or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activity.

柯林娜的話指出一項問題，那就是英文老師儘管語言能力強，但卻缺乏翻譯的專業訓練，他們所擁有的翻譯經驗大多源於自身學習外語的經驗，而帶著這樣的翻譯觀點來授課，恐怕很難將翻譯的專業層面介紹給學生。一項由臺灣行政院新聞局所發表的《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指出，教師是否具備翻譯專業素養對教學目標的設定有顯著的不同，研究顯示，有專業訓練的教師視「學生得到充分翻譯練習機會」為最重要之教學目標，而未受過專業訓練者卻是以「提升學生外文能力」為首要教學目標（周中天，2004，5 之 13 頁）。此項研究結果與柯林娜的看法不謀而合，亦即，授課教師若為外語教學出身，才會將原本是外語教學目標的「提升外語能力」，視為翻譯之教學目標。正如報告中所言，若是聘用專業度不夠的老師教授翻譯，不但「授課方法、取得教材將是一大困難，對學生而言，無法習得正確翻譯技巧與態度，更是學生學習權益的損失。」（周中天，2004，2 之 36 頁）以上探討得知，臺灣大學部翻譯師資的「專業性不足」（戴碧珠，2003，頁 71），乃對於翻譯教學成效有著最直接的影響。

外語教學對於翻譯教學（尤以筆譯教學）的影響由來已久，這些影響特別彰顯在翻譯師資與教學資源的問題上。今日，翻譯既已成為一門獨立的科系（即便它是跨學門的科系），師資學歷背景問題或許無法在短期內見到有效的改善，最起碼在教學內容上，不應再依附於語言教學之上，而當以樹立翻譯專屬之教學目標為第一要務。

二、釐清定位：教學翻譯 VS 翻譯教學

根據戴碧珠（2003）對臺灣大學部筆譯教學的研究，在教師之教學目標的調查指出，希望學生具備基礎翻譯技巧占了 91%，而提升中英文理解能力被列為第二重要（78%）的教學目標，作者之結論是：「這說明了教師對翻譯課程的看法——翻譯本身即是翻譯課最主要的目標，而非外語。」（戴碧珠，2003，頁 37）但筆者想進一步提出區分，語言能力的提

升乃為學習翻譯之自然結果，著實不適合列為翻譯課程之教學目標，不論研究者或是教學者都不應混淆或視之為理所當然；語言能力的提升本屬於語言課程應達成之目標，若將此列為翻譯教學的目標，顯示教學者對翻譯專業之認知仍囿限於語言學習之內。

另外，臺灣的筆譯課程設計一般偏重「實踐」（戴碧珠，2003，頁29），以練習和技巧講解為課程設計的重點，而非「情感、態度、或價值」（戴碧珠，2003，頁37）之培養。西方學者紐伯特持不同看法，他說：「翻譯不單是關於語言這項主題，更不只是一門學習語言對比的學問。」（作者之翻譯）（Neubert, 1994, p. 413）另一位學者穆瑟（Mossop, 1994, p. 404）在構思大學部的翻譯理論課時則提出：

It is not enough for translators to learn a complicated set of techniques for resolving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They need to have an awareness of the institutional role they are playing within their society, the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as a method of inter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 very psychology of translation process may induce losses and gains in information.

穆瑟看待翻譯的角度，其實已言明這項活動的本質，翻譯是不斷往返評估、角力、抉擇甚至是妥協的過程，譯者工作的媒介雖然是語言，但當中涉及許多因素是機構與人的問題，譯者的專業素養必然包含對這些因素的處理能力。翻譯是一項專門的工作，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必須能反映市場上的翻譯活動；若只是把翻譯當成「轉碼操作」（transcoding operation）（Colina, 2003, p. 31）講授，那麼無論如何重視實踐，學生的學習依然是見樹不見林，此即說明了，翻譯教師與語言教師在專業能力與教學職責方面，實有很大的出入。

近年來，不少大陸學者已產生一個共識，為了達到有效的翻譯教學，必須區分「翻譯教學」與「教學翻譯」這兩個基本概念（張美芳，2001；

穆雷，1999；穆雷、鄭敏慧，2006）。以下引用穆雷與鄭敏慧（2006，頁4）的說明：

表 1 教學翻譯 VS 翻譯教學

主要區別	教學翻譯	翻譯教學
學科定位	附屬於外語教學 屬於應用語言學	附屬於獨立學科翻譯學 屬於應用翻譯學
教學目的	提高並鞏固外語應用技能	掌握翻譯職業的理念與技能
教學重點	外語的語言結構 外語語言能力應用	翻譯技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雙語轉換與職業翻譯能力

資料來源：穆雷、鄭敏慧（2006）。翻譯專業本科教學大綱設計探索。《中國翻譯》，27（5），3-7。

雖然翻譯是一門新興學科，而且在臺灣，目前多數大學部翻譯課程亦設置在英語系或應用外語系之下，無論學生將來是否以翻譯為職業或投考翻譯研究所，筆者認為身為教師，必須體認翻譯教學（translation pedagogy）與教學翻譯（pedagogical translation）的差異性，才能成功地將翻譯課程目標定位在專業的翻譯能力培養。

三、功能主義的興起

根據以上觀察，大學部的英漢翻譯課堂中，微觀的教學法在外語教學影響下由來已久，但宏觀的翻譯教學卻尚未有充分的實證研究。近年來，大陸與香港在翻譯教學上的研究論文數量有長足的增長，雖然，誠如穆雷與鄭曄在〈近 50 年中國翻譯教學研究的發展與現狀〉中所評述的，當前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方法仍以「思辯性與經驗性為主，實證性研究較少，研究結果缺乏說服力」（穆雷、鄭曄，2007，頁 66），但當中的某些觀點，依然值得我們學習。目前，大陸有些學者提倡將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翻譯理論應用在翻譯與教學上（成昭偉、白彬，2007；熊婷婷，2007；聶慧、肖善香，2007），以期更能符合現今非文學翻譯活

動爲主的市場需求。功能主義興起於 20 世紀 80 年代左右的德國，其核心觀念爲：「翻譯的目的決定了翻譯手段」（張美芳、錢宏，2007，頁 14），並認爲讀者與譯者皆會對翻譯的溝通過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換言之，翻譯決策是根據整體情境來取決，翻譯的標準不再一味以追求文字對等爲依歸，甚至，譯者也不再是隱形人。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筆者整理出幾點結論，作爲本研究筆譯教學之方針：

- (一) 教學方法——如何教：微觀的教學（例如語言對比、翻譯技巧）必須再佐以宏觀的教學方式，如此不但可爲學生奠定翻譯技巧的基礎，且能教導學生翻譯這門專業的本質，擺脫「翻譯等同語言轉換」的刻板印象。
- (二) 教學內容——教什麼：現今翻譯作爲一門專業化與商業性的溝通活動 (communicative activity) 所涉及的種種面向，包括譯者、作者、委託者、文本目的如何牽動譯文的翻譯等，這些議題必須透過課堂的實踐讓學生充分體會。

參、研究設計

研究實施期間自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共一學年。

一、研究對象

參與此次研究的對象是筆者授課的兩班大三「中英翻譯」學生，總數 50 人。此爲應用外語系的必修課，授課期間爲一學年。學生在大二時已修過一門「翻譯導論」，該課程指定教科書爲陳定安的《英漢比較與翻譯》(2006)。

二、教科書：紐馬克之《翻譯教程》

有鑑於本研究後半部所採取的宏觀理論架構——功能主義，特選定紐馬克之中文版《翻譯教程》(2005)一書作為教科書，這本教材具備下列特點：

- (一) 英國學者紐馬克的翻譯理論被歸類為德國功能主義翻譯學派(張美芳, 2005)，作者從語言功能的角度教導譯者如何分析文本，討論相應的翻譯策略，書中並提供許多筆譯操作之實用建議，是一本理論與實務兼備的教科書。
- (二) 中譯版的《翻譯教程》本身就是一部傑出的翻譯作品，書中諸多翻譯手法都是學生可以直接學習的對象，這是其他中文教材所沒有的附加價值。

不過，這本教材究竟適不適用於大學部英漢教學，仍有待研究證明，理由如下：

- (一) 作者談翻譯原則主要是針對印歐語系之間的對譯，對於英漢翻譯的適用程度究竟有多高，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 (二) 本書經過中文翻譯，其譯文的用字遣詞對學生而言或許並不容易吸收。
- (三) 本書的中譯本於2005年出版，但原文書於1988年出版(Newmark, 1988)，距今已近20年，當中的理論是否禁得起時間考驗，是否適合現在的翻譯趨勢與市場需求，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三、實施過程

上學期並無指定教科書，而是由教師彙整相關資料，自行編列講義供學生使用。有鑑於多數學生尚未有充足的實務經驗，此階段的授課方式屬於由下而上的微觀教學法，授課內容主要有三：翻譯概論、中英語

言對比分析、常用的翻譯技巧。課堂間有大量的單句練習，以提升學生對翻譯技法的瞭解與應用能力。期中評量是針對翻譯技巧所設計的單句及一篇短文翻譯題，而期末評量則是發一長篇英文及其中文翻譯給學生，除了請他們整理報告譯文當中所使用過的翻譯技巧外，學生必須進一步指認譯文中幾處錯誤，並以自己的翻譯取代之。這學期的教學目標是透過經常演練，讓學生對於轉換兩種語言的技法達一定熟悉度，故在選材上以各式單句練習為主。

下學期的教學目標是，從功能觀的角度建立學生對翻譯的認知，並讓他們在翻譯流程上有一整套的實務經驗。此階段的訓練採小段落的文本為單位，以不同體裁的小型文本協助學生瞭解紐馬克所指的語言功能與文本類型之概念。課堂活動多為加強學生吸收教科書內容而設計，包括練習以書中建議架構評論他人的翻譯作業、分析比較同一文本的不同譯作、擷取教科書的原文用以討論內容與中譯文、佈置各領域專有名詞查詢，及提供回譯（BTT）的英漢實例與練習等。每次上課都會討論學生的作品，並鼓勵學生踴躍發表自己的創作。此外，為了幫助學生培養尋找資源的能力，也讓他們意識到翻譯操作過程所涉及的多元性，教師亦適時補充不同的教材，如中文標點符號使用法、選讀翻譯期刊文章、漢語拼音與通用拼音的介紹與提供相關網路資源等。期中與期末的評量採任務導向，讓學生實際模擬翻譯情境；學生以小組型態，合力翻譯 *Becoming Vegan* (Davis & Melina, 2000) 一書的第一章 *Vegan Roots*，總計共 13 頁。詳細翻譯任務規定請見附錄 1。

四、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有二：

- (一) 學生對上下兩學期分別實施的微觀與宏觀式教學各有何回饋？
- (二) 紐馬克的這本教科書適用於大學部英漢翻譯教學的程度。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結合質化與量化的方法，將教師、學生與評量成績三方面的資料做交叉分析。資料來源有三：

(一) 教師上課觀察日誌

上下學期均作每堂課的教學日誌，記錄上課情形與學生學習狀況。

(二) 下學期期末實施開放性問卷調查

開放性問卷設計可讓每位學生都能暢所欲言，比深度訪談能觸及更多的受訪者，並廣羅多元、詳細的意見。回收的問卷總共 49 份，為求資料的可信用度，將整學年曠課率高於 30% 的 3 名學生問卷排除，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46 份。

問卷問題如下：

1. 你覺得紐馬克的這本教科書內容易懂嗎？請說說你的看法。
2. 跟上學期所教的內容比較起來，你覺得何者比較容易學？何者讓你學到比較多？
3. 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翻譯作品，請問從這部作品當中，你是否也具體地學到一些關於翻譯的實務？
4. 你認為這本書與陳定安的《英漢比較與翻譯》比較，有何不同？哪一本書比較適合你？
5. 你覺得這本教科書所教的內容，對你在做這學期的期中與期末翻譯任務有幫助嗎？

(三) 下學期小組作業的期中與期末成績比較

這項資料用以評估學生整體上對於宏觀教學法搭配教科書的吸收狀況。上學期的成績採行個別評量方式，故不適合與下學期的小組作業作比較。

肆、研究結果

一、教師觀察日誌

(一) 上學期

根據研究者（即授課教師）之觀察，學生對上學期的授課反應頗佳，原因是一來課程內容對他們的能力不會造成負擔，二來課堂練習與檢討的時間較多，加上教師以平常成績加分的方式鼓勵大家上台分享自己的作品，激發了學生的成就感與參與度。學生只要憑藉他們已有的中英文能力，加上課堂的聽講，便能輕鬆過關。這個階段，他們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往往不是理解英文，而是以適當的中文來表達；從課堂間討論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自己的中文程度不夠好。

(二) 下學期

下學期的授課以教科書為主軸，剛開始有些學生受到不小的衝擊，上課發言比例稍有降低，應是課程內容的難度比上學期高之故，但透過講解與課堂的練習，從學生的反應得知，他們的吸收力多半有提高。再則，這學期教學的評量不再圍繞著句子和翻譯技巧，而是以小組合作的方式翻譯一整篇文章。同學在第一次期中作業的表現普遍不佳，研究者發現，很多觀念或理論即使列入授課內容，也可由課本參考，但是學生並沒有應用在自己的翻譯實務上，這顯示書中的理論須透過實作才能進一步被內化，否則「知道」與「做到」之間仍會有差距。

第二點發現，從期中作業整篇譯文的結構來看，學生中文標點符號的運用能力不足，而維持上下譯文的連貫與流暢性也是他們新發現的挑戰，這些都是從前光做單句練習時無法顯現的問題。整體而言，由於翻譯的單位由句子擴大為文本，加上教科書的內容不易理解，下學期的課程的確對學生的挑戰較大。

二、開放式問卷

以下分別整理學生對問卷中五個問題的回應：

(一) 你覺得紐馬克的這本教科書內容易懂嗎？請說說你的看法。

有 67% 的學生（31 人）表示這本書的內容不易吸收，原因一部分是翻譯過的文體所致，以下摘錄其中一位的話：

《翻譯教程》本來就不是國人寫的中文書籍，它是經由翻譯產生的譯文，有時候我會覺得賴老師的譯文其實也有些僵硬，而且影響到我對課文內容的理解。再者，因為作者不是中國人，書中提到的有些例子根本與中文的翻譯無關，這也讓我漸漸對課本失去興趣，章節也都是跳著讀，選擇想看的部分看，無法全部吸收。

儘管有 31 人認為課文較難理解，其中的 17 人卻也肯定這本教科書帶給他們學習上的收穫，讓他們見識到翻譯過程的複雜面，例如語言功能、文本分析、翻譯的程序、評論、操作程序、全面性概念及架構等等。幾位學生寫道：

這本書讓我受益良多，它不僅提出很多翻譯的見解，也提供確切的翻譯方法，它讓我瞭解到翻譯涉及的層面廣大得讓我無法想像。以前單單地認為只要把原文翻譯出來就好了，但現在我可不這麼認為。

從這學期的翻譯課中，我比以前更瞭解翻譯所要擔負的工作及使命了。並且瞭解要分析文本，瞭解文本的背景與風格，才可能完成好的翻譯作品。此外，還要注意文本的態度，字面意義與言外之意，所以也讓我知道往後如果要從事翻譯的工作就要注意這些細節。

另一方面，有 6 名學生與前面 31 位學生持不同觀點，他們覺得這本教科書容易吸收，並且理論與實務皆備；其中的 2 位更明白表示這是本成功的教科書，應列為翻譯員之必讀書目。

拿到教科書的時候還蠻開心的，因為它看起來不會像文詡詡的教科書，反而像是書局買得到的那種商業出版的書，內容讀起來也很順，一開始我還在想，翻譯的理論該比企業管理的辭彙更難掌握，想不到譯者居然有辦法翻到沒什麼外文的痕跡，又能確切表達紐馬克要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實在是不簡單，我想給這本書很高的評價。

(二) 跟上學期所教的內容比較起來，你覺得何者比較容易學？何者讓你學到比較多？

全體受訪者都一致認為上學期所教授的內容比較好學，而且由於花在課堂演練的時間較多，不少人提到上學期課堂裡熱絡的討論對他們來說比較有趣。

我認為上學期的課程內容比較有趣，而且也好吸收，老師每教一種翻譯法，就會有練習題讓我們作，然後再全班一起討論；這學期大部分都在講教科書上較為理論的東西，課堂馬上練習馬上檢討的機會比較少，所以和上學期比起來就會覺得枯燥乏味。但認真說起來，透過下學期長篇的翻譯練習，外語能力有比較顯著的提升。

不過，有 15 個人表示，儘管這學期學的授課內容比上學期深奧，而且期中期末任務的挑戰也很大，但他們認為這學期收穫較多，以下是他們部分的回答：

上學期的教學方式對我來說比較簡單，可是學到的東西比較少，因為上學期教的是兩種語言，翻的通常是一兩句的句子；這學期是翻一整篇的文章，所要注意的事項更多，像是標點符號的運用、專有名詞還有翻譯腔的問題，也因此，我所學到的東西也就更多了。

原以為翻譯是門輕鬆的課程，但真正著手進行翻譯這樣工作之後，我發現身為一個譯者實在太辛苦了！不僅要收集許多關於原文的資料，還要分析資料、討論和研究，最後才開始慢慢的翻譯。不過這學期真的受益

良多，也因為要真正去學習翻譯一篇文章，我認識了更多專有名詞、單字，也更懂得如何分析句子的結構。

另一位同學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題，但也比較了上下學期之授課內容：

在上下學期的教材中，其實學習到的知識很多，上學期是著重翻譯的「基本功夫」，然而這學期我想會選用這本教材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只要學習翻譯一段英文和句子，而是要學習如何翻譯一整篇文章或是其他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需要仔細考量的範圍擴大許多，透過最重要的文本分析，我們才能更謹慎的定位譯文的風格、決定翻譯方法等等。

(三) 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翻譯作品，請問從這部作品當中，你是否也具體地學到一些關於翻譯的實務？

這一題有提供答案的學生只有 16 位，他們全都給予正面的肯定：

賴慈芸老師不單只是寫出譯文，還有加以附註說明。從事翻譯工作時，無論從何處獲得資訊，都必須註明來源處，清楚地告訴讀者，對作品負責，另外，若原文與譯文有些小差異，也必須加以解釋。

這個學期的期中期末作業，有些專有名詞的處理，和連貫層面的運用，我都會去翻一下課本，看是不是有給什麼樣的建議，另外，註解的處理也都是從教科書學來的。

(四) 你認為這本書與陳定安的《英漢比較與翻譯》比較，有何不同？哪一本書比較適合你？

有 6 人認為這兩本教材各有千秋：

簡單來說，陳定安老師那本書教我怎麼翻譯單獨的句子和字詞；賴慈芸教授則讓我懂得怎麼將整篇文章完整的翻譯出來。

有 13 人很明確表達比較喜歡《英漢比較與翻譯》或認為這本書較適合自己：

我比較喜歡陳定安老師的書，因為同樣都是以中文的角度去看翻譯，舉的例子也更貼近中文翻譯的實例。

我比較喜歡陳定安教授的《英漢比較與翻譯》，這本書比較多例句，而且提供的是英漢譯文，這對我們比較有幫助，而且沒有這麼理論，讀起來不會枯燥乏味。

倒是有一位同學對紐馬克的書情有獨鍾：

如果要選擇這兩本書的話，我覺得紐馬克這本教科書讓我學習較多的翻譯課程，不管是翻譯原則還是翻譯方法，都有一一解釋並提出作者的見解。而陳定安的書比較偏重於中文和英文詞語的差異，雖然也可以學到翻譯技巧，但理論的東西比較少，也沒有確切的翻譯方法。

(五) 你覺得這本教科書所教的內容，對你在做這學期的期中與期末翻譯任務有幫助嗎？

有 52% 的同學（24 位）表示《翻譯教程》對他們進行期中與期末作業有幫助，像是文本分析、註解、標點符號、文本類型、專有名詞的處理等。以下摘錄幾位同學的話：

在操作實務上，翻譯教程倒是提供了較為完善的練習，也因為書裡完善的介紹全面性的理論架構，我學會怎麼分析文本，也更瞭解翻譯技巧。特別是在處理期中和期末作業的時候，有挑戰性的原文需要更仔細的推敲和更多次反覆閱讀對照，課本裡提過的許多細節能避免我在翻譯時出錯，也能讓我順利將 SL 轉換成 TL。

我覺得有用，因為翻譯任務不像以前，只是翻譯句子或是一小段文章，這次是七、八張 A4 的長篇文章，必須要注意到很多地方，像上下文的連貫、專有名詞和名詞的解釋、內文的背景等等。從書中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對剛開始要進行翻譯文章的我，在下手前可以學得應該注意的事項。在翻譯的過程中，像是第七章「直譯」、第十二章「格位語法與翻

譯」、第十七章「翻譯批評」，在我陷入翻譯困境的時候，都有點醒我，讓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翻譯。

也有4個人認為《翻譯教程》對翻譯任務沒有幫助，反倒是上學期教的東西比較有用，其中之一：

這本教科書所教的內容對我在這學期的期中與期末翻譯任務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在尋求幫助時，還是會去拿上學期的講義來參考，也許是那些講義清楚又簡單吧！

三、下學期學生小組作業的期中與期末成績比較

學生以4至5人為一組，總計兩班共有12組，以下為各組期中與期末成績比較表：

表2 期中與期末成績比較

組別編號	期中成績	期末成績	進步或退步幅度
1	65	80	+23%
2	61	75	+23%
3	58	53	-9%
4	75	72	-4%
5	60	83	+38%
6	60	80	+33%
7	68	80	+18%
8	76	80	+5%
9	69	85	+23%
10	71	76	+6%
11	61	72	+18%
12	65	84	+29%

註：進步或退步幅度計算方式為，期末成績減去期中成績，再除以期中成績，四捨五入至整數之後，以百分比呈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成績結果發現，在學生翻譯同一文本、及期中與期末一貫之評分方式的狀況下，除了兩組有少許退步之外，其餘十組的期末評量分別有5% 甚至到38%的進步比率，顯示有八成左右的學生，在期末處理翻譯問題的能力已經比先前提升。

伍、討論與結論

一、微觀與宏觀式的教學搭配比例

由學生對上學期的授課觀感得知，互動、練習與討論的方式能鼓舞他們的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但從他們如此正向回應中亦可推知，上學期的授課內容挑戰性偏低，畢竟他們是應用外語系的大學生，相對上已具備一定的中英文互譯基礎，對部分程度較好的學生來說，甚至不需要每堂課都參與也可以及格。至於下學期，學生的學習困難主要在於吸收翻譯成中文的西方理論，以及翻譯的單位從句子、段落擴大為一篇文章。學生學習理論的興趣素來較低，這點與王慧娟（Wang, 2007）調查翻譯課程學生的需求所得到的結果一樣，很多學生對於密集講授一本翻譯理論較濃的教科書一開始適應不良。但隨著期中小組作業的進行，學生開始發現課本上的理論和他們翻譯實踐間的關係，學習狀況也慢慢地漸入佳境，這點由他們期末成績進步的情形可得到驗證。

這項研究結果對於大學部的翻譯教學設計、教學法比重的分配應有一定之啓發，例如，在有限的教學時間架構下，減少微觀的教學，並增加宏觀式的教學時數，如此一來既可維持學生的興趣與參與度，也能給學生充足的時間消化翻譯理論。

二、翻譯能力之訓練應包含態度與觀念的培養

如前文所述，臺灣地區大學部翻譯課程設計與教學目標以「實踐」為主，而相對缺乏態度與價值觀之培育。本研究在上下兩學期都讓學生有大量的翻譯實踐，只是實踐的內容不同；上學期著重句子與段落，下學期則強調篇章與整體的連貫性。根據學生的問卷作答顯示，翻譯句子對他們而言很容易上手，其實不難理解，這種翻譯實踐與他們學習外語時的翻譯練習差異並不大，當然挑戰性也就有限。但是面臨一整篇文章時，根據學生在問卷上第一、二與五題的回應，他們意識到翻譯所牽涉的問題之廣，超乎自己以前的認知，也開始懂得從整體的角度思考翻譯的過程，並實際體驗身為譯者的處境。由此得知，課堂上的實踐，不能過度著眼於句子的練習，雖然這在訓練翻譯技巧的初期無可避免，一旦學生打下基礎後，訓練的範圍應擴大到健全與專業的翻譯實踐，包括在時間壓力下完稿、團隊合作的精神、實事求是地查證資料、電腦與網路資源的應用等等，長遠來看，這樣的翻譯能力與視野方為實用。

三、《翻譯教程》之選擇性講授

整理分析學生的回答之後，發現主要有以下原因，導致他們難以吸收課本內容：

- (一) 因為這是本翻譯書，讀起來有翻譯腔、「僵硬」或「看文言文」之感，以至於影響對課文內容的理解。
- (二) 有學生的形容是這本書「理論太多」，或是「內容比較有深度，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思考理解」，學生對於理論的內容感到枯燥沉悶。
- (三) 學生自認程度不夠好，加上之前對翻譯專業及理論的涉獵太少。
- (四) 課本與習作本所提出的例子，許多原文都是學生不懂的外國語（例如德語或法語），導致學生比較不易把例子所闡述的理論應

用在自己的翻譯作品，也較會產生隔閡或排斥的感覺，因而打斷了閱讀的思路。

(五) 內容抽象不易理解，而且較缺乏組織、系統。

然而也有另一部分學生表示，這本書對期中與期末的翻譯任務有助益，再對比他們期中與期末作業所表現出的進步情形，顯示如果配合適當的講解與活動輔助，《翻譯教程》的內容中也有不少適合英漢翻譯實踐的理論，故無論是否列為教科書，教師可以參考書中合適的翻譯觀念與操作來講授。另外，多增加一些本書的原文供學生對照，一來可加強對內容的吸收，二來有現成的譯文作參考，也不失為另一個討論翻譯的良機。

四、運用功能論視角創造專業性之翻譯教學

進一步觀察學生比較兩本教科書的回答，有一點值得提出來討論：喜歡《英漢比較與翻譯》或認為它適合自己的 13 位學生中（見問卷第四題回答），他們的理由歸納起來大體上是因本書以英漢互譯為主，較容易理解，至於書中內容是否有助於對他們從事翻譯實踐時的應用、或解決他們遇到的翻譯問題，除了提到本書教會他們翻譯句子之外，似乎沒有進一步的描述。反之，就算排除第五題（針對《翻譯教程》對作業任務的幫助）之回答，從學生在問卷第一題與第二題的回應可看出，經過一學期的訓練之後，學生可以寫得出自己具體學到的觀念或實務操作，例如建立起翻譯過程全面性架構、文本分析、譯者的意圖、註釋的處理等。由此推論，以功能視角為出發的宏觀教學法搭配《翻譯教程》的運用，雖然內容對學生而言難度較高，但卻可以在教學上創造前面所提的翻譯「專業性」面向，彌補傳統英漢翻譯教學法之不足。

五、結論

本研究探討的是結合微觀與宏觀的翻譯教學法之成效，以及學習英漢翻譯的大學生對紐馬克《翻譯教程》之使用心得。研究顯示，宏觀的

翻譯教學法帶給大學生的挑戰雖高，但學生獲得的知識與經驗，更接近市場上專業譯者所具備之能力與實際面臨之狀況，是值得擴大落實的教學方式。不過，《翻譯教程》一書若作為大學部英漢翻譯課程的教材，尤其是針對缺乏實務經驗的學生，教師需要配合學生程度選擇內容做好課程規畫，本書方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陸、研究範圍與限制

雖然此研究屬於應用翻譯學中的翻譯教學 / 譯者訓練範疇，但因研究的對象為大學部應用外語系學生，而非翻譯系的本科生，受訪者將來真正有志從事筆譯工作的人比例或許並不高。因此，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會有其侷限性，並不能代表翻譯系學生可能有的意見，故教學上的應用不一定完全適用於翻譯系本科之英漢翻譯課程設計。

第二點限制來自上課時間本身，由於紐馬克的書只有實施一個學期而非整學年，學生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吸收陌生的翻譯理論並不容易¹，因此必然也會影響他們對這本教科書的看法。

第三點限制源於開放性問卷的設計，雖然開放性問題可以讓每位學生自在表達，並較易捕捉豐富的資料，但在效度上因沒有提供答案給學生選擇，有時會發生受訪者沒有表明自己意向的狀況，因此分析時較不易建立系統性之量化結果。

柒、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未來的研究可以同樣的教學法搭配來調查大學部翻譯系本科生之回應，並在資料的收集上作更多元的變化，例如問卷同時包含封閉與開放式問題，深度訪談與學生作業評量等。除此之外，也可針對這兩種教學法設計控制組與對照組的方式，探討兩組學生對於不同教學法之反應與學習成效。

註釋

1. 教科書的授課章節為第 1, 2, 3, 4, 5, 7, 16, 17, 18, 19, 20 章。

參考文獻

- 成昭偉、白彬 (2007)。功能目的論與實用翻譯教學。《遼寧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30 (2)，74-76。
- 李憲榮 (2006)。在臺灣設立翻譯學系大學部的問題。《國立編譯館館刊》，34 (3)，59-66。
- 周中天 (2004)。《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
- 聂慧、肖善香 (2007)。目的論指導下的廣告語篇英漢翻譯策略運用及特點。《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91-93。
- 張美芳 (2001)。《中國英漢翻譯教材研究 (1949-1998)》。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張美芳 (2005)。《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張美芳、錢宏 (2007)。翻譯研究領域的“功能”概念。《中國翻譯》，28 (3)，10-16。
- 陳定安 (主編) (2006)。《英漢比較與翻譯》。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熊婷婷 (2007)。功能派翻譯理論視角下的翻譯教學。《四川文理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17 (4)，78-80。
- 賴慈芸 (譯) (2005)。P. Newmark 著。《翻譯教程》。臺北：培生教育出版集團。
- 穆雷 (1999)。《中國翻譯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穆雷、鄭敏慧 (2006)。翻譯專業本科教學大綱設計探索。中國翻譯，27 (5)，3-7。
- 穆雷、鄭曄 (2007)。近50年中國翻譯教學研究的發展與現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18 (5)，60-66。
- 戴碧珠 (2003)。臺灣各大學英文系及應用英文系筆譯教學現狀探討。臺北：輔仁大學。
- Colina, S. (2003).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 Bost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 Davis, B., & Melina, V. (2000). *Becoming vegan*. Summertown: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 Mossop, B. (1994). Goals and methods for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theory. In M. Snell-Hornby, F. Pochhacker,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Neubert, A. (1994).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A complex skill, how to study and how to teach it. In M. Snell-Hornby, F. Pochhacker,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Wang, H. C. (2007, December). *A study on Applied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needs for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cour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Kaohsiung, Taiwan.

附錄：期中期末小組筆譯任務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模擬背景：

《常春雜誌》將與臺安醫院聯合舉辦一場名為「生機飲食新起點」的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美國的營養師與作家 Brenda Davis 及 Vesanto Melina 蒞臨演講。《常春雜誌》擬將兩位作家合著的英文書《Becoming Vegan》的第一章「Vegan Roots」翻譯成中文，介紹生機飲食在國外的發源與演進。該文將分成兩次刊登在《常春雜誌》上，你與你的小組接獲這個翻譯任務，必須在 4 月 29 日以及 6 月 24 日各完成 50% 的譯文。

任務目的：

1. 藉由翻譯此文本，將所學的理论應用於實踐。
2. 實地經驗翻譯的整個流程，包括文本分析、專業資訊的搜尋、解決問題、修稿等等。

評分項目：

1. 作品是否反映出對原文的正確理解。
2. 作品句子間的銜接是否流暢。
3. 作品的譯文風格是否合乎此類文本的功能、作者的意圖與讀者的屬性。
4. 專有名詞或特殊辭彙的處理是否審慎、正確。
5. 文字讀起來是否自然、是否有翻譯腔。

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 以中港臺及日韓大學為例

楊承淑

本文以中港臺及日韓各地設有翻譯研究所的 10 所大學為對象，分析其口筆譯圖書典藏的數量及類別，透過以研究所為主體的教學單位圖書典藏內涵，探索其教學及研究上的思考方向及屬性定位。由於中港臺各翻譯研究所碩士班，都以中英文為最重要的語言組合。也為了便於比較對照，本文的調查對象也將以中英文圖書為觀察分析的目標。至於日韓兩國，則僅以英文書籍為調查對象，以收比較對照之功。

在分類基準方面，參酌 Holmes (1972/2001) 及 Toury (1995, p. 10) 提出的翻譯學結構圖為基礎，做為本研究的分類指標。其中包含翻譯理論、描述性翻譯研究、應用翻譯研究等三大類，其次類劃分之細項則共計 10 項。

透過本研究的調查與分析，可以回顧過去數十年來，翻譯教學在東亞地區的發展特徵，並作為今後本學科前瞻性規劃時的佐證。而另一方面，則對於翻譯學科的分類，藉由圖書館藏去重新檢視前人研究的有效性，並補充其中尚未涵蓋的內容，以重新審視本學科分類的階層架構。

關鍵詞：口筆譯學科分類、口筆譯圖書分析、翻譯系所的屬性定位

收件：2008 年 9 月 5 日；修改：2008 年 10 月 21 日；接受：2009 年 1 月 12 日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ok Archives: An Examin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eng-shu Ya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ok archives at ten universities with graduate institut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cusing on the quantities of the books and how the books are categorized. The universities are located i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concepts and positioning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at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book archives at graduate institutes. Masters level graduate program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emphasize Chinese and English a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combination.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this paper focuses its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on books about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order to produce a meaningful comparison, the analysis for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institutes is limited to English language books.

The basic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in this paper are based on the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Holmes (1972/2001) and Toury (1995, p. 10). The three primary categories are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se three primary categori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en subcategories.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is paper will allow researchers to re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 in East Asia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can also be used as validating eviden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ield. Additionally, the study of book archives assists in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or research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helps to fill the gaps that prior research failed to address. Through thi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be reexamined.

Keywords: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ok archives, positioning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stitutes

Received: September 5, 2008; Revised: October 21, 2008; Accepted: January 12, 2009

Cheng-shu Yang, Professor /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001652@mails.fju.edu.tw

壹、前言

全球第一個創設口筆譯課程的瑞士日內瓦大學，自 1941 年成立翻譯口譯學院以來，跨越了二十世紀，已達 67 年之久。如今，翻譯教學的可行性與重要性，早已受到全球一致的肯定¹。然而，支持翻譯教學的圖書典藏究竟是怎樣的面貌？在翻譯教學相關的知識經驗中，哪些是各校的共同脈絡、哪些是反映各自不同見解的結果？從各校的圖書典藏之中，我們可以循線找出該系所對於翻譯教學的觀點及定位。

以中港臺等華語圈為範疇，審視前述主題時，創設歷史最久者，首推北京外國語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兩者皆設立於 30 年前。也就是說，華語圈的翻譯教學，較之歐洲起步晚了大約 30 年。因此，積累翻譯圖書的時期，也是近 30 年才開始的。至於東亞方面，韓國外國語大學的翻譯碩士課程創立於 1979 年，與北外的「聯合國譯訓班」正好是同一年起步。而日本第一所翻譯碩士班課程，卻到了 1995 年才在大東文化大學設立。可以說，東亞地區翻譯系所的成立都是近 30 年以內的事，能夠超過 10 年的系所，都可算是稍具規模了。而這些年輕的學科，成立之後是如何吸取鄰近學科的養分，以壯大其成長所需的能量。從各校的圖書典藏書目錄，可以做為探測該學科發展情況的重要指標。

本文將以中港臺及日韓翻譯系所成立 10 年以上的大學為對象，每一地區各 2 校，總計調查標的共 10 校。其中，日本的第二所翻譯系所成立雖晚，但卻已有博士課程，因此一併納入，以保持每一地區皆達 2 校採樣上的均衡²（詳表 1）。

表 1 調查標的概況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韓國	日本
北外（1979）	中大（1972）	輔大（1988）	韓外大（1979）	大東文化（1995）
廣外（1997）	浸會（1990）	臺師大（1996）	梨花大（1997）	立教大學（200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東亞地區各大學的翻譯研究館藏入手，除了得以探索各校翻譯藏書的屬性及其教學與治學觀點之外，對於翻譯學科的分類基準研究而言，大學圖書館藏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佐證資料。如此，彷彿開啓了一扇明亮的門窗，導引我們走入本學科的分類寶庫。

貳、翻譯學科的分類研究

根據 Holmes (1972/2001) 及 Toury (1995, pp. 7-19) 對於翻譯學的學科分類，主要分為探討翻譯現象的「純粹翻譯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及具有精進翻譯作用的「應用翻譯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³。

在純粹翻譯研究之下，再分為建立翻譯的普遍原則，並用於解釋及預測翻譯現象的「理論性翻譯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以及描述翻譯作品 (product)、功能 (function)、過程 (process) 的「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在「理論性翻譯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之下，可分為適用於所有翻譯的「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 以及僅適用於某些範疇的「專門理論」(Partial theory)。其方法及目的如下：

1. 普遍理論 (General theory)：援用原則 (principles)、理論 (theories) 及模型 (models) 等，以解釋或預測特定語言間的翻譯過程或現象。
2. 專門理論 (Partial theory)：僅限於某一翻譯問題的解釋或描述性研究。包括以下 6 類：
 - (1) 翻譯問題 (problem-restricted)
 - (2) 翻譯層級 (rank-restricted)
 - (3) 翻譯語對 (area-restricted)
 - (4) 翻譯媒介 (medium-restricted)

(5) 文本類型 (text-typed restricted)

(6) 翻譯時期 (time-restricted)

根據 Holmes 的解釋，翻譯學科的理論性、描述性、應用性研究，既可用於闡釋普遍理論，亦可印證專門理論。三者之間地位等同，而且是相互作用、彼此呼應的（詳如圖 1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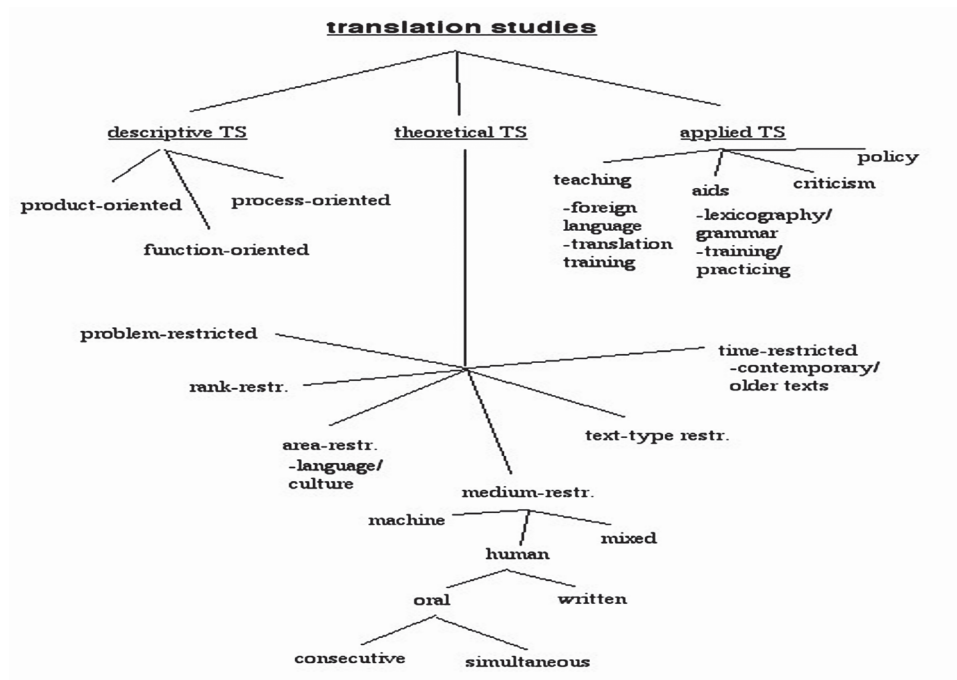


圖 1 Holmes' map

資料來源：2007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santana.uni-muenster.de/Seminars/TranslationStudies/Protocols/protokoll0305.html>。

然而，Toury (1995, p. 1) 對於 Holmes 的見解，卻有不同的看法。他特別凸顯了「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角色功能，並視之為翻譯研究的軸心。理由是，他不認為翻譯研究可以跳脫實證，而得到完整且有系統的結果。

此外，Toury (1995, p. 15) 也指出描述性翻譯研究的實證結果，是導引或印證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因此，他把 Holmes' map 中的「描述性翻譯研究」加以放大，同時也降低了應用研究的位階。

在「應用翻譯研究」方面，Toury 認為應用研究並非翻譯活動的核心，僅能視為翻譯研究的延伸 (extensions)。對象包括譯者的養成方法、翻譯工具的探討、以及翻譯品質的檢驗等。(下圖引述自伯明罕大學英語研究中心之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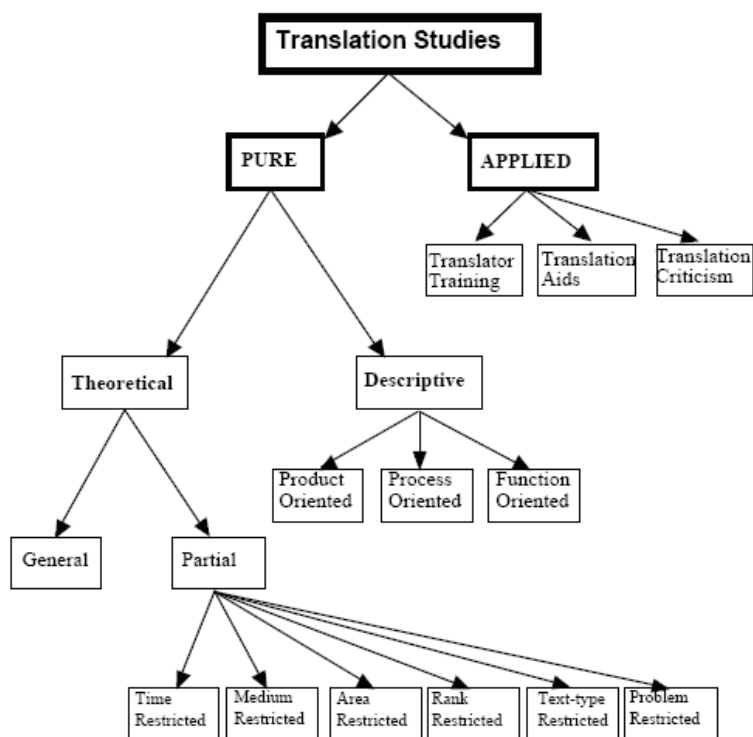


圖 2 Toury 的分類圖示

資料來源：2007 年 10 月 16 日，取自 <http://www.cels.bham.ac.uk/samplemats/ITSpdf/01it.pdf>。

以下，根據 Toury (1995, pp. 7-19) 的類別定義及梳理，筆者從 Holmes 與 Toury 的描述中提出 10 個分類項目，再加上分類標誌的關鍵詞或定義上的描述。

表 2 翻譯學科分類及關鍵詞、定義描述

普遍理論 (General theory)	關鍵詞 / 定義描述
翻譯理論【譯論】 (Translation / Translating Theory)	文學理論、性別、國家、文化 翻譯概論、理論與實踐、技巧
描述性翻譯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關鍵詞 / 定義描述
翻譯【媒介】(medium-restricted)	手語翻譯、影視翻譯、口譯、口語與書寫
翻譯【語對】(area-restricted)	特定語言或文化的對應關係研究
翻譯【層級】(rank-restricted)	詞素、詞語、句子、篇章的層級研究
【文本】類型 (text-typed restricted)	文學、法律、商業、技術文本或文類研究
翻譯【時期】(time-restricted)	限定某一時期的翻譯問題，如翻譯史
翻譯【問題】(problem-restricted)	翻譯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如隱喻、等值、理解
應用翻譯研究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關鍵詞 / 定義描述
譯者【培訓】(translator training)	教學、課程、譯者角色、翻譯政策
譯助【工具】(translation aids)	辭典、詞庫、網路技術
翻譯【批評】(translation criticism)	譯作效度、評價基準、評論、品質

註：【 】內為該項目之簡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述翻譯學科的分類，肇始於 Holmes (1972, 1988) 為描述翻譯研究應有的範圍而勾勒。後經 Toury (1995, p. 10) 加入了不同的觀點及詮釋，而產生了新的類屬關係。然而十幾年來，衡諸近代各學科及其鄰近領域的急速發展，以上分類是否足以兼容並蓄？若有不足因應之處，我們有必

要加入新的分類項目，才能反映現代翻譯研究的進展及其實際狀況。此外，以上 10 項分類之中，對於數量內容皆達龐雜的項目，是否應進一步做次類劃分的規劃，也是可以一併考量的時候了。

此外，從 Holmes 1972 年在丹麥第 3 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年會，提出學科分類芻議以來，歷經 Toury (1995) 的梳理及增修。對於不斷茁壯的翻譯學研究，適時地進行分類探討及基準檢視，可說是符合學科發展的需求，也是豐富翻譯學科內涵的有效方法。

而另一方面，相對於數十年前，前人研究僅能以學問的脈絡立基，推論翻譯學科的類屬及發展，其間不乏學者的想像與推估，故與當初翻譯學科的實情，恐怕原本就有若干落差。通過本研究針對近 5 千冊圖書的分類及梳理，對於前人研究的結果，不無佐證或修補之功。

參、調查範圍、方法、及探討

本研究鎖定的 10 所翻譯系所之中，設有翻譯研究博士班的共有 8 所。包括：北外、廣外、中大、浸會、臺師大、韓外大、梨花女大、立教大學。僅設碩士班的則是輔大、大東文化。各校系所學制及中英圖書藏書量詳如下(表 3)：

表 3 各校翻譯系所學制及藏書量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外	梨花	大東	立教	小計
學士	○	○	√	√							4
碩士	√	√	√	√	√	√	√	√	√	√	10
博士	○	○	√	○	√		√	√		√	8
英書	262	129	751	444	173	115	120	246	83	160	2,483
中書	655	890	252	230	148	325					2,500
小計	917	1,019	1,003	674	321	440	366+243=609			4,983	

註：√：指翻譯系所，○：則指該校其他教學或學術單位設立之翻譯課程。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如今，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電腦應用的普及，使得我們得以無遠弗屆地掌握翻譯系所的圖書館藏。再透過 EXCEL 等資料庫分析及統計工具，更有效地提升了本研究的精確程度。尤其，上述各校無論系所成立期間及碩博士班營運狀況，都具有一定的指標性，因而成為本研究搜尋及分析新類別的主要線索。例如，設有博士課程的學校，圖書數量與未設博士課程的大學相比，明顯多出了許多（見表 3 灰階欄位）。

以下，根據 Holmes 與 Toury 的分類，針對各校館藏進一步分項如下（下頁表 4）。

表中斜體字部分，則指分類項目中的次類。對於次類的說明，依序簡述如後：

譯叢：指探討翻譯問題的期刊或叢刊。

口譯：各種型態、技能、功用的口譯描述。

文本：指單一著作（如聖經翻譯）之探討，或背景知識之概述。

文集：指同一主題之系列叢書或期刊。

文類：指文學、法律、新聞、科技等不同類別及文體之翻譯研究。

譯者：指譯者之傳記或譯者之自述。

測試：指應考翻譯證照之書籍。

教材：學校之教科書或自修之參考書。

從學科分類的觀點看來，前述次類當中的「譯叢」與「文集」兩類（見標 * 處），顯然並不具備學術分類上的意義。但由於圖書數量不少，必須加以區分之後才能看出該類別真正的屬性特質，故在此暫且賦予次類的項目名稱。

至於本研究的調查時間，則分為兩階段進行⁶。中港臺方面是以 2007 年 10 月為基準，而日韓方面則以 2008 年 1 月為準。對於版次相同之複本書，以不重複計入為原則；而版次不同的書籍（亦即 ISBN 編碼不同書號者），則視為不同書籍而計入總冊數。而在統計方式上，以下各表中凡以灰階顯示者，是指至少達 10% 或是具有比較對照意義的項目。而百分比

的計算，則僅取其整數。

表 4 各校翻譯藏書分類及數量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外 / 梨花		大東 / 立教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英	英	英
語言	68	126	49	181	169	166	156	152	99	74	63	161	38	130	34	74
譯論	68	126	49	181	169	166	156	152	99	74	63	161	38	130	34	74
<i>譯叢：探討翻譯問題之期刊</i>					60		55									
百分比	26	19	38	20	30	66	48	66	57	50	55	50	32	53	41	46
調整後	42%	31%		33%	46%	(左欄為扣除比重過高的項目後，譯論占全體之百分比)										
媒介	2	0	3	1	4	0	2	0	2	0	2	2	1	4	1	2
口譯	10	28	13	55	9	15	4	19	13	7	6	22	18	24	5	10
語對	23	75	16	85	39	3	25	2	1	27	5	29	6	10	7	5
層級	19	21	9	18	11	7	11	5	3	7	5	18	12	12	22	25
文本	*101	20	13	85	*134	21	*111	10	18	6	7	23	5	13	1	9
文集					*221		*35									
文類		50		67	*30		0	0				17			6	11
時期	3	19	3	16	17	0	10	1	0	6	0	12	2	10	0	3
譯者	8	3	0	5	5	6	5	5	1	0	1	1	6	4	0	1
問題	5	26	4	1	8	2	2	1	2	1	2	1	5	7	0	1
小計	171	242	61	333	478	54	205	43	40	54	28	125	55	84	42	67
百分比	65%	37%	47%	37%	64%	21%	46%	19%	23%	36%	24%	38%	46%	34%	48%	42%
教學	8	*149	10	*122	19	7	13	12	8	10	8	15	12	13	3	6
測試： 應試用書		*54		*194		1		3		0						
口譯教材		*45		*25												
工具	12	24	3	24	21	17	14	12	25	6	15	18	14	18	4	13
批評	3	15	6	11	4	7	1	8	1	4	1	6	1	1	0	0
小計	23	287	19	376	44	32	28	35	34	20	24	39	27	32	7	19
百分比	9%	44%	15%	42%	6%	13%	6%	15%	20%	14%	21%	12%	23%	13%	8%	12%
合計	262	655	129	890	751	252	444	230	173	148	115	325	120	246	83	160

註：* 表比重過高之項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4 的各項數據可以明顯看出，中港臺地區對於中英文圖書的典藏偏向。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方面，中文圖書以翻譯教學、應試用書、口譯教材等應用領域為主，且占有顯著的數量（占 4 成以上之項目以灰階標示）。香港方面，在英文期刊、叢書、系列圖書以及引介各學科背景知識的文本類圖書方面，居極高的比重。而臺灣方面，則在工具書上較受青睞。

若僅從英文書籍來看，臺灣、韓國、日本的共同點在於對翻譯論述幾乎都以最高的比重加以收藏，其中超過 50% 者有三校（臺師大、輔大、梨花），超過 40% 的也有三校（浸會、大東、立教）。而各地之間的藏書屬性內容，也呈現了區域上的一致性。例如，香港、臺灣、韓國等校，在英文譯論的藏書內容上，分別出現了僅有該區才有的書籍屬性。至於北外與香港中大的英文藏書中，由於文本所占比重過高，致使譯論比重相形偏低。若扣除各校比例過於偏高的單一項目之後，經調整後之百分比，其實各區之間相去不遠（北外、中大分別占 42% 與 46%，見表 4 左上「調整後」欄位）。

而同一地區的學校之間，譯論所占的比重又往往極為接近。例如，香港中大與浸會的中文譯論，以及臺灣師大、輔大的中英書譯論比重，都出現了幾乎等同的現象。而北外與廣外的中文譯論比重，若扣除兩校藏書中比重最高的教學、測試、教材後，中書所占百分比約為 31-33%。

其次，針對口譯、語對、層級、文本等描述性翻譯研究範疇的內容加以探討。在口譯方面，大陸（廣外）、韓國比重最高，英文書籍份量略高於中文，大約以 10-15% 的比重納入館藏。其次則為臺灣、日本，平均約為 6%。至於香港兩校口譯書籍僅占 1%（0.9-1.2%）。而語對方面，只有在大陸與臺師大等校收藏略多⁷；香港、韓國、日本則都不顯著⁸。語對類書籍是指，兩種特定語言之間的對比分析或翻譯研究；但由於中文書籍對於英漢語的比較對照遠多於英文書籍，故有中書遠多於英書的現象。而中國大陸的語對類中文書籍之所以數量較多，原因為兩校都是外語背

景的大學，因而收入了較多英文以外的雙語對比類書籍。例如，北外語對類中，收藏了日語、法語、德語、俄語與漢語的對比分析圖書。而廣外則涵蓋了日語、俄語、韓語與漢語的語對類書籍。相對於此，臺灣師大的語對比重較高，主要集中在英漢對比分析或翻譯技巧上。輔大的語對類比重則相對較低，且英語以外的語對也不多（僅日、西、法各 1 冊）。

表 5 中港臺翻譯次類比重偏高之中英藏書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總數	262	655	129	890	751	252	444	230	173	148	115	325
口譯	10	28	13	55	9	15	4	19	13	7	6	22
百分比			10%							5%	5%	
語對	23	75	16	85	39	3	25	2	1	27	5	29
百分比		11%	12%	10%						18%		9%
文本	101	20	13	85	134	21	111	10	18	6	7	23
文集					221		35					
文類		50		67	30							17
百分比	39%	11%	10%	17%	51%		33%		10%			12%
工具	12	24	3	24	21	17	14	12	25	6	15	18
百分比											1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6 各校翻譯次類比重偏高之英書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大	梨花	大東	立教
語言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總數	262	129	751	444	173	115	120	246	83	160
口譯	10	13	9	4	13	6	18	24	5	10
百分比	3.8%	10%	1.2%	0.9%	7.5%	5%	15%	10%	6%	6.3%
語對	23	16	39	25	1	5	6	10	7	5
層級	19	9	11	11	3	5	12	12	22	25
百分比		12%					15%		35%	19%
文本	101	13	134	111	18	7	5	13	1	9
文集			221	35						
文類			30						6	11
百分比	39%	10%	51%	33%	10%					13%
工具	12	3	21	14	25	15	14	18	4	13
百分比					14%	13%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層級方面，意指對詞素、詞語、句子、篇章等語言問題的探討。比較重視這個問題的，正好都集中在日本與韓國（外語大）。主要內容是英語語法、語意、語用等問題的討論。

此外，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英書典藏，都有為數眾多的文本類圖書；所占比重（見表 5）分別達 39%（101 冊，北外）、51%（385 冊，中大）、33%（146 冊，浸會），且各校的屬性差異頗大。北外的英文文本內容主要是文學類；而中大與浸會的英文文本，則除了文學類之外，還包含了各學科的概論等，與翻譯背景知識相關的書籍。而輔大的中文文本類，六成屬於強化翻譯背景知識的書籍，四成則討論金融、新聞、歌劇、文學等文

類的翻譯問題。

至於應用研究類藏書，以臺灣輔仁大學與韓國外國語大學顯現了較高的關注。就整體的出版數量來看，是各地區書量占整體比重最少的一類（表 7、表 8），且英文書的比重高於中文書籍（20-23% 比 12-15%，見表 7、表 8）。內容以機器翻譯、工作手冊、翻譯軟體或辭典類工具書為主，著重於提升翻譯效率及相關工具與操作準則的探討。

表 7 各校應用研究類英書類別及數量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外	梨花	大東	立教
語言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總數	262	129	751	444	173	115	120	246	83	160
教學	8	10	19	13	8	8	12	13	3	6
工具	12	3	21	14	25	15	14	18	4	13
批評	3	6	4	1	1	1	1	1	0	0
小計	23	19	44	28	34	24	27	32	7	19
百分比	9%	15%	6%	6%	20%	21%	23%	13%	8%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但明顯不同於港臺日韓的是，大陸北外（248 冊）與廣外（341 冊）在教學、應考、口譯教材方面的中文書籍，兩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高達總冊數 38% 的館藏比重。且其書籍總數與其他各校的寥寥數冊（中書：7-15 冊；英書：8-19 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詳表 8）。而入學考試、取得證照或課堂教學用途的書籍，在大陸以外的地區並未列入各校典藏書目之中。這類圖書的收藏，也正反映了中國發展翻譯教學的觀點及其特質。

表 8 中港臺應用研究類中英藏書類別及數量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總數	262	655	129	890	751	252	444	230	173	148	115	325
教學	8	149	10	122	19	7	13	12	8	10	8	15
測試		54		194		1		3				
口譯教材		45		25								
小計		248 (38%)		341 (38%)								
工具	12	24	3	24	21	17	14	12	25	6	15	18
批評	3	15	6	11	4	7	1	8	1	4	1	6
總計	23	287	19	376	44	32	28	35	34	20	24	39
百分比		44%	15%	42%		13%		15%		14%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下，就中港臺韓日近 5 千本藏書內容，依從 Holmes 與 Toury 的主要類別劃分，分別描述中英文書籍的屬性特質，並檢視項目分類與館藏之間的落差如下：

一、中英譯論內容與屬性

譯論的性質可分為理論性、實證性、經驗性。其中，理論性的論述，大都有藉助其他領域的傾向。如援引文學、文化、政治、性別、社會等理論，作為探討翻譯問題的闡釋方法。而實證性方面，則以翻譯問題或現象為主體，透過文本或語意分析等方法，探討翻譯文本內容與翻譯現象，試圖提出條理化的描述。總體而言，英文書籍的內容，大都屬於前兩者。

而中文譯論書籍，約有兩成屬於資深譯者的經驗披露（書名中含「漫談、偶談、縱橫談」，或是「論翻譯、話翻譯」等）。而另一類譯論，則

以介紹國外理論性或透過文本分析提出實證性翻譯見解為主。但就長遠的翻譯學科發展而言，中文論著有必要從內涵上發展理論性及實證性譯論的深度與廣度。

二、中英描述性研究的內容與屬性

在描述性研究方面，中文書籍數量與內容，若扣除與翻譯研究較無直接關連的文本與文集，冊數約僅譯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見表 9，扣除 T1+T2，即文本 + 文集兩項後，與最末行譯論數量之比較)。參閱表 9 倒數第 2 行則顯示扣除文本與文集後，本類占總書量之比重約為 13-18%。如廣外、中大、浸會之中英書，以及臺灣之英書。

表 9 中港臺描述性研究中英藏書類別及數量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總數	262	655	129	890	751	252	444	230	173	148	115	325
媒介	2	0	3	1	4	0	2	0	2	0	2	2
口譯	10	28	13	55	9	15	4	19	13	7	6	22
語對	23	75	16	85	39	3	25	2	1	27	5	29
層級	19	21	9	18	11	7	11	5	3	7	5	18
T1. 文本	101	20	13	85	134	21	111	10	18	6	7	23
T2. 文集	0	0	0	0	221	0	35	0	0	0	0	0
文類	0	50	0	67	30	0	0	0	0	0	0	17
時期	3	19	3	16	17	0	10	1	0	6	0	12
譯者	8	3	0	5	5	6	5	5	1	0	1	1
問題	5	26	4	1	8	2	2	1	2	1	2	1
小計	171	242	61	333	478	54	205	43	40	54	28	125
扣 T1+T2 後之書量及 百分比	70	222	48	248	123	*33	*59	*33	*22	48	*21	102
	27%	39%	16%	13%	16%	13%	13%	14%	13%	32%	18%	31%
譯論	68	126	49	181	169	166	156	152	99	74	63	161

註1：「扣 T1+T2」指扣除「文本+文集」後之藏書量。

註2：「扣 T1+T2」後之藏書量，不及譯論半數者以*標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體而言，描述性研究似乎是中文書籍數量較多、且較有特色的類別。此外，在文本類方面，中文書對於文學、財經、新聞、法律、科技等文類的翻譯問題，呈現了多元發展的面貌。此外，還有譯作與經典譯作的探討（如聖經、紅樓夢），也是文本類圖書典藏的特色之一。

表 10 各校描述性研究英書類別及數量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外	梨花	大東	立教
語言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總數	262	129	751	444	173	115	120	246	83	160
媒介	2	3	4	2	2	2	1	4	1	2
口譯	10	13	9	4	13	6	18	24	5	10
語對	23	16	39	25	1	5	6	10	7	5
層級	19	9	11	11	3	5	12	12	22	25
T1. 文本	101	13	134	111	18	7	5	13	1	9
T2. 文集			221	35						
文類			30						6	11
時期	3	3	17	10			2	10		3
譯者	8		5	5	1	1	6	4		1
問題	5	4	8	2	2	2	5	7		1
小計	171	61	478	205	40	28	55	84	42	67
百分比	65%	47%	64%	46%	23%	24%	46%	34%	51%	42%
譯論	68	49	169	156	99	63	38	130	34	7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在譯者傳記、譯史等「時期」項中，針對特定時期的回顧式研究方面，大陸與臺灣的中書較多（表 9）；而香港與韓國則在英書典藏上比較突出（表 10）。此外，有關口譯的中英著述，無論中、港、臺、韓，則都有增加的趨勢（見表 9、表 10）。

三、中英應用研究的內容與屬性

單就數量來看，大陸的北外與廣外，不同於港臺日韓，都有極大量的翻譯教學、應考及口譯教材等中文圖書。由於典藏基準的不同，大陸以外的港臺地區並未將此類圖書納入館藏之中。而另一方面，在教學相關的英文書籍中，有些雖然也是教材性質，卻依然獲得各校的典藏青睞（詳表 7「教學」項）。可見港臺日韓對於教學論著，大都以學術性作為館藏與否的基準，而未曾考慮其應試或取得證照等實用性質。此外，港、臺、日、韓各地的學校，其工具類藏書幾乎都超過了教學研究的數量（詳表 7、表 8「工具」項）。相較於本區域廣設翻譯系所的現況看來，對於翻譯教學研究的關注，顯然落後於實際需求。

從以上針對三大類別所做的屬性分析及內容檢討結果，還可以進一步對應於中港臺及韓日翻譯系所的教學及研究方向，檢視館藏圖書與教學研究之間的關係。首先，從譯論類藏書來看，各校在數量方面，平均約達總冊數的四成五（各校數據詳表 4「譯論」欄及其百分比），可見整體而言是重視理論研究的。且就內涵上看來，理論、實證、經驗三者兼而有之，也可說是反映現階段研究工作的現況。但中英書兩者相較，英文書的理論及實證屬性，還是遠高於中文書籍。

其次，在描述性研究方面，出現了某校在特定項目的書籍上有比例偏高的現象。此一情況，除了歸因於圖書編目採取每書一號的方式所造成的數量膨脹之外，多數情況都是出於教師的教學觀點所致。因此，文本類書籍偏高，可以解讀為教學上對於翻譯背景知識的要求。但如果該類書籍與翻譯系所實際的需求並不吻合（如偏重於數學或生物等學科），則

該批文本可能是來自其他系所的介購。又如，語對偏高的現象，則可推論為教學上對於雙語對比分析的需求。此外，語法、語意、語用等層級類圖書比重的偏高，也有可能因為該類書籍來自於語言系所的介購，與翻譯系所未必相關。但至少可以推估，該校擁有此類資源與人才。對於翻譯系所而言，亦不失為有力的條件。

在媒介研究方面，中文口譯藏書數量，可說一枝獨秀，在中港臺甚至有超過英書的現象。這也顯示了中港臺學習口譯的熱潮，可說方興未艾。而韓國在口譯的英文書籍上，顯然關注的程度遠超過日本。這也說明了口譯在韓國遠比日本，更加受到重視。

此外，參照應用研究類的書籍內容，大陸各校館藏大量出現的應考書籍及口譯教材，在入學與證照考試的推波助瀾之下⁹，翻譯系所對於試題裡出現的口筆譯文本或語篇，似乎比港臺大學採取更為接納的立場。

如果把中港臺韓日各校的翻譯典藏，視為該系所的知識地圖，我們可以進一步描述其屬性特徵及意義如下：

（一）譯論：顯現系所教師對於翻譯的思考深度與廣度

無論翻譯與其他學科領域的融合、或是通過大量實踐檢驗的歸納、或者由譯者現身說法的經驗之談，透過抽絲剝繭的梳理及向下扎根的深入剖析，都將是通往條理化的理論之路。從不同的比例，可知各校對於此一問題的關注已無庸置疑。

（二）描述：顯示系所過去及現在對口筆譯教學與研究的關注重點

這個領域是變化較大、範疇較廣的類別。內容包含：翻譯的媒介、口譯的特質、語言的對比、翻譯的詞語、背景知識的掌握、不同文類的翻譯、特定時期的翻譯問題、譯者傳記、翻譯過程裡的普遍問題等。而這些面向，都是翻譯教學中最常出現的具體問題。

（三）應用：顯示系所擴展口筆譯教學與研究的視野

應用層面的議題，如工具、批評等都只是個別的選項，並非翻譯系所日常教學或執行實務上的課題。但是從典藏的數量及內容，至少可以

看出該系所劃定的視野及未來可能開拓的領域。就教學研究的屬性特徵而言，此類藏書則足以看出該系所的教學法與教學觀。

以下，再次援引三類館藏數據及各項比例，進一步為上述觀點提出佐證。

表 11 中港臺中英翻譯藏書量及類別比重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中
總數	262	655	129	890	751	252	444	230	173	148	115	325
譯論	68	126	49	181	169	166	156	152	99	74	63	161
百分比	26	19	38	20	30	66	48	66	57	50	55	50
描述	171	242	61	333	478	54	205	43	40	54	28	125
百分比	65	37	47	37	64	21	46	19	23	36	24	38
應用	23	287	19	376	44	32	28	35	34	20	24	39
百分比	9	44	15	42	6	13	6	15	20	14	21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中書三大類別的比例可以看出，譯論類在大陸的比重約達 20%，香港達 66%，臺灣則為 50%。而在描述類方面，大陸的比重達 37%，香港約達 20%，臺灣則約 37%。至於應用類方面，大陸的比重約達 43%，香港約為 14%，臺灣約為 13%。從統計分析中可以看出，各地區在同一類別的比重上，顯現了不約而同一致性，可說耐人尋味。或許，這也正反映了各地區翻譯學界對於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基本觀點。或者反過來說，地區的特質或需求，是否也成為左右翻譯觀點的重要因素？尤其，當我們以中港臺較易取得的中文書籍來做比較時，似乎更清楚地顯現了此一推論的基礎，確有其相對的立足點可資對照。

無獨有偶，此一現象似乎在臺灣、香港、日本的英書典藏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可供參照（見表 12）。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翻譯的引進或詮釋，區域性的需求或觀點不妨視為一項觀察性指標。畢竟，此一分析結果不會是單一系所或少數學者的看法，值得今後透過書目的異同比對，進一步加以深入探討。相對於此，各校在某一類別的顯著落差，則可以視為不同系所對於某一領域的關注或偏好。

表 12 各校翻譯英書藏量及類別比重

項目	北外	廣外	中大	浸會	臺師大	輔大	韓外	梨大	大東	立教
語言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總數	262	129	751	444	173	115	120	246	83	160
譯論	68	49	169	156	99	63	38	130	34	74
百分比	26/42	38%	30/46	48%	57%	55%	32%	53%	41%	46%
描述	171	61	478	205	40	28	55	84	42	67
百分比	65/27	47%	64/12	46/13	23%	24%	46%	34%	51%	42%
應用	23	19	44	28	34	24	27	32	7	19
百分比	9%	15%	6%	6%	20%	21%	23%	13%	8%	12%

註：斜線右側的數字，指扣除比重過高項目之後的比重¹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中港臺韓日共計 10 所大學的口筆譯圖書館藏，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翻譯的學科分類中，有些項目還是十分薄弱的。這樣的現象，一方面緣於該領域的研究未臻成熟。而另一方面原因，則是出於翻譯系所選擇圖書的基準問題。尤其，在特定項目上，某校典藏數量明顯與平均值落差過大時，選書基準正是其關鍵問題的核心。但這也說明了該校翻譯系所對於翻譯的詮釋觀點，同時也反映了該系所在翻譯教學及研究上的自我定位。

肆、結語

透過本研究對於翻譯學科分類的檢驗，可以看出 Holmes 與 Toury 的學科分類，除了部分項目可以再行細分之外，在分類的解釋性上似乎並無困難。而從以上各大學現有的圖書典藏中，也可以據此明確指出哪些分類項目是有必要，且值得立項的。

至於中英書籍的比較對照上，透過本研究可以看出，譯論中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為英書之強項；而描述性研究中，口譯、語對、譯史、譯者則中書具有發展潛力；至於應用研究中的教學及測試，則是中書已經大量推出，而未來可望進一步深化的領域。而工具類書目前英書較受關注，未來也是中書可望拓展的知識疆域。

註釋

1. 根據 Caminade and Pym (1998, p. 282) 指出，1960 年全球翻譯系所數有 49 個，1980 年有 108 個，而到了 1994 年則有 250 個。
2. 香港方面，公開大學（1996）、嶺南大學（1992）、城市大學（1984）、理工大學（1976）也都設有翻譯系所或課程。但為符合兩岸三地之比例原則，故以 2005 年開始由兩岸三地主要翻譯系所輪辦的「中華譯學論壇」成員校為對象。至於各校翻譯課程或系所設立年份，除參考各校網頁外，各系創立年份引自劉靖之的〈香港的翻譯與口譯教學：回顧與前瞻〉（2001，頁 189-224）。
3. 關於 Holmes 及 Toury 結構圖中所使用的專有名詞，其中文譯詞多數引自李德鳳（2007，頁 10）。
4. Holmes' map 引自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Englisch Seminar, Hauptseminar: Translation Studies Dozenten: Prof. Dr. W. Paprotté, Lea Cyrus, Protokoll vom 03.05.05
5. 由於中港臺學制屬性各不相同，故僅以學科設置目標相近者進行比對。此外，本次調查未納入的上外，雖屬新設且已有碩博士班，近日已在英語學院設立翻譯系（北外亦同）。據該校教授指出，高翻學院近日購入大量圖書，但並未置於圖書館藏，故實際藏書與館藏間恐有相當落差。
6. 本調查進行之際，輔大獲國科會「口筆譯研究典藏補助計畫」（2006.12-2008.11）資助，於 2008 年初起近千筆新購圖書大量湧進，故中港臺各校藏書調查，皆以 2007 年 10 月為基準。

7. 在筆者（2007）另一研究中，曾發現臺灣的長榮大學在「語對」方面有高達83%的比重（106：127）。這類書籍在中港臺地區大都以探討中英翻譯為主，其次則屬漢語與其他外語間的對比分析。
8. 日韓兩國在語對類的藏書上，理應以日英、日韓為其主要語言組合。
9. 臺灣目前只有外語系所的大學轉學考及碩士班入學考，會以翻譯入題。而中英口筆譯能力檢定考試，已於2007年12月推出。未來是否如大陸般風行，且大舉推出教戰手冊，目前尚難預料。但香港早有類似考試，卻未進入學術門牆。無論學術文章或大學館藏，都未見討論或引進。
10. 此處主要指扣除北外、中大、浸會的文本類書後，各大類占該校翻譯藏書總數之百分比。

參考文獻

- 李德鳳（編譯）（2007）。Jeremy Munday著。**翻譯學導論：理論與實踐**（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香港：中文大學。
- 金聖華（1999）。從香港翻譯教學的經驗談翻譯系的設置與發展。**翻譯學研究集刊**，4，157-190。
- 胡功澤（2005）。翻譯理論的發展與省思——以臺灣地區為例。**翻譯學研究集刊**，9，109-126。
- 楊承淑（2007，10月）。中英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以中港臺大學為對象。論文發表於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翻學院主辦之「第三屆兩岸三地中華譯學論壇」研討會，北京。
- 廖柏森（2007）。臺灣口譯研究現況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10，189-217。
- 劉靖之（2001）。香港的翻譯與口譯教學：回顧與前瞻。**翻譯學研究集刊**，6，189-224。
- 穆雷（1999）。**中國翻譯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Caminade, M. & Pym, A. (1998). Translator-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M. Baker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280-28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lmes (1972/2001).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 Venuti (Hg.),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180-192). London: Routledge, Seiten.
- Holmes, J (1988).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B. V.
- Pö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專業口譯需要字正腔圓嗎？

張鳳蘭

常有人說專業口譯發音咬字要像播音員一樣字正腔圓，但專門探討口譯員發音咬字的實證研究卻不多見。本文旨在透過實證調查探究口譯員的發音咬字對聽眾的影響。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彰化師範大學三個班級的學生共 121 位。本研究採取假貌相比測試法 (matched guise technique)，由 4 名女性專業口譯分別錄製了 3 個發音版本的錄音檔，包括標準版、自然版和口音版。口譯員兩位來自中國大陸，兩位來自臺灣；其中一位臺灣口譯員也受過專業廣播訓練並主持了多年的電台廣播工作。學生們每聽完 1 個錄音檔，便在李克特 7 等尺度量表 (7-point Likert Scale) 上就口譯的專業程度和聽眾的喜好程度評分。問卷調查在中國大陸東北大學重複進行以探討大陸聽眾的標準和期望是否與臺灣相似或甚至更高。參與調查的為瀋陽東北大學 3 個班級的學生共 89 位。兩岸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譯文內容無虞的情況下，口譯員發音愈標準聽眾覺得愈專業，專業程度和聽眾的喜好程度呈現高度的正比關係。像播音員一樣字正腔圓有加分作用，但並非必要。

關鍵字：口譯、口譯員、發音、口音、聽眾觀感、聽眾喜好、假貌相比測試法、專業程度、語言態度

收件：2008 年 10 月 30 日；修改：2009 年 1 月 10 日；接受：2009 年 1 月 12 日

Do Interpreters Need to Sound Like Broadcasters?

Feng-lan Chang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good enunciation is a basic quality of an interpreter, but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is aspect. The current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interpreter enunciation affects audience percept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one students from three classes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erved as raters. They listened to four sets of matched guises of speeches recorded by fou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two from China and two from Taiwan. One of the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as also a broadcaster. Each interpreter recorded a reading passage in three pronunciation versions: Standard Mandarin, a Natural guise and an Accented guise. Students rated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their preference on a 7-point Likert scale. The study was replicated in China with 89 students from three classes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s raters. Results of both studies indicated when content of rendition is of no concern, more standard Mandarin during interpreting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and favorable. However broadcaster-level enunciation is “icing on the cake,” but not essential for interpreters.

Keywords: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enunciation, accent, audiences' perception, audiences' preference, matched guise, professionalism, language attitude

Received: October 30, 2008; Revised: January 10, 2009; Accepted: January 12, 2009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Most experts,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agree good enunciation is essential for interpreters (Chou & Chen, 1995; Zhang, 1999; Mei, 2000; Liu, 2001; Liu, 2005; Zhong, 2001; Pochhacker, 2004). Kuo (2004) emphasizes exquisite e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字正腔圓)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charm of an interpreter, making one stand out; otherwise, one would be buried among other interpreters. Interpreters should be cautious that mild misarticulation might lead to the discomfort of the listeners, whereas serious ones may actually result in confusion or even misinterpretation.

While it is widely believed good enunciation is a basic quality of an interpreter, empirical studies devoted to this issue are scarce. Previous research on language attitudes has largely studied subjects' reactions to two languages or dialects, where these two choices are available to the speaker in the speech community being surveyed. The interpreting scenario is applicable by definition. Kalmar, Zhong, and Xiao (1987) examined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Guangzhou area.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many studies of areas where a "high" variety (here, Mandarin) coexisted with a "low" variety (in this case, Cantonese). Speakers of Cantonese recognized the social 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fluent use of Mandarin, but remained loyal to their local dialect.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d female judges gave substantially higher ratings to Mandarin than did male judges.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process has been shown to be central to the process of people evaluating other people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 studies (Thatcher, 2004). The more similarity is perceived between the judge and the person being judged, such as background, social class, and language,

the more positively that speaker is evaluated (Coupland, 1980). Hence, the convergence strategies, where the speaker tries to sound more like the listener, supported the data of Berg's (1986)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choice among shop assistants at a variety of department stores in Taiwan.

While the convergence theory offers an explanation for why listeners tend to prefer those who sound like themselves, other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similarity is not always an asset. Giles (1971) demonstrated that the same local dialect could elicit favorable evaluations on qualities relating to personal attractiveness and integrity but negative evaluations on competence. In other words, a more standard accent is often perceived as more competent, but not necessarily more attractive, suggesting another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operating besides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dynamics.

Yet another factor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s the perceived group identity. Listeners' evaluation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perception a speaker belongs to or is from outside the speech community of the judge (Tajfel, 1974; Thatcher, 1995).

To address effectively the aforementioned dimensions on language attitudes,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is the matched guise technique (Thatcher, 2004). The rationale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are reliably between the speaker representing "exquisite enunciation" and one that is "less exquisite" because many other factors could differ between the two speakers such as timbre, pitch, and speech rate, etc. One may end up comparing between apples and oranges. The matched guise design attempts to control extraneous factors by using a single speaker to perform in multiple variants or "guises", as an actor might change costume and make-up, appearing in the same play in a second role (Thatcher, 2004). In the matched-guise design, the voice of a speaker is held constant, allowing onl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this case,

for example: broadcaster-like enunciation vs. accented pronunciation) to vary.

Lambert et al. (1960) pioneered the matched guise technique. In this branch of research, a number of studies on native speakers' evaluation of native varietal speakers are relevant to this project. Arthur, Farrar, and Bradford (1974) examined attitude toward a variety of English. Forty-eight Anglo-American UCLA students rated four pairs of matched guise voices of standard English and Chicano English (a non-standard ethnic dialect). Dialect differences consistently affected rating, with standard English guises receiving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This finding was supported by the data of Sebastian and Ryan (1985). Their 120 subjects rated two pairs of matched guises representing Spanish-accented English and Standard English. Speakers with the heaviest accent were the least positively evaluated. Similar results were also found in Thatcher's 1995 matched-guise study in which 210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in Taiwan evaluated Mandarin use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was shown for use of Beijing Mandarin when the speaker was believed by the raters to be a native speaker of Mandarin.

Thatcher (2004) explored preference of audience for Chinese-B and Chinese-A interpreters working into Chinese using a matched guise format. Seventy-on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aiwan listened to recordings of nine interpreters' voices reading a passage and 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akers using a seven-point Likert scale. Four of the samples on the stimulus tape were actually dual performances by two speakers, who performed once each in Taiwan Mandarin and Beijing Mandarin guises. The author advised that Chinese-B interpreters adopt as standard a Beijing Mandarin accent as possible.

In the language attitude literature, Thatcher's work (2004) is one of the few studies examining audiences' perception of interpreters in Taiwan. Nevertheless, the "interpreters" in her study are not real interpreters, but

skilled speakers of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one Taiwan native. Furthermore, the study did not ask raters to judge directly and specifically the speaker's professionalism as an interpreter, which is considered a central quality of a successful interpreter.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pointed out that her study did not investigate how rater characteristics may have affected their judgment.

Existing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females exhibited better listening skills than males in first 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 quoted in Oxford & Herman, 1995). Eisenstein (1982) also demonstrated female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ales on a dialect discrimination task and females were able to recognize dialects of greater or lesser prestige. Yu (2005) indicated females have greater linguistic awareness than males. Ng (1992) studied end user's reactions to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 interpreters.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study. Males were found to focus on the interpreters' lexical choice and overall fluency, while females tended to attach more significance to the correctness of grammar. Different majors in college have been shown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dominant intelligence. More language-related majors such as Chinese and law majors exhibit better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than science majors (Yu, 2005; Hsu, 2006). Prior training 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might also affect audience expectations. Kurz (1993) conducted three surveys on interpreter-related qualities in conferences involving medical personnel, engineers and diplomats, respective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ratings by these three different user groups were consistently lower than those by the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Buhler's 1986 survey of AIIC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members. In addition, users' expectation profiles were also found to differ according to their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Since 1989, quite a few researches have embark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user-expectations of interpreting services in the western world (Kurz, 1989, 1993, 1994, 1996; Gile, 1990; Ng, 1992; Marrone, 1993; Vuorikoski, 1993, 1998; Kopczynski, 1994; Mack and Cattaruzza, 1995; Moser, 1995, 1996; Collados Ais, 1998; Andres, 2000).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among the important quality criteria of interpreting services, content (e.g.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is relatively more important than form (e.g. native accent or pleasant voice) (Buhler, 1986; Marrone, 1993; Kurz, 1993; Kopczynski, 1994; Moser, 1995, 1996). Funded by AIIC, Moser (1995 & 1996) directed the most elaborate survey on user expectations. Using a questionnaire with both open-ended and specific questions, 94 AIIC interpreters conducted a total of 201 interviews on speakers or audiences at 84 different meetings. The meetings we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large technical meetings, small technical meetings, large general meetings and small general meetings. A marked preference for faithfulness to meaning was found. A lively animated voice was considered important but accent was rated fairly unimportant. On the contrary, Collados Ais (1998) found interpretations with melodious delivery and mistakes were generally rated better than interpretations with a monotonous delivery and total sense consistency.

Ru (1995) conducted one of the few user-expectation surveys on the Mandarin Chinese market. Twenty Taiwanese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nd 166 conference attendees were asked to rank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seven quality parameters of interpretation: pronunciation (發音), fluency of delivery (流暢度), logical cohesion of rendition (一致性), appropriate speed (速度適中),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忠實度), use of correct terminology (專業語彙), and pleasant voice (悅耳聲音). The 166 attendees were from five conference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business, engineering, and religious meeting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pronunciation received fairly high ranking from the audience: second place by the audience of religious meetings and fourth place by the entire audience. The Taiwanese audiences attached greater significance to pronunciation than do westerners to native accent.

Ru pointed out “pronunciation” in her study was more related to e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n addition, her targeted subjects were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She speculat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ting of pronunciation vs. native accen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udiences might be related to one’s mother tongue. This argument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Among the important quality criteria of interpreting, content is shown in many studies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form. In the condition when content is not a concern and being held constant, is more standard enunciation considered more professional? Furthermore, if more standard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does an audience necessarily prefer such enunciation? Is it possible that Taiwanese audiences might prefer more natural pronunciation than carefully articulated enunciation because the former is how most people speak in Taiwan and therefore is considered more personable? On the contrary, would a typical mainland Chinese standard enunciation be perceived by audiences in Taiwan as more distant and therefore less attractive? By the same token, would “standard” Mandarin produced by a Taiwanese interpreter be “accepted” by audiences in China as professional or attractive? Are the underlying expectations and standards similar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ith increasing contacts and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piring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ishing to pursue a career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might find this information helpful. Such information can help interpreters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quality of interpreting. It can also assist teachers of interpreting to focus more precisely on the training of their students.

Purpos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the enunciation of four interpreters was manipulate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empirically how it affects audiences' perceptions. On the premise that content of rendition is of no concern,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answer three specific questions:

1. Is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in interpreting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2. Do audiences prefer more professional sounding enunciation?
3. How do rat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major of study, and pri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affect judgment of the interpreters' enunciation?

Predicted Hypotheses

1.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during interpreting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2.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ater's preference.
3. Rat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ajor, gender and pri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affect his/her evaluation of the interpreter. Females are predicted to be more demanding of enunciation than males. English major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taken interpreting courses, are expected to be more peculiar about enunciation than non-English majors.

Methodology

Recruitment of Stimulus Readers

Speakers for the stimulus audio files are fou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two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wo from Taiwan. All speak standard Mandarin and at least one dialect (or are capable of faking one). Only females were recruited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speaker's gender effect.

Voice One ("Taiwan A").

Voice One is a 50-year-old Taiwanese female from Taipei. She received her interpreting training in Taipei. Upon the completion of her training, she worked as an in-hou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for a well-known TV station in England for two years. After her return to Taiwan, she worked for a broadcasting company in Taipei as a program host and, on the side, as a free lance interpreter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anks to her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in the media, her enunciation is representative of a broadcaster. She also speaks Taiwanese and Cantonese.

Voice Two ("Taiwan B").

Voice Two is a 39-year-old Taiwanese female from central Taiwan (Nantou). She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preting from the US. Voice Two has been working as a free lanc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in Taiwan for one year. She speaks Mandarin and fakes the Taiwanese accent well.

Voice Three ("China A").

Voice Three is a 39-year-old Mainland Chinese female from Beijing.

She left Beijing for Hong Kong at the age of 13. After finishing her colle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he obtained her Master's degree in interpreting from the US. Voice Three has worked as a free lance conference interpreter since 1993 and has done numerous assignments for the US government. She spent the first eight years of her life in Hainan Island and nearly ten years in Hong Kong. Therefore, besides Mandarin, she also speaks Cantonese and the Hainan dialect.

Voice Four ("China B").

Voice Four is a 26-year-old female from Qingdao China. She also holds a master degree in interpreting from the US. She has worked as an in-house interpreter in Shanghai for approximately one year. Besides Mandarin, she also speaks the Qingdao dialect.

Stimulus Digital Audio Files

Each of the four interpreters recorded three versions of a 166-word reading passage (see Appendix A) with a digital recorder, representing Standard Mandarin, Natural Mandarin, and Accented Mandarin, respectively. In the Standard Mandarin guise, interpreters did their best to produce exquisite e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n the Natural Mandarin guise, interpreters were told to substitute several retroflex consonants / ㄓ , ㄒ , and ㄖ / purposely with their non-retroflex counterparts / ㄉ , ㄔ , and ㄌ / respectively. Only these three retroflex consonants were manipulated and there was no intonation problems involved. The total number of substituted / ㄓ , ㄒ , or ㄖ / among the four interpreters ranged from three to nine in the entire 166-word passage. Matched-guise design aims to make within-subject comparisons in order to

eliminate between-subject extraneous factors.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misarticulated consonants was not kept constant across interpreters since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mpare the three guises of the same interpreter. It was as expected that the interpreters produced different total numbers of substitute / ㄗ , ㄗ' , or ㄩ' /. Two interpreters (“China B” and “Taiwan A”) had very few, only three and four substitutions, respectively, while the other two (“Taiwan B” and “China A”) had more, seven and nine respectively. Detailed distribution of the substitutions is listed in Appendix B. If any interesting pattern is observ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substitutions and audience perceptions, such a topic can be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in further studies by employing the same interpreter to manipulate the retroflex consonants. To determine an audience’s tolerance threshold of inconsistency in retroflex consonant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In fact, in the planning stage of the project, “Taiwan A” was asked to fake all the desired guises instead of recording different interpreters;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so many guises one could fake successfully to convince listeners. She was not able to fake the mainland accent. Consequently, other mainland Chinese interpreters were used instead.

In the Accented Mandarin guise, interpreters read with an obvious dialectal accent. “China A” recorded a moderate Cantonese accent by inserting several typical Cantonese words such as [gai] for 「介」 and [si] for 「司」. “China B” spoke a Quingdao dialect and so the tones differed distinctively from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A” produced a heavy Taiwanese accent by mispronouncing all the retroflex consonants and replacing [f] for [h] in words such as 「非」 and 「方」. “Taiwan B” also performed the same substitutions but her Taiwanese accent was not as exaggerated. The speed of recording was controlled at about 166 words/47 seconds (+/- 2 seconds). The reading task

was chosen instead of samples from live interpreting because the latter w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variations in vocabulary, grammar,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speech rate in order to maintain sufficiently re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amples (Thatcher, 2004).

Instrument: Survey

Based on Thatcher's 2004 study, the 7-point Likert scale was adapted to answer the three proposed questions. There are two items,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for each of the 12 recordings (see sample in Appendix D). Each recording is about 47 seconds in length; consequently, the entire survey takes approximately 15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urvey was established by five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Interpreting Program of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CUE) serving as raters. Among the five students, three were second-year graduate students and one was a third-year graduate student. The other one was a second-year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Translation Program but she had taken several interpreting courses with the interpreting majors and therefore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 sophisticated listener.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index was adopt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among the 5 raters on the 12 guises. The reliability index is 0.75.

Subjects

The study was first conducted in Taiwan and then replicated in China for a comparison. In the Taiwan study, three classes of students ($N = 121$) from NCUE in central Taiwan served as raters. One was the freshmen class from the Physics Department ($n = 36$) representing science majors who were primarily males. The other two were English majors, with the sophomore (i.e.,

English-N, $n = 39$) and the senior (i.e., English-Y, $n = 46$) classes differing in that the latter had taken a one-year interpreting course. The senior class did not receive any accent-related training in other courses. Most English majors were females (see Table 1).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used as raters because it was difficult to recruit actual conference attende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outside a conference environment.

Table 1. Gender Breakdown of the Taiwanese Raters

Class	Gender		Total
	Male	Female	
Physics	26	10	36
English-N	3	36	39
English-Y	9	37	46
Total	38	83	121

In the China study, three classes of students ($N=91$) fro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Shenyang China served as subjects. There were two subjects with incomplete data, so the subsequent analyses were based on responses from 89 students. The freshmen class from the Automation Department ($n = 38$) represented science majors who were mostly males. The other two are English majors, with the freshmen class ($n = 31$) and the junior class ($n = 20$) differed in that the junior class had taken a one-year interpreting course. As with their Taiwanese counterparts, the juniors did not receive any accent-related training in other courses. Most English majors are females (see Table 2).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were from North China.

Table 2. Gender Breakdown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Raters

Class	Gender		Total
	Male	Female	
Automation	25	15	38*
English freshmen	5	26	31
English juniors	5	15	20
Total	35	54	89

*Missing data in the Automation class.

Procedures

Th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the Taiwanese students (i.e., raters) by the author, their regular classroom English teacher, during a regular class period. In China, the raters' regular classroom English teacher conducted the survey after class. For both studies, all three classes did the survey in the same language lab to ensure uniformit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structions to the raters were pre-recorded into an MP3 file in Mandarin Chinese by the author (see Appendix C) and played back to them. After the instructions were played, raters were presented with the 12 recorded guises of speeches and asked to rate two parameters,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degree they like the interpreter's performance (i.e., rater's preference), on the 7-point Likert scale and then identify the origin of the speaker. The 12 guises were presented in a random order for each class to avoid the order effect. A different random ordering was used for each of the six classes.

A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three proposed hypotheses. There are two between-subject factors: *Class* (3 levels) and *Gender*; two within-subject factors: *Interpreter* (4 levels) and *Version* of guises (3 levels). The α level is set at 0.05 level.

Results and Discussion

For each research question, the data from the Taiwan survey will be presented first, followed by those of the China study.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for each interpreter and guise in the Taiwan study are presented in Table 3.

Table 3.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Rater's Preference, and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of Speaker Origin among Interpreters and Guises in the Taiwan Study

	China A			China B			Taiwan A			Taiwan B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overall)	5.40	3.42	3.06	5.64	5.39	3.84	5.92	4.36	2.42	5.81	4.02	2.95
Rater's Preference (overall)	4.68	2.93	2.64	5.07	4.86	3.06	5.52	3.83	2.60	5.57	3.78	2.69
% of Correct Guesses of Speaker Origin	94.21	55.37	73.55	90.08	38.84	99.17	81.82	85.95	93.39	94.21	86.78	89.26

Q1: Is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in interpreting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aiwan Data.

Data in Table 3 indicated more standard articulation received higher scores for all four interpreters. Across all interpreters, the Standard guises were scor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Natural guises with the Accented guises scoring the lowest. Please also refer to Figure 1 for a graphic visu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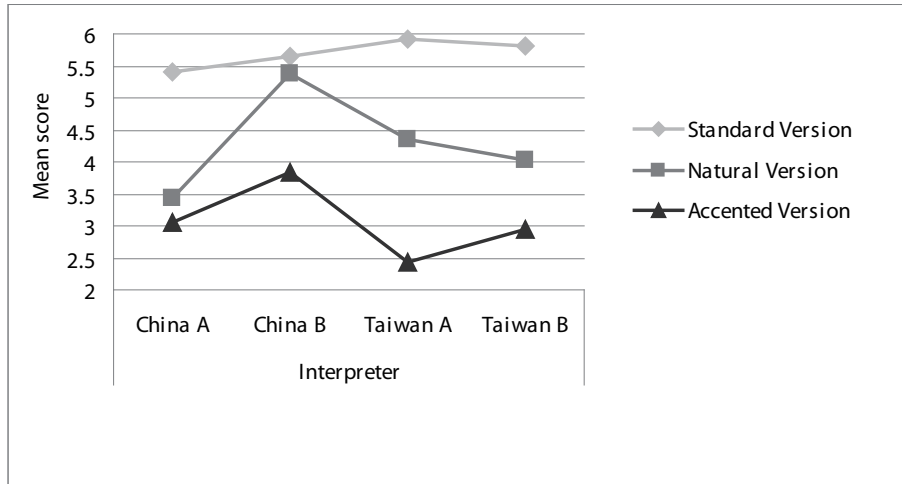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by Interpreters and Guises

The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result is summarized in Table 4 (see Appendix E). The *Version* effec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2, 230) = 268.77, p < .0001$]. The result of the Tukey's post-hoc comparison procedure showed the overall mean scores for the three versions of guis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with the average for the Standard guises (5.69) being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Natural guises (4.30) and the Accented guises scoring the lowest (3.07).

The matched-guise design attempts to control extraneous factors by having the same speaker perform in different variants or guises; hence, it is more meaningful to compare the three guises of the same interpreter. Furth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imple main effects and Tukey's post-hoc comparison procedures.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ables 5-1 through 5-4 (see Appendix E).

The result of Tukey's comparison showed that in professional scores,

each of the mean score of four interpreter's three guis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except for "China B's" Standard vs. Natural guises. This means that across the interpreters, the listeners perceived the three guises as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with the more standard guises receiving the higher professional scores except for "China B". It is because "China B's" Natural guise had only three misarticulated retroflex consonants. Such subtle difference resulted in a slightly lower mean score in professionalism (Standard 5.64 vs. Natural 5.39),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se results support predicted hypothesis one that more standard Mandarin during interpreting is perceived by the college students as more professional.

For the Standard guises, as shown in Table 3 and Figure 1, the ranking of mean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is : "Taiwan A": 5.92 > "Taiwan B": 5.81 > "China B": 5.64 > "China A": 5.40. The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ere rated higher in professionalism than the mainland Chinese one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aiwan A" the broadcaster, received the highest scores. However, with further analysis, simple main effect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interpreters' scores for the Standard guises. The resulting F value [= 5.96, $df = (3, 1035)$, $p < .001$] indicated that the four interpreters'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s for the Standard version were somehow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ukey's post-hoc comparison procedure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6-1 (see Appendix E).

The outcome from this study is consistent with 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Coupland, 1980; Berg, 1986; Thatcher, 2004) in that Taiwanese listeners found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to be more professional than the two mainland Chinese interpreters.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of speaker origin for the four interpreters were high ("China A": 94.21%; "China B": 90.08%; "Taiwan A": 81.82% and "Taiwan B": 94.21%) meaning the listen-

ers were aware of the speaker's origin. The ranking here supports the theory of group identity (Tajfel, 1974; Thatcher, 1995) that when the speaker is perceived as from inside the group of the listener, she is more positively evaluated.

For the Natural guises, the ranking of the mean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is: "China B": 5.39 > "Taiwan A": 4.36 > "Taiwan B": 4.02 > "China A": 3.42 (see Table 3 and Figure 1). Fascinatingly, the number of mispronounced retroflex consonants in the order of the above ranking was three for "China B", four for "Taiwan A", seven for "Taiwan B" and nine for "China A"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e guises with fewer misarticulated retroflex consonants were rated more positively in professionalism.

As with the Standard guises, the result of simple main effect [$F= 47.31$, $df= (3, 1035)$, $p < .0001$] was significant. Results of Tukey's procedure are presented in Table 6-2 (Appendix E). Each pairwis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meaning these four Natural guises sounded different to the 121 raters. Nonetheless, as explained in the stimulus digital audio files section, these Natural guises were produced by four different interpreters and, consequently, there was a confounding factor of interpreter. The focus of this matched-guise study is to make within-interpreter comparisons. Having the same interpreter misarticulate different numbers of consonants to control this factor will be done in future studies.

As for the Accented guises, it has been stressed that making between-interpreter comparisons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especially since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accents varied among the interpreters. Consequently, no between-interpreter comparisons on the Accented guises will be pursued in this project.

Taken together, the data of this Taiwan survey support the widely accepted belief that good enunciation is essential for interpreters because

the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atcher's 2004 study in that when interpreters were perceived as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the Beijing guise rather than the Taiwanese Mandarin guise seemed likely to garner more positive ratings on both overall better impression and competence variables. The finding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several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ing the more standard accent is more positively evaluated whereas the heavier dialectal accents received more negative ratings (Arthur et al., 1974; Sebastian & Ryan, 1985; Thatcher, 1995).

China Data.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from 89 students for each interpreter and guise are presented in Table 7. The ANOVA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8 (Appendix F).

Table 7.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Rater's Preference, and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of Speak Origin Among Interpreters and Guises in the China Study

	Interpreters											
	China A			China B			Taiwan A			Taiwan B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Natural	Accented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overall)	4.73	3.34	2.66	5.99	5.70	2.10	5.61	4.30	3.66	5.55	3.87	2.93
Raters' Preference (overall)	4.45	3.07	2.40	5.82	5.53	2.42	5.20	3.79	3.43	5.24	3.90	2.94
% of Correct Guesses of Speaker Origin	71.91	60.67	37.08	73.03	95.51	97.75	49.44	78.65	86.52	39.33	85.33	97.75

As shown in Table 8, the *Version* effec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2,166) = 310.51, p < .0001$]. The results of Tukey's procedure indicated the average for the Standard version was the highest (= 5.47), followed by the Natural version (= 4.30), with the Accented version scoring the lowest (= 2.84). Furthermore, a significant *Interpreter × Version* interaction [$F(6,498) = 36.81, p < .0001$] was found.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survey, across all interpreters, the Standard guises received the highest ratings, and the Accented guises scored the lowest. For a clear visualization refer to Figur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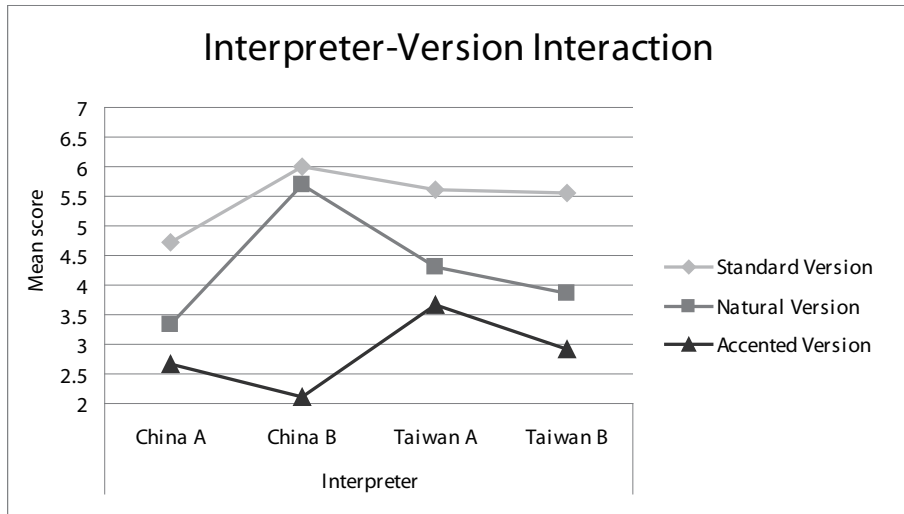


Figure 2.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mong Interpreters and Guises

Tables 9-1 through 9-4 (Appendix F)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the simple main effects and Tukey's procedure. Results indicated all comparis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xcept f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B's" Standard and Natural guises. This outcome mirrored the result of the Taiwan study. "China B's" Natural guise only missed three retroflex consonants.

Compared with her Standard guise, this subtle difference was still perceived by th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s the Natural guise received a slightly lower professional rating (5.7 vs. 5.99).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eaning that when only two or three retroflex consonants were mispronounced, the overall impact was negligible.

For the Standard guises, as shown in Table 7 and Figure 2, the ranking of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is : “China B”, 5.99 > “Taiwan A”, 5.61 > “Taiwan B”, 5.55 > “China A”, 4.73. As a significant simple main effect [$F = 20.02$, $df = (3, 747)$, $p < .0001$] was obtained, the result of Tukey’s procedure is summarized in Table 10-1. The only non-significant pairwise comparison among the four Standard guises is “Taiwan A” vs. “Taiwan B”. The resul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Taiwan study. For th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China B” sounded significantly more professional than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As expected, the interpreter receiving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ism score from th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was from China (“China B”). However, surprisingly,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ere evaluat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China A”. They also received higher preference ratings (see Table 7). A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revealed by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of interpreter origin as shown in Table 7. The percentages were 49.44% and 39.33% for “Taiwan A” and “B”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uch lower than Taiwanese students’ 81.82% and 94.21% correctness. The data indicat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hought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ere from China in origin. As a result, their receiving of higher professionalism rat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ended to think interpreters with more standard enunciation were all from China.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al guises, the ranking of the mean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Standard guises: “China B”, 5.70 > “Taiwan A”, 4.30 > “Taiwan B”, 3.87 > “China A”, 3.34 (Table 7 & Figure 2). The results of simple main effects and Tukey’s post-hoc comparison procedure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0-2.

The outcome is identical to the finding of the Taiwan study. The guises with fewer misarticulated retroflex consonants scored higher in professionalism. A caveat to note here is the identical pattern in the ranking found in both studies. It is just an interesting observation of the results instead of valid analysis due to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Detailed explanation has been given previously in the stimulus digital audio files an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aiwan data.

Overall, the findings of the mainland study also support the belief that good enunciation is essential for interpreters because the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during interpreting was perceived as being more professional.

Q2: Does audience prefer more professional sounding enunciation?

Taiwan Data.

Based on data from 121 student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was 0.77, indicating a fairly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across the 12 recordings were also high (0.51 - 0.78, see Table 11) except for Taiwan A’s Accented guise ($r = 0.20$).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revealed for both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preference scores, the listeners’ responses were fairly spread out along the 7-point scale, resulting in a low correlation. This means that with Taiwanese A’s heavy accent, the listeners’ responses were

more multi-polar. Some may have found it unprofessional but cute, amusing or entertaining while others might have found it totally unacceptable, leading to a low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preference scores. To explore specific reasons, the questionnaire can elicit an explanation in the future studies.

Since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supports the common view that more standard Mandarin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 Standard guises. As shown in Table 3, Taiwanese raters preferred Taiwanese interpreters (Rater's preference scores: "Taiwan B": 5.56 > "Taiwan A": 5.5 > "China B": 5.07 > "China A": 4.69).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also applied in this case. Interestingly, "China A" represented a typical mainland Chinese officer's articulation. As predicted, Taiwanese listeners found it less appealing. One may again explain it with the group identity theory or 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Table 1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Preference

Interpreter	Vers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hina A	Standard	0.58
	Natural	0.69
	Accented	0.59
China B	Standard	0.71
	Natural	0.78
	Accented	0.51
Taiwan A	Standard	0.75
	Natural	0.59
	Accented	0.20
Taiwan B	Standard	0.71
	Natural	0.65
	Accented	0.54

Intriguingly, “Taiwan A”, “Taiwan B” and “China B”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in professional scores. Nonetheless, when rater’s preference scores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ing F value [= 12.43, df= (3, 1026), $p < .0001$] showed the four interpreters’ mean preference scores for the Standard version were also somehow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results of Tukey’s post-hoc comparison procedure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2.

Table 12.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Mean Preference Scores of Standard Version

	Taiwan A	China B	China A
Taiwan B (5.57)	0.05	0.50*	0.89*
Taiwan A (5.52) broadcaster		0.45*	0.84*
China B (5.07)			0.39*
China A (4.68)			

Note.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5.

* significant at 0.033 level

China Data.

The overall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two ratings,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was 0.85, indicating a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aforementioned ratings across the 12 recordings were mostly high, ranging from 0.65 to 0.94 (see Table 13). The only two exceptions were the Accented guise of “China B” (0.38) and the Natural guise of “Taiwan A” (0.45). Examination of frequency plots revealed that, for these two guises, the rating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preference were relatively more spread out along the 7-point scale, meaning the raters’ responses were more varied on these two guises. “China B’s” Accented guise is

pure Qingdao dialec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mainland Chinese's reaction to this heavy accent was similar to how the Taiwanese students reacted to the heavy Taiwanese accent. Some might have found it unprofessional but amusing while others might have found it totally unacceptable. Again, to determine specific reasons, one can elicit explana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in future studies. As for "Taiwan A's" Natural guise, it only missed four retroflex consonants in the 166 words. Some of these mainland Chinese northerners might have perceived it to be acceptable. Had the students not been from Beijing (there was only one Beijing native), the scope of acceptability for "standard Mandarin" might have been greater.

Since the current findings als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more standard Mandarin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n rater's preference focused on the Standard guises only. As shown in Table 7, mainland Chinese raters preferred Taiwanese interpreters over "China A", one of their own ("China B", 5.82 > "Taiwan B", 5.24 > "Taiwan A", 5.20 > "China A", 4.45). This ranki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 ratings, only with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switching their order.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a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raters took the Taiwanese interpreters for mainland Chinese. Therefore,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again can be applied. Interestingly, "China A" represented a typical mainland Chinese officer's formal and serious articulation. As predicted, Taiwanese raters found it less appealing. However, do the current data reflect mainland Chinese are also tired of its formality and find it distant?

Table 1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Interpreter	Vers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hina A	Standard	0.84
	Natural	0.77
	Accented	0.75
China B	Standard	0.84
	Natural	0.77
	Accented	0.38
Taiwan A	Standard	0.78
	Natural	0.45
	Accented	0.94
Taiwan B	Standard	0.65
	Natural	0.67
	Accented	0.80

Q3: How do rater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major of study, and pri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affect their judgment of the interpreters' enunciation?

Becaus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nd rater's preference scores is high,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 professional score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aiwan Data.

Results of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indicat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s including *Interpreter*×*Version*×*Class* and *Interpreter*×*Version*×*Gender* (see Appendix E).

Figure 3 illustrated the *Interpreter*×*Version* interaction effects of the three classes. Among them, the overall patterns of the physics majors and the English sophomore class were more similar. With the Standard version, the English senior class differed from the other two classes in that its trend line declined on “Taiwan B”. In the senior class, the Taiwanese broadcaster, “Taiwan A”, scored higher in professionalism than “Taiwan B” (6.07 vs. 5.35). However, the trend line of the other two classes went upward instead. Another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China B’s” Natural guise with three mispronounced consonants. For both the sophomore and the physics classes, her Natural guise almost overlapped with her Standard guise. For the physics majors, her natural version even scored slightly higher than her Standard version (5.58 vs. 5.56). Nonetheless, for the senior class, the two guises wer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or both the Standard and Natural versions, the professional ratings given by the physics class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the other two classes across interpreters. Overall, the English senior class appeared more differentiating in the interpreters’ pronunciation. They seemed to tune in to the subtle differences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classes, suggesting prior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made a difference.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ed hypothesis and prior research, i.e., people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or pri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present different expectation profiles (Buhler, 1986; Kurz, 1993, 2002; Yu,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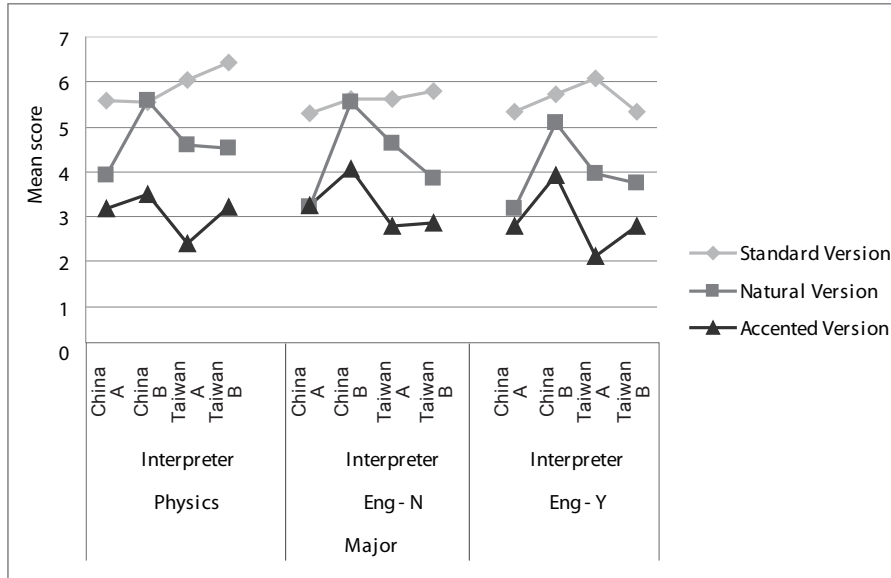


Figure 3. The *Interpreter*×*Version* Interaction of Three Classes in Taiwan

Figure 4 illustrated the three-way *Interpreter*×*Version*×*Gender* interaction effect. Please refer to Table 1 for the breakdown of raters’ gender.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raters was on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For both the Standard and Natural versions, the trends of male raters went upward while those of the females went downward.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Taiwan A” is the broadcaster and her Natural guise missed four retroflex consonants while “Taiwan B” missed seven. The female listeners’ ratings were as predicted but the males’ were the opposite. Furthermore, in 10 out of the 12 conditions (4 interpreters × 3 versions), males gave higher scores than females.

Taken together, as predicted, females tended to be more differentiating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interpreters. This finding is in line with prior research indicating females have better listening skills (Eisenstein, 1982;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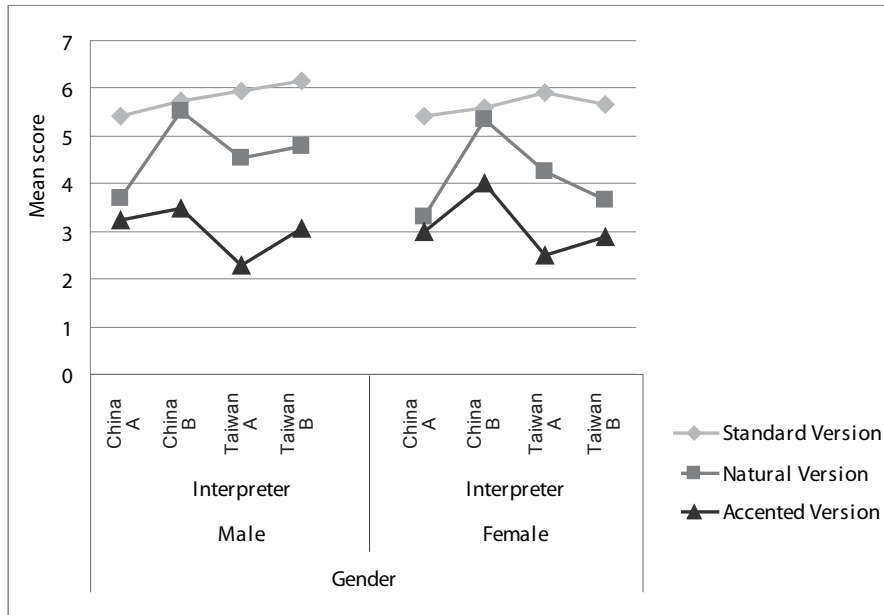


Figure 4. The *Interpreter*×*Version* Interaction of Males vs. Females in Taiwan

China Data.

As shown in Table 8 (Appendix F),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ree-way *Interpreter* × *Version* × *Class* interaction effect is interesting. Figure 5 illustrated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mong interpreters and guises for the three classes. At first glance of the three figures,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s from the Automation class appeared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from the two English classes. It was completely unexpected that for the Automation class, “Taiwan A’s” Accented guise, a strong and even amusing accent, wa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her Standard and Natural versions.

Her Accented guise also received a fairly high preference rating (average = 5.47) from the Automation students. This unexpected outcome might suggest that Automation students were less differentiating and listened with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ers' pronunciations as hypothesized. However, another possibility could be that "Taiwan A's" Accented guise was exaggerated slightly and the Automation class might have not responded seriously which could have affected the validity of the outcome. Hence, a more natural accented guise is recommended for future studies.

The patterns of the two English-major classes were similar. The freshmen class appeared to perceive "Taiwan A" a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Taiwan B" in both the Standard and Natural guises. "Taiwan A" is a typical broadcaster whose Standard guise flowed gracefully. Her Natural guise also missed three fewer retroflex consonants than "Taiwan B" (4 vs. 7 misarticulations). 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nglish classes was observed in "China A's" Natural vs. Accented guises. The English junior class unexpectedly perceived "China A's" Accented guises a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the Natural version. Overall, the mean pattern of the freshmen class is more in line as hypothesized. Contrary to Taiwan raters, the English class who had prior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was not attuned to the subtlety as much as the freshmen class. Possible reasons could be related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unior class, such as the length of training, the instructor, or the students not being auditorily sensi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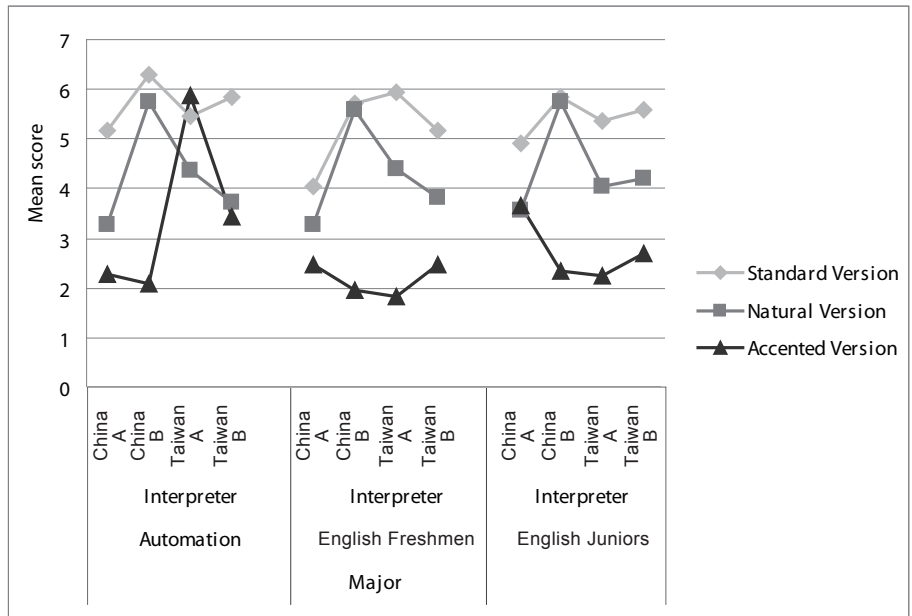


Figure 5. The Interpreter×Version Interaction of Three Class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able 8, the *Gender* effect was significant [$F(1, 83) = 6.4, p = .0133$].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females are more demanding of an interpreter’s enunciation. The gender difference echoes the finding of the Taiwan study and previous research (Eisenstein, 1982; Ng, 1992).

Figure 6 demonstrates the mean scores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among guises and classes for the two genders. In most of the conditions (7 out of 9),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s from mal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females. This finding, once again,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 in the Taiwan surv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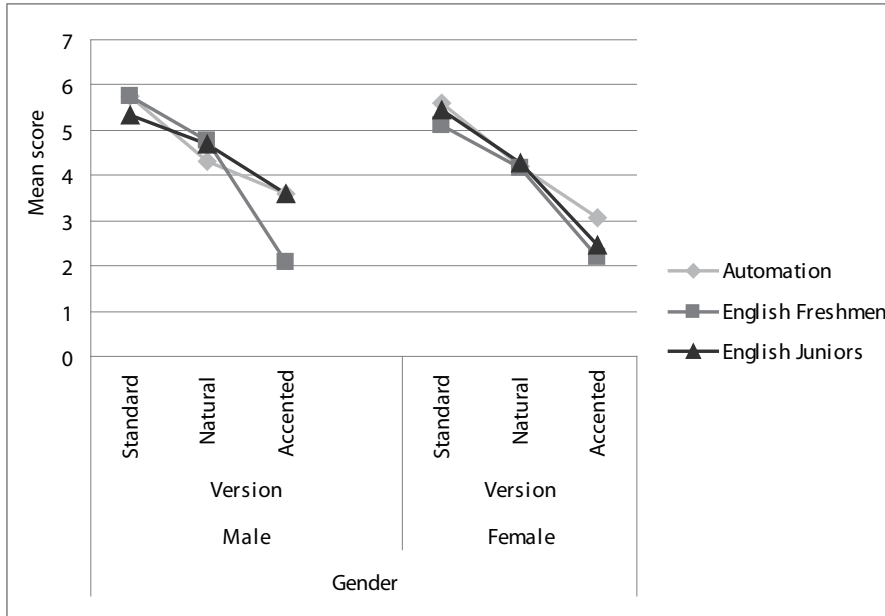


Figure 6. The *Interpreter*×*Version* Interaction of Males vs. Females in China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verify empirically the common claim that interpreters ought to have exquisite e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字正腔圓), audience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were examined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Three classes from NCUE were surveyed in response to four interpreters' three matched guises. The survey was replicated in China where three classes fro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Shenyang served as raters. On the premise that content of rendition is of no concern and held constant,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Is more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in interpreting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2. Do audiences prefer more professional sounding enunciation?
3. How do rat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major of study, and prior exposure to interpreting affect judgment of the interpreters' enunci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21 Taiwanese and 89 mainland Chinese subjects, more standard Mandarin wa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across interpreters. Across interpreters, the Standard guise was rated as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the Accented guise the least. In both studies, the top interpreter with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ratings was from the same country as that of the audience. Furthermore, the rate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evaluated the Standard guise of "China A" as the least professional and favorable, possibly due to "bureaucrat-like" formality, which might have sounded distant.

Secondly, a high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aters' preference and perceived professionalism (0.77 for Taiwan study and 0.85 for China study respectively), meaning audiences also prefer more standard sounding enunciation. Preference scores from the 121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aiwan A", the broadcaster, receive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scores but "Taiwan B"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er in either professional or rater's preference scores. The 89 Chinese students even preferred "China B" and "Taiwan B" over "Taiwan A" (Table 7).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suggests exquisite enunciation is evaluated positively, but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does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sound like a broadcaster in order to be perceived as professional or to win audience approval.

Finally, rater characteristics were found to affect their judgment of the interpreters' pronunci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both locations, males tended

to be less demanding in judging enunciation as exhibited in their giving higher professional scores than femal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iwan and China Surveys

Three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Firstly, the ranking of the four interpreters is different. As expected, Taiwanese students rated the Standard guise of a local Taiwanese interpreter-cum-broadcaster (“Taiwan A”) as the most professional. However, the mainland Chinese listeners gave a mainland Chinese interpreter (“China B”)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ratings and the mean rat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econd place “Taiwan A”. Therefore, to northern Chinese mainlanders, a mainland Chinese accent still sounded more professional than a Taiwanese interpreter-cum-broadcaster.

Secondly, regarding accents, the mainland Chinese listeners from northern China were less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origin of a speaker. The lower overall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in speaker origin (China 72.75% vs. Taiwan 81.89%) reflected this outcome. When each of four interpreters’ three guises was more closely examined statistically, Cochran-Mantel-Haenszel Statistic = 30.94 (df=1, $p < .0001$) was significant.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 the raters and the correctness of identifying interpreters’ origin existed in some “Interpreter-Vers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are listed in Table 14. The condition with p-value less than 0.0042 ($= 0.05/12$) can b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Table 14. Breakdown of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in Interpreters' Origin

Interpreter	Version	% of correct		Chi-square	p
		China	Taiwan		
China A	Standard	71.91	94.17	19.52	<.0001
	Natural	60.67	55.00	0.67	.412
	Accented	37.08	73.33	27.55	<.0001
China B	Standard	73.03	90.00	10.32	.0013
	Natural	96.59	38.33	73.90	.0001
	Accented	97.75	99.17	0.72	.3955
Taiwan A	Standard	50.00	93.33	50.84	<.0001
	Natural	79.55	86.67	1.88	.17
	Accented	86.52	81.67	0.88	.3475
Taiwan B	Standard	39.77	93.33	70.27	<.0001
	Natural	85.39	87.39	0.18	.6756
	Accented	97.75	90.00	4.91	.0266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ditions included: China A's Standard and Accented guises and the two Taiwanese interpreters' Standard guises. "China A's" Accented guise had a moderate Cantonese accent. More than 60%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made an incorrect judgment. Ninety-four percent of Taiwanese students could identify "China A's" Standard guise was recorded by a Chinese mainlander. Anecdotally, during the survey, most Taiwanese students laughed when presented with "China A's" Standard version and indicated the speaker must be from China. Surprisingly, only approximately 72%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made correct guesses. This contrast is somewhat hard to explain. About 50-60%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guessed the two Taiwanese

Standard guises were produced by Chinese mainlanders. Chinese mainlanders tended to think that more standard guises were produced by mainland Chinese interpreter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with numerous dialects as well as accents. It is therefor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mainlanders to identify correctly a speaker's origi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from traveling in China, when the mainland Chinese hear poorly articulated Mandarin or Mandarin with an accent unfamiliar to them like Taiwanese, they often think the speaker is from one of the remote provinces such as Canton or Fujian, where people speak with strong southern accents. A Taiwanese accent is just as foreign to northerners as is Cantonese or any other southern accent.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only limited variations of accents in Taiwan, either Taiwanese Mandarin or non-Taiwanese Mandarin. Therefore, discrimination becomes relatively easier. This can be seen in "Taiwan B's" Accented guise.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guesses for her Standard and Accented versions were both high (93% and 90%), likely because the accents can be easily identified as Taiwanese due to their familiarity. In her Accented guise, she substituted [f] with [h] which is typical of Taiwanese Mandarin. This feature is so salient, which makes guessing easier than her Natural version (87%).

Thirdly, prior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exhibited different effects in these two studies. In the Taiwan study, the English majors with prior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appeared to be the most discriminating among the three classes on the listening tasks. However, in the China study, the English class with prior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was not more discriminating than the English freshmen.

In conclusion, results of both studies illustrated more standard Mandarin is perceived as more professional and favorable. Broadcaster-level exquisite e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s "icing on the cake," but not essential fo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Plan of Study

The stimulus audio recordings are not real samples from live conferences and the raters are not actual conference attendees.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often considered representing the age group that in their future careers may have the opportunities and occasions to use interpreting services and atte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owever, they still do not fully represent all conference attendees. In addition, demography of the raters is another limitation. Finally, adopting two different dialects in the China study could possibly introduce another uncontrolled variable if one were to make between-interpreter comparis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t will be informative to employ the same interpreter to manipulate the retroflex consonants to determine audience's tolerance threshold of inconsistency in retroflex consonants, because in both studies three substitutions out of 166 words were perceived as negligible but four were not. It will also be interesting to explore audiences' perception in locations, such as Hong Kong and the U.S., where Mandarin Chinese is not the first language. In addition, a larger sample with more balanced group siz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instance, students from business or law schools might be good candidates, as the male-female ratio would be more balanced. Finally, the questionnaire can be designed to elicit the rater's explanation of judgment for potentially controversial guises to investigate the rationale directly.

Bibliography

- Andres, D. (2000). *Konsekutivdolmetschen und Notizen.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mentaler Prozesse bei Anfängern in der Dolmetscherausbildung und professionellen Dolmetschern (as cited in Kurz, 2001)*.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enna, Vienna, Austria.
- Arthur, B., Farrar, D., & Bradford, G. (1974). Evaluation rea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dialect differences in the English of Mexican-Americans. *Language and Speech*, 17, 55-270.
- Berg, M. van den.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Social identity, language accommodation and language choic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59, 97-115.
- Buhler, H. (1986). Linguistic (semantic) and extra-linguistic (pragmatic)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ers. *Multilingua*, 5, 231-235.
- Collados Ais, A. (1998). *La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en la interpretación simultánea. La importancia de la comunicación no verbal (as cited in Kurz, 2001)*.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 Coupland, N. (1980). Style-shifting in a Cardiff work setting. *Language in Society*, 9, 1-12.
- Eisenstein, M. (1982). A study of social variation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32, 367-391.
- Giles, H. (1971).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reaction to RP, South Welsh and Somerset accents spee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 280-281.
- Gile, D. (1990). L'évaluation de la qualité du travail par les délégués: Une étude de cas (as cited in Kurz, 2001).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3, 66-71.
- Hsu, T. (2006). *An innovative measurement: Multiple-intelligences inventory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 Kalmar, I., Zhong, Y., & Xiao, H.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angzhou, China. *Language and Society*, 16, 499-508.
- Kopczynski, A. (1994). Quality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ome pragmatic problems. In M. Snell-Hornby, F. Pochhacker,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pp. 189-19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Kurz, I. (1989). Conference interpreting—User expectations. *Coming of Age.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143-148.
- Kurz, I. (1993).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 In

- F. Po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2002) (pp. 313-324). New York: Routledge.
- Kurz, I. (1994). What do different user groups expect from a conference interpreter? *The Jerome Quarterly*, 9, 3-7.
- Kurz, I. (1996). *Simultandolmetschen als Gegenstand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 (as cited in Kurz, 2001). Vienna: WUV Universitätsverlag.
- Kurz, I. (2001).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Quality in the ears of the user. *Meta*, 46, 394-409.
- Lambert, W., Hodgson, R., Gardner, R., & Fillenbaum, S. (1960). Evaluation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4-51.
- Larsen-Freeman, D. & Long, M.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 Mack, G., & Cattaruzza, L. (1995). User survey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means of learning about quality and /or raising some reasonable doubts. In Tommola, J. (Eds.). In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pp. 51-68).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 Marrone, S. (1993). Quality: A shared objective.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5, 35-41.
- Moser, P. (1995). *Simultanes Konferenzdolmetschen. Anforderungen und Erwartungen der Benutzer* (as cited in Kurz, 2001). Endbericht im Auftrag von AICC, Vienna, SRZ Stadt und Regionalforschung GmbH.
- Moser, P. (1996). Expectations of users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1 (2), 145-178.
- Ng, B. (1992). End users' subjective reac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 interpreters.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7, 43-55.
- Oxford, R., & Herman, M. (1995). Adult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an intensiv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System*, 23, 359-386.
- Po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Sebastian, R., & Ryan, E. (1985). Speech cues and social evaluation: Markers of ethnicity, social class and age. In Giles, H. & St. Clair, R. (Eds.), *Recent advance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pp. 113-143).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Ltd.
- Tajfel, J.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13, 65-93.
- Thatcher, T. (1995). *Native speaker evaluation of guise choice in Mandarin Chin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Texas, U.S. A.
- Thatcher, T. (2004). *Some observations on preferred Mandarin guise for native and non-native*

- interpreters working into Mandar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uj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Vuorikoski, A. (1993).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User 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 In Picken, C. (Ed.), *Translation—the vital link*. 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World Congress of FIT (vol 1, pp. 317-327). Londo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 Vuorikoski, A. (1998). User responses to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Unity in Diversity? In Bowker, L., Cronin, M., Kenny, D., & Pearson, J. (Eds.),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84-197).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Zhong, S.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Chinese interpretation*. Taiwan: Lighthouse Publishing.
- 汝明麗 (1995)。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口譯品質與口譯員角色。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縣。
- 周兆祥、陳育沾 (1995)。口譯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商務。
- 林郁如、雷天放、陳菁 (廈門大學口譯教研小組) (2006)。口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張維為 (1999)。英漢同聲傳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 梅德明 (2000)。英語高級口譯資格證書考試高級口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郭岱宗 (2004)。優美、快速的中英同步翻譯教學。載於柴明穎 (主編)，口譯的專業化道路：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 (頁280-296)。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游俊閔 (2005)。大學生多元智慧之研究。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 劉和平 (2001)。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 劉和平 (2005)。口譯理論與教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Appendix A: Text of Recording and Source Text

譯文：工藝品公司介紹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通過這次會議提供的平台與大家相聚，並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是一家專業設計、生產和銷售工藝品的公司，從公司創立至今，我們已經走過了整整 15 年的歷程。15 年前，我們擁有員工 50 名，今天，擁有員工 1,700 名；15 年前，我們租用廠房 4,500 平方米，今天自建廠房 24,000 平方米，這些數字，都清晰地記錄了我們創造的輝煌。

Source Text: Introduction to an Arts and Crafts Comp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dear friends:

I feel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our company to you through the platform provided by this conference. Founded 15 years ago, we are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handicrafts. Fifteen years ago our staff numbered 50; now the figure is 1,700. Fifteen years ago we rented a facility covering a floor space of 4,500 square meters; now our own facility covers a floor space of 24,000 square kilometers. These figures speak loudly and clearly of our success.

Appendix B: Distribution of Retroflex Substitutions

Interpreter	Distribution
China A: 9 Substitutions (shown as underlined)	<p>工藝品公司介紹</p> <p>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通過這次會議提供的平台與大家相聚，並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是一家專業設計、生產和銷售工藝品的公司，從公司創立至今，我們已經走過了整整15年的歷程。15年前，我們擁有員工50名，今天，擁有員工1,700名；15年前，我們租用廠房4,500平方米，今天自建廠房24,000平方米，這些數字，都清晰地記錄了我們創造的輝煌。</p>
China B: 3 Substitutions	<p>工藝品公司介紹</p> <p>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通過這次會議提供的平台與大家相聚，並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是一家專業設計、生產和銷售工藝品的公司，從公司創立至今，我們已經走過了整整15年的歷程。15年前，我們擁有員工50名，今天，擁有員工1,700名；15年前，我們租用廠房4,500平方米，今天自建廠房24,000平方米，這些數字，都清晰地記錄了我們創造的輝煌。</p>
Taiwan A: 4 Substitutions	<p>工藝品公司介紹</p> <p>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通過這次會議提供的平台與大家相聚，並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是一家專業設計、生產和銷售工藝品的公司，從公司創立至今，我們已經走過了整整15年的歷程。15年前，我們擁有員工50名，今天，擁有員工1,700名；15年前，我們租用廠房4,500平方米，今天自建廠房24,000平方米，這些數字，都清楚地記錄了我們創造的輝煌。</p>
Taiwan B: 7 Substitutions	<p>工藝品公司介紹</p> <p>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通過這次會議提供的平台與大家相聚，並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是一家專業設計、生產和銷售工藝品的公司，從公司創立至今，我們已經走過了整整15年的歷程。15年前，我們擁有員工50名，今天，擁有員工1,700名；15年前，我們租用廠房4,500平方米，今天自建廠房24,000平方米，這些數字，都清晰地記錄了我們創造的輝煌。</p>

Appendix C: Instructions

以下你會聽到幾位專業口譯員的錄音，有些口譯來自中國大陸，有些來自臺灣。每聽完一位口譯員的錄音之後，請針對他的專業水平以及你個人對該口譯的喜歡程度評分，然後再判斷他的口音是大陸口音還是臺灣口音。謝謝。

Appendix D: Sample Rating Form

主修 _____，年級 _____

學號 _____

性別 _____，是否學過口譯 _____ 是 _____ 否 _____

語言背景：_____ 國臺語雙語，_____ 只會說國語

請針對下列口譯員的專業水準及你個人對該口譯的喜歡程度評分

Speaker 1

毫不專業	→	→	→	→	→	非常專業
1	2	3	4	5	6	7

毫不喜歡	→	→	→	→	→	非常喜歡
1	2	3	4	5	6	7

你認為這是大陸口音 _____ 臺灣口音 _____ ？

Appendix E: Taiwan Data

Table 4. Repeated-measures ANOVA Summary Table in the Taiwan Study

Source	df	SS	MS	F
Class	2	16.80	8.40	2.11
Gender	1	0.89	0.89	0.22
Class × Gender	2	0.60	0.30	0.08
Error(I)	115	458.73	3.99	
Interpreter	3	85.42	28.47	33.20*
Interpreter × Class	6	10.51	1.75	2.04
Interpreter × Gender	3	4.52	1.51	1.76
Interpreter × Class × Gender	6	2.50	0.42	0.49
Error(II)	345	295.93	0.86	
Version	2	758.53	379.27	268.77*
Version × Class	4	10.37	2.59	1.84
Version × Gender	2	5.92	2.96	2.1
Version × Class × Gender	4	2.66	0.66	0.47
Error(III)	230	324.56	1.41	
Interpreter × Version	6	84.69	14.11	20.16*
Interpreter × Version × Class	12	17.96	1.49	2.14*
Interpreter × Version × Gender	6	9.93	1.65	2.36*
Interpreter × Version × Class × Gender	12	11.12	0.93	1.32
Error(IV)	690	483.16	0.70	
Total	1451	2584.80		

* $p < .05$

Table 5-1.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 of Three Guises of Interpreter "China A"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40)	1.99*	2.35*
Natural (3.42)		0.36*
Accented (3.06)		

Note. $F(2, 920) = 83.44, p < .0001$.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5-2.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 of Three Guises of Interpreter "China B"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64)	0.25	1.80*
Natural (5.39)		1.55*
Accented (3.84)		

Note. $F(2, 920) = 73.47, p < .0001$.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5-3.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 of Three Guises of Interpreter "Taiwan A"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92)	1.56*	3.50*
Natural (4.36)		1.94*
Accented (2.42)		

Note. $F(2, 920) = 196.65, p < .0001$.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5-4.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Score of Three Guises of Interpreter "Taiwan B"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81)	1.79*	2.86*
Natural (4.02)		1.07*
Accented (2.95)		

Note. $F(2, 920) = 125.55, p < .0001$.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6-1. Pair wise Comparison of the Standard Vers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preters

	Taiwan B	China B	China A
Taiwan A (5.92)	0.11	0.28	0.51*
Taiwan B (5.81)		0.17	0.40*
China B (5.64)			0.23
China A (5.40)			

Note.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0.

* significant at 0.033 level

Table 6-2. Pair wise Comparison of the Natural Vers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preters

	Taiwan A	Taiwan B	China A
China B (5.39) missing 3 consonants	1.03*	1.37*	1.97*
Taiwan A (4.36) missing 4 consonants		0.34*	0.94*
Taiwan B (4.02) missing 6 consonants			0.60*
China A (3.42) missing 9 consonants			

Note.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0.

* significant at 0.033 level

Appendix F: China Data

Table 8. Repeated-measures ANOVA Summary Table in the China Study

Source	df	SS	MS	F
Class	2	22.83	11.41	2.95
Gender	1	24.79	24.79	6.40*
Class × Gender	2	1.47	0.73	0.19
Error(I)	83	321.51	3.87	
Interpreter	3	96.22	32.07	33.71*
Interpreter × Class	6	64.55	10.76	11.31*
Interpreter × Gender	3	1.22	0.41	0.43
Interpreter × Class × Gender	6	6.99	1.17	1.22
Error(II)	249	236.94	0.95	
Version	2	829.88	414.94	310.51*
Version × Class	4	47.03	11.76	8.80*
Version × Gender	2	2.62	1.31	0.98
Version × Class × Gender	4	18.49	4.62	3.46*
Error(III)	166	221.83	1.34	
Interpreter × Version	6	158.14	26.36	36.81*
Interpreter × Version × Class	12	188.55	15.71	21.94*
Interpreter × Version × Gender	6	7.51	1.25	
Interpreter × Version × Class × Gender	12	14.77	1.23	
Error(IV)	498	356.57	0.72	
Total	1067	2621.91		

* P < .05

Table 9-1.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Rating of "China A's" Three Guises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4.73)	1.39*	2.07*
Natural (3.34)		0.68*
Accented (2.66)		

Note. $F(2, 664) = 63.38, p < .0001$.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7.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9-2.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Rating of "China B's" Three Guises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99)	0.29	3.89*
Natural (5.70)		3.60*
Accented (2.10)		

Note. $F(2, 664) = 289.25, p < .0001$.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7.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9-3.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Rating of "Taiwan A's" Three Guises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61)	1.31*	1.95*
Natural (4.30)		0.64*
Accented (3.66)		

Note. $F(2, 664) = 85.69, p < .0001$.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7.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9-4. Results of Tukey's Comparison Procedure on the Mean Professionalism Rating of "Taiwan B's" Three Guises

	Natural	Accented
Standard (5.55)	1.68*	2.62*
Natural (3.87)		0.94*
Accented (2.93)		

Note. $F(2, 664) = 128.81, p < .0001$.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7.

* significant at 0.025 level

Table 10-1. Pair wise Comparison of the Standard Version Among Interpreters

	Taiwan A	Taiwan B	China A
China B (5.99)	0.38*	0.44*	1.26*
Taiwan A (5.61)		0.06	0.88*
Taiwan B (5.55)			0.82*
China A (4.73)			

Note.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6.

* significant at 0.033 level

Table 10-2. Pair wise Comparison of the Natural Version Among Interpreters

	Taiwan A	Taiwan B	China A
China B (5.70)	1.40*	1.83*	2.36*
Taiwan A (4.30)		0.43*	0.96*
Taiwan B (3.87)			0.53*
China A (3.34)			

Note. $F(3, 747) = 72.49, p < .0001$. Minimum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36.

* significant at 0.033 level

臺灣大專中英口譯教學現況探討¹

胡家榮 廖柏森

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日，世界儼然已成為一個地球村，為與國際接軌，培養企業所需的雙語工作人才 (bilingual professionals) 便成為國內英、外文系所的要務，而大學部的口譯教學訓練正適合提供此類相關專業人才。然而綜觀國內口譯教學研究，對於大學部的口譯教學現況仍缺乏充足的研究以確保其教學成效。過去的相關研究曾針對全國應用外語科系進行口譯教學概況的調查，然而因國內口譯教學的快速發展，調查的結果已屬過時，而且未包含一般英、外文系所開設的口譯課程，故亦難稱具代表性。為因應目前國內大學部口譯教學迅速發展的需求及彌補之前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以問卷調查 (survey research) 佐以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的方式，針對全國有開設口譯課程的大學英、外文系及應用外語系進行調查，共有 42 位口譯教師參與。調查重點包含現今大學口譯課程設計、師資結構、教學方法、教學困難及教材使用等範疇。研究結果呈現目前大學部實施口譯教學的相關實況，並指出與先前研究不盡相同之處，突顯國內口譯教學近幾年來快速發展之脈絡。本文並針對目前的大專口譯課程規劃提出建議，希冀能提供口譯教師在教學上的相關資訊以提升口譯教學品質，並為社會培育出更多的外語專業人才。

關鍵詞：口譯教學、口譯研究

收件：2008年6月3日；修改：2008年8月11日；接受：2008年10月2日

胡家榮，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E-mail: clarencedaviss@hotmail.com。
廖柏森，國立臺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

Teaching College Level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Clarence M. Davis Posen Liao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interpretation courses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recently. Colleges all over Taiwan have begun promoting the teaching of interpretation. However, most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studies in Taiwan focus on the graduate level, ignoring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undergraduate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in order to provide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both interpretation instructors and program administrators to design a more effective course. A survey comprised of both questionnaires and follow-up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a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A total of 42 college interpretation instructor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was conduct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test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results depicted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urrent undergraduate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in terms of course objectives, materials selec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taught skills, as well as the make-up of interpreting instructors, with their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teaching needs. To conclud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ndergraduate interpretation instruction in Taiwan as well as to help interpretation teachers and program administrators better design college interpreting courses.

Keywords: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interpretation studies

Received: June 3, 2008; Revised: August 11, 2008; Accepted: October 2, 2008

Clarence M. Davis,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mail: clarencedaviss@hotmail.com
Posen L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壹、緒論

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日，世界儼然已成為一個地球村，尤其近年來臺灣為積極與國際接軌，培養企業所需的雙語工作人才（bilingual professionals）便成為國內英、外文系所的要務，而大學部的口譯訓練正適合提供此類相關專業人才。然而綜觀國內目前口譯教學的研究，大多以在翻譯研究所培訓專業會議口譯人員為重點，進行與教學相關之探討，而對於大學部的口譯教學現況，卻相對較為缺乏充足的研究以確保其教學成效。

其實翻譯研究所和大專階段學生在口譯訓練上的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和學生的素質是大不相同的，翻譯系所學生以翻譯為專業技能（professional skill），此技能包含優異的外語和母語能力、兩種語言和文化間的轉換能力、以及不同專業領域的背景知識。語言能力只是翻譯能力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廖柏森，2007），學生通常期許自己未來成為職業的譯者。

另一方面，大專學生在中英語言能力上還有待加強，而且在專業領域、知識廣度、個性志趣等各方面的培養亦尚未成熟。大專學生通常視翻譯為一種語言技能（language skill），是在傳統要求的外語聽、說、讀、寫技能之外的第五種技能。學生可能把口譯當作一種專長，增加個人就業的競爭力，但不一定會以口譯作為職業的考量。因此學校在教學上並不太強調口譯市場需求和專業取向（professional orientation）。以口譯專家和學者的眼光看來，大專口譯課只是透過口譯方式以提升學生的外語技能和其它相關能力（劉敏華，2002），並非訓練專業口譯人員的課程。

而目前國內大專口譯教學的風潮雖然大興²，但其現況尚缺乏較詳實的描述和檢驗，即使是現職口譯教師和研究者往往也難一窺全貌。在口譯教學方面，見諸過去的相關研究文獻中，李翠芳曾於1996年針對全國

大學部的口譯課程規劃做過全面性的檢討，何慧玲亦於 1999 年針對當時的應用外語科系進行口譯教學概況的調查。但其結果與現今口譯教學的情況相較已有極大的差異，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外語科系所開設口譯課程的數量急遽增加。在何慧玲於 1999 年發表的調查報告中，當時全臺設置翻譯課程的應用外語科系共有 22 所，而時至 2005 年，根據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國內應用英／外語系所已高達 75 所，傳統英／外文系也有 44 所，其中有開設口譯課的系所則達 99 系。可見短短數年內大專口譯教學生態之變化急速，我們也需要較為即時的調查資訊方能貼切描繪實際的教學現況。

貳、文獻探討

探討國內口譯教學現況之文獻並不多見，目前對於口譯教學研究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口譯課程的規劃和教案的設計（王珠惠，2003；楊承淑，1996，1997）、口譯教材教法的分享或建議（何慧玲，2001；林宜瑾、胡家榮、廖柏森，2004；陳彥豪，2003；湯麗明，1996）以及口譯員的訓練方式（吳敏嘉，1999，2000，2001；陳聖傑，1999；鮑川運，1998；關思，1998），針對各大專院校口譯教學現況實施大型的實徵調查（empirical research）則相對較少。

雖然調查國內翻譯教學現狀的文獻有限，至少在筆譯教學領域已有全面性的調查研究。戴碧珠（2003）曾就當時全國 43 所設有筆譯課程的系所發出問卷，並針對筆譯課的班級人數、教科書、課程、師資、教學目標與困難、學生的學習困難、作業及考試與評量等方面作調查分析，找出現存筆譯教學的問題和癥結，並提供建議和解決之道。再者，王慧娟（2008）是從學生的角度來調查其筆譯的學習需求，其問卷結果呈現出大專生對於學習筆譯的資源、課程、目標、教材內容、活動和評量等面向的看法。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地區對於全國翻譯教學也曾進行大規模之研究。經由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輔助，穆雷所著《中國翻譯教學研究》(1999)一書中調查了全中國主要外語院系的翻譯教學情況，涉及學科建設、課程設置、教材建設、師資培養、教學方法、口譯教學、翻譯測試及教學研究等八大方面，最後再從理論上探討如何改革翻譯教學。此種總結翻譯學科發展現況之研究，對翻譯學界、教師、乃至學習者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臺灣的口譯教學界其實也需要類似的研究成果，雖然全國性的調查實施不易，但本研究仍希望能從事初步的探索，收拋磚引玉之效。

目前有關描述國內口譯教學現況的文獻，最常被引用的有李翠芳(1996)所作〈大學部口譯課程的教學規劃〉以及何慧玲(1999)之〈臺灣大專應用外語科系口筆譯教學概況與分析〉。首先，李翠芳(1996)分析國內六所大專的口譯課程教案並針對該課程學生實施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各校教案都盡可能涵蓋口譯技巧、言談分析、知識領域和語言表現等項目，而大部份學生上口譯課的反應是希望藉由口譯課來增強其外語能力，只有少數英文系學生希望將來當口譯員，因此李翠芳主張大專口譯教學應該定位為外語教學的一環。

何慧玲(1999)亦使用問卷調查全國大專應用外語科系口譯教學概況，分析其師資、課程安排、教學目標與內容、教學的困難和需要之協助。研究中發現，口譯教師為因應學生外語能力不足之困境，對口譯課設定之課程目標前三項分別為(1)熟悉口譯之技巧、(2)加強英／外文之口語表達能力及(3)提升英／外文之理解能力。至於口譯課程應該訓練之技巧，按重要性排列依序為視譯(sight translation)、口語表達能力(oral presentation skills)及改說(paraphrasing)。可見一般大專口譯教師心目中也是以培養學生語言技能為教學重點。

但國內口譯教學生態變化急遽，短短幾年間各校口譯課數量暴增，教學現況不斷呈現新的風貌、問題與困難，過去的教學調查結果已難符

現狀，亟需更新。再者，上述兩項調查研究的樣本數（sample size）較小，例如李翠芳（1996）只選擇六所大學作教案分析和問卷調查；而何慧玲（1999）的研究是同時針對口譯和筆譯的教學概況作調查，其中口譯課程所回收的有效問卷僅有十份。以上研究結果是否能普遍推論到其它口譯教學情境可能會有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以較大的樣本數來提高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希望能更深入透析國內口譯教學現況以符改進口譯教學之所需。

綜合以上之研究背景和文獻探討，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瞭解國內大專口譯教學之實際現況，以問卷調查各校口譯課之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師資結構、教師教學困難和需求等範疇（categories），最後並討論改進口譯教學之建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此研究旨在探討目前國內大專口譯教學之現況，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survey research）佐以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的方式，針對全國英、外文相關科系中教授口譯課程的教師進行研究。

問卷調查是透過問卷等工具及系統化的程序，經由蒐集樣本（samples）的資料，以推論整個母體（population）的特性和現象。但由於研究對象的口譯教師遍及國內各大專院校，親身調查往返不易，因此採用郵寄問卷調查（mail survey），其主要優點為：(1) 節省費用、(2) 在較短時間內可以調查大量受訪者、(3) 可讓受訪者有足夠時間作答、(4) 受訪者可保有隱私權、(5) 受訪者可在自己方便的時間內作答、(6) 受訪者可理解系列問題之間的關係、(7) 受訪者較不易受到研究者的干擾（Mangione, 1995）。

另外，除了問卷調查所得的量性資料外，為深入瞭解口譯教師對於口譯教學的態度和看法，本研究亦邀請口譯教師進行半結構訪談以取得深度質性的資料。半結構訪談的特色在於研究者事先只擬好題綱，而不以具體特定的問題來限制受訪者發表意見的方向，使訪談過程具有相當的彈性（Nunan, 1992），也希望能讓受訪的口譯教師暢所欲言。

二、研究對象

一般而言，研究樣本數若愈接近母體數則愈能減少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而本研究的母體為國內設有口譯課程之大專英／外語科系中擔任口譯教學之教師，研究者經由各校在網際網路上所提供的課程資料和口譯師資搜集研究對象名單，以總數共 92 名的口譯教師作為研究母體寄發問卷，其中有 42 位教師回覆問卷，成為此研究的樣本，而且這些教師執教的地理區域遍及全國，所收集的資料應可具備基本的外在效度以推論至整個母體。另外在訪談上，從答覆問卷的 42 位口譯教師中有六位願意受訪，其中三位是主修口譯的教師，另外三位則是主修外語教學。

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行設計之口譯教學問卷調查表，問卷設計過程首先是由研究者訪談四位現職大專口譯教師，以瞭解現行口譯教學之實際狀況；接著參考國內類似之教學調查問卷（何慧玲，1999；李翠芳，1996；戴碧珠，2003）並撰擬本研究問卷之初稿。之後實施問卷的預試（pilot test），邀請之前參與訪談的四位口譯教師和另外五位主修英語教學的研究生填寫，再根據受試者之反應和意見修訂該問卷的架構和修辭，俾使問卷於正式大規模施測時能更加清楚周延。

問卷題目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口譯教師的個人學經歷背景和所任教課程的基本資料（共 13 題）；第二部份則使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

(5-point Likert scale) 請受測者就口譯課程的教學目標 (共 16 題)、所教授的口譯技巧 (共 12 題)、教學方法 (共 8 題)、教學困難 (共 15 題) 和教學需求 (共 10 題) 等範疇之各項問題作答；最後還有兩題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請教師進一步說明對口譯教學的看法或問卷中未提及的問題。

四、資料收集

研究者先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教育部和各大專院校網站，全國共計有 44 所傳統英／外文系和 75 所應用英／外語系。再經查各校教務處的開課資訊或經由打電話查詢，確認只有 99 個系實際有提供口譯課程，而教授這些口譯課程的教師共有 92 位³。研究者隨即寄發附有回郵之問卷給這 92 位口譯教師，而教師可透過回郵信封、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回覆問卷。整個資料的收集時間費時約兩個月，初期的問卷回收率並不理想，研究者需透過電子郵件或打電話再次請託口譯教師回覆，最後共計回收 42 份問卷，回收率達 46%。

另外質性的訪談資料，則是由研究者邀請填寫過問卷的六位口譯教師進行訪談，期間約一個月。每次訪談都先請受訪者填具研究同意書 (consent form)，以中文進行訪談並錄音保存內容，事後加以謄錄 (transcribe) 成文字稿，作為分析的依據。

五、資料分析

在問卷調查資料的分析方式上，首先進行內在一致性信度分析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計算出此問卷反應之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 (Cronbach, 1951)。接著採用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計算問卷反應之次數分配 (frequency distribution)、平均數 (means)、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s) 和百分比 (percentage) 等數據，以求得全體受

測教師對問卷的反應。而部份類別變項 (nominal variables) 的題目則進行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以確定其次數是否存有顯著性差異。另外，質性的開放性問題和訪談內容則是由研究者詳加閱讀後，歸納出其中幾個重要的主題加以組織分類，其內容則作為量性問卷資料的輔助。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信度

根據 42 位口譯教師回覆的問卷，研究者使用 SPSS 統計軟體計算其內一致性的信度，所得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83，顯示問卷結果為高度可信。

二、口譯教師的背景資料

問卷首先調查口譯教師的背景資料 (詳請見附錄)，目前大專院校中大部份口譯教師的最高學歷為碩士 (71.4%)，任教的職稱以講師居多 (73.8%)，專任 (57.1%) 多於兼任 (42.9%)，其中口譯教學年資在一到三年間為最多 (40.5%)，性別則是女性 (76.2%) 遠多於男性 (23.8%)。這些教師的主修專長在可複選的情況下依序為口譯 (78.6%)、筆譯 (66.7%)、英 / 外語教學 (33.3%)、語言學 (16.7%)、其它 (9.5%)、文學 (4.8%)，而有受過口譯專業訓練和有從事過口譯實務工作的教師皆佔 88.1%。

從以上資料可看出，雖然目前教育部和各大學在聘任師資時均以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為原則 (李憲榮, 2006)，但因為口譯屬於專業技能，通常是在研究所的碩士班訓練完成；而具有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資格者多以學術研究為職志，不一定具備專業口譯之能力、興趣或實務經驗，導致國內口譯師資大多集中在碩士學位和講師資格，與大

學其它系所學科例如英文系的師資結構相比似乎略遜一籌，但這是口譯學科的特性使然，也是各校必須接受的現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何慧玲於 1999 年所發表的大專口譯教學概況作為對比，當時接受問卷調查的十位口譯教師中曾從事口譯工作的只有三位，絕大多數教師既無口譯經驗，亦未曾接受專業訓練，何慧玲對此現象表示教師本身的專業素養可能會影響教學品質（1999，頁 128）。但與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對照，目前的口譯師資具備口譯主修專長和口譯實務經驗的比例已大為提高，可見國內口譯教學的師資在短短數年內已有長足進步。至於口譯教師專業素質提升的原因，有接受訪談的口譯教師表示，會議口譯的市場極為競爭，僧多粥少，而口譯教學的工作機會則較為充足，由於大專院校於近年來競相開設口譯課程，加上對於師資水準的要求提高，專業口譯員在擔任自由譯者（freelancer）之餘，從事教職的比例也隨之增加。這顯示口譯教學的專業性愈來愈受到重視，是值得欣慰之處。

另外，口譯專任教師比例雖然略高於兼任教師，但在實際人數上專任教師 24 人與兼任教師 18 人的差別其實不大。因此研究者使用卡方檢定，結果發現兩者在統計上並無顯著性差異，而且也發現有不少口譯教師是同時在不同學校兼課，這顯示國內口譯教學以兼任師資任教的情況相當普遍。雖說兼任教師對國內口譯教學也有相當大的貢獻，但畢竟專任教師較能長時間留在學校協助輔導學生學習口譯，因此長期以往各校還是應該以聘用專任教師為主，以符合學生需求和改進口譯教學品質。

三、口譯教學的課程規劃

本口譯教學問卷的第一部份集中在教師對於課程規劃的意見（詳請見附錄），結果顯示目前國內大專口譯課程超過半數（54.8%）是開放外系選修的，而且大部份課程（59.5%）對於修習口譯課的學生是沒有資格上的限制。這樣的結果意謂著大多數學校仍將口譯課程定位為一般的選修課程，並非只針對英文系主修學生而設置，也未考量學生英文程度上的

差異。但是口譯技能的培訓仍需有堅實的語言能力作基礎，否則容易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難，或者讓教師降低教學標準。為促進口譯教學成效，事先對學生的能力有適度的篩選或分級才開課，可能是對師生雙方都有助益的作法。

至於國內目前口譯課的學生人數，大部份為 11 至 20 人（33.3%）和 20 至 30 人（31%），考量口譯課在課堂上需要大量實作練習，上班級人數已屬偏多，問卷中卻還有班級人數多達 40 人以上（21.4%）者，令人懷疑學生是否有時間練習口譯並接受教師的指導。例如一位教師接受訪談時提到，她的班級人數高達 50 人，根本無法兼顧每位學生口譯練習的表現，只能以講課（lecture）的方式進行。可見各校的口譯教學資源不一，在授課的班級人數上也有很大的差距。而反觀何慧玲（1999）的研究中有半數以上的口譯班級是超過 40 人，其餘班級至少有 30 人至 40 人，則可證明英文系所過去幾年來確有致力於縮減班級人數。不過以口譯教師的立場而言，他們認為理想的授課人數還要再降為 5 至 10 人（33.3%）或 10 至 15 人（33.3%），如此小班的編制對校方行政和教學成本上可能是種負擔，但長遠來看是提升教學品質的重要因素，值得繼續努力。

再者，有 71.4% 的口譯教師表示其教學方法並無理論依據，也未使用任何教科書。而在口譯課中最常教授的主題，根據問卷結果依序為商業、政治、新聞等，而最少教授的主題為法律、運動、娛樂等；至於最常出的作業方式為課前預習、錄音、搜尋資料等。以上的結果反映出一般口譯教師並不重視教學方法的理論基礎，而是憑藉個人的經驗和直覺從事教學，也因多數口譯教師缺乏教學理論的訓練，對其教學效果可能有所影響。而在教科書使用上，由於口譯技能的專書相當缺乏，可供選擇的書籍稀少，在難易程度、時效性和編撰方式上也不見得適合課堂使用，所以很多教師寧可自編教材講義來上課。例如有受訪教師提到，因為口譯的題材通常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最新知識，教科書往往來不及納入，因此他們偏好使用最新的資訊或演講稿來編製成上課用的講義。不過自編

教材相對就需耗費許多時間精力，讓教師難以負擔，可能的解決方式是由第一線的口譯教師與出版社密切合作，即時利用最新題材編纂能符合不同口譯程度班級所需的多樣書籍。而由於國內口譯教學風氣興盛，對於口譯教科書有大量的市場需求，其實許多出版社也樂於出版口譯教科書，只是缺乏有心的教師投入編寫，相當可惜。

最後，在評量方式上，絕大多數的口譯教師（92.9%）都有實施考試，只是評量的技能和施測的方式各有不同。根據教師的填答，在評量學生的技能上包括了記憶、逐步口譯、視譯、跟述，甚至也有部份老師實施同步口譯的測驗。一般而言，大專生的語言能力尚未足以接受同步口譯的訓練，但有些學校為吸引學生修課而開設該課程，可能不得不降低評量的難度。至於教師施測的過程則可歸納如下表：

表 1 教師評量學生的口譯技能和過程

評量的技能	施測過程
記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播放英文演講的片段 2. 之後由學生用中文講述他所記憶的內容 3. 將學生的語言輸出錄音
跟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在口譯廂內 2. 聆聽一則學過的和另一則全新的演講 3. 兩則演講約為 5 分鐘時間 4. 學生跟述他們所聽到的內容 5. 學生個別測驗 6. 將學生的語言輸出錄音 7. 跟述完後學生再做記憶回顧
視譯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試卷上有兩篇文章 2. 學生有 10 分鐘時間可瀏覽文章內容 3. 學生個別測驗 4. 在視聽教室施測 5. 將學生的語言輸出錄音

逐步口譯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聆聽英文演講並做筆記 2. 學生參照其筆記並做口譯 3. 將學生的語言表現錄音 4. 學生個別測驗 5. 在視聽教室施測 6. 施測時間約為 2 到 3 分鐘
同步口譯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學生在口譯廂內 2. 聆聽一則學過的和另一則全新的演講 3. 演講長度約為 15 分鐘 4. 學生做英翻中的口譯 5. 學生個別測驗 6. 將學生的語言輸出錄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口譯課程的教學目標

本口譯教學問卷的第二部份則是採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調查口譯教師的意見，第一個範疇是關於大專口譯課的教學目標，教師依題目中的敘述可選擇從 (1)「最不重要」依程度遞增到 (5)「最重要」的選項。問卷的回答經分析後，各題的平均數 (M) 和標準差 (SD) 結果如表 2：

表 2 口譯教學目標

項目敘述		M	SD
1.	學生能對口譯建立負責的態度	4.31	.77
2.	學生能具備基礎口譯技巧	4.52	.67
3.	學生能提升中／英文理解能力	4.51	.64
4.	學生能習得口譯理論	2.95	1.06
5.	提升學生一般背景知識	4.36	.69
6.	拓展學生其他專業知識	4.08	.84
7.	激發學生學習口譯的興趣	4.68	.80
8.	學生能掌握語言 / 文化的轉換	4.54	.79

9.	學生能獨立蒐集資料	4.33	.82
10.	學生能符合市場的需求	3.74	1.13
11.	學生能注重邏輯推理與分析	4.38	.59
12.	培養學生溝通的自信和能力	4.55	.60
13.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4.38	.78
14.	學生能增進中／英文的口語表達能力	4.52	.68
15.	介紹口譯這門專業	3.90	.79
16.	重視真實的溝通語境	4.18	.8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 結果透露出口譯教師認為最重要的教學目標為：(1) 激發學生對於學習口譯的興趣（第 7 題）、(2) 培養學生溝通的自信和能力（第 12 題）、(3) 教導學生掌握語言和文化的轉換（第 8 題）、(4) 具備基礎口譯技巧（第 2 題）和 (5) 增進口語表達能力（第 14 題）等；相對地，教師認為最不重要的教學目標包括了：(1) 教授口譯理論（第 4 題）、(2) 符合市場的需求（第 10 題）和 (3) 介紹口譯的專業（第 15 題）等。由此可見大專口譯教師皆能務實看待大專學生的能力與需求，教學目的主要是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讓培訓專業口譯員相關的理論、專業、市場等議題退居次要的角色，這樣的看法與大部份口譯教學專家的建議相符（王珠惠，2003；何慧玲，1999；李翠芳，1996；Golden, 2001）。例如何慧玲（1999）的調查中，教師是以熟悉口譯技巧為首要目標，其次為加強外文口語表達及理解能力，而瞭解口譯理論則殿後，基本上與本次調查的結果相當一致。至於口譯教師為何不注重口譯理論的教授呢？除了口譯是實務的技能而不重理論外，從訪談的資料中，三位具口譯專業訓練背景的教師都表示，他們在研究所進修時就很少修習相關課程或自行學習口譯理論，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做口譯技巧練習。而現在當他們擔任教師時，也是沿用過去接受口譯教育的方式來教導學生，因此口譯理論的角色就長期被忽略了。

五、教授的口譯技巧

本問卷第二部份的第二個範疇，是調查教師在課堂上所教授的口譯技巧，請受測教師按這些技巧的重要性，選擇從 (1)「最不重要」依程度遞增到 (5)「最重要」的選項。問卷中各題的平均數 (M) 和標準差 (SD) 結果如表 3：

表 3 教授的口譯技巧

項目敘述		M	SD
17.	中／英文正音、語調訓練	3.70	1.35
18.	朗讀及讀稿技巧	3.95	1.02
19.	換句話說	4.28	.51
20.	摘要	4.53	.51
21.	公眾演講	4.38	.64
22.	視譯	4.54	.61
23.	記憶力訓練	4.56	.55
24.	筆記技巧	4.35	.62
25.	一心多用 (分神訓練)	4.22	.75
26.	演講預測及邏輯分析	4.38	.74
27.	跟述	4.17	.92
28.	數字轉換	4.37	.7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範疇題目所得的平均數都較高，整體的平均數為 4.29，表示口譯教師都很重視這些口譯技巧，其中又以記憶力 (第 23 題)、視譯 (第 22 題)、摘要 (第 20 題) 的技巧相對最受重視。此處口譯教師將記憶力列在首位的原因可能是與訓練學生的聽力有關，畢竟英語聽力愈佳，對於接收口語訊息的短期記憶容量就愈大；若記憶力愈好，也有助聽力的理解和詮釋。另外，視譯與閱讀技能相關，可訓練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和瞭解中英文結構的差異 (何慧玲, 1997)，而摘要則需要聽力和口說技能配

合，上述這些技能除了可增進英語技能外，也都是訓練口譯能力的基本功，既符合大專口譯課學生的程度，亦可為將來所要學的專業口譯技能奠定基礎。

六、口譯教學的方法

本問卷第二部份的第三個範疇，是調查教師在課堂上所使用的口譯教學方法，請教師按使用這些教學法的頻率，選擇從 (1)「最不頻繁」依程度遞增到 (5)「最頻繁」的選項。各題的平均數 (M) 和標準差 (SD) 結果如表 4：

表 4 教授口譯時所使用的方法

項目敘述	M	SD
29. 時常與學生互動	4.64	.58
30. 讓學生得到充分的口譯練習機會	4.78	.70
31. 指正學生的口譯表現	4.57	.64
32. 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	4.59	.59
33. 讓學生分組練習	4.26	.99
34. 讓學生扮演會議的角色	3.81	1.45
35. 安排學生參訪有口譯服務的會議	2.58	1.50
36. 讓學生互助合作，籌辦模擬會議	3.18	1.4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範疇的題目設計大體上是以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vism) 的教育理論為本，其要旨在於以學生為中心 (student-centered)，訓練學生獨立思考、主動學習、並與他人互動共同建構知識，而反對讓學生被動接受知識，這也是許多研究者所提倡的一種適合翻譯教學的理論 (劉敏華，2003；廖柏森，2007；Kiraly, 2000, 2003)。而在此範疇的統計結果顯示整

體的平均數達 4.05，雖然如前述大部份口譯教師認為其教學方法並無理論依據，但於此則突顯出教師在課堂上仍時常不自覺地使用社會建構論的教學原則來教導學生；反之可推論社會建構論的教學觀可有效支持目前大專的口譯教學課程，未來對於口譯師資的培訓亦可以社會建構論為教學理論的基礎，訓練口譯教師使用各種教學活動和技巧，以期更有效提升其教學的效能。

而教師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的項目為充分練習（第 30 題）、與學生互動（第 29 題）、以學生為主（第 32 題）等教學方式。這幾種教學方式都是需要在學生人數較少的班級才得以順利實施，這與前述教師心目中理想的小班授課人數結果相符。相反地，教師使用最少的教學方法為參訪實際的口譯會議（第 35 題），這當然是受限於教師個人的資源和時間，而且大專口譯課程目標並不重視市場需求，不過若有機會帶領學生參觀實務口譯工作之情境，也未嘗不是提高學生學習口譯動機和興趣的機會。

七、口譯教學的困難

本問卷第二部份的第四個範疇，是請口譯教師表達他們在口譯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以 (1) 代表「完全不是問題」依程度遞增到 (5)「最嚴重」的選項。問卷中各題的平均數 (M) 和標準差 (SD) 結果如表 5：

表 5 教授口譯時所遇到的困難

項目敘述	M	SD
37. 學生中文程度不夠	3.30	.91
38. 學生外文程度不夠	4.14	.84
39. 學生背景知識不足	4.00	.75
40. 學生學習動機不強	2.56	1.27
41. 上課人數過多	3.38	1.53

42. 難覓適當的教學教材	3.05	1.41
43. 教學方法一成不變	2.27	1.28
44. 本身缺乏專業口譯訓練	1.62	1.28
45. 本身缺乏市場口譯經驗	1.85	1.25
46. 系上對口譯課程的定位不明確	1.91	1.15
47. 口譯評量困難	1.97	1.04
48. 進修口譯的機會不多	2.50	1.40
49. 系上口譯設備不足	1.95	1.33
50. 感覺像在教英文，而非口譯	2.42	1.44
51. 口譯教學時數過短	3.18	1.3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表 5 中，教師於口譯教學過程中自認面對的最大困難依序為學生的外文程度不夠（第 38 題）和背景知識不足（第 39 題），這樣的結果與何慧玲（1999）的研究完全一致，反映出大專口譯課程過去數年來至今仍有相同的問題，其優先任務也仍在於培訓學生的語言和知識能力，才有可能進一步訓練口譯能力，否則只是徒增教學的困擾和學生的挫敗感。雖然可能有人質疑口譯課並不是語言訓練課，為何要加強語言技能而不是口譯技能，但是口譯課卻常用以增進學生的外語技能和擴展知識領域（廖柏森、徐慧蓮，2005），也符合一般大專口譯課的教學目標，仍值得口譯教師努力克服上述這些困難。

而令人振奮的，是目前教師覺得教學上沒有困難的項目較多，依序為缺乏專業口譯訓練（第 44 題）、缺乏市場口譯經驗（第 45 題）、口譯課程的定位不明確（第 46 題）和口譯設備不足（第 49 題），這顯示出口譯教師的素質和以往相比有明顯提升，有更多主修口譯和具備實務經驗的專業譯者投入教學工作，而且大都瞭解大專口譯課程的定位，因此並

不覺得有太多困難之處；加上大部份系所爲了招攬學生和應付評鑑，亦不吝於花費鉅資投資口譯的教學視聽設備。所以口譯教學的環境不論是軟硬體整體看來都是頗爲樂觀，只有待學生語言能力和努力程度的成長，才能更充分利用這些優秀人力和充分物力的資源來學習口譯。

八、口譯教學的需求

本問卷第二部份的第五個範疇，是請教師反應他們在口譯教學過程中還有哪些需求可以增進教學成效，選項從 (1)「完全不需要」依程度遞增到 (5)「最需要」。結果如下表 6 的各題平均數 (M) 和標準差 (SD)：

表 6 口譯教學的需求

項目敘述	M	SD
52. 口譯教學教材	3.95	1.06
53. 口譯教學大綱指引	3.53	.91
54. 口譯教學活動	3.78	.99
55. 口譯教學研究刊物	3.60	.96
56. 口譯教學研討會	3.35	1.10
57. 口譯教學工作坊	3.67	1.05
58. 口譯教師相關組織	3.25	1.17
59. 與業界之聯繫合作	3.63	1.29
60. 會議演講稿來源	3.72	1.4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可知，在口譯教學上教師最需要的項目依序爲教學的教材 (第 52 題)、教學活動 (第 54 題) 和會議的演講稿 (第 60 題) 等。如同本問卷第一部份的課程規劃中曾提及，缺乏適當的口譯教科書使得很多教師勢必要自編上課講義而耗費大量心神。另外，接受訪談的教師也指

出，課堂的口譯教學活動向來脫離不了大量的學生練習和教師評論，上課氣氛緊張而單調，教師極需創新而多元的口譯教學活動來協助同學學習。例如模擬會議（mock conference）就是個鼓勵同學實際參與口譯工作和增進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的教學活動（林宜瑾、胡家榮、廖柏森，2005）。而舉辦更多的口譯教學工作坊、研討會和發行刊物也都可提供教師分享彼此教學的心得。至於會議的演講稿其實也算是教學教材的一種，而且它是真實（authentic）而自然的教材，比較貼近職場需要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可是教師通常很難有管道取得；但也有受訪教師持不同意見，認為會議演講稿對學生而言是難度太高的教材，通常還要經過改寫才能在課堂上使用，並不是很好用。

另外，目前口譯課的教材都是以書面的課本或講義為主，最多輔以錄音的 CD 等有聲教材，對學生的幫助仍有其限制。筆者認為未來也可嘗試開發出具有口譯員影像和聲音的教材，包括適合大學口譯課教學目標的逐步口譯、導覽隨行口譯和企業內談判溝通口譯等，都可將這些實務的口譯工作情境攝製成 DVD 的視聽教材，並搭配書面的文字教材，相信更能傳達口譯員的雙語轉換和肢體表情等技能使用，有效增進課堂口譯教學之成效。以上這些教學需求其實並不是個別教師有能力可以解決的，還需要學界、出版社和業界共同努力才能促進口譯教學的發展。

伍、結論

本研究呈現國內目前大專口譯教學的相關資訊，並指出與之前研究結果之異同，突顯國內口譯教學近幾年來迅速發展之脈絡。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歸結如下：

- 一、口譯課程的教師多為主修口譯和具備專業經驗的碩士學位者，雖然尚未達到一般系所對於博士或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的要求，但以口譯學科的特性和目前國內專業口譯人才結構而論，如此

的師資配置仍應屬恰當。

- 二、目前大部分的口譯課程可開放給非英文系學生選修，亦未採行任何篩選措施，修課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導致教師難以控制授課品質，建議未來各校應有分級授課的機制。
- 三、現行口譯班級的學生人數大多介於 11 至 30 人之間，但教師普遍認為可以再減少至一班 5 至 15 人，才有可能在課堂上提供學生更多練習的機會，提升教學效果。
- 四、多數口譯教師認為自己的教學方式並未有任何理論基礎，但是從教師所實施的教學活動和方式，其實相當符合社會建構論的教育原則，未來也可依據社會建構的教學理論來培訓口譯師資。
- 五、教師認為大專口譯課程目標主要在激發學生學習口譯的興趣，教授的口譯技巧亦多與語言技能相關，此種定位相當務實，可針對大專學生的能力因材施教，並與研究所以培訓專業口譯員的教學目標做出區隔。
- 六、口譯教學最大的困難則是學生的語言程度和知識背景不足，雖然口譯課並不是語言技能課，但可經由口譯課來增進學生的語言和知識能力。另外口譯課也可和英語的聽、說課程搭配，共同發展學生的語言能力。
- 七、多數教師上課並未使用教科書，而是使用自製的教材，其中最常教授的主題為商業和政治。但是缺乏合適教材和教學活動也是大多數教師的困擾，期待有更多現職教師與出版社合作創作適用的教材，納入更新的題材和更真實的視聽學習工具。也盼望有更多的口譯教學工作坊、學術研討會和專業刊物供口譯教師分享更多元有效的教學活動。

本研究也有其限制，首先，問卷回收率 46% 若能再提高，此研究樣本就更具代表性。但是很多口譯教師因為口譯工作和教學事務繁忙，經

多次聯繫亦未回覆。不過此次研究是以全國性 92 位口譯教師為母體的規模下寄發問卷，能回收來自各個不同縣市學校的 42 份回覆問卷，較之於過去類似研究的小樣本數已屬難能可貴。另外，未來的研究方向也可探討教師的背景變項，例如專兼任、口譯教學年資以及具專業口譯背景和其它領域背景的口譯教師在教學方法、教學成效和學生觀感上有何差異，以期豐富國內口譯教學的研究。

最後，本文所得的研究結果，希冀能提供最新的口譯教學相關資訊予規劃大專口譯課程的行政主管及教師，或許他們也能於現今的口譯教學概況中獲得某些啟發，或借鏡其他教師的口譯教學方法，進而截長補短，提升口譯的教學品質，為社會培育出更多的外語專業人才。

註釋

1.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十二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經增修後而成此文。
2. 截至 2008 年止國內已設有五所翻譯研究所（臺師大、彰師大、輔大、高雄第一科大、長榮大學）和兩所翻譯學系（長榮大學、文藻外語學院）。
3. 因有多名口譯教師是同時在不同學校任教，因此口譯教師人數 92 位低於開設口譯課程的系所數量 99 所。

參考文獻

- 王珠惠（2003）。大專口譯課程教案設計及實踐。**翻譯學研究集刊**，8，181-195。
- 王慧娟（2008）。A study on Applied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needs for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courses。載於長榮大學翻譯系舉辦之「第十二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31），臺南縣。
- 何慧玲（1997）。英中視譯錯誤分析與教學關係。**翻譯學研究集刊**，2，111-135。
- 何慧玲（1999）。臺灣大學應用外語科系口筆譯教學概況與分析。**翻譯學研究集刊**，4，121-156。
- 何慧玲（2001）。大學口譯課程筆記的學習與教法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6，

53-77。

- 李翠芳 (1996)。大學部口譯課程的教學規劃。**翻譯學研究集刊**，1，117-140。
- 李憲榮 (2006)。在臺灣設立翻譯學系大學部的問題。**國立編譯館館刊**，34 (3)，59-66。
- 林宜瑾、胡家榮、廖柏森 (2005)。口譯課程使用國際模擬會議之成效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9，81-107。
- 吳敏嘉 (1999)。A step by step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翻譯學研究集刊**，4，265-280。
- 吳敏嘉 (2000)。Teaching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ing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翻譯學研究集刊**，5，181-195。
- 吳敏嘉 (2001)。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rategic—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翻譯學研究集刊**，6，79-92。
- 陳彥豪 (2003)。英語說服性演說的逐步口譯教學評量機制設計。**翻譯學研究集刊**，8，153-194。
- 陳聖傑 (1999)。A structured decomposition model of a non-language-specific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翻譯學研究集刊**，4，81-119。
- 湯麗明 (1996)。大學「口譯入門」課程英譯中視譯練習之運用與建議。**翻譯學研究集刊**，1，141-161。
- 楊承淑 (1996)。「口譯入門」課的教案設計、修正與評鑑。**翻譯學研究集刊**，1，163-182。
- 楊承淑 (1997)。我國碩士班口譯課程規劃與模態建立。**翻譯學研究集刊**，2，17-27。
- 廖柏森 (2007)。**英語與翻譯之教學**。臺北：秀威資訊。
- 廖柏森、徐慧蓮 (2005)。大專口譯課是否能提升學生口語能力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9，313-332。
- 劉敏華 (2002)。口譯教學與外語教學。**翻譯學研究集刊**，7，323-338。
- 劉敏華 (2003)。從實徵主義到建構主義：口譯研究與教學的新思維。載於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暨翻譯學研究所舉辦之「第七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會前論文集** (頁20-34)，臺北縣。
- 鮑川運 (1998)。同步口譯的過程及分神能力的訓練。**翻譯學研究集刊**，3，21-36。
- 戴碧珠 (2003)。**臺灣各大學英文系及應用英文系筆譯教學現狀探討**。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縣。
- 穆雷 (1999)。**中國翻譯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關思 (1998)。Interpretation training for the non-language major。**翻譯學研究集刊**，3，81-102。

- Cronbach, L. T. (1951).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16 (3), 297-334.
- Golden, S. (2001).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mes. In S.-W. Chan & D. E. Pollard (Eds.),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pp. 1074-1084).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Kiraly, D. C. (2000).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 Kiraly, D. C. (2003). From teacher-centered to learning-centered classrooms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Control, chaos, or collaboration? In A. Pym, J. Fillada, R. Biau & J. Orenstein (Eds.), *Innovation and E-learning in translator training: Reports on online symposia* (pp. 27-31). Terragona: University Rovira I Virgili.
- Mangione, T. W. (1995). *Mail survey: Improving the quality*. CA: Sage.
- Nunan, D. (1992).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錄：問卷結果摘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口譯教師背景資料

姓名		最高學歷	<input type="checkbox"/> 學士 (2.4%) <input type="checkbox"/> 碩士 (71.4%) <input type="checkbox"/> 博士 (26.2%)
年齡		任教職稱	<input type="checkbox"/> 講師 (73.8%) <input type="checkbox"/> 助理教授 (9.5%)、副教授 (11.9%)、正教授 (4.8%)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23.8%) <input type="checkbox"/> 女 (76.2%)	專、兼任	<input type="checkbox"/> 專任教師 (57.1%) <input type="checkbox"/> 兼任教師 (42.9%)
主修專長 (可複選)	<input type="checkbox"/> 口譯 (78.6%) <input type="checkbox"/> 語言學 (16.7%) <input type="checkbox"/> 文學 (4.8%) <input type="checkbox"/> 筆譯 (66.7%) <input type="checkbox"/> 英 / 外語教學 (33.3%)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9.5%)		
口譯教學年資	<input type="checkbox"/> 未滿 1 年 (9.5%) <input type="checkbox"/> 1~3 年 (40.5%) <input type="checkbox"/> 3~5 年 (21.4%) <input type="checkbox"/> 5~10 年 (11.9%) <input type="checkbox"/> 10 年以上 (16.7%)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01. 您是否受過相關口譯訓練？			
<input type="checkbox"/> 否 (11.9%) <input type="checkbox"/> 是 (88.1%)			
02. 您是否 (曾) 從事口譯工作？			
<input type="checkbox"/> 否 (選此項者無須填答下一題) (11.9%) <input type="checkbox"/> 是 (88.1%)			
03. 您曾從事的口譯工作性質為何？ (可複選)			
<input type="checkbox"/> 視譯 (59.5%) <input type="checkbox"/> 逐步口譯 (81.0%) <input type="checkbox"/> 同步口譯 (66.7%) <input type="checkbox"/> 隨行口譯 (64.3%)			

二、口譯教學問卷內容（第一部分）

01. 貴系口譯課程是否開放外系選修？

否（45.2%）

是（54.8%）

02. 貴系學生修習口譯課程是否有資格上之限制？

否（59.5%）（選此項者，請直接跳答第 4 題）

是（40.5%）

03. 修習口譯課程之限制為何？（可複選）

篩選考試（41.1%）

擋修（35.2%），須先修過 _____

其他 _____

04. 您在設計大學部的口譯課程時，是否有教學理論的依據？

否（71.4%）

是（28.6%）（選此項者，請詳填教學理論名稱，謝謝）

(1) “You can’t teach what you can’t do” by Jennifer Mackintosh

(2) “Effort Models” by Daniel Gile

(3)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by Elliot et al.

(4) “Social-constructivism” by Don Kiraly

(5)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6) “Analysis, Transfer, and Restructuring” by Engene Nida and Peter Newmark

05. 您目前的口譯班學生平均人數為：

10 人以下（2.4%）

11~20 人（33.3%）

21~30 人（31.0%）

30 人以上（11.9%）

40 人以上（21.4%）

06. 您認為最合適的口譯班上課人數為：

- 5 人以下 (14.3%)
- 5~10 人 (33.3%)
- 10~15 人 (33.3%)
- 15~20 人 (19.0%)
- 20 人以上 (0%)

07. 您是否使用口譯教科書？

- 否 (71.4%)
- 是 (28.6%) (選此項者，請詳填書名及作者，謝謝)

Book Title / 書名	Author / 作者	Publisher / 出版社
1. 同步翻譯 (1~4)	郭岱宗	東華書局
2. 實戰口譯	林超倫	經典傳訊
3. 口譯的理論與實踐	周兆祥、陳育沾	臺灣商務印書館
4. 實用口譯手冊	鍾述孔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5. 口譯精華	黃佩蕙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6. 英中翻譯 Step by Step	張中倩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7. CNN 互動英語雜誌	Live ABC 編輯團隊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08. 您目前所用口譯教材 (教科書或自製講義) 之內容性質為何？

(請排序，使用最多者為 1，其次為 2，依此類推，未用者則無須填答)

- 文史哲 (42.9%)
- 商業 (76.2%)
- 科技 (45.2%)
- 經貿 (57.1%)
- 政治 (66.7%)
- 法律 (16.7%)

- 觀光 (47.6%)
- 新聞 (61.9%)
- 運動 (26.2%)
- 娛樂 (38.1%)
- 其他 _____

09. 您的口譯課程是否有指定作業？

- 無 (0%) (選此項者，請直接跳答第 12 題)
- 有 (100%)

10. 您多久給一次作業？

- 每週皆有 (40.5%)
- 兩、三週一次 (21.4%)
- 不一定 (38.1%)

11. 您出的作業為：

- 個別作業 (52.4%)
- 小組作業 (0%)
- 兩者皆有 (47.6%)

12. 您所出的作業方式為何？

- 錄音 (66.7%)
- 回家分組練習 (31.0%)
- 課前預習 (76.2%)
- 籌備模擬會議 (42.9%)
- 搜尋資料 (61.9%)
- 完成課本習題 (21.4%)
- 其他 _____

13. 您所教授的口譯課程是否有考試？

- 否 (7.1%)
- 是 (92.9%)

譯評

繪寫康熙——*Emperor of China* 及譯本《康熙》文體評析

蔣宜臻

原書名：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者：臺北，時報出版
出版年：2005
總頁數：221
ISBN: 9571343633
售價：NT 250 元

耶魯大學史學系的中國近代史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以流暢、活潑、近似小說的寫作風格聞名。他重視個人在歷史的地位，著作幾乎都是人物傳記，藉由刻畫傳主的性格、稟賦、際遇與所處的大時代背景，栩栩如生地呈現歷史事件的場景，其早期著作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即大膽採用獨特的寫作手法——以第一人稱的自述口吻，模擬康熙的「自傳」。他在史料中抽絲剝繭，抽離出流露康熙個人思緒的隻字片語，建構出康熙的內心世界，讓讀者「傾聽他藉由文字傳達的態度與價值觀……從康熙自己的觀點，領略他內心深處的罣礙，進而更加瞭解康熙這個人。」(溫洽溢譯，2005，頁 7-9)

這幅以言文史料為素材，以現代英文勾勒（轉譯）的康熙自畫像，在成形的三百多年前，其實已經歷過滿文轉譯為漢文的過程，而在 *Emperor of China* 出版三十一年後，臺灣時報出版推出中譯本《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還原翻譯這幅畫像，第三度翻譯康熙之語。在這多次的翻譯過程中，史景遷想以真實的康熙之語「自述」康熙的目標，是否能夠達成？史景遷轉譯史料時，採用的文體又呈現出何種康熙形象？溫洽淦的還原翻譯描繪的康熙形象，是否與史景遷描繪的相同？

若能深入探討滿文到漢文的第一度翻譯，我們可以更瞭解康熙的滿人文化背景，但礙於筆者能力的限制，僅能對滿文史料所占的份量與重要性，稍作描述。

第一度翻譯——滿語到漢語

滿文為清朝國語，入關之初，滿人漢化不深，君臣常以滿文談論公事，或以滿文撰寫奏摺，因此，當起居注官記載皇帝言行，收錄諭旨時，滿文起居注官的記載較為翔實，而翻譯成漢文的史料不免有所簡化（陳捷先，1977，頁 108-109）。最原始的起居注史料即有滿漢對譯的刪略與失真問題，雍正時期開館編修的《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更是刻意地潤飾刪削諭旨，甚至竄改臣工奏疏（莊吉發，1980，頁 126，143），使得《實錄》的真實性有待商榷。

史景遷以官修史料為素材描繪康熙，引用最多的是官修史書《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次為官方纂修的康熙語錄《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其次為第一手、未經纂修的康熙書信與硃批原跡，如寫給敬事房總管顧問行的親筆信函〈清聖祖諭旨〉、康熙硃批奏摺，以及民國十四年與十七年發現的〈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康熙的親筆書信與硃批雖有引用，但大幅引用經過對譯刪修的《實錄》，使得這幅畫像的可信度在繪製時，已被打上問號。

第二度翻譯——漢語到現代英文

史景遷爬梳的史料極其繁雜，除官書之外，還參考當朝大臣的記聞、文集與年譜，描述康熙一朝的中西交流時，亦採用大量西文史料。面對數量如此驚人、雜亂無章的史料，史景遷試圖模擬在一刻之間湧起的人生回憶，以第一人稱敘事與不斷變換主題的流暢敘事，過去與現在並現，捕捉相隔幾十年的經歷，恍若康熙娓娓道來的「追憶似水年華」。他依循生、老、病、死的人生周期，以主題式的章節安排，從青壯年的「遊」(in motion)、「治」(ruling)、「思」(thinking) 到邁入晚年的「壽」(growing old)，以及描述眾子爭權的「阿哥」(sons)，最後以康熙五十六年的臨終諭旨作結。

擬自傳要可信，康熙的口吻真實與否非常關鍵。史景遷不僅是作者，也是「康熙語言」的譯者，他在序言裡也對康熙的語言多加著墨，評為「簡潔流暢、坦率抒發」、「口語化的特質」(溫洽溢譯，2005，頁 17-18)。他以何種文體詮釋康熙的語言特色，是否符合他對康熙語言的評語，即為一個有趣的問題。為解答此問題，筆者試從文體結構、人稱代名詞、字彙、成語分析 *Emperor of China* 呈現的康熙語言。

Emperor of China 的句型結構很簡單，而且適當運用連接詞，加上清楚明瞭的標點符號，讀來層次分明，簡單易懂。例如，根據 Freeborn (1996) 對子句功能的分類，以下長句可依主要子句 (main clause, MCl)、附屬子句 (subordinate clause, SCl)、關係子句 (relative clause, RelCl)、同位語子句 (appositive clause, AppCl) 的分類，拆成以下子句：

[MCl 1 I checked] [RelCl that rewards were given to the various people] [RelCl who helped us move across the country]—[AppCl the guides, scouts... and their women folk]—[MCl 2 and always insisted] [RelCl that the horses be lovingly tended]: [AppCl if there is a danger of rain, cover them up properly]; [AppCl if they have been ridden hard and have sweated, don't give them water

right away or they'll get ill.]

從此分析可看出，本句的每個子句皆很簡短，關係子句緊接著其修飾的主要子句（“I checked that rewards...”；“the various people who...”；“insisted that the horses...”），直接明瞭，文義清楚。多種標點符號的使用，也避免混淆，有助於閱讀：用破折號與冒號引出補充描述的同位語子句，分號將兩個子句分隔開。簡單的句型結構呼應史景遷對於康熙文體的歸類——「簡單、直接」（Spence, 1974, p. xxii）。清晰的標點符號也代表：這本自傳雖然強調康熙平實簡單的語言風格，且 *Emperor of China* 模仿的是康熙的書面文字風格，而不是模仿口語。

另外，單就 and 和 but 兩個對等連接詞來看，*Emperor of China* 呈現強烈的口語色彩。《朗文口語與書面英文語法》（*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LGSWE）的 LGSWE 語料庫分析歸納對話的語域特色，發現說話者會運用擴充策略連結說出的子句，擴充言談內容，包括使用對等連接詞 and 與 but，或是 so 與 because（Biber et al., 1999），而且 and 在對話中，常用於連接子句與發語詞，but 也是英文對話最常見的發語詞之一，因為說話者常用 but 修飾之前所說的話，或用 but 提出相反的意見。加上避免以對等連接詞起始句子是常見的正式英文文體寫作規範，*Emperor of China* 常出現以 and 和 but 起始的句子¹，不僅相當特出，而且功能也頗為近似口語的發語詞，例如：“...**And** this Ošan once claim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Gorolo clan... I did not permit this **and** he's had a grudge against me ever since. **And** he had no thoughts for my favors...”（Spence, 1974, p. 136），或是以 and 連接，不作停頓表現說話者的憤慨，如：“Hu Chien-ching...seizing people's **lands and wives and daughters, and murdering people** ...”（p. 30）。另一個對等連接詞 but，是 *Emperor of China* 最常用於表現轉折的連接詞，其他同義詞，如 although, nevertheless, on the other hand 僅各出現四次、一次、一次。與 and 相似，but 也常放在句首作為發語詞，甚至在書面的論旨也可看到——“...then let them be killed.

But spare the others...But the women in the bandits' camp.... (p. 32) ”。

若從人稱代名詞來說，中國皇帝專有的人稱代名詞「朕」，其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是 I 無法傳達的。史景遷在 *Emperor of China* 的序言中雖說明中國特殊的帝王避諱傳統，但他未試著將避諱的特性融入他轉譯的康熙語言內（如自創康熙獨有的人稱代名詞），而是使用無尊卑差異的現代英文人稱代名詞。康熙與臣民（以及讀者）同樣都用 I 自稱，甚至臣民也用 you 指稱康熙，使得皇帝與臣民的地位顯得較為平等，讓康熙的形象更為親和。

常用字彙頻繁重複出現，亦讓 *Emperor of China* 的用字顯得淺顯，風格平實，例如，對話中最常見的敘述形容詞（predicative adjective）—— good 與 bad (Biber et al., 1999)，在 *Emperor of China* 出現的次數很頻繁，good 有 58 次，bad 有 27 次，讓康熙的用字顯得淺白，如：“It’s a **good** principle to look for the **good** points in a person and ignore the **bad**. (p. 34) ”, “...when an exemption was granted it benefited these **bad** people and not the **good** ones who had already paid. (p. 54) ”。與史的翻譯相比，原文的用詞其實比較明確和多樣，如「善於馭馬」、「精於騎射」、「人之美事」，一概以 good 形容。對話常用字頻繁出現，亦符合「對話的字彙選擇不多」（Biber et al., 1999, p. 545）的現象。

史景遷摘選的史料多出於官修史書，文體多是莊重的文言文，但其譯文相當淺白，不似書面語，無論是句型結構、人稱代名詞和字彙，皆呈現近似對話的語言風格。雖然史景遷要以不更動原典文句的方式，忠實呈現康熙，不加入自己的意見，但摘選、翻譯時，史景遷已突顯了康熙有別於其他帝王的親和坦率，人性化的一面。

第三度翻譯——英文到中文

對於該以何種文體翻譯此本風格獨特的偽自傳，繁體中譯本譯者溫洽溢在譯後序做了詳細說明——他認為謹守原典史料，還原原典字句，最能突顯史景遷欲以康熙之口述生平的創作旨趣（溫洽溢譯，2005，頁212）。《實錄》、《庭訓格言》、〈清聖祖諭旨〉與硃批諭旨是史景遷最常引用的史料，在 *Emperor of China* 中，所有史料皆很巧妙地編織成一致的淺白文體，然而，深究之下，引用的史料包括文言、白話，甚至是英、法、日文的外文史料，忠實還原除了會重現史料文體的不協調，遇到外文史料，譯者的翻譯也須依循還原史料的文體風格，因此，譯者以何種文體翻譯外文史料，亦能看出其還原翻譯時，使用何種標準揉合不同文體的史料。譯者選擇「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採用文言文的形式翻譯……以還原帶有帝王語氣的中文。」（溫洽溢譯，頁212）反映了譯者心目中的帝王之語，應是莊重的文言文體。

官修正史《實錄》是 *Emperor of China* 最常引用的史料，句型簡短，用詞典雅，是引用史料中，風格最正式的文言文體，如：「朕承太祖、太宗、世祖弘業……兢兢業業，軫恤臣工，惠養百姓，惟以治安天下為務。今觀胤祔，不法祖德，不遵朕訓……」（《實錄》，卷234，頁2-3）。相較之下，康熙的家訓《庭訓格言》記載生活上的談話，雖為文言文，但用語較通俗，句型也較為繁雜冗長，如：「若夏秋間雨水可慮，必覓高原……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庭訓格言》，頁13）。這兩種史料都經過後人編修、潤飾，從康熙親筆書信〈清聖祖諭旨〉的口語白話，可看出康熙口語和官書文體風格的落差，像是：「問南府教習朱四美……他是八十餘歲的老人，不要問緊了，細細的多問兩日，倘你們問不上來……」（〈諭旨〉，頁19b）

在對照溫譯本的還原與原始史料後，筆者發現溫譯還原《實錄》時，幾乎是一字不改，僅在需要更動人稱時，或需配合英文句型時，稍作調

整，如《實錄》第 136 卷第 12 頁的「上率文武諸臣，以次仰射。上連發數矢，皆過峰頂。侍衛桑革拉、納拉善二人，射至其顛峰……」，溫譯本還原為「朕率文武諸臣依序仰射。除朕之外，惟侍衛桑革拉、納拉善得射過峰頂……」（溫洽湓譯，2005，頁 31）。風格較淺顯的《庭訓格言》，更動幅度較大，如上段引用的《庭訓格言》，還原之後，改為「……夏、秋間，當慮雨水，必覓高原……冬、春間，應思星火燎原，但覓草稀背風處……」（頁 33）。譯者將原文的句子切割、縮短，注意文句的對稱，更動重複的用詞，使用四字成語（「星火燎原」），顯示其對書面文體的偏好。因此，〈清聖祖諭旨〉雖是康熙親筆書信，卻因為文體口語，也被大幅修改，如〈諭旨〉第 16 頁的「潮汐之說，古人議論最多，總未得其詳……朕到海邊者……與本土人詢問，大約皆不同，所以將各處安人記時刻，亦不同。後知泉井皆有微潮，亦不準時。」經溫譯修改後，用詞更為書面（粗體為筆者所加）——「潮汐之說，古人**議論紛陳**，總**難知曉箇中實情**。朕臨海邊……然詢問**當地之人**，**所得時辰概皆不同**，各地**所載之起落時辰亦迥然有別**。嗣後，朕得知泉、井皆有微潮，但亦難知**確鑿時刻**。」（頁 81）。

溫譯除改用書面用詞與成語，句子也加長，另加入兩個文言介系詞「之」，此特色亦在其模擬的「帝王之語」出現，應證了譯者心目中的帝王，應使用莊重的文言文。以教廷使節覲見康熙的對話為例，對於這段引自西文史料的記載²，溫譯文體試圖模擬文言文的用詞：

朕諭令通譯張誠務必嚴正強調此點後，又謂：「教化王與爾等定能恤勉遠道而來、經年離鄉背井之西洋人。」（頁 90-91）

此羅馬使節稟道：「遠臣實能憐惜彼等之煎熬，易地而處體認彼等旅途之疲憊。」（頁 90-91）

除書面辭彙外，亦使用文言文人稱代詞：「朕」、「爾」、「彼等」、「遠臣」，使譯文帶有古體之感，但因使用複音詞的辭彙與四字成語，使得句子比《實錄》等史料長了許多。

上述幾例說明了溫譯並非一字不改地還原史料，文言書面的《實錄》保留得最完整，而口語的〈清聖祖諭旨〉大幅潤飾，其修飾的重點與溫譯的擬古體特色相仿，皆使用書面辭彙、成語³與文言文介詞「之」。從原典史料的修改與擬古體的風格觀之，溫譯想像中的帝王之語是文言典雅的，其描繪的康熙之語與史景遷筆下的淺白口吻截然不同，尤其是文言文人稱代名詞在還原後，重現康熙凌駕臣民的至高無上，與史景遷意圖描繪的平易可親迥然相異。

結論

史景遷大膽以親近的第一人稱口吻描寫康熙，淺白生動的風格，獲得許多讚譽。然而，這本逼真的擬自傳真能讓讀者看到康熙的內心之語嗎？史景遷全然接受《實錄》的記載，取材的適當性即受到質疑，而溫譯忠於《實錄》的還原，描繪與史景遷截然不同的康熙，不僅說明兩者對於康熙形象的想像有所差距，亦突顯出 *Emperor of China* 勾勒的康熙，經過了大幅「排演」（康無為（Harold Kahn）的批評，引自 Spence, 1974, p. 211）——即使史料文體殊異，史景遷仍以一貫的淺白風格呈現，代表其對康熙的語言風格先有預設。相較於史景遷的創新詮釋，譯者溫洽溢描繪的康熙，則是用語莊重典雅的傳統極權君主，為求描繪形象的一致，溫譯改動康熙親筆書信，讓真實的康熙語言更不可得，背離史景遷強調以康熙之語口述的創作旨趣。

溫譯仿文言文的擬古體風格，反而難以傳達史景遷的原著旨趣，亦讓人思考其他還原翻譯文體——與康熙朝白話相近的明清歷史演義小說文體，或許是另一種可行的選擇。

註釋

1. *Emperor of China* 第 117 頁的正文中，以 and 起頭的句子即有 65 例，but 起頭的句子有 53 例。
2. 此段原典出自 Rouleau, Francis A., S. J. (1705) Millard de tournon,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The first imperial audienc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lesu*, LXII 1962, 264-323。
3. 溫譯大量使用成語擬古，非出於原典的常見成語可歸納出 89 個。

參考文獻

- 莊吉發 (1980)。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
- 清世宗 (1989)。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臺北：新文豐。
- 清高宗 (1970)。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百卷。臺北：華文書局。
- 清聖祖 (1964)。清聖祖諭旨編輯識。載於許寶衡 (主編)，*掌故叢編*。臺北：國風。
- 陳捷先 (1977)。清史雜筆第二輯。臺北：學海。
- 溫洽溢 (譯) (2005)。Jonathan D. Spence 著。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臺北：時報。
- Biber, D. et al.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Harlow, Essex, England: Longman.
- Freeborn, D. (1996). *Style: Text analysis and linguistic criticism*.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Spence, J. (1974).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Vintage Book.

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

胡功澤

班雅明 (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於 1892 年 6 月 15 日在柏林出生，1940 年 9 月 26 日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小鎮坡埠 (Portbou) 去世。是位德國哲學家，社會理論家，文學批評家以及翻譯理論家。自從 1970-1980 年選集出版後，始漸漸受到世人的重視。其作品中常被提及的有〈論歷史的概念〉以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等等。不過 1920-21 年之間完成的〈譯者天職〉一文，雖是早期的作品，卻能夠清楚呈現其整體思想，也是班雅明後來各種理論的中心軸線，在當代人文界非常受到重視。

〈譯者天職〉一文乃是 1921 年出版的班雅明所做 Baudelaire 翻譯的前言，因此，並非一嚴謹意義之下的理論建構，而是針對他對於語言的瞭解（或更好說：信念），所做的一些反省與表達。由於中文裡面還沒有從德文原文翻譯過來的版本，筆者做了這個嘗試，為關心者提供另一個詮釋版本。

本文將既有的四個中文版本，與筆者的翻譯做比較，針對關鍵概念有誤解或不清楚的地方，提出十個例子，分析比較。至於風格的不同，則不是本文比較的重點。德文原文以及筆者的中文翻譯則置於附錄，以供參考。令人慶幸的是，加上筆者翻譯的一篇，共五篇譯文，對於該原文，百分之八、九十都達到近似的瞭解。因此讀者更能夠從不同角度，不同的表達方式，瞭解班雅明該文的意涵。

關鍵詞：班雅明、〈譯者天職〉、譯文比較

收件，2008年12月17日；修改：2009年1月18日；接受：2009年1月18日

胡功澤，天主教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philippu2004@yahoo.com。

On Different Renditions of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ith a Full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into Chinese

Kung-tze Hu

Since Walter Benjamin (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1892-1940)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author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logy, Philosophy, Translation Studies, Post-modernism etc., the object of this project is the translation of his ess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from the German original into Chines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author, there are already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essay, demonstrating its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scholars. However, they're all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versions (1968 and 1996 by Harry Zohn). Besides variations in style of expression among these four, some interpretations differ. The author chooses ten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that these diversities hav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among all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cluding the fifth one from this author) there is an 80 to 90 percent agreement on meaning in the essay. The author wants to show that this essa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expression, which taken together result in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ssay, echoing Wilhelm von Humboldt's opinion that various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all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Keywords: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omparison of translations

Received: December 17, 2008; Revised: January 18, 2009; Accepted: January 18, 2009

壹、前言

班雅明的〈譯者的天職〉(或譯為〈譯者的任務〉)德文原文雖然寫成已久(1921)¹，但是廣為人知以及頻受徵引，也只不過是20世紀接近尾聲之際，特別是在該文翻譯成為英文之後²。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對該文都有所引用或評論：例如比較文學(Paul de Man, 1986)，哲學(Derrida, 1985)，文化研究(邱漢平, 2000)，後殖民翻譯研究(Niranjana, 1992)等。單單在華文領域來說，從1998年到2008年，包括本文在內，已經有五個版本的中譯，由此可見其受重視的一斑。但是在翻譯研究的領域，以實務為導向的研究，例如口譯，工商、法律、科技翻譯等，對該文較少提及。由此可見，該文在以文化或文學為導向的翻譯研究領域，比較受到重視。

筆者第一次接觸該文是透過邱漢平教授在《中外文學》(邱漢平, 2000)的介紹文章。班雅明的這篇文章，對於翻譯的看法，確實與眾不同。剛開始閱讀時，一時難以進入其思考路線。直到後來，反覆閱讀，並參考相關文章以及既有的翻譯，才開始漸漸確定對該文的瞭解。基本上，班雅明在該文完全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翻譯。我們一般想當然爾的看法，比如說，認為翻譯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這一點在班雅明該文中，並未受到重視；相反地，班雅明認為翻譯是追尋眾語言源頭的工作。

貳、〈譯者的天職〉內容簡介

班雅明的這一篇文章，早已獲得「難懂」的評語。德希達(Derrida)在他〈論巴別塔〉(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認為班雅明該文是一篇艱深的文章。(Derrida, 1986, p. 175)霍米巴巴(Homi Bhabha)也說，本文是20世紀最難懂的文章之一。(引自邱漢平, 2000, 頁14)其實不止

如此，班雅明的朋友蘇霖（Gershom Scholem）提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就說過，這篇文章出版之後，學界一片沈寂，沒人回應，從此，班雅明就獲得了「不可理解的名聲」（*der Ruf der Unverständlichkeit*）（Scholem, 1975, p. 153）。

根據筆者粗淺的看法，該文的難處之一，應該是其中的幾個概念，比如說，「純語言」（*die reine Sprache*），或者「達到純語言的途徑」。但是，如果我們閱讀該文的時後，不要因為這些不易懂的概念而止步，甚至要拋開自己既有的關於翻譯的看法，嘗試著跟隨文章的敘述，進入其中的思維邏輯，或許還能夠有一些領悟。因為以文本結構來說，這是一篇結構嚴謹的文章，從頭到尾，班雅明旁徵博引，反覆不斷地從不同角度來說明幾個核心概念，因此該文章的重點非常清楚。德希達對該文也有類似的體會，他雖然承認該文難懂，但是卻說，整篇文章有明顯而一致的主題可循。他在〈論巴別塔〉一文中說：

“The preceding ought to have led me instead to an early text by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1916) [...] But given the, in my view, overly enigmatic character of that essay, its wealth and its overdeterminations, I have to postpone that reading and limit myself to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ts difficulty is no doubt no less, but its unity remains more apparent, better centered around its theme.**”
（Derrida, 1986, p. 175，重點由筆者所加）

德希達在此所說的該文的中心主題之一，應該就是文章的題目：譯者的任務。乍看之下，這五個字是很容易懂的。譯者的任務，按照一般的瞭解，應該是：把譯文做得忠實，寫得通順，或者具有文采等。不過，班雅明所說的任務，好像是另外一種，是非常不平常的一種，是我們聞所未聞的一種任務。為了說明他所提出的任務，他必須首先排除一般人對翻譯的看法。比如，他從開始到結尾，不斷提出的一件事就是，翻譯不是為

人而做的，不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因此，翻譯的內容，不是原文的含意，不是原文的訊息，不是模仿原文的文字、句法、及結構。他說，如果我們把翻譯的注意力放在文字語言上面，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為語言文字不斷地在變動，我們無法獲得一個「永恆」的譯文。因此，這種翻譯始終是一個次等的翻譯。

但是，他指出，翻譯有其無比崇高的任務。他舉出一個幫助我們瞭解的例子，就是《聖經》〈若望福音〉的第一句話「太初有言」。我們人間的語言，應該都是翻譯這個「道」的結果。不過，班雅明用的大多不是宗教的語言，他舉出的翻譯的終點是「純語言」。翻譯者的任務，在於將語言帶回這個終極目標。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班雅明認為一般的文學、文章、以及用語當中，含有太多「人」的成分，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或語言的文法。翻譯的任務則在於，把這些「人為」的東西去掉，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永恆的價值。翻譯的任務有點像「解脫」(Erlösung)被太多人為的語意所纏繞的語言，讓語言變成它原本的面貌，其終點就是純語言，而其過程就是班雅明所認為的真正歷史的進程。

因為有這樣的大前提，有這樣一種對歷史的瞭解，因此，會有「來生」、「後繼生命」的概念。文學是這純語言在世間的載體，翻譯者的任務，在於在原著當中找出互補的表意的方式，把原著帶到一個更高，更純淨的語言的氛圍。在救贖歷史的終結，互補的眾語言達到一個和諧的語言的境地，靠近了純語言，在此地，一切的溝通，語言都成為多餘的，都將消失，因為在那裡是完全的共融，完全的和諧，完整的實現。(幾乎可以說：一個字就包含了所有的語言)班雅明也是從此出發，賦予忠實翻譯以及自由翻譯新的詮釋：忠實於達到純語言的目標，在此大目標之下，自由變動手中的語言文本。

如果我們暫時不談該文在神學以及哲學領域的意義，單單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班雅明的這篇文章，對於目前的翻譯研究，可有如下的啓

發：一、翻譯實踐方面，班雅明強調不用注重表面上的對等，（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每一種語言都隨著時代改變），因此，這不應是翻譯的重點，翻譯的重點應該在於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表現同一個意指。這一點認識有助於澄清對等的翻譯觀念。二、本文詳細而且令人信服地看到，我們所謂的翻譯文本都是暫時的，因此，文學經典需要不斷地重新翻譯，以配合語言本身不斷的變化。三、眾語言之間含有一定的關聯，透過翻譯可以豐富以及提升本國語言。四、提出人際的相互瞭解，僅僅橫向的翻譯也是暫時的，有限的，想達到更深的互相瞭解，則要回到各自語言的源頭，班雅明本文開闢了新的思考方向。

以上所做的介紹，比起德文原文的內容，可謂非常粗糙。要懂班雅明的想法，還是應該看他的原文。他的解釋是相當清楚的。至於一些玄妙的概念，既然班雅明沒有進一步說明，我們也暫時擱置一旁。單單抓住我們所能懂得部分，已經會有許多收穫。

對於不能讀德文原文的朋友，就要靠翻譯，因此可見翻譯的重要性。這也是筆者將之從德文翻譯成中文的原意所在。筆者在翻譯的時候，所考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讀者讀得懂嗎？能不能夠懂班雅明原來想要說的東西？這樣看起來，筆者並沒有遵守班雅明的翻譯原則。不過筆者這麼想，把文章翻譯得讓讀者讀得懂，是目前翻譯工作的第一個要求。至於在這麼做的時候，在翻譯裡面，是否有班雅明所謂的提升了語言生命的後繼生命，很有可能，不過，這是另一層面的事，要在另一個機會來討論；而在目前，這並非筆者翻譯時候所關注的。

參、譯本的比較

「現在，翻譯做完了，每個人都可以閱讀，可以批評。甚至一下子翻個三、四頁眼睛也不用眨一下——卻不知，現在走的平坦大道，曾經是礫岩與土塊。我們必須流著汗水，辛苦地把礫岩與土塊搬開，好讓他

人在上面舒坦行走。清除過的田地才好耕作。」(Reiss, 1971/1986, p. 9; 中譯出自筆者)這是馬丁路德翻譯了德文聖經之後，寫的一小段話。寫出翻譯批評與從事翻譯的不同。

提到譯文的比較，難免會有翻譯批評。「批評」兩個字很敏感，應該做一點說明。下面的譯本比較，乃以筆者對於德文原文的瞭解為基礎，針對筆者對其他中文譯本的瞭解作比較。因此，是把不同時間，不同情況之下所做出來的譯本，都拿到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桌子上，在筆者的主觀判斷之下互相對比。

這樣做的時候，只能比較翻譯的成品 (production)，筆者不能對各個文本的製作過程比較。筆者所下的判斷，是針對翻譯成品，而非針對每一個譯本的全部翻譯工作所做的。這個表示什麼？這表示，對於其他譯者，這樣的翻譯比較有點不公平。因為比較公平的作法是，從各譯者翻譯工作當時的條件來判斷他的成就與勞苦。僅僅舉一個因素來說，有些譯本是從英文本翻譯，但是英文本本身已經是從德文翻譯過來的，中文的翻譯自然受到英文本的限制。而現在把它們拿來和從德文原文直接翻譯過來的譯本放在同一個平台比較，當然有一點不公平。

德希達的解構式翻譯理論，至少為翻譯實踐的現實，帶來一個理論基礎，那就是，翻譯的正確性只是在其創造的那一刻能夠決定，移開了時地，也就是經過延異的過程之後，無法再回到翻譯過程的原來情況。根據這個事實，筆者的譯作也是一時之作，受到此時的種種限制（例如：在 21 世紀去瞭解一篇 20 世紀的文章，隔著時間與文化的距離），筆者也不過是在各種限制之下，完成該譯文。因此，也絕非完美之作。

說到這裡，筆者還要感謝先前的譯著給予筆者的啓發（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很重要），有些地方已經很難分辨，什麼是筆者的，什麼是他人的東西。不過，只要是能夠幫助讀者瞭解班雅明原文的意思，不就是一個值得的作法嗎？有些翻譯理論家提到一個很有用的觀點：透過不同的譯本，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瞭解同一篇原文，可以互補地，更完整地瞭解原

文。在這裡也是一樣，尤其面對班雅明這篇難懂的文章，更要從各方面仔細去瞭解其意思。

本文所採用的譯本如下：

- (一) 張旭東 (譯) (1998)。W. Benjamin 著。譯作者的任務。載於漢娜·阿倫特 (主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頁 63-7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二) 陳永國 (譯) (1999)。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陳永國、馬海良 (主編)，**本雅明文選** (頁 279-2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三) 陳浪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謝天振 (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 (頁 321-332)。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四) 喬向東 (譯) (1999)。W. Benjamin 著。翻譯者的任務。**中國比較文學**，1，71-83。
- (五) 胡功澤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天職。見附錄，未出版。

參考的英文譯本及德文原文：

- (Z1) Benjamin, W.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 Zohn, Trans.). In H. Arendt (Ed.), *Illumination* (pp. 69-8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 (Z2) Benjamin, W. (1996).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 Zohn, Trans.). In M. Bullock & M. W. Jennings (Eds.),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pp. 253-2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本文仍由 Zohn 翻譯，與 Z1 比較，有一些修改)
- (H) Hynd J., & Valk E. M. (1968).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Delos: A Journal on and of Translation*,

II, 76-96.

- (B)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IV 9-22. (這是編輯在班雅明德文選集裡的文本，也附在附錄裡)

每個例句後面括號內的數字，是該譯本的頁數。筆者本人的譯作，即例句(五)，以及德文原文(B)，則參照登在附錄的頁碼。畫線由筆者所作，以突出比較重點。

例一

這裡是開頭第二段的第一和第二句話。之前的第一段，班雅明清楚地說，藝術品的創作，不是為了讀者。接下來，就問：翻譯是為誰而做的？其實按照上面的一段意思，這個問題只是一個修辭性(rhetoric)的問題，答案是不說自明的。因此下面一句話，班雅明並沒有回答上面一句話的問題。反而進入另一個題目：將翻譯與原文比較。班雅明認為，如果翻譯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那麼，翻譯自然是次等的藝術品。下面一句話(見附錄原文)，繼續發揮了這個意思。

在此，翻譯(二)和(五)的翻譯正確。(一)、(三)、(四)的翻譯明顯受到英文原文(Z1)的影響，而且將 divergence 所說的差別，因為 their 的緣故，用到複數的讀者身上，而非用來分別翻譯和原著的階級。德文原文的「差別」一字，其實指的是有高低順序的階級之意(Rangordnung)，並且所用的代名詞，清楚的指出上述的兩樣東西(beiden: the two)之間的級別。而上一句裡面，只有提到翻譯和原著兩樣東西。因此指的應該是此兩者。而且在德文原文裡，下面接著繼續說明翻譯和原著的不同。(見附錄原文)。

究其原因，此處在原文裡意義突然轉折，而代名詞需要找出正確所指，確實容易誤會，因此在(Z2) Zohn已經作了修改，(二)則應是根

據 (Z2) 所做的翻譯。

這一句話的意涵，與整篇文章的意義前後呼應：翻譯既非為讀者而寫，也不是原著的複製品。翻譯本身有其自己的存在價值，乃是為純語言而服務的。見例句：

- (一) 那麼譯作是為不懂原作的人準備的嗎？如果是的話，這倒足以說明在藝術領域裡不諳原作的讀者有多麼廣大了。(63)
- (二) 翻譯是有意為不懂原文的讀者而作的嗎？這似乎充分的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譯文和原文在藝術領域中具有相當不同的地位。(279)
- (三) 那麼，譯作是為不懂原作的讀者而作的嗎？如果確是如此，倒也可以充分說明藝術領域裡讀者的看法立場何以千差萬別。(321)
- (四) 翻譯是為了那些不懂原作的讀者而做的嗎？這似乎是可以解釋在藝術王國裡讀者的立場的不同。(71)
- (五) 那麼，翻譯是為了不懂得原文的讀者而做的嗎？單單這一點，似乎就足以說明兩者(翻譯與原文)在藝術領域裡面的階級。(217)
- (Z1) Is a translation meant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his would seem to explain adequately the divergence of their standing in the realm of art. (69)
- (Z2) Is a translation meant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his would seem to explain adequately the fact that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have very different standing in the realm of art. (253)
- (H) Is a translation intended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That would seem to b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t status of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realm of art. (76)

- (B) Gilt eine Übersetzung den Lesern, die das Original nicht verstehen?
 Das scheint hinreichend den Rangunterschied im Bereiche der Kunst zwischen beiden zu erklären. (1)

例二

這裡的錯誤是，本來「否定」人的關係，誤譯成爲「肯定」人。而這個錯誤牽涉到基本概念的瞭解：班雅明該文最大的特點是，翻譯的概念和「人」沒有關係，翻譯有其「天生」的特色與任務，該文就在指出這個任務。因此，這裡的誤譯，會混攪了清晰的概念。

事實上，1996年班雅明的英文選集出版時，Arendt已經改正了這個錯誤：

- (一) 我們應當指出某些相關的概念只有當同人聯繫起來時才有意義，有時或許竟獲得其終極的蘊含。(64)
- (二) 應該指出，在對這種思考的拒絕中，某些對應概念，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專門用于人的指涉的話，那就保留了它們的意義，也可能保留了它們最重要的含義。(280)
- (三) 應當指出，某些相互關連的概念只有專門與人聯繫起來後才有意義，而且可能才會有他們最重要的意義。(322)
- (四) 應該指出的是：相互關連的概念如果他們被用來專指人則仍然具有各自的含意，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含意。(72)
- (五) 相較於這種看法，我們卻要指出，有些概念之間的關係能夠完善地、甚至最完整地保留下來，如果不侷限在人的層面。(219)
- (Z1)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certain correlative concepts retain their meaning, and possibly their foremost significance, if they are referred exclusively to man. (70)
- (Z2) It should be point out in refutation of such thinking that certain

correlative concepts retain their meaning, and possibly their foremost significance, if they are not from the outset used exclusively with reference to man. (254)

(H) In this connection, it might be pointed out that certain concepts are best grasped if they are not associated, a priori, exclusively with man. (78)

(B) Ihm gegenüber ist darauf hinzuweisen, daß gewisse Relationsbegriffe ihren guten, ja vielleicht besten Sinn behalten, wenn sie nicht von vorne herein ausschließlich auf den Menschen bezogen werden. (3)

例三

在此，班雅明要分開的是「意指的對象」與「意指的方式」；意指方式在單字層面互相抵觸，但以整個語言來說，卻是相互補充的。因為它們指向同一個東西。由於概念特別，德文原文也不好懂。譯文因為沒有抓住這些要點，不容易讓人看清楚，甚至會誤解。(Z2)也作了更改。在(一)中，變成意向性和意向性對象的互補。而(二)，雖然看了Zohn的新版，然而最後一句，變成了「這些詞的意指方式與這種方式與所意指的東西」，也錯誤了。(H)的翻譯是對的。

(一) 然而對於意向性對象卻使這兩個詞不能兩樣。這兩個詞的意向性樣式之間有衝突，然而意向性和意向性對象卻使這兩個詞變得互補，它們自己也正來自兩種互補的語言中，只有在這裏，意向性和它的對象間才是相輔相成的。(68)

(二) 然而，至於意指的東西，這兩個詞指涉同一事物。即便這兩個詞的意指方式處於這種衝突之中，但卻從這兩個詞所衍生的每一種語言中得以補充自身；確切說，這些詞的意指方式與這種方式與所意指的東西的關係構成了互補。(284)

(三) 但就意指對象而言，兩個詞語的意思並沒有區別。當兩個詞語

的意指方式相互抵觸之時，分別來自兩種語言的意圖和意指對象卻使這兩種語言互補。也只有在此時，對象和意圖之間才會相互補充。(325)

- (四) 然而，至於意指的對象，這兩個詞語指的是同樣的東西。這兩個詞語的意圖樣式互相抵觸，然而其意圖及意圖的對象卻使兩種語言互補，它們自身來自這兩種互補的語言。恰恰在這裡對象和意圖之間是相互補充的。(76)
- (五) 但是，它們所指的東西，以絕對的意義來說，表示同樣的 (das Identische)、同一個 (das Selbe) 東西。雖然這兩個字在意指的方式上如此的抵觸，但是，兩個語言裡這兩個不同的意指方式卻是互相補充。那是因為它們在各自的語言裡指向同一個東西的緣故。(228)
- (Z1) As to the intended object, however, the two words mean the very same thing. While the modes of intention in these two words are in conflict, intention and object of intention complement each of the two languages from which they are derived; there the objec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intention. (74)
- (Z2) As to what is meant, however, the two words signify the very same thing. Even though the way of meaning in these two words is in such a conflict, it supplements itself in each of the two languages from which the words are derived;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way of meaning in them is supplemented in its relation to what is meant. (257)
- (H) but due to what is meant, taken absolutely, signify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lthough the manner of meaning is thus quite at variance in the words, in the languages to which these words belong their manners of meaning sup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se languages, in

fact, the manner of meaning is integrated into what is meant. (84)

- (B) am Gemeinten aber, daß sie, absolut genommen, das Selbe und Identische bedeuten. Während dergestalt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iesen beiden Wörtern einander widerstrebt, ergänzt sie sich in den beiden Sprachen, denen sie entstammen. Und zwar ergänzt sich in ihn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m Gemeinten. (10)

例四

這一句的重點有一點偏差。因為整頁都是在講那個翻譯追求的最後的語言氛圍，譯者的工作就是從原著中找出那屬於這個氛圍的語言，把它們從一般尋找語意的翻譯劃分開來，因此，固然那是一個無法完全觸及的氛圍（核心部分），但是，譯者的任務就是在替語言找尋回歸之路。因此，（一）、（二）均強調那遙不可及的東西，而忽略了原文強調的譯者的工作。而（H）在這裡也是比較忠實於原意的。

- （一）即使所有的表面內容都被捕獲和傳遞，一個真正的譯作者最關心的東西仍然是難於把握的。(69)
- （二）儘管我們可以從譯文中儘可能多地收集那種主題，並將其翻譯過來，但真正的翻譯所關注的那個因素卻仍然相當遙遠，不可企及。(284)
- （三）即使把所有的表面內容都挖掘和傳遞出來，我們仍然很難把握一個真正譯者關心的內容。(326)
- （四）即使所有表面性的內容被挖掘、轉述出來，而一個真正的翻譯家最關心的東西仍無從把握。(77)
- （五）不論我們從翻譯裡面找出多少訊息，並且翻譯出來，不過那核心部分仍然不動地停留在那裡，而這部分就是真正譯者工作的方向。(230)
- (Z1) Even when all the surface content has been extracted and

transmitted,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genuine translator remains elusive. Unlike the words of the original, it is not translatable. (75)

(Z2) Though one may glean as much of that subject matter as one can from a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e that, the element with which the efforts of the real translation were concerned remains at a quite inaccessible remove. (258)

(H) That is, one may take from it all the information one can, and translate it; yet there remains the intangible at which the true translator aims. (86)

(B) Mag man nämlich an Mitteilung aus ihr entnehmen, soviel man kann und dies übersetzen, so bleibt dennoch dasjenige unberührbar zurück, worauf die Arbeit des wahren Übersetzers sich richtete. (12)

例五

在此要說的是，原著經過翻譯被提升到更高的語言氛圍，但是上面班雅明說過，這種提升，不是一次就做到的，而是原著的不同部分，漸漸被提升，已經受到提升的部分，不能再動它們。只能在後來再次翻譯時候，把其他還沒有被提升的部分，一點一點地提上去。(一)、(二)、(三)(四)受到(Z1)、(Z2)的影響，沒能說清楚這一部分。(H)的翻譯在此也是比較清楚的。

(一) 原作只能在另一時間被重新抬出。(70)

(二) 原文只能在那裡被更新和被置於其他時刻。(285)

(三) 原作只能在另一個時間裡再次復活。(326)

(四) 原作只能在另一時間再次復活。(77)

(五) 而只是不斷重新把作品的其他部分提升到此範圍內。(231)

(Z1) The original can only be raised there anew and at other points of time. (75)

- (Z2) The original can only be raised there anew and at other points of time. (258)
- (H) All that can happen is that its other and different aspects can in their turn be raised to this higher realm. (86)
- (B) sondern in ihn nur immer von neuem und an andern Teilen erhoben zu werden vermag. (13)

例六

這裡可以相當清楚的看出來，是（一）、（三）、（四）中文譯者加入了其既有的概念。班雅明在這一部分很清楚分開文學和翻譯，指出其各有所司，各有其任務。下面語言森林的比喻就是一個例子（見原文及翻譯，附錄第 14 頁）。所以，把翻譯看成是文學的一部分，並非原文的意思。（二）的翻譯則更忠實於原文。其次，德文 Dichter 有詩人以及文學作家的意思，（Z）有時候譯為 poet，因此，中文譯者也就譯為「詩人」。其實按照德文原文的情境，幾乎都可譯為「（文學）作家」。（H）在此就譯為 writer。

- （一）既然翻譯是自成一體的文學樣式，那麼譯作者的工作就應該被看作詩人工作的一個獨立的、不同的部分。(70)
- （二）正如翻譯是一種獨立的形式一樣，所以，翻譯者的任務也可以看做是獨特的，明顯區別於詩人的任務。(285)
- （三）既然翻譯是一種獨立的文學模式，那麼譯者的任務也應該獨立出來，與詩人的工作明顯清楚地區分開。(326-7)
- （四）既然翻譯是一種文學樣式，那麼同樣也應該將翻譯家與詩人的任務清楚地區別開來。(78)
- （五）就好像翻譯是一個獨特的形式，譯者的任務也是獨特的，必須和作家的任務清楚的分開。(232-233)
- (Z1) As translation is a mode of its ow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oo,

may be regarded as distinct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task of the poet. (76)

(Z2) Just as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its own, so, too, m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be regarded as distinct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task of the poet. (258)

(H) Just as translation is a unique form, so too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ay be taken as unique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at of the writer. (88)

(B) Wie nämlich die Übersetzung eine eigene Form ist, so läßt sich auch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als eine eigene fassen und genau von der des Dichters unterscheiden. (13)

例七

按照上下文判斷，在此，sense 應該是 meaning 的意思。因此，(一)的翻譯有點突兀，因為上下文並沒有談到感性世界。

(一) 如果對感性世界的複製不再是決定性的，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不就瓦解了嗎？(72)

(二) 如果意義的再生產不再是決定性的，那麼，這樣一種解決方法不是脫離了根基了嗎？(286)

(三) 因為，一旦意義的複製不再具有決定性，解決問題的基石不就瓦解了嗎？(328)

(四) 因為如果意義的再創造不再是決定性的，難道不是就已經失去解答這一問題的基礎嗎？(79)

(五) 因為，假如翻譯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再現原意，那麼翻譯不就失去了立足點？(236)

(Z1) For is not the ground cut from under such a solution i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ceases to be decisive? (77)

- (Z2) For is not the ground cut from under such a solution i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ceases to be decisive? (259)
- (H) For isn't the basis of any such solution removed if the rendering of sense ceases to matter? (90)
- (B) Denn wird einer solchen nicht der Boden entzogen, wenn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aufhört, maßgebend zu sein? (16)

例八

這裡談及的是語意與那個「終極的、具有決定性的」的東西，也就是與純語言的關係。班雅明一直堅持的看法是，文字語言應該表達其原本的面貌（純語言），而非傳達的訊息。因此，如果將語意等同於語言所傳達的訊息，那麼就失去了語言本來的任務——展示純語言。而這個「終極的、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就會被隱藏，受到隔絕，強而有力地保存在它自己的地方。

(Z1) 翻譯的第一句，不太清楚，因此(一)、(三)、(四)的翻譯也都誤解了原意。(Z2) 有所修改，但是(二)並沒有瞭解 lawgiving role 的意思，直譯為「立法的角色」，無助於原文的瞭解。

第二句開頭的「只有」(一)、(二)，「只要」(三)，「除非」(四)也是誤導的；本句的意思是說，當語意與訊息等同之時，那終極之物就會遠離語意，近在咫尺遠在天涯。德文的 Allein 英文譯者譯為 Only 在這裡作為 conjunction 用，有 but、however 的轉折之意，中譯沒有注意到，而當作副詞，作為「僅僅有」的意思，因此原意就不清楚了。

- (一) 自由的意思若不是認為達意並不是高於一切的目的，它又意味著甚麼呢。只有當語言的創造性作品的意味可以同它所傳遞的信息等同起來，某種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才變得不可企及；它們會顯得近在咫尺卻又無比遙遠，深藏不露或是無從區分，支離破碎或者力大無窮。(72)

- (二) 自由如果不是意指義的再生產，因此必須放棄其立法的角色，那又能指什麼呢？只有在一種語言創造的意義與它所傳達的信息的意義相等之時，某種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才能超越全部交流——既相當貼近然而又無限遙遠的，隱藏的或可區別的，破碎的或有力的。(287)
- (三) 因為，除了不再認為傳遞意義極為重要外，自由還能意味著什麼呢？只要我們把語言作品創作的意義等同於它所傳述的信息，某些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就會永遠不可企及——它們好像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深藏不露卻又清晰可辨，支離破碎卻又影響巨大。(329)
- (四) 因為除了認為傳達意義不再重要以外，自由還能意味著什麼？除非把文學作品創作的意義和它所傳達的信息等同起來，那些終極的、決定性的要素才變得無法傳達——它們十分接近但又極其遙遠，潛隱著但又是可以辨明的，支離破碎的但又是強有力的。(81)
- (五) 因為翻譯的自由，難道指的不就是再現語意的自由？——而我們現在卻認為語意並非翻譯的根本依據。不過，如果我們認為語言文字的語意就是傳達的訊息，那麼，那個最後的、具有決定性、隱藏在語意之下的東西，對語意來說，就會看似很近，卻無限遙遠，說得更清楚一些，它被語意斷絕了，或者，更頑強地超越在一切訊息之外。(239)
- (Z1) For what is meant by freedom but that the rendering of the sense is no longer to be regarded as all-important?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may be equ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 it conveys does some ultimate, decisive element remain beyond all communication, quite close and yet infinitely remote, concealed or distinguishable, fragmented or powerful. (79)

- (Z2) For what does freedom refer to, if not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which must thereby give up its lawgiving role?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may be equated with that of the information it conveys does some ultimate, decisive element remain beyond all communication – quite close and yet infinitely remote, concealed or distinguishable, fragment or powerful. (260-261)
- (H) To what does freedom refer if not to the rendering of sense, which is no longer to be the ruling principle?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can be taken as identical with the sense it communicates, it retains over and above all communication, so close, yet SO utterly remote; hidden under it, or rendered the more distinct; broken by it, or rendered the more powerful, something final, decisive. (92)
- (B) Denn worauf bezieht Freiheit sich, wenn nicht auf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die aufhören soll, gesetzgebend zu heißen? Allein wenn der Sinn eines Sprachgebildes identisch gesetzt werden darf mit dem seiner Mitteilung, so bleibt ihm ganz nah und doch unendlich fern, unter ihm verborgen oder deutlicher, durch ihn gebrochen oder machtvoller über alle Mitteilung hinaus ein Letztes, Entscheidendes. (18)

例九

此例指出（一）關於 the sense 一詞的翻譯。在此（一）將之譯為「意味」，我們通常把「……意味……」瞭解為「……暗示……」、「……表示……」。在這裡，the sense 則譯為「意義」或「語意」比較恰當。因為根據此處的上下文，班雅明要強調的是：原文以及譯文之間，文字的意義層面具有什麼重要性？這裡舉出的圓周和切線的例子，表示了原文文字

的意義或者語意，對於翻譯來說，只是切線碰到圓周上的那一點，好像一個跳板，經過這一點，翻譯就順著他自己軌道往前直行，完全不再顧及原文的意義。

將翻譯和原文的意義分開，是班雅明全文的要點之一。從一開始，班雅明就指出，翻譯不在於翻譯原文的訊息，而是翻譯那在文字裡面不能夠明說的一些東西。後來，他又舉語言森林的例子，說明翻譯和語言的關係，不同於文學和語言的關係：翻譯的任務，在於提升整個語言本身的境界，文學的任務則在於，將語言內部的各種意義，做出特殊的結合。現在，他又舉圓周切線的例子，將原文裡面意義的重要性，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因此，這個圓周和切線的例子對於全文脈絡的瞭解，相當重要。其中 the sense (德文 Sinn) 這個字佔有關鍵的地位。如果不譯清楚，相當可惜。此外，在例七當中，我們也看到，(一) 將同一個字 the sense，翻譯為「感性世界」。前後不一致的翻譯，也會增加閱讀的困難。

(一) 意味在譯作和原作的關係中有甚麼重要性呢？我們不妨作個比方。一個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同圓輕輕接觸，由此便按照既定方向現前無限延伸。同樣，譯作只是在意味這個無限小的點上輕輕地觸及原作，隨即便在語言之流的自由王國中，按照忠實用性的法則開始自己的行程。(74-75)

(二) 關於意義，就其對於譯文與原文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而言，可以用下面的明喻加以說明。正如一條切線與一個圓輕輕相交但卻只在一個點上——這次相交而非相交的點確立了按其直線無限延續的法則——譯文也與原文輕輕相交但卻只是在意義的無限小的點上。(289)

(三) 那麼，關於原作與譯作之間的關係而言，意義有什麼重要性呢？我們在這裡不妨打個比喻。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和圓稍稍接觸。切線正是通過這樣的接觸而不是通過切點規定了自己筆

直的路徑通向無限。同樣，譯作也只是在意義這個無窮小的切點上與原作接觸，並由此根據忠實的規則在自由的語言之流中開始了自己的航程。(330)

(四) 而意義對於翻譯與原作之間的關係有何重要性？爲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就像一條切線只在一小個點上輕輕與一個圓相切，正是這一相切而不是這一切點定下了直線沿著其筆直的路徑伸向無限的法則，譯作同樣與原作輕輕相切，旨在意義這一各無限小的切點上與原作相切，然後立即沿著根據忠實法則所確定的自己的路徑在語言之流中前進。(81-82)

(五) 經過這番說明，翻譯和原文跟語意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比喻來瞭解。就好像圓周的切線短暫地，只在一點上和圓周接觸，而按照切線的定律，重要的是那個接觸，而不是那一點，然後，切線順著它自己筆直的軌道，繼續無限延伸。翻譯也是一樣，它僅僅在語意的那個無限小的小點上和原文輕輕地接觸，然後按照忠實的原則，在語言變化的自由之中，跟隨完全屬於它自己的軌道。(241)

(Z1) And what of the sense in its importa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A simile may help here. Just as a tangent touches a circle lightly and at but one point, with this touch rather than with the point setting 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to continue on its straight path to infinity, a translation touches the original light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thereupon pursuing its own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flux. (80)

(Z2) What remains for sense, in its importa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may be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simile. Just as a tangent touches a circle lightly and at but one point

– establishing, with this touch rather than with the point, 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to continue on its straight path to infinity -- a translation touches the original light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thereupon pursuing its own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flux. (261)

- (H) What importance the sense retains afterwards, for the relation of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can be caught in a simile . Just as a tangent glancingly, at a single point only, touches the circle, and as the contact and not the point prescribes the law by which it draws its straight line out to infinity, in the same way, glancing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does the translation touch the original, to follow its personal course, set by the law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growth and movement. (94)
- (B) Was hiernach für das Verhältnis von Übersetzung und Original an Bedeutung dem Sinn verbleibt, läßt sich in einem Vergleich fassen. Wie die Tangente den Kreis flüchtig und nur in einem Punkte berührt und wie ihr wohl diese Berührung, nicht aber der Punkt, das Gesetz vorschreibt, nach dem sie weiter ins Unendliche ihre gerade Bahn zieht, so berührt die Übersetzung flüchtig und nur in dem unendlich kleinen Punkte des Sinnes das Original, um nach dem Gesetze der Treue in der Freiheit der Sprachbewegung ihre eigenste Bahn zu verfolgen. (20)

例十

本例指出英文原文有誤譯，以及不甚清楚之處，中文譯文因此受害。德文中的 wegen der Schwere 意思是「由於繁重、笨重的關係」，與

句子後半段的 Flüchtigkeit「輕微，短暫」相對照，指的是上文說的，當一個文本的意義，或者語意太多的時候，會變得很笨重，重得連提起翻譯的槓桿都無法舉起來。

一個可譯性高的文本，即使意義很少，也可以翻譯。但是，這是對原文文本說的；至於譯文，當它按照真正的翻譯形式被翻譯之後，是不能夠再翻譯的。而現在提出來討論的這句話，就是接著這個意思而說的。它要說：譯文本身不能再被翻譯，不是因為它的含義（意義、語意）太過笨重，而是因為譯文的含義（意義、語意）太過輕薄。一般人抓不住文本的意義，因此，就變得不能翻譯了。

後半部所說的含有太少、太輕微的意義，指的是譯文本身，而非原文，因此（一）誤解了英文的最後一個字 them (attached to them)，認為是原作。（二）在這一點就翻譯對了。

我們看各種譯本：

- （一）譯作本身是不可譯的，這不但是因為它本身固有的種種困難，更因為它同原作意義之間的結合是鬆散的。（76）
- （二）對比之下，譯文證明是不可譯的，不僅因為固有的困難，而且因為附屬於譯文的意義的鬆散性。（289-290）
- （三）另一方面，譯作之所以不可譯並不是由於自身固有的困難，而是因為意義依附於譯作的狀態比較鬆散。（331）
- （四）而就譯作而言，不可譯并非是因為譯作內在的困難，而是因為其負載意義的形式的鬆散。
- （五）對譯文本身來說，其至不能夠再被翻譯，不是由於附著的語意太過繁重，而是由於太過於短暫。（243）
- （Z1）Trans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prove to b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any inherent difficulty, but because of the looseness with which meaning attaches to them.（81）
- （Z2）This, of course, applies to originals only. Translation, in contrast,

prove to b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any inherent difficulty, but because of the looseness with which meaning attaches to them. (262)

(H) Translations ar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undertaking but from the all too limited way the sense adheres to them. (96)

(B) Übersetzungen dagegen erweisen sich unübersetzbar nicht wegen der Schwere, sondern wegen der allzu großen Flüchtigkeit, mit welcher der Sinn an ihnen haftet. (22)

經過以上的比較與說明，我們發現，除了譯本（二）參考了 Zohn 1996 年更改過的版本之外，譯本（一）、（三）、（四）都是從 Zohn 1968 年的版本翻譯，因此難免多一些錯誤。而在英文翻譯方面，1968 年出版的 Hynd and Valk 的翻譯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比同年出版的 Zohn 的翻譯要精確一點。

上面提出來的 10 個例子，乃是對整篇文章的瞭解可能誤導，或者詮釋不甚清楚的一些地方。除此之外，在所有譯著之間，大約有百分之八、九十相同的瞭解，如果我們單看這一相同的大部分，我們應該高興，因為大家所見略同。當然，每一篇譯著的行文風格是不一樣的。由於筆者直接從德文翻譯，在行文之間能夠考慮德文原文的詞序，而且有更多的調整的自由度，這是比其他（一）、（二）、（三）、（四）的譯者更方便的地方。不過，風格這方面並不是本文對比的重點。

註釋

1.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一文的寫作以及出版經過，見 Benjamin (1991), pp. 890-896.
2. 關於該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及時間，見 Benjamin (1996), 版權頁。

感謝詞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班雅明〈譯者天職〉中譯研究》(2006-2008 編號：95-2411-H-030-005-) 部分成果。感謝國科會的補助與支持。

感謝所有提供幫助的國內國外的朋友，尤其是蘇正隆先生和羅新璋先生。蘇先生非常仔細一字一句地校閱全文，前後不下三次，在中文的潤飾上面，筆者受益良多，衷心感激。羅先生在臺灣師範大學客座期間，將本譯文全部看過，給予修改意見，還以他的法文專長特將馬拉美那一段法文翻譯成中文供筆者參考。不過，在附錄刊登的譯文全文，文責全由筆者負責。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的評審，花費時間做了仔細的閱讀並給予寶貴的建議。

參考文獻

- 邱漢平 (2000)。凝視與可譯性：班雅明翻譯理論研究。**中外文學**，29 (5)，13-38。
- 陳永國 (譯) (1999)。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陳永國、馬海良 (主編)，**本雅明文選** (頁279-2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浪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謝天振 (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 (頁321-332)。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張旭東 (譯) (1998)。W. Benjamin 著。譯作者的任務。載於漢娜·阿倫特 (主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頁63-7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喬向東 (譯) (1999)。W. Benjamin 著。翻譯者的任務。**中國比較文學**，1，71-83。
- Benjamin, W. (1991).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von Tillman Rexroth. 1972 (1991). Frankfurt a.M.: Suhrkamp.
- Bullock, M., & Jennings, M. W. (Eds.). (1996).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pp. 253-2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85). Des Tours de Babel. In J.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pp. 165-20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De Man, P. (1986).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iranjana, T.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Reiss, K. (1971, 1986).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 Scholem, G. (1975, 1997). *Walter Benjamin – die 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附錄：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翻譯

胡功澤 譯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ters

Nirgends erweist sich einem Kunstwerk oder einer Kunstform gegenüber die Rücksicht auf den Aufnehmenden für deren Erkenntnis fruchtbar. Nicht genug, daß jede Beziehung auf ein bestimmtes Publikum oder dessen Repräsentanten vom Wege abführt, ist sogar der Begriff eines 'idealen' Aufnehmenden in allen kunsttheoretischen Erörterungen vom Übel, weil diese lediglich gehalten sind, Dasein und Wesen des Menschen überhaupt vorauszusetzen. So setzt auch die Kunst selbst dessen leibliches und geistiges Wesen voraus- seine Aufmerksamkeit aber in keinem ihrer Werke. Denn kein Gedicht gilt dem Leser, kein Bild dem Beschauer, keine Symphonie der Hörschaft.

譯者的天職

要認識一件藝術品，或一種藝術形式，考慮其接受者是沒有用的。因為跟特定觀眾群或其代表人物的每一種聯繫，都會令人誤入歧途，不只如此，甚至想像一個「理想」的接受者，對於藝術批評也有害處。因為這麼做的時候，對人類的生存及其本質就已經做了某種預設。人的身體與精神是藝術的先決條件，但是，藝術本身卻不會考慮人。因為沒有一首詩是為讀者而寫，沒有一幅畫是為觀賞者而做，沒有一組交響曲是為聽眾而譜的。¹

Gilt eine Übersetzung den Lesern, die das Original nicht verstehen? Das scheint hinreichend den Rangunterschied im Bereiche der Kunst zwischen

beiden zu erklären. Überdies scheint es der einzig mögliche Grund, 'Dasselbe' wiederholt zu sagen. Was 'sagt' denn eine Dichtung? Was teilt sie mit? Sehr wenig dem, der sie versteht. Ihr Wesentliches ist nicht Mitteilung, nicht Aussage.

那麼，翻譯是爲了不懂得原文的讀者而做的嗎？單單這一點，似乎就足以說明兩者（翻譯與原文）在藝術領域裡面的階級。此外，好像這也是唯一的理由，把「同樣的東西」再說一遍。一個文學作品到底「說」些什麼？它要告知我們什麼？對於懂得文學的人來說，都是很少的。文學作品的本質，不在傳達內容，不在於說出來的東西。²

Dennoch könnte diejenige Übersetzung, welche vermitteln will, nichts vermitteln als die Mitteilung- also Unwesentliches. Das ist denn auch ein Erkennungszeichen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en. Was aber außer der Mitteilung in einer Dichtung steht- und auch der schlechte Übersetzer gibt zu, daß es das Wesentliche ist- gilt es nicht allgemein als das Unfaßbare, Geheimnisvolle, 'Dichterische'? Das der Übersetzer nur wiedergeben kann, indem er- auch dichtet? Daher rührt in der Tat ein zweites Merkmal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 welche man demnach als eine ungenaue Übermittlung eines unwesentlichen Inhalts definieren darf. Dabei bleibt es, solange die Übersetzung sich anheischig macht, dem Leser zu dienen. Wäre sie aber für den Leser bestimmt, so müßte es auch das Original sein. Besteht das Original nicht um dessentwillen, wie ließe sich dann die Übersetzung aus dieser Beziehung verstehen?

可是，想要轉介的翻譯，只能轉介訊息，也就是說，那是作品裡不重要的東西。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次等的翻譯。在作品裡面，訊息之外的東西——即使次等的譯者也不得不承認，才是作品裡重要的部分——不就是一般認爲無法捉摸、神秘莫測、「詩意」的東西嗎？而譯者也

必須創作，才能再現原著？事實上，由此也可以看出次等翻譯的第二個特徵，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它：這種翻譯不精確地傳達不重要的內容。如果一個翻譯汲汲於為讀者服務，它就是這個樣子。假如翻譯是為讀者而存在的，那麼，原文也應該是為讀者而寫的。假如原文不是為了讀者而存在，我們怎麼能夠從讀者的角度去瞭解翻譯呢？³

Übersetzung ist eine Form. Sie als solche zu erfassen, gilt es zurückzugehen auf das Original. Denn in ihm liegt deren Gesetz als in dessen Übersetzbarkeit beschlossen. Die Frage nach der Übersetzbarkeit eines Werkes ist doppelsinnig. Sie kann bedeuten: ob es unter der Gesamtheit seiner Leser je seinen zulänglichen Übersetzer finden werde? oder, und eigentlicher: ob es seinem Wesen nach Übersetzung zulasse und demnach - der Bedeutung dieser Form gemäß - auch verlange. Grundsätzlich ist die erste Frage nur problematisch, die zweite apodiktisch zu entscheiden. Nur das oberflächliche Denken wird, indem es den selbständigen Sinn der letzten leugnet, beide für gleichbedeutend erklären.

翻譯是一種形式。要掌握這個形式，必須回到原文。這個形式的規則隱藏在原文裡面，那也就是原文的可譯性。談到作品的可譯性，這問題有兩種意思。其一是：在一個作品的所有讀者當中，是否找得到一位稱職的譯者？另一個更重要的意思是：按照作品的性質，它可以翻譯嗎（ob es seinem Wesen nach Übersetzung zulasse）？如果是的，那麼——按照翻譯形式的本意——它也企求（verlange）翻譯。⁴ 其實，第一個問題只是找到合適譯者的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則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只有膚淺的想法才會否認第二個問題所具有的獨特意義，而認為前後兩個問題無分軒輊。

Ihm gegenüber ist darauf hinzuweisen, daß gewisse Relationsbegriffe ihren guten, ja vielleicht besten Sinn behalten, wenn sie nicht von vorne

herein ausschließlich auf den Menschen bezogen werden. So dürfte von einem unvergeßlichen Leben oder Augenblick gesprochen werden, auch wenn alle Menschen sie vergessen hätten. Wenn nämlich deren Wesen es forderte, nicht vergessen zu werden, so würde jenes Prädikat nichts Falsches, sondern nur eine Forderung, der Menschen nicht entsprechen, und zugleich auch wohl den Verweis auf einen Bereich enthalten, in dem ihr entsprochen wäre: auf ein Gedenken Gottes.

相較於這種看法，我們卻要指出，有些概念之間的關係能夠完善地、甚至最完整地保留下來，如果不侷限在人的層面。比如說，我們可以談論一個難忘的人生或時刻，即使沒有一個人還記得它們。如果其本質有此要求，也就是要求不被遺忘，那麼，談論它們就不是錯誤的，只是人達不到這個要求而已，同時，這也指向一個可以達到這個要求的地方：那就是天主的記憶。⁵

Entsprechend bliebe die Übersetzbarkeit sprachlicher Gebilde auch dann zu erwägen, wenn diese für die Menschen unübersetzbar wären. Und sollten sie das bei einem strengen Begriff von Übersetzung nicht wirklich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e sein? - In solcher Loslösung ist die Frage zu stellen, ob Übersetzung bestimmter Sprachgebilde zu fordern sei. Denn es gilt der Satz: Wenn Übersetzung eine Form ist, so muß Übersetzbarkeit gewissen Werken wesentlich sein.

同樣地，即使一段語言對人來說是無法翻譯的，我們也需要考慮它的可譯性。況且，用嚴格的翻譯概念來看，語言文字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是不能夠翻譯的嗎？——因此經過這番澄清之後，我們要問，是否某些特定的語言文字需要翻譯。因為我們的原則是：假如翻譯是一種形式，那麼對某些作品來說，可譯性就是它的本質。⁶

Übersetzbarkeit eignet gewissen Werken wesentlich - das heißt nicht, ihre Übersetzung ist wesentlich für sie selbst, sondern will besagen, daß eine bestimmte Bedeutung, die den Originalen innewohnt, sich in ihrer Übersetzbarkeit äußere. Daß eine Übersetzung niemals, so gut sie auch sei, etwas für das Original zu bedeuten vermag, leuchtet ein. Dennoch steht sie mit diesem kraft seiner Übersetzbarkeit im nächsten Zusammenhang. Ja, dieser Zusammenhang ist um so inniger, als er für das Original selbst nichts mehr bedeutet.

可譯性是某些作品的本質——這並不是說，翻譯對於作品本身很重要，而是說，包含在原著裡的某些意義，能夠在可譯性中表現出來。任何一個翻譯，即使再好，也不能對原文本身產生任何意義，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透過作品的可譯性，翻譯和作品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當這個關係對原文本身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時候，這個關係就變得更為緊密。⁷

Er darf ein natürlicher genannt werden und zwar genauer ein Zusammenhang des Lebens. So wie die Äußerungen des Lebens innigst mit dem Lebendigen zusammenhängen, ohne ihm etwas zu bedeuten, geht die Übersetzung aus dem Original hervor. Zwar nicht aus seinem Leben so sehr denn aus seinem 'Überleben'. Ist doch die Übersetzung später als das Original und bezeichnet sie doch bei den bedeutenden Werken, die da ihre erwählten Übersetzer niemals im Zeitalter ihrer Entstehung finden, das Stadium ihres Fortlebens.

這個關係，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更確切地說，是一個生命的聯繫。就好像生命的各種表現和生命本身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對生命本身卻沒有意義可言，翻譯也是這樣從原文裡面產生的。而且，與其說來自原文的生命，不如說來自原文「後來的生命」（Überleben）。因為，翻譯不都是要比原文出現得晚？而且，對著名的作品來說，由於它們從未在其問世的年代就找到選中的譯者，翻譯標誌著作品後繼生命（Fortleben）的

階段。⁸

In völlig unmetaphorischer Sachlichkeit ist der Gedanke vom Leben und Fortleben der Kunstwerke zu erfassen. Daß man nicht der organischen Leiblichkeit allein Leben zusprechen dürfe, ist selbst in Zeiten des befangensten Denkens vermutet worden. Aber nicht darum kann es sich handeln, unter dem schwachen Szepter der Seele dessen Herrschaft auszudehnen, wie es Fechner versuchte; geschweige daß Leben aus den noch weniger maßgeblichen Momenten des Animalischen definiert werden könnte, wie aus Empfindung, die es nur gelegentlich kennzeichnen kann. Vielmehr nur wenn allem demjenigen, wovon es Geschichte gibt und was nicht allein ihr Schauplatz ist, Leben zuerkannt wird, kommt dessen Begriff zu seinem Recht. Denn von der Geschichte, nicht von der Natur aus, geschweige von so schwankender wie Empfindung und Seele, ist zuletzt der Umkreis des Lebens zu bestimmen.

這裡關於藝術作品的生命與後繼生命的說法，全然是事實，而非隱喻。即使在思想最狹隘的時代，也沒有人只把器官組成的肉身看做是生命的全部。不過，生命的定義不會是像費胥訥（Fechner）所主張的那樣，屬於心靈軟弱的權杖之下；更不能用不重要的動物本能作為生命的定義，例如感覺，它只是偶爾表現出生命的現象。相反的，只有在那些具有歷史意義、而且超越歷史場景的地方尋找生命的意義，才能為生命找到完整的定義。因為，決定生命的範疇，最終要從歷史，而不是從大自然出發，更別提搖擺不定的感覺和心靈了。

Daher entsteht dem Philosophen die Aufgabe, alles natürliche Leben aus dem umfassenderen der Geschichte zu verstehen. Und ist nicht wenigstens das Fortleben der Werke unvergleichlich viel leichter zu erkennen als dasjenige der Geschöpfe? Die Geschichte der großen Kunstwerke kennt ihre Deszendenz aus

den Quellen, ihre Gestaltung im Zeitalter des Künstlers und die Periode ihres grundsätzlich ewigen Fortlebens bei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Dieses letzte heißt, wo es zutage tritt, Ruhm. Übersetzungen, die mehr als Vermittlungen sind, entstehen, wenn im Fortleben ein Werk das Zeitalter seines Ruhmes erreicht hat. Sie dienen daher nicht sowohl diesem, wie schlechte Übersetzer es für ihre Arbeit zu beanspruchen pflegen, als daß sie ihm ihr Dasein verdanken. In ihnen erreicht das Leben des Originals seine stets erneute späteste und umfassendste Entfaltung.

因此哲學家的任務是從更廣大的歷史生命來瞭解所有的自然生命。難道認出作品的後繼生命不比認出受造物的後繼生命容易得多？偉大藝術品的歷史是從其後來的世代認出該作品的血統和其在藝術家當時的形式，以及藝術品那基本上永恆的後繼生命出現的時期。當這個永恆後繼生命出現的時候，就叫做聲譽。當一部作品在其後繼生命聲譽確定之時，也就是出現了那種不只是轉介訊息的翻譯。因此，這些翻譯既不是為原著服務——次等的譯者經常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翻譯也不將其存在歸功於原著。在翻譯裡面原文達到其不斷更新之後的最新、最全面的發展。⁹

Diese Entfaltung ist als die eines eigentümlichen und hohen Lebens durch eine eigentümliche und hohe Zweckmäßigkeit bestimmt. Leben und Zweckmäßigkeit - ihr scheinbar handgreiflicher und doch fast der Erkenntnis sich entziehender Zusammenhang erschließt sich nur, wo jener Zweck, auf den alle einzelnen Zweckmäßigkeiten des Lebens hinwirken, nicht wiederum in dessen eigener Sphäre, sondern in einer höheren gesucht wird. Alle zweckmäßigen Lebenserscheinungen wie ihre Zweckmäßigkeit überhaupt sind letzten Endes zweckmäßig nicht für das Leben, sondern für den Ausdruck seines Wesens, für die Darstellung seiner Bedeutung.

這個發展受到一個獨特又高級的目標引導，朝向一個獨特又高級的生命。若要找出生命和目標之間那看起來密切，卻又幾乎無法認識的關係，就不能在原來的生命裡，而只能在更高一層的生命氛圍裡尋求，也就是尋求生命所有個別目標共同歸向的那個最後目標。不論是邁向目標的各種生命現象，或是目標本身，其目標的最終意義不在於這個生命，而是爲了表達生命的本質，爲了表現生命的意義。

So ist die Übersetzung zuletzt zweckmäßig für den Ausdruck des innersten Verhältnisses der Sprachen zueinander. Sie kann dieses verborgene Verhältnis selbst unmöglich offenbaren, unmöglich herstellen; aber darstellen, indem sie es keimhaft oder intensiv verwirklicht, kann sie es. Und zwar ist diese Darstellung eines Bedeuteten durch den Versuch, den Keim seiner Herstellung ein ganz eigentümlicher Darstellungsmodus, wie er im Bereich des nicht sprachlichen Lebens kaum angetroffen werden mag. Denn dieses kennt in Analogien und Zeichen andere Typen der Hindeutung, als die intensive, d. h. vorgreifende, andeutende Verwirklichung. - Jenes gedachte, innerste Verhältnis der Sprachen ist aber das einer eigentümlichen Konvergenz. Es besteht darin, daß die Sprachen einander nicht fremd, sondern a priori und von allen historischen Beziehungen abgesehen einander in dem verwandt sind, was sie sagen wollen.

因此，翻譯的最後目標乃是表達各種語言相互之間最內在的關係。這個隱藏著的關係本身，翻譯是無法展示或製作的；但是翻譯可以呈現這個關係的苗芽，或者以濃縮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而且，這種表示意義的嘗試，呈現製作過程中的幼苗，是獨一無二的，是非語言範疇所沒有的。因爲，非語言的領域透過類比和符號來表示意義，不同於這裡濃縮的方式，也就是預示的，預指的方式——上面所提到的語言之間最內在的關係，是一個獨特的交集。這個關係就是，各種語言彼此並不陌生，而

是先天地，並且不受任何歷史因素影響，在它們所要說的東西的層面上，彼此有親屬關係。

Mit diesem Erklärungsversuch scheint allerdings die Betrachtung auf vergeblichen Umwegen wieder in die herkömmliche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einzumünden. Wenn in den Übersetzungen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sich zu bewähren hat, wie könnte sie das anders als indem jene Form und Sinn des Originals möglichst genau übermitteln? Über den Begriff dieser Genauigkeit wüßte sich jene Theorie freilich nicht zu fassen, könnte also zuletzt doch keine Rechenschaft von dem geben, was an Übersetzungen wesentlich ist.

以上的說明，好像讓我們的討論只是白白地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一般的翻譯理論。因為，如果要在翻譯裡面證明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那麼，除了盡量精確地傳達原文的形式和內容之外，翻譯還能做什麼呢？但是，一般的翻譯理論自然無法指出這裡所說的精確是什麼意思，到最後還是無法說出翻譯真正重要的地方。

In Wahrheit aber bezeugt sich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in einer Übersetzung weit tiefer und bestimmter als in der oberflächlichen und undefinierbaren Ähnlichkeit zweier Dichtungen. Um das echte Verhältnis zwischen Original und Übersetzung zu erfassen, ist eine Erwägung anzustellen, deren Absicht durchaus den Gedankengängen analog ist, in denen die Erkenntniskritik die Unmöglichkeit einer Abbildtheorie zu erweisen hat. Wird dort gezeigt, daß es in der Erkenntnis keine Objektivität und sogar nicht einmal den Anspruch darauf geben könnte, wenn sie in Abbildern des Wirklichen bestünde, so ist hier erweisbar, daß keine Übersetzung möglich wäre, wenn sie Ähnlichkeit mit dem Original ihrem letzten Wesen nach anstreben würde.

事實上，翻譯裡面各種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要比兩個作品表面

上無法確定的類似性來得更深刻、更確定得多。要瞭解原文和翻譯之間真實的關係，可以參考一個極類似的思考過程，那就是，認知批評理論（Erkenntniskritik）可以證明複製是不可能的：假如客觀就是複製事實的話，那麼，就不可能有客觀的認知，連這樣的要求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裡我們也可以證明，假如翻譯最後的本質在於追求與原文的相似性，那麼，翻譯就是不可能的。

Denn in seinem Fortleben, das so nicht heißen dürfte, wenn es nicht Wandlung und Erneuerung des Lebendigen wäre, ändert sich das Original. Es gibt eine Nachreife auch der festgelegten Worte. Was zur Zeit eines Autors Tendenz seiner dichterischen Sprache gewesen sein mag, kann später erledigt sein, immanente Tendenzen vermögen neu aus dem Geformten sich zu erheben. Was damals jung, kann später abgebraucht, was damals gebräuchlich, später archaisch klingen. Das Wesentliche solcher Wandlungen wie auch der ebenso ständigen des Sinnes in der Subjektivität der Nachgeborenen statt im eigensten Leben der Sprache und ihrer Werke zu suchen, hieße - zugestanden selbst den krudesten Psychologismus - Grund und Wesen einer Sache verwechseln, strenger gesagt aber, einen der gewaltigsten und fruchtbarsten historischen Prozesse aus Unkraft des Denkens leugnen.

因為原文在其後來的生命裡有所改變：原文的生命必定有所轉化與更新，否則就不能稱為後來的生命。即使意義已經固定的辭彙也可能有後熟的過程。作者當時的文學語言趨勢後來會成為過去，而其他潛在的趨勢則會透過語言形式重新浮現。以往清新的，後來變老套，以往流行的，後來變古板。在這種形式與意義不斷轉變的過程中，想以後來生命的主觀解釋，而不是在語言及其成品的真正生命裡，尋找語言的本質，那就是本末倒置——即使最粗糙的心理學派，也承認這一點。說得更嚴格一些，這是由於缺乏思考能力而否定了一個最強而有力、最能帶來豐碩成

果的歷史進程。

Und wollte man auch des Autors letzten Federstrich zum Gnadenstoß des Werkes machen, es würde jene tote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doch nicht retten. Denn wie Ton und Bedeutung der großen Dichtungen mit den Jahrhunderten sich völlig wandeln, so wandelt sich auch die Muttersprache des Übersetzers. Ja, während das Dichterwort in der seinigen überdauert, ist auch die größte Übersetzung bestimmt in das Wachstum ihrer Sprache ein-, in der erneuten unterzugehen. So weit ist sie entfernt, von zwei erstorbenen Sprachen die taube Gleichung zu sein, daß gerade unter allen Formen ihr als Eigenstes es zufällt, auf jene Nachreife des fremden Wortes, auf die Wehen des eigenen zu merken.

即使我們抬出作家的最後語言讓作品蓋棺論定，我們也無法挽救那種僵死的翻譯理論。因為就好像偉大文學作品的語言和意義，隨著幾個世紀的過去而完全改變，翻譯者的母語也一樣在改變。儘管作家的辭彙在其母語中繼續為人使用，最偉大的譯著，也必定在其自己語言的成長與創新中枯死與消逝。翻譯絕不應該是兩個已經死去的語言之間聾啞的對等，而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之中，唯獨翻譯最需要注意外國語言後來的成熟發展，以及自己語言中待產的陣痛。

Wenn in der Übersetzung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sich bekundet, so geschieht es anders als durch die vage Ähnlichkeit von Nachbildung und Original. Wie es denn überhaupt einleuchtet, daß Ähnlichkeit nicht notwendig bei Verwandtschaft sich einfinden muß. Und auch insofern ist der Begriff der letzt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mit seinem engern Gebrauch einstimmig, als er durch Gleichheit der Abstammung in beiden Fällen nicht ausreichend definiert werden kann, wiewohl freilich für die Bestimmung jenes engern Gebrauchs der Abstammungsbegriff unentbehrlich bleiben wird.

假如翻譯可以展示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那不會是透過原著和複製之間模糊的相似性。這個道理很明顯，就好像在親屬之間，看起來不一定都要相像。此外，語言和血親的親屬關係還有一點相同，那就是，以嚴格的親屬定義來說，雖然共同的來源是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單單有共同的來源，也還不足以弄清楚彼此的親屬關係。

Worin kann die Verwandtschaft zweier Sprachen, abgesehen von einer historischen, gesucht werden? In der Ähnlichkeit von Dichtungen jedenfalls ebensowenig wie in derjenigen ihrer Worte. Vielmehr beruht alle überhistorisch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darin, daß in ihrer jeder als ganzer jeweils eines und zwar dasselbe gemeint ist, das dennoch keiner einzelnen von ihnen, sondern nur der Allheit ihrer einander ergänzenden Intentionen erreichbar ist: die reine Sprache.

撇開歷史上語言的親屬關係不談，到何處去尋找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呢？不論如何，從作品的相似性，或者作品語詞的相似性去尋找，都不會有什麼結果。相反地，語言之間超越歷史的親屬關係，在於把每一個語言當作一個整體，每一次使用語言時，它們指的都是同樣一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卻不是任何一個語言可以單獨指出來的，只有結合所有語言要表達這個東西的意向（Intentionen），彼此互補之後才能夠達到：也就是那純語言。¹⁰

Während nämlich alle einzelnen Elemente, die Wörter, Sätze, Zusammenhänge von fremden Sprachen sich ausschließen, ergänzen diese Sprachen sich in ihren Intentionen selbst. Dieses Gesetz, eines der grundlegenden der Sprachphilosophie, genau zu fassen, ist in der Intention vom Gemeint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 unterscheiden. In “Brot” und “pain” ist das Gemeinte zwar dasselbe, die Art, es zu meinen, dagegen nicht. In der Art des Meinens

nämlich liegt es, daß beide Worte dem Deutschen und Franzosen je etwas Verschiedenes bedeuten, daß sie für beide nicht vertauschbar sind, ja sich letzten Endes auszuschließen streben; am Gemeinten aber, daß sie, absolut genommen, das Selbe und Identische bedeuten. Während dergestalt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iesen beiden Wörtern einander widerstrebt, ergänzt sie sich in den beiden Sprachen, denen sie entstammen. Und zwar ergänzt sich in ihn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m Gemeinten.

因爲，雖然不同語言的個別單位，單字、句子、連接方式，都互相排斥，但是這些語言在意向上卻互相補充。這是語言哲學裡的一條基本規律，若要確實瞭解這個規律，則要在意向裡，分辨意指的東西（das Gemeinte），和意指的方式（Art des Meinens）¹¹。「Brot」和「pain」兩個字，意指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意指的方式卻不一樣。在意指的方式上，這兩個字對德國人和法國人來說，它們的意義不同，兩者也不能交換，甚至到最後要相互排斥；但是，它們所指的東西，以絕對的意義來說，表示同樣的（das Identische）、同一個（das Selbe）東西。雖然這兩個字在意指的方式上如此的牴觸，但是，兩個語言裡這兩個不同的意指方式卻是互相補充。那是因爲它們在各自的語言裡指向同一個東西的緣故。

Bei den einzelnen, den unergänzten Sprachen nämlich ist ihr Gemeintes niemals in relativer Selbständigkeit anzutreffen, wie bei den einzelnen Wörtern oder Sätzen, sondern vielmehr in stetem Wandel begriffen, bis es aus der Harmonie all jener Arten des Meinens als die reine Sprache herauszutreten vermag. So lange bleibt es in den Sprachen verborgen. Wenn aber diese derart bis ans messianische Ende ihrer Geschichte wachsen, so ist es die Übersetzung, welche am ewigen Fortleben der Werke und am unendlichen Aufleben der Sprachen sich entzündet, immer von neuem die Probe auf jenes heilige Wachstum der Sprachen zu machen: wie weit ihr Verborgenes von der Offenbarung entfernt

sei, wie gegenwärtig es im Wissen um diese Entfernung werden mag.

各自單獨的語言，還沒有跟其他語言互補的時候，它們無法個別地觸及那個被指的東西，就好像單獨的單字或者句子一樣。相反地，那受意指的東西在語言中不斷地遊移著，一直等到所有的意指方式和諧互補之後成為純語言，它才得以出現。到此境地之前，它總是隱藏在諸語言裡面。眾語言如此朝向它們的歷史的默西亞的終點成長之時¹²，翻譯，那點燃作品永恆後續生命以及讓語言永遠復活的翻譯，要在語言這種神聖的成長過程中，不斷重新的檢測：那些語言所隱藏的東西，距離展示之日還有多遠，而在此距離之下，如何把那隱藏的東西作最大的展現。

Damit ist allerdings zugestanden, daß alle Übersetzung nur eine irgendwie vorläufige Art ist, sich mit der Fremdheit der Sprachen auseinanderzusetzen. Eine andere als zeitliche und vorläufige Lösung dieser Fremdheit, eine augenblickliche und endgültige, bleibt den Menschen versagt oder ist jedenfalls unmittelbar nicht anzustreben. Mittelbar aber ist es das Wachstum der Religionen, welches in den Sprachen den verhüllten Samen einer höhern reift.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所有的翻譯都只是處理陌生語言暫時的方式。對於這些陌生的部分只能提出一個有時間限制、暫時的解決方案，想要一蹴可幾，立刻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人類無法做到，或者至少不可能立刻做到。但是間接地，透過各個宗教的成長，可以讓隱藏在諸語言裡的更高級語言的種子漸漸成熟。

Übersetzung also, wiewohl sie auf Dauer ihrer Gebilde nicht Anspruch erheben kann und hierin unähnlich der Kunst, verleugnet nicht ihre Richtung auf ein letztes, endgültiges und entscheidendes Stadium aller Sprachfügung. In ihr wächst das Original in einen gleichsam höheren und reineren Luftkreis der Sprache hinauf, in welchem es freilich nicht auf die Dauer zu leben vermag, wie

es ihn auch bei weitem nicht in allen Teilen seiner Gestalt erreicht, auf den es aber dennoch in einer wunderbar eindringlichen Weise wenigstens hindeutet als auf den vorbestimmten, versagten Versöhnungs- und Erfüllungsbereich der Sprachen. Den erreicht es nicht mit Stumpf und Stiel, aber in ihm steht dasjenige, was an einer Übersetzung mehr ist als Mitteilung. Genauer läßt sich dieser wesenhafte Kern als dasjenige bestimmen, was an ihr selbst nicht wiederum übersetzbar ist. Mag man nämlich an Mitteilung aus ihr entnehmen, soviel man kann und dies übersetzen, so bleibt dennoch dasjenige unberührbar zurück, worauf die Arbeit des wahren Übersetzers sich richtete.

因此，雖然翻譯不能要求它的文字長久不變，在這一點上它和藝術不同，但是，卻不否認它的方向：一個最後的、不變的、具有決定性的、所有語言互相配合的境界。在翻譯裡面，原文好像成長到一個更高，更純淨的語言氛圍之中；當然，在此原文不可能長久生存，況且，原文形體當中還有許多部分距離該氛圍十分遙遠，不過，原文至少以一種令人驚訝的迫切性指向這個境界，一個命定卻還不能達到的語言大和解，語言得以完全實現的境界。原文不能連根帶梢地一次就進入這個境界，但是在原文裡有些特別的東西，那就是在翻譯當中超越傳達訊息的部分。更確切地說，這個重要的核心部分是翻譯裡面不能夠再翻譯出來的東西。不論我們從翻譯裡面找出多少訊息，並且翻譯出來，不過那核心部分仍然不動地停留在那裡，而這部分就是真正譯者工作的方向。

Es ist nicht übertragbar wie das Dichterwort des Originals, weil das Verhältnis des Gehalts zur Sprache völlig verschieden ist in Original und Übersetzung. Bilden nämlich diese im ersten eine gewisse Einheit wie Frucht und Schale, so umgibt die Sprache der Übersetzung ihren Gehalt wie ein Königsmantel in weiten Falten. Denn sie bedeutet eine höhere Sprache als sie ist und bleibt dadurch ihrem eigenen Gehalt gegenüber unangemessen, gewaltig

und fremd. Diese Gebrochenheit verhindert jede Übertragung, wie sie sie zugleich erübrigt. Denn jed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aus einem bestimmten Zeitpunkt der Sprachgeschichte repräsentiert hinsichtlich einer bestimmten Seite seines Gehaltes diejenigen in allen übrigen Sprachen. Übersetzung verpflanzt also das Original in einen wenigstens insofern - ironisch - endgültigeren Sprachbereich, als es aus diesem durch keinerlei Übertragung mehr zu versetzen ist, sondern in ihn nur immer von neuem und an andern Teilen erhoben zu werden vermag.

這個部分不能像原文的文學語言那樣地譯出來，因為內容跟語言的關係，在原文和在翻譯裡面完全不一樣。在原文裡，內容和語言在某種程度上組成一體的關係，好像果實和果皮，而翻譯的語言圍繞著內容，好像寬鬆有摺的皇袍。因為翻譯的語言表示著一種高過自己的語言，因此，對於其原來的內容來說，這個語言是不合身的，是暴力的，是陌生的。這種分離的關係，阻止了每一種轉譯的可能性，同時也不需要再轉譯了。因為語言歷史上某個特定時期的一本著作的每個翻譯，針對原著內容的某個特定面向來說，代表了所有其他語言的翻譯。也就是說，至少在這個面向——具有反諷意味的——翻譯把原文移植到一個更確定的語言範圍，沒有任何其他的轉譯可以再把原著移出這個範圍，而只是不斷重新把作品的其他部分提升到此範圍內。

Nicht umsonst mag hier das Wort 'ironisch' an Gedankengänge der Romantiker erinnern. Diese haben vor andern Einsicht in das Leben der Werke besessen, von welchem die Übersetzung eine höchste Bezeugung ist. Freilich haben sie diese als solche kaum erkannt, vielmehr ihre ganze Aufmerksamkeit der Kritik zugewendet, die ebenfalls ein wenn auch geringeres Moment im Fortleben der Werke darstellt. Doch wenn auch ihre Theorie auf Übersetzung kaum sich richten mochte, so ging doch ihr großes Übersetzungswerk selbst

mit einem Gefühl von dem Wesen und der Würde dieser Form zusammen. Dieses Gefühl - darauf deutet alles hin - braucht nicht notwendig im Dichter am stärksten zu sein; ja es hat in ihm als Dichter vielleicht am wenigsten Raum. Nicht einmal die Geschichte legt das konventionelle Vorurteil nahe, demzufolge die bedeutenden Übersetzer Dichter und unbedeutende Dichter geringe Übersetzer wären. Eine Reihe der größeren wie Luther, Voß, Schlegel sind als Übersetzer ungleich bedeutender denn als Dichter, andere unter den größten, wie Hölderlin und George, nach dem ganzen Umfang ihres Schaffens unter dem Begriff des Dichters allein nicht zu fassen. Zumal nicht als Übersetzer. Wie nämlich die Übersetzung eine eigene Form ist, so läßt sich auch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als eine eigene fassen und genau von der des Dichters unterscheiden.

在此，「反諷」兩個字讓我們聯想到浪漫主義者的思想，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比其他人更早瞭解到作品的生命，而翻譯正是這個生命的最高見證。不過，他們並沒有認識到翻譯的真正面貌，卻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文學批評上面。當然文學批評也是作品後繼生命的一種，雖然較次一等。

不過，即使他們的理論並沒有涉及翻譯，但是他們偉大的翻譯作品卻體現了翻譯形式的本質與尊嚴。這種體現——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並不一定在作家身上才是最強烈的；甚至可以說，在作家身上，當他以作家的身分工作的時候，或許這種體現是最不可能的。甚至連歷史也不能夠證明一般人的偏見：出名的譯者就會是作家，而小作家則是無足輕重的譯者。許多有名的人，如路德（Luther），弗司（Voß），施列格爾（Schlegel），他們做為譯者的重要程度，要大大超過作家的身分。另外，最有名的如賀德林（Hölderlin）和葛歐格（George），按照他們的創作成就，我們無法將他們單單歸類於作家。這樣的分類，尤其無法涵蓋他們作為譯者的身分。就好像翻譯是一個獨特的形式，譯者的任務也是獨特

的，必須和作家的任務清楚的分開。

Sie besteht darin, diejenige Intention auf die Sprache, in die übersetzt wird, zu finden, von der aus in ihr das Echo des Originals erweckt wird. Hierin liegt ein vom Dichtwerk durchaus unterscheidender Zug der Übersetzung, weil dessen Intention niemals auf die Sprache als solche, ihre Totalität, geht, sondern allein unmittelbar auf bestimmte sprachliche Gehaltszusammenhänge. Die Übersetzung aber sieht sich nicht wie die Dichtung gleichsam im innern Bergwald der Sprache selbst, sondern außerhalb desselben, ihm gegenüber und ohne ihn zu betreten ruft sie das Original hinein, an demjenigen einzigen Orte hinein, wo jeweils das Echo in der eigenen den Widerhall eines Werkes der fremden Sprache zu geben vermag. Ihre Intention geht nicht allein auf etwas anderes als die der Dichtung, nämlich auf eine Sprache im ganzen von einem einzelnen Kunstwerk in einer fremden aus, sondern sie ist auch selbst eine andere: die des Dichters ist naive, erste, anschauliche, die des Übersetzers abgeleitete, letzte, ideenhafte Intention.

譯者的任務是在翻譯的語言裡找出可以在原作內喚出迴響的意向。在此可以看到翻譯和文學作品完全不同的一點，因為作品的意向，從來不是針對語言本身，或者語言整體而做的，而只是直接地將一些特定的語言內容結合起來。但是翻譯，它不像文學作品好像在語言的山林之內工作，而是在山林之外，面對著山林，沒有踏進去，翻譯向原作呼喊，向那個特定的一處呼喊，好針對外語作品產生的回聲在翻譯內做出反應。不只是翻譯的意向指向和文學作品不同的東西，也就是從一部單一的外語作品指向語言的整體，而意向本身也不一樣：作品的意向是直覺的，創始的，形象式的，而翻譯的意向則是推理的，最後的，概念式的。

Denn das große Motiv einer Integration der vielen Sprachen zur einen wahren erfüllt seine Arbeit. Dies ist aber jene, in welcher zwar die einzelnen Sätze, Dichtungen, Urteile sich nie verständigen - wie sie denn auch auf Übersetzung angewiesen bleiben -, in welcher jedoch die Sprachen selbst miteinander, ergänzt und versöhnt in der Art ihres Meinens, übereinkommen. Wenn anders es aber eine Sprache der Wahrheit gibt, in welcher die letzten Geheimnisse, um die alles Denken sich müht, spannungslos und selbst schweigend aufbewahrt sind, so ist diese Sprache der Wahrheit - die wahre Sprache. Und eben diese, in deren Ahnung und Beschreibung die einzige Vollkommenheit liegt, welche der Philosoph sich erhoffen kann, sie ist intensiv in den Übersetzungen verborgen.

因為譯者的工作充斥著崇高的動因，即將眾多語言融合成爲一個真正的語言。在這個語言裡，雖然個別的句子、個別的文學作品和評論從來無法溝通——也因此它們依賴翻譯——但是各個語言本身卻能透過它們指意的方式互補與和解達成協調。假如另外有一種真理的語言，能夠平和無間地，甚至靜默地保存著一切思想所追求的最後秘密，這個真理的語言就是——真語言。而哲學家夢寐以求的唯一完美的工作就在於能夠預見、描述這個真語言，它正是豐富地隱藏在翻譯裡面。

Es gibt keine Muse der Philosophie, es gibt auch keine Muse der Übersetzung. Banausisch aber, wie sentimentale Artisten sie wissen wollen, sind sie nicht. Denn es gibt ein philosophisches Ingenium, dessen eigenstes die Sehnsucht nach jener Sprache ist, welche in der Übersetzung sich bekundet. "Les langues imparfaites en cela que plusieurs, manque la suprême: penser étant écrire sans accessoires, ni chuchotement mais tacite encore l'immortelle parole, la diversité, sur terre, des idiomes empêche personne de proférer les mots qui, sinon se trouveraient, par une frappe unique, elle-même matériellement la vérité." Wenn, was in diesen Worten Mallarmé gedenkt, dem Philosophen streng

ermeßbar ist, so steht mit ihren Keimen solcher Sprache die Übersetzung mitten zwischen Dichtung und der Lehre. Ihr Werk steht an Ausprägung diesen nach, doch es prägt sich nicht weniger tief ein in die Geschichte.

哲學沒有謬司之神，翻譯也沒有。但是，它們並非像多愁善感的藝術家們所認為的那樣庸俗枯燥。有一位哲學天才，他最深的願望就是尋找那個在翻譯當中所顯現的語言。「語言之不完美在於其多，唯缺最高語言：思維既是不假修飾，不假虛響的書寫，而默然的才是不朽的語句。世上習語之歧異，妨礙人一舉說出，道盡真理。」假如針對馬拉美 (Mallarmé) 的這個思想作嚴格的區分，那麼包含了這種語言苗芽的翻譯，就處身於文學作品和教義之間。翻譯在外形上，不如兩者具有特色，不過在歷史上刻下的深度，不輸給這兩者。¹³

Erscheint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in solchem Licht, so drohen die Wege ihrer Lösung sich um so undurchdringlicher zu verfinstern. Ja, diese Aufgabe: in der Übersetzung den Samen reiner Sprache zur Reife zu bringen, scheint niemals lösbar, in keiner Lösung bestimmbar. Denn wird einer solchen nicht der Boden entzogen, wenn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aufhört, maßgebend zu sein? Und nichts anderes ist ja - negativ gewendet - die Meinung alles Vorstehenden. Treue und Freiheit - Freiheit der sinngemäßen Wiedergabe und in ihrem Dienst Treue gegen das Wort - sind die althergebrachten Begriffe in jeder Diskussion von Übersetzungen. Einer Theorie, die anderes in der Übersetzung sucht als Sinnwiedergabe, scheinen sie nicht mehr dienen zu können. Zwar sieht ihre herkömmliche Verwendung diese Begriffe stets in einem unauflöslichen Zwiespalt.

在這樣的光照之下來看翻譯者的任務，恐怕達成任務之路要顯得更為隱晦不明了。不錯，這個在翻譯裡面讓純語言種子漸漸成熟的任務，看

起來是永不可及，而且任何結果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假如翻譯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再現原意，那麼翻譯不就失去了立足點？而我們前面的所說的——反過來說——不都是在主張這一點？忠實與自由——自由地再現原意，而在此過程中忠實於字詞——這是有史以來每一次討論翻譯都會出現的概念。對於不在於重現原意，而是追求其他東西的翻譯理論，忠實與自由好像就毫無用處了。雖然這兩個概念在一般使用的時候，總是陷入無解的爭論之中。¹⁴

Denn was kann gerade die Treue für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eigentlich leisten? Treue in der Übersetzung des einzelnen Wortes kann fast nie den Sinn voll wiedergeben, den es im Original hat. Denn dieser erschöpft sich nach seiner dichterischen Bedeutung fürs Original nicht in dem Gemeinten, sondern gewinnt diese gerade dadurch, wie das Gemeinte an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em bestimmten Worte gebunden ist. Man pflegt dies in der Formel auszudrücken, daß die Worte einen Gefühlston mit sich führen. Gar die Wörtlichkeit hinsichtlich der Syntax wirft jede Sinneswiedergabe vollends über den Haufen und droht geradenwegs ins Unverständliche zu führen. De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standen Hölderlins Sophokles-Übersetzungen als monströse Beispiele solcher Wörtlichkeit vor Augen.

特別是忠實，它到底能為意義再現提供什麼幫助？翻譯的時候忠實字詞，幾乎從來不能夠把字詞在原文裡的意義完全再現。因為，字詞在原文裡的文學意義，不在於所指的東西，而在於這個所指的東西，透過何種指意的方式，固定在特定的字詞之上。我們通常說，文字帶有感情，就是這個意思。跟隨原文句法字對字的翻譯，甚至顛覆每一個意義再現的可能性，直接導致不可理解的危險。19世紀賀德林翻譯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就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字譯的駭人例子。

Wie sehr endlich Treue in der Wiedergabe der Form die des Sinnes erschwert,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emgemäß ist die Forderung der Wörtlichkeit unableitbar aus dem Interesse der Erhaltung des Sinnes. Dieser dient weit mehr - freilich der Dichtung und Sprache weit weniger - die zuchtlose Freiheit schlechter Übersetzer. Notwendigerweise muß also jene Forderung, deren Recht auf der Hand, deren Grund sehr verborgen liegt, aus triftigeren Zusammenhängen verstanden werden. Wie nämlich Scherben eines Gefäßes, um sich zusammenfügen zu lassen, in den kleinsten Einzelheiten einander zu folgen, doch nicht so zu gleichen haben, so muß, anstatt dem Sinn des Originals sich ähnlich zu machen, die Übersetzung liebend vielmehr und bis ins Einzelne hinein dessen Art des Meinens in der eigenen Sprache sich an bilden, um so beide wie Scherben als Bruchstück eines Gefäßes, als Bruchstück einer größeren Sprache erkennbar zu machen. Eben darum muß sie von der Absicht, etwas mitzuteilen, vom Sinn in sehr hohem Maße absehen und das Original ist ihr in diesem nur insofern wesentlich, als es der Mühe und Ordnung des Mitzuteilenden den Übersetzer und sein Werk schon enthoben hat.

無論如何，忠實於原文的形式增加重現意義的困難，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因此，我們不可能爲了保留原意而要求字對字的翻譯。若要保留原意，拙劣譯者那種毫無節制的自由翻譯，會做得好得多，當然，這樣做，對於文學作品以及語言來說，就更無幫助。因此，對於字譯的要求，看似明顯，但其理由則深藏不露，我們必須找出更合理的解釋。就好像一個容器的碎片，爲了黏接起來，必須在最小的地方也要配合，但碎片本身的形狀不須相同，翻譯也是一樣，不需要相同於原文的意義，而要用愛心，注意到每一個細節，在自己的語言裡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就好像一個容器的兩塊碎片一樣，讓人看出來，兩者是同一個更大語言的碎片。正因爲如此，翻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必顧慮傳達訊息，傳達語意；而從語意的角度來說，原文對於翻譯的意義則僅僅在於，它爲譯者以及翻

譯省去了整理及表達語意的功夫。

Auch im Bereiche der Übersetzung gilt: *v οχη ην λ γος*, im Anfang war das Wort. Dagegen kann, ja muß dem Sinn gegenüber ihre Sprache sich gehen lassen, um nicht dessen *intentio* als Wiedergabe, sondern als Harmonie, als Ergänzung zur Sprache, in der diese sich mitteilt, ihre eigene Art der *intentio* ertönen zu lassen. Es ist daher, vor allem im Zeitalter ihrer Entstehung, das höchste Lob einer Übersetzung nicht, sich wie ein Original ihrer Sprache zu lesen. Vielmehr ist eben das die Bedeutung der Treue, welche durch Wörtlichkeit verbürgt wird, daß die große Sehnsucht nach Sprachergänzung aus dem Werke spreche. Die wahre Übersetzung ist durchscheinend, sie verdeckt nicht das Original, steht ihm nicht im Licht, sondern läßt die reine Sprache, wie verstärkt durch ihr eigenes Medium, nur um so voller aufs Original fallen. Das vermag vor allem Wörtlichkeit in der Übertragung der Syntax und gerade sie erweist das Wort, nicht den Satz als das Urelement des Übersetzers. Denn der Satz ist die Mauer vor der Sprache des Originals, Wörtlichkeit die Arkade.

若望福音的「太初有言」這句話，在翻譯的領域裡也是有效的。因此，面對文意，翻譯的語言，不但可以，而且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要將表達原文語意的意向用模仿的方式，而要當作對翻譯語言和諧的補充，翻譯語言要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該意向。因此，如果有人說一篇翻譯讀起來不像翻譯，而像原文，這並不是最高的讚美，特別是當這篇翻譯剛剛出爐的時候。相反地，字對字忠實的意義就在於要從譯作當中看出語言互補的那份極大的渴望。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它不會遮住原文，不會擋住照亮原文的光照，而是讓透過翻譯語言更為加強的純語言的光亮，更加清楚地照在原文之上。這個效果特別可以透過句法的字譯達到，而正是這一點證明了譯者的原始元素是字詞，而非句子（語意）¹⁵。因為句子是阻在原文語言前面的一道牆，而字詞才是進去的通道。

Wenn Treue und Freiheit der Übersetzung seit jeher als widerstrebende Tendenzen betrachtet wurden, so scheint auch diese tiefere Deutung der einen beide nicht zu versöhnen, sondern im Gegenteil alles Recht der andern abzuspochen. Denn worauf bezieht Freiheit sich, wenn nicht auf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die aufhören soll, gesetzgebend zu heißen? Allein wenn der Sinn eines Sprachgebildes identisch gesetzt werden darf mit dem seiner Mitteilung, so bleibt ihm ganz nah und doch unendlich fern, unter ihm verborgen oder deutlicher, durch ihn gebrochen oder machtvoller über alle Mitteilung hinaus ein Letztes, Entscheidendes.

翻譯的忠實與自由，自古以來就看作是背道而馳的趨向，現在對於其中一個做的深入解釋，並沒有將兩者拉近，相反地，好像把另一個的權利全都剝奪了。因為翻譯的自由，難道指的不就是再現語意的自由？——而我們現在卻認為語意並非翻譯的根本依據。不過，如果我們認為語言文字的語意就是傳達的訊息，那麼，那個最後的、具有決定性、隱藏在語意之下的東西，對語意來說，就會看似很近，卻無限遙遠，說得更清楚一些，它被語意斷絕了，或者，更頑強地超越在一切訊息之外。

Es bleibt in aller Sprache und ihren Gebilden außer dem Mitteilbaren ein Nicht-Mitteilbares, ein, je nach dem Zusammenhang, in dem es angetroffen wird, Symbolisierendes oder Symbolisiertes. Symbolisierendes nur, in den endlichen Gebilden der Sprachen; Symbolisiertes aber im Werden der Sprachen selbst. Und was im Werden der Sprachen sich darzustellen, ja herzustellen sucht, das ist jener Kern der reinen Sprache selbst. Wenn aber dieser, ob verborgen und fragmentarisch, dennoch gegenwärtig im Leben als das Symbolisierte selbst ist, so wohnt er nur symbolisierend in den Gebilden. Ist jene letzte Wesenheit, die da die reine Sprache selbst ist, in den Sprachen nur an Sprachliches und dessen Wandlungen gebunden, so ist sie in den Gebilden

behaftet mit dem schweren und fremden Sinn. Von diesem sie zu entbinden, das Symbolisierende zum Symbolisierten selbst zu machen, die reine Sprache gestaltet der Sprachbewegung zurückzugewinnen, ist das gewaltige und einzige Vermögen der Übersetzung.

在所有語言以及其文字之內，除了有可傳達的東西之外，還有一個無法傳達的東西，這個東西，以象徵的，或者被象徵的方式出現，端看其所處的位置而定。象徵者，僅存在於語言有限的文字之內；被象徵者，則存在於語言變化的過程之中。語言變化過程所欲表達的，甚至建構的，就是那純語言本身的核心。這個核心部分，雖然只能以隱藏及零碎的方式呈現，但確實是那被象徵者本身，而且只能夠以象徵的方式住在語言的文字裡。¹⁶ 既然語言的最後本質，也就是純語言本身，在語言裡都束縛在語言的文字裡面，以及其轉變之中，那麼，它總是在文字裡面被附加了沈重和陌生的語意。解開這些附著的語意，把象徵者變成被象徵者本身，在語言轉變的過程中塑造並找回純語言，唯獨翻譯具有這種強大能力。

In dieser reinen Sprache, die nichts mehr meint und nichts mehr ausdrückt, sondern als ausdrucksloses und schöpferisches Wort das in allen Sprachen Gemeinte ist, trifft endlich alle Mitteilung, aller Sinn und alle Intention auf eine Schicht, in der sie zu erlöschen bestimmt sind. Und eben aus ihr bestätigt sich die Freiheit der Übersetzung zu einem neuen und höhern Rechte. Nicht aus dem Sinn der Mitteilung, von welchem zu emanzipieren gerade die Aufgabe der Treue ist, hat sie ihren Bestand. Freiheit vielmehr bewährt sich um der reinen Sprache willen an der eigenen. Jene reine Sprache, die in fremde gebannt ist, in der eigenen zu erlösen, die im Werk gefangene in der Umdichtung zu befreien, ist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Um ihretwillen bricht er morsche Schranken der eigenen Sprache: Luther, Voß, Hölderlin, George haben die Grenzen des Deutschen erweitert. -

這個純語言，不再意指什麼，不再表達什麼，而是無言但富有創造力的字（Wort），是所有語言所意指的東西，在這個純語言的層面，終於所有的訊息，所有的語意，所有的意向都在此相遇，而且，都將在此消逝。而正是純語言的緣故，翻譯的自由獲得了一個新的、而且更高的權利。翻譯的自由，並非來自訊息的語意，因為這正是忠實翻譯所要解除的部分。翻譯的自由是爲了語言當中的純語言緣故。在翻譯語言中拯救那被放逐異地的純語言，將束縛在作品中的語言，透過再創作解放出來，這是譯者的任務。爲了這任務，譯者要打破自己語言腐朽的藩籬：路德，弗司，賀德林，葛歐格，他們因此開擴了德語的境界。

Was hiernach für das Verhältnis von Übersetzung und Original an Bedeutung dem Sinn verbleibt, läßt sich in einem Vergleich fassen. Wie die Tangente den Kreis flüchtig und nur in einem Punkte berührt und wie ihr wohl diese Berührung, nicht aber der Punkt, das Gesetz vorschreibt, nach dem sie weiter ins Unendliche ihre gerade Bahn zieht, so berührt die Übersetzung flüchtig und nur in dem unendlich kleinen Punkte des Sinnes das Original, um nach dem Gesetze der Treue in der Freiheit der Sprachbewegung ihre eigenste Bahn zu verfolgen.

經過這番說明，翻譯和原文跟語意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比喻來瞭解。就好像圓周的切線短暫地，只在一點上和圓周接觸，而按照切線的定律，重要的是那個接觸，而不是那一點，然後，切線順著它自己筆直的軌道，繼續無限延伸。翻譯也是一樣，它僅僅在語意的那個無限小的小點上和原文輕輕地接觸，然後按照忠實的原則，在語言變化的自由之中，跟隨完全屬於它自己的軌道。¹⁷

Die wahre Bedeutung dieser Freiheit hat, ohne sie doch zu nennen noch zu begründen, Rudolf Pannwitz in Ausführungen gekennzeichnet, die sich in

der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finden und die neben Goethes Sätzen in den Noten zum “Divan” leicht das Beste sein dürften, was in Deutschland zur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veröffentlicht wurde. Dort heißt es: unsre Übertragungen auch die besten gehen von einem falschen Grundsatz aus sie wollen das indische griechische englische verdeutschen anstatt das Deutsche zu verindischen vergriechischen verenglischen. sie haben eine viel bedeutendere Ehrfurcht vor den eigenen Sprachgebräuchen als vor dem Geiste des fremden Werks ... der Grundsätzliche Irrtum des Übertragenden ist dass er den zufälligen Stand der eignen Sprache festhält anstatt sie durch die fremde Sprache gewaltig bewegen zu lassen. er muss zumal wenn er aus einer sehr fernen Sprache überträgt auf die letzten Elemente der Sprache selbst wo Wort Bild Ton in eins geht zurück dringen er muss seine Sprache durch die fremde erweitern und vertiefen man hat keinen Begriff in welchem Maße das möglich ist bis zu welchem Grade jede Sprache sich verwandeln kann Sprache von Sprache fast nur wie Mundart von Mundart sich unterscheidet dieses aber nicht wenn man sie allzu leicht sondern gerade wenn man sie schwer genug nimmt.

這種自由的真正意義，雖然潘維茲（Rudolf Pannwitz）沒有明指，也沒有做解釋，但是他在〈歐洲文化的危機〉（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一文中對此有所描述，這段話足以和歌德在《西東合集》（Divan）註釋中的那些話並列，成為至今德國所出版的最好的翻譯理論。他說：「我們的翻譯，即使是最好的，也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他們想把印度文、希臘文、英文德文化，而不是把德文印度化、希臘化、英文化。他們對於自己語言用法的崇敬，大大超過外來作品的精神……譯者最基本的錯誤是，緊緊抓住自己語言偶然形成的東西，而不讓自己的語言受到外語帶來的巨大衝擊。特別是翻譯來自遙遠的文字，必須鑽進語言最深的部分，甚至字、形、音融合為一的地方。他必須藉著外語來擴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我們無法想像這種改變的極限，無法知道每一種語言可以改變到何種程

度，也不知道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差異幾乎就好像方言之間的不同。不過，這要我們十分認真地看待語言，而不是對語言抱著輕率的態度。」

Wie weit eine Übersetzung dem Wesen dieser Form zu entsprechen vermag, wird objektiv durch die Übersetzbarkeit des Originals bestimmt. Je weniger Wert und Würde seine Sprache hat, je mehr es Mitteilung ist, desto weniger ist für die Übersetzung dabei zu gewinnen, bis das völlige Übergewicht jenes Sinnes, weit entfernt, der Hebel einer formvollen Übersetzung zu sein, diese vereitelt. Je höher ein Werk geartet ist, desto mehr bleibt es selbst in flüchtigster Berührung seines Sinnes noch übersetzbar. Dies gilt selbstverständlich nur von Originalen. Übersetzungen dagegen erweisen sich unübersetzbar nicht wegen der Schwere, sondern wegen der allzu großen Flüchtigkeit, mit welcher der Sinn an ihnen haftet. Hierfür wie in jeder andern wesentlichen Hinsicht stellen sich Hölderlins Übertragungen, besonders die der beiden Sophokleischen Tragödien, bestätigend dar. In ihnen ist die Harmonie der Sprachen so tief, daß der Sinn nur noch wie eine Äolsharfe vom Winde von der Sprache berührt wird.

一個翻譯符合其形式本質的程度客觀上是由原文的可譯性決定。原文語言的價值和尊嚴越低，越是一種傳達訊息的文章，那麼翻譯從其中得到的益處就越少。直到訊息的份量過重，絲毫無法產生一個符合形式的翻譯時，翻譯就變得不可能了。一個作品愈是高級，即使和它的語意只作最輕微的接觸，也是可以翻譯的。當然這只是針對原文而說的。對譯文本來說，甚至不能夠再被翻譯，不是由於附著的語意太過繁重，而是由於太過於短暫。關於這一點，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樣，賀德林的翻譯，特別是兩個索福克勒斯的悲劇翻譯，提供了證明。這些譯文中語言之間的和諧是如此的深邃，語言接觸到語意就好像微風撫吹過風鳴琴一般。

Hölderlins Übersetzungen sind Urbilder ihrer Form; sie verhalten sich auch zu den vollkommensten Übertragungen ihrer Texte als das Urbild zum Vorbild, wie es der Vergleich der Hölderlinschen und Borchardtschen Übersetzung der dritten pythischen Ode von Pindar zeigt. Eben darum wohnt in ihnen vor andern die ungeheure und ursprüngliche Gefahr aller Übersetzung: daß die Tore einer so erweiterten und durchwalteten Sprache zufallen und den Übersetzer ins Schweigen schließen. Die Sophokles-Übersetzungen waren Hölderlins letztes Werk. In ihnen stürzt der Sinn von Abgrund zu Abgrund, bis er droht in bodenlosen Sprachtiefen sich zu verlieren. Aber es gibt ein Halten. Es gewährt es jedoch kein Text außer dem heiligen, in dem der Sinn aufgehört hat, die Wasserscheide für die strömende Sprache und die strömende Offenbarung zu sein. Wo der Text unmittelbar, ohne vermittelnden Sinn, in seiner Wörtlichkeit der wahren Sprache, der Wahrheit oder der Lehre angehört, ist er übersetzbar schlechthin. Nicht mehr freilich um seines-, sondern allein um der Sprachen willen. Ihm gegenüber ist so grenzenloses Vertrauen von der Übersetzung gefordert, daß spannungslos wie in jenem Sprache und Offenbarung so in dieser Wörtlichkeit und Freiheit in Gestalt der Interlinearversion sich vereinigen müssen. Denn in irgendeinem Grade enthalten alle großen Schriften, im höchsten aber die heiligen, zwischen den Zeilen ihre virtuelle Übersetzung. Die Interlinearversion des heiligen Textes ist das Urbild oder Ideal aller Übersetzung.

賀德林的翻譯是翻譯形式的原型；即使與他人最完美的轉譯比較，也是原型和模型的關係，只要比較一下賀德林和魯道夫（Rudolf Borchard）對於品達（Pindar）第三首頌曲所做的翻譯就可以看出來。正是這樣，比起別的翻譯，在這種原型的翻譯裡面，具有一切翻譯最大而且真正的危險：如此幅員遼闊又堅固的語言，它會關上大門，將譯者鎖進沈默之中。索福克勒斯的翻譯是賀德林最後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裡，語

意從一個深淵跌進另一個深淵，直到幾乎迷失在無底的語言深處。但是，有一個佇足的地方。不過，這只有聖經可以提供，因為在這裡，語意不再是不斷湧現的語言和不斷湧現的啓示之間的分水嶺。這裡的文本，是直接地，不需要轉介的語意，它的每個字都屬於真語言，屬於真理，或者教義，它就是真正的可譯性。當然，這翻譯不是爲了那文本，而是爲了眾多的語言。面對這樣的文本，翻譯需要有無限的信賴，就好像在聖經文本裡，語言和啓示和諧無間地結合在一起，在翻譯裡面，字譯與自由翻譯，也必須以行對行的形式，毫無瑕疵地彼此結合。因為在所有偉大的作品，特別是聖經裡面，它們在行與行之間，包含著翻譯的可能性。聖經的行對行的翻譯，是所有翻譯的原型或理想。

註釋

1. 在開頭的第一段，班雅明已經道出整篇文章的基調，也就是：藝術（班雅明將翻譯歸類於此）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另外的東西。整篇文章不斷地從各種角度來說明這一點。本文的德文解釋除了另有說明之外，均按照《永大簡明德華辭典》。
2. 在這裡，重要的是德文 *mitteilen*（動詞，意思是告知，告訴，通知，傳達）和其名詞型式 *Mitteilung*（告知的東西，傳達的內容）。這個詞在本文也常和另一個動詞連用：*vermitteln*，也就是「轉介」的意思，班雅明認爲次等的翻譯，就是在轉介這些可告知的訊息（內容、意思、語意、消息）。這些辭彙，在本文裡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關鍵辭彙。因為在班雅明的這篇文章裡，從頭到尾都會用到這個辭彙。班雅明重複地指出，他所說的翻譯，不在於「告知」或是「傳達語意」。班雅明強調，在一個文本裡面，有可以傳達（告知、轉介）的訊息（內容、意思、語意、消息）；其他則是那不可以傳達的東西。譯者的任務在於處理那些不能夠傳達（告知、轉介）的東西。
3. *Dichten*（動詞：寫作，創作）*Dichtung*（名詞：詩，文學創作）這兩個字在德文都有廣義和狹義的意思，也就是文學創作或者詩作（又如 *Dichter* 可以稱作家或者詩人）。由於從文章伊始，班雅明就是以概論的方式論及藝術，把翻譯與其他藝術相提並論，因此，基本上，筆者採用廣義的解釋。也就是將動詞 *dichten* 翻譯爲「創作」、「寫作」，名詞 *Dichter*，*Dichtung* 翻譯爲「作家」、「文學作品，文學創作」、「作品」。但唯獨在這一段裡，班雅明特別要道出文學的特色，以 *das Unfassbare, das Geheimnisvolle* 道出那份神祕不可言喻的成分，因此，筆者就特別用「詩意的」來翻譯 *das 'Dichterische'*；其中的引號 ' ' 是原文中就有的，這個引號的運用是否就是說，班雅明在此使用其狹義的意思？在後文中，此字仍然出現多次，筆者均用「(文學)」

作品」(文學)創作」來翻譯。此外，這裡首次出現 schlechte Übersetzer 這個詞，schlecht 有(質量上)壞的、次的、劣的、差的等意思。

4. 這句話，乍看之下會有些難懂，因為它已經牽涉到後來要說明的東西：作品之內，是否含有可譯性，也就是是否含有後來才提到的純語言的種子；如果有，那麼就是可以翻譯的。如果是這樣，這些純語言的種子，就必須要翻譯出來，因為這就是天生的翻譯的任務。
5. 這裡班雅明花了半頁多的篇幅(整篇文章才13頁)來解釋，我們的想法不能只限於「人」的範疇。而這裡也是第一次，也是全文唯一的一次，用到「Gott」(天主，上帝)這個字。為的是要指出，翻譯的對象要超出「人」的範圍。另外，在本文裡，和宗教有關的論述非常之少，而且非常的間接。大約不超過五處：「messianisches Ende」、「Religion」、「Anfang der Johannes Evangelium」、「heilige Schrift」。總的來說，雖然他的論點帶領我們進入另一個範疇，但他並不從宗教的立場來說明他的論點。
6. 這裡的最後一句，回應本段的第一句話：「翻譯是一種形式」。由此可見，班雅明在行文上，有他自己嚴格的邏輯可尋。而整段的內容就是在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一個作品的可譯性要看在作品內有沒有這個翻譯的形式存在，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翻譯，而且不只如此，班雅明還強調說，這個作品要求我們去翻譯，即使人不能夠完全達到這個任務；我們要注意，那要求我們去翻譯的，是隱含在作品裡面的翻譯的形式，而非作品。這也是下一段班雅明要說明的。
7. 關於這個翻譯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乍看之下，似乎有些矛盾，但從後面的解說來看，就會漸漸明白。也就是翻譯要透過作品，因為可譯性隱含在作品裡，但是那不是作品本身的可譯性，而是翻譯形式需要給翻譯出來的可譯性。因此，作品是作品，翻譯是翻譯，各走各的路。這就是班雅明在這裡所要說的。班雅明特別用下面的比喻來說明這份關係。
8. 這裡出現了常常受外界引用的辭彙「來世」(Überleben)、「後繼的生命」(Fortleben)因此，在此附上原文，以期幫助說明原意。其實，Überleben 這裡的 Über——除了「後來」的意思之外，還可以有大難餘生的意思(例如 Er hat sich überlebt.)，也就是「超越此生」的意思。在此，班雅明用引號在 Überleben 前後，或許強調他在這裡只是借用來表達一個「後來的生命」，如同他在下一句裡面所用的 Fortleben 之意。而在下面第二句裡，班雅明強調說，這不是隱喻的用法，更能說明此意。事實上，在全文當中，後來出現幾次「後來的生命」，班雅明都用了 Fortleben，而沒有再用 Überleben。
9. 在整整一頁篇幅的這一長段裡，班雅明道出翻譯與原著的關係：翻譯與原著之間的關聯在於可譯性。但是這個可譯性來自於翻譯所獨具的本質，而非來自於原著。翻譯的意義，要在歷史裡，甚至超越歷史去尋找。
10. 此處第一次出現「純語言」，下面一大段在於解釋構成純語言的方式。由於「意向」在本文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此附上原文。
11. 在此，意指的東西，和意指的方式也都是重要概念，附上原文。
12. 「歷史的默西亞的終點」是猶太教——基督宗教的說法，表示世界的終結。參考 Harry Zohn 的翻譯：If, however, these languages continue to grow in this manner until the

end of their time, it is translation.... (Arendt, 1968, p. 74, 底線為筆者所劃, 以示重點。)

13. 文中所引馬拉美的一段話, 承蒙羅新璋協助從法文翻譯為中文。本段最後, 班雅明提到翻譯與文學作品(文學創作)(Dichtung)和教義(理論)(Lehre)之比較。在此, 又遇到 Dichtung 該如何翻譯的難題: 文學作品, 或者詩作? 基本上, 筆者認為它指的是廣泛的用法: 文學作品。這裡說的「教義」(Lehre), 在文末還會出現一次, 根據上下文, 應該指的是神聖經典的教義, 例如「聖經」、「塔木得」等經書。
14. 從這裡開始, 幾乎有兩整頁的篇幅, 班雅明討論忠實翻譯和自由翻譯的問題, 在此對於意譯與字譯有非常精闢深入的分析。然後, 班雅明從純語言的角度重新詮釋翻譯的忠實與自由。
15. 這裡班雅明再度說明了翻譯不要注重原文的語意, 而是用互補的方式表達意向, 不要模仿原文的表達的方式, 表達方式特別顯現在句法當中, 因此, 要注意翻譯一個一個字, 而非整句。英文翻譯 (Arendt) 將原文的 Satz (句子) 翻譯為「語意」(Proposition), 或許更可以讓讀者明白原意。因為上面一直使用的詞就是「語意」(Sinn), 現在一下子用「句子」來說明, 或許容易引起混淆。
16. 這裡班雅明引進象徵者, 與被象徵者的概念: 象徵者, 有主動, 向外發出功能的作用; 被象徵者, 有被找到的東西, 在此, 就是純語言。可是, 不論象徵或被象徵, 都是屬於語言「不可傳達」的部分。傳達訊息(語意、內容)和真正要翻譯的東西有什麼區別, 終於在此有了詳細解釋。
17. 翻譯所接觸的那原文語意的小小的一點, 就是隱藏在原文當中, 純語言的片段部分。翻譯要抓住那一點, 然後, 找出適當的表意方式, 以便和其他的表意方式和諧地、互補地表達這部分的純語言。

書評

口譯評估

陳子瑋

書名：口譯評估（原創版）
作者：蔡小虹
出版者：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出版年：2006
總頁數：266
ISBN：9787500106203
售價：¥16元（人民幣16元）



口譯服務品質衡量已經是近年口譯研究的顯學之一，許多學者紛紛就品質議題由不同面向提出研究結果。雖然集大成的突破性研究仍未出現，但也已累積相當可觀的重要成果。在此前提之下，評論一本口譯品質衡量的學術著作目的是什麼？謹此提出三項想法供讀者參考：第一、詳實介紹主要內容，盡量以報導方式方便讀者瞭解本書主要內容，以便評估是否進一步投入時間與精神閱讀；第二、由學術研究觀點為該書定位，連結與前人研究之脈絡，並且提供讀者相關背景知識，以提升閱讀之效益；第三、由實務角度出發，便利讀者未來評估工作之參考。由前述三項要點看來，蔡小虹教授所著《口譯評估》（2006年10月出版）一書，在眾多研究中，具有其特殊地位與意義，尤其以書中所介紹之大陸學者研究成果及蔡教授所提出之評量方式及標準更具參考價值。以下即按照三項要點逐一敘述¹：

陳子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d9425@ntnu.edu.tw。

一、內容摘要

本書由回顧現有文獻出發，於第一章中整理西方相關研究，並將其分為理論及實證兩部分分別說明。理論部分大致依時序，一路由 D. Seleskovitch & M. Lederer, D. Gile, B. Moser-Mercer, H. Marquant 到 C. Angelelli 分別簡要介紹各家學說重點。實證研究部分則又細分為期望、評估、訊息忠實度及語言質量等方面，並詳細說明 Meta 專刊及 2001 年於西班牙召開的研討會內容。此節所列之西方研究者較為常見，臺灣相關研究亦常見引用。本章第二部份仍依照理論及實證研究兩部分整理臺灣及大陸學者研究口譯品質之結果，理論部分涵蓋範圍由 1987 年至 2006 年，其中除引用學者著作外，較特別的是介紹四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碩士論文，所列碩士論文的研究議題都與口譯品質衡量關係密切，且結果也十分實用，能夠藉由此方法引介碩士論文研究成果不僅別具心裁，也有實質效果。誠如作者所言，這些碩士論文固然在研究方法上還有需要改進之處，但已足以為未來口譯品質評估研究提供思考的方向。

第二章則可視為本書關鍵，綜合前人研究結果說明口譯品質衡量的相關定義、變數及方法。在定義方面，本書所定義之對象包括口譯性質、口譯品質評估、口譯任務及口譯品質四項。其中口譯品質評估部分又細分為評估種類、評估指標、評估目的及評估模式等項目；口譯任務一節再分為溝通方式、溝通程序、溝通情境及溝通語篇結構等部分；口譯品質則再細分為口譯員觀點、靜態結果與動態操作、口譯效果等三部分。口譯品質評估變數則包含訊息單位、準確度、流利度及服務對象滿意度等三部分。本章最後則介紹口譯品質的評估方式，細分為量化及質化兩種類型。

本書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詳細分析三種評估模式，第三章為專業評估，第四章為學習成果評量，第五章則為口譯研究評估。第三章之評估對象為專業口譯員。本章由行業專業化觀點出發，主張評鑑專業口譯員可分為專業能力評估及服務品質評估兩部分，而評估方式則可採能力評估

及品質評估兩種。其中能力評估係指資格認證考試、用人單位自行考核及市場規律評估三種，前二種評估方式較常見，自當無須贅述，而市場規律評估所指的是由專家或專業人士推薦及市場篩選兩類方法。第三章最後並附有評估專業口譯員之實例研究，其中並說明評估細部項目及調查表範例。

第四章則專文探討口譯教學成效評量。本章由口譯課程出發，討論口譯教學成果評量的類型、方法及步驟，並於最後章節附有細部說明的評量實例。本章所提之評量類型方法包括課前評量及課後評量兩種，課前評量係指瞭解學生能力之各類評量，目的在於評估學生學習課程之能力；課後評量則針對課程內容，掌握學生學習的部分或全面績效，期使學生能夠有豐碩學習成果，根據實施時間不同，又可分為階段性評量及期末考、畢業考等各類。至於評量的方法，本書提出三類，即「持續性與選擇性評量」、「課間評量與學生課後自我評量」及「校內單項評量與學校與口譯員聘用單位聯合評量」三種。此三種方法為評量之基本原則，各有不同的適用情境，且三者並不互斥。持續性與選擇性原則著重於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果之長期評估與一次性考試之搭配運用；課間評量與學生課後自我評量係以評量時間是否為課間為劃分；校內單項評估與學校與口譯員聘用單位聯合評量則依參與評量單位之多寡區分。本章最後的評量步驟及實例中提供巴黎高等翻譯學校以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各類考試例題及細部評量標準。

第五章之標題為口譯研究評估，所指的是針對口譯活動中特定項目的學理研究。本章所涵蓋的口譯研究評估與第三章及第四章之最大不同，在於前二章之研究對象為口譯活動之整體及最終產出，而本章之研究評估則指「可以是純粹的理論性質，也可針對實踐評估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探究」。本章前半章以比較專業評估、教學成效評量及口譯研究評估之方式說明三者間的關係，後半章則以兩項研究實例說明口譯研究的實施方式。

第六章標題為思考與建設，即結論與建議。主要結論有六項：第一、西方實證研究發展較早，中國的實證研究進展相對較慢；第二、西方學者側重以跨領域方式研究口譯品質，而中國學者較注重評估標準的問題；第三、口譯品質評估應納入服務對象及聽眾觀點；第四、口譯研究成果已累積相當數量，且因為全球化之關係，推動標準化、高品質口譯服務之時機已成熟，因此可以根據前人研究成果，大規模研究口譯品質相關議題；第五、口譯研究必須植基於理論基礎才能有明確方向及完整體系；第六、目前口譯研究之重點容易限於片面，仍有許多待擴展之領域。

二、研究觀點

本書應為第一本以中文寫作之口譯品質評估專書，作者彙整前人相關研究，輔以大量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及巴黎高等翻譯學校之經歷及實例，進而提出對於口譯品質之看法。整體而言，這是一本以有經驗的口譯教學及研究者為對象的專著，適合任職於大專院校，對於口譯研究已有基礎認識的教師及研究人員閱讀。建議初入門的研究生應在教師指導下研讀，或可作為研究所層級口譯研究相關課程之指定參考或指定閱讀材料。

本書所涵蓋之內容十分豐富，且架構十分完整，可以明顯看出作者強烈之企圖心。雖然囿於篇幅無法將所有相關前提全數納入書中，但其中所提出的多項概念對於有志從事研究者皆深具啟發功能。例如書中明確將評估專業口譯員及口譯教學評量分為兩章探討，對於從事口譯教學及研究之教師便能發揮釐清教學評量設計之作用。其次，第三章不論在內容詳實、論述邏輯或分析深入各方面看來，皆居各章之冠，且其中所提出之專業口譯評估方式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如前段所述，這是一本以有經驗的口譯教學及研究者為對象的專著，因此許多有關於口譯品質及教學評量之基本概念皆省略。若將本書作為研究所口譯研究相關課程之研讀教材，建議教師應於閱讀前補充基本概念。於此建議不熟悉評量議題之讀者於進入本書前，可配合先研讀 David

Sawyer 於 2004 年出版的《Fundamental Aspects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一書第四章〈Foundations of interpreter performance assessment〉。該章以簡要方式說明評量之基本原則，且涵蓋範圍由最基礎開始，恰可與本書相輔相成，補充基本概念，以使閱讀效率提升。至於實際閱讀本書時，建議初入門讀者不妨先閱讀第二章之定義及參數部分，待對於基本概念有一定認識後，再回頭閱讀第一章的前人研究回顧，定更能觸類旁通，收穫更多。此外，本書雖然沒有專門探討實作評量（performance test）及真實性評量（authentic test）等評量類型的獨立章節，但是相關概念於第三章及第四章卻隨處可見。因此建議對評量不熟悉之讀者宜參考相關文獻，閱讀第三章及第四章時才較容易掌握書中之重點及脈絡。此類文獻十分豐富，參閱應不成問題，建議讀者針對最基本的概念進行瞭解即可，避免陷入細節研究及案例分析而失去焦點。另外，作者對於西方口譯品質研究的文獻採用較少篇幅梳理脈絡，這應該是為了控制篇幅，而不得不做的割愛，但對於教學應用而言，若以本書做為教材，則應另行補充文獻。

本書的另外一項特色則為內容包含大量中國學者研究，且作者論述時明顯以中國環境為對象。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正好可以透過本書瞭解中國口譯評估研究之進展，也能對於大陸口譯市場有更深入之認識。然而，這項特點對於臺灣讀者而言，也可能造成額外負擔，即閱讀時必須多下一番功夫，才能充分掌握兩岸辭彙及用語的差異。本書所含的辭彙差異所造成之挑戰其實不難克服，讀者無需因而卻步。

就全書編排方面，如前所述，第一章之前人研究回顧似較適合與第二章之定義章節對調，以使讀者於進入歷史回顧之前，對於名詞及定義有清楚的認識。此外，第三章至第五章的分類並不一致，第三章及第四章則是以評估對象為劃分基準，各為專業口譯員及學生，分際十分清楚。而第五章卻以口譯活動中某些特定環節為對象，相較之下，似乎無法與前二章連貫，且第五章標題「口譯研究評估」一詞與實際內容並不完全相符。

另由於本書各章涵蓋內容豐富，受限於篇幅，難免出現部分章節內容不甚完備或配置不均之狀況。以第三章為例，其中以較多篇幅說明資格認證考試之內容，而資格認證考試之上一層目標 3.2 節「行業專業化」卻只有半頁篇幅，且內容不盡完整。其次，第三章中 3.5 節「譯員的工作條件」與前後節之關聯性似乎不明顯。

此外，本書雖名為《口譯評估》，但實際內容仍以會議口譯為範圍，並未探討其他口譯型式，如社區口譯、法庭口譯及醫療口譯等。這應是中國目前並無此類口譯之緣故，因此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此種狀況與臺灣極為類似。雖然如此，但為與世界口譯研究潮流更加緊密結合，仍宜適度修正標題，以彰顯研究之國際觀。至於研究方法方面，本書主要仍著重於口譯研究的範圍。後續研究不妨著眼跨領域整合，如引進語言測驗工具，開發為口譯適用的形式，使第四章之內容更加豐富，或者引進管理學對於服務品質之評量研究，以使口譯評估之層面能更完備。

以上係對本書整體之看法，以下則針對第二章之內容進一步提出意見，希望在後續研究中能有所進展。第二章提出口譯品質衡量分為成果評估及過程評估：成果評估是對於口譯產出的評鑑，而過程評估是口譯使用者對口譯效果的客觀反應。根據目前文獻，成果評估應與傳統的口譯譯文研究如錯誤分析等概念近似；過程評估則近似於聽眾觀點的滿意度調查。成果評估類的方法早已普遍使用於各類口譯考試評分標準之中，累積研究成果已經十分豐碩，近年更有朝跨領域研究發展的趨勢，如由 Bachman 一系列語言測驗研究所衍生的相關研究皆屬此類，而聽眾觀點的口譯品質研究從 1980 年代開始以來，也已經有一系列的文獻。可惜的是，兩者之間並沒有交集，使得聽眾觀點與口譯員觀點無法緊密聯繫。而本書所提之成果評估的可信度、可接受度、簡明度、多樣性、迅捷度及技術性等六項指標，或可發展成為兩方溝通的可能方式。然而，提出此六項指標的說明僅以第 25 頁最後一行文字交代，實屬可惜。或許可以考慮添加文獻討論，統整並釐清口譯成果評估及過程評估之互動，進而與第

三章及第四章之各項評估方法及類型，延伸發展為一獨立章節，必定能使內容更聚焦，且可能在口譯研究進程上獲得重大突破。

舉例而言，第三章第一例的客戶滿意度調查問卷中，共有七個問題選項，分別為語言水準、翻譯技能、溝通能力、行業知識、職業操守、知識水準及經驗資歷。根據本書第 25 頁對口譯品質評量類型的分類，此七項應屬於過程評估類，即口譯使用者對口譯效果的客觀反應。其中除經驗資歷外，其他六項似乎都可以依照第 26 頁六項指標之定義歸類。語言水準及翻譯技能可以歸入可信度、可接受度及簡明度，而溝通能力、行業知識則可列入多樣性；例二會議口譯聽眾意見調查表中的八項問題，也與成果評估的六項指標有密切關聯。若能進一步思考兩者之對應關係，並定能夠整合口譯員及聽眾觀點，建立一個多面向的口譯品質評估體系。

三、實務觀點

就實務觀點而言，本書之實用價值甚高，書中引用之文獻也已涵蓋近年研究成果，且各章所提供之案例不僅包含學校考試之評分參考，也包括對於客戶使用口譯服務滿意度調查之問卷樣本。可說對於研究者、教學者都能有實質用途。然而，用於碩士班或博士班初期課程教學時，宜搭配學習評量及測驗相關內容使用，並補充翻譯品質研究相關之西方研究文獻。

四、結論

口譯品質評估是一個有趣但也相當複雜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研究結果雖然已經累積不少，但仍缺乏有系統的整理，而中文的研究更是相對較少。本書將口譯品質評估問題透過有系統的方式以三種不同的評估需求詳細說明，並附上實際可用之案例研究，不僅能提供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學習成果評量的實際參考，亦能使口譯研究人員在研究口譯評

估相關議題時能更有系統地組織前人研究成果。即使仍有部分可修正之處，但整題而言此書瑕不掩瑜，作者所投入的心力必定相當可觀，也因此而愈顯得難能可貴。更期待口譯學界能於此基礎之上更加努力，將口譯評估之研究進程持續向上提昇。

註釋

1. 為方便讀者閱讀，名詞盡量使用臺灣慣用法，與原文用法不盡一致。

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 (FIT World Congress) 與會報告

賴慈芸

第 18 屆世界翻譯大會是由國際譯聯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FIT) 和中國翻譯協會主辦, 2008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為期四天, 會議主題為「翻譯與多元文化」。筆者有幸得到國科會補助參與盛會, 因此寫成此文向讀者報告大會概況。

世界翻譯大會 (FIT World Congress) 每 3 年舉辦一次, 這是國際譯聯自 1953 年成立以來首次在亞洲地區舉辦, 下一次大會則預定在 2011 年於美國舊金山舉行。大會期間並改選主席, 新任主席由南非的 Marion Boers 擔任, 而 3 位副主席中有 1 位是中國的黃友義先生。與會的除了翻譯研究者、翻譯教師、譯者之外, 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盟委員會、各翻譯專業組織等 30 多個國際組織代表。本次大會約 1500 名與會者, 來自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 創下最多人與會的紀錄。平行分論壇多達 88 場, 由於論文眾多, 論文集直接製成光碟而無紙本。會場外同時舉辦中國翻譯產業展覽會, 有多家大型翻譯公司、出版公司、翻譯軟體公司、翻譯組織及學校參展; 由於中國翻譯產業規模成長迅速, 產值在 4 年內成長近 3 倍, 從 2003 年的 110 億元人民幣, 達到 2007 年的 300 億元人民幣, 因此各地華人與會相當熱烈, 除了兩岸及港澳之外, 包括新加坡、澳洲、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等地的翻譯專業團體都組團前來。

此次大會開會時間正值北京奧運前夕，每次進出會場及展場都要排隊通過安全檢查，是比較特別的情況。來自世界各地的譯界同儕，有些遠從芬蘭、阿根廷、哥倫比亞、印度等地而來，雖然膚色及服裝各異，但每一位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從事翻譯。雖然與會者包括產官學界，但由於研究翻譯的學者多半也從事實務翻譯工作，因此頗有全球譯者共聚一堂的感覺，與一般的學術會議氣氛頗為不同。

此次大會分論壇多達 88 場，內容相當全面，包括法庭口譯、術語規範、翻譯教學、兒童文學的翻譯、語料庫研究、科技翻譯、財經翻譯、醫療翻譯、翻譯軟體、本地化產業、翻譯市場、翻譯考試與翻譯品質標準等等。由於筆者正為教育部研發翻譯能力考試的評量方法，因此參與的幾場都與翻譯認證考試和翻譯品質標準有關，獲得許多最新的訊息，受益良多。

這幾年內，世界各地紛紛制定了翻譯服務的標準：歐洲標準協會 (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 在 2006 年通過了 EN 15038 「翻譯服務——服務要求」(Translation Services—Service Requirements)，取代之前各國（如德國）的國家標準；美國國際標準制定組織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也在 2006 年通過了 ASTM2575，即「翻譯品質標準綱領」(Standard Guide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ranslation)；加拿大也在今年 2008 年 6 月提出國家翻譯品質標準，並在此次翻譯大會開會期間傳來已經獲得通過的消息；而中國則在 2003 年就制定了「國家標準：翻譯服務規範」。可見在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大家對於翻譯品質也有更高的要求。這些規範都明定了客戶與翻譯工作的內容、標準作業程序、選擇翻譯人員的原則、品質控管等等，每一個環節都符合要求的翻譯公司才可以獲得認證，對於客戶和譯者都更有保障。客戶可以選擇有認證的翻譯公司，獲得品質優良的服務；優秀的譯者也不必削價競爭，可以得到與能力相符的報酬。其次，教育客戶也是翻譯服務標準的一大功能，讓客戶、譯者、管理者都可以用共同的語言溝通。再者，當雙方對

翻譯品質的認知落差太大時，由獨立的第三者（非客戶也非譯者）稽核翻譯品質，也是值得參考的作法。

而在認證過程中，譯者的能力當然是一大重點。有公信力的翻譯能力考試也因此更受重視。如果一家翻譯公司雇用的譯者（全職或自由譯者）都有通過某些翻譯能力考試的證明，自然更具優勢。中國大陸自2003年開始舉辦全國翻譯水平考試，4年內報考人數超過6萬人次，可見得舉辦翻譯考試是世界性的趨勢。中國人事部的考試歷年通過的考生約有9000人，通過率大概在15%左右，與我國教育部2007年開始舉辦的翻譯能力考試及格率差不多，也和澳洲國家翻譯及傳譯認證局（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AATI）的及格率差不多，都在20%以下，是有相當難度的考試。評量方面比較值得注意的變化是澳洲國家翻譯及傳譯認證局的評分改革方向：以往是扣分制，但有扣分加總後與整體印象不能符合的弊病；現在雖仍有標記錯誤之處，但最後分數由整體印象決定。另外，美國譯者協會（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TA）注重單語讀者的看法（即只看譯文表現，不對照原文），也值得作為我們在設計評分機制時的參考；例如我們未來中譯英的部份，有可能在第一階段先不對照原文（中文）評分，而完全由英語單語讀者來評分，與美國譯者協會重視可讀性的想法一致。

此次大會期間，與會人士相當踴躍，多場分論壇都爆滿，晚到的聽眾只能站在後面聽講；學生志工與服務人員也都相當優秀而積極。由於會場使用的電腦操作介面是中文的，許多不會中文的講者常在操作過程中遇到困難，工作人員都能迅速解釋並加以協助。其中在一場翻譯標準分論壇的進行期間，會議室屋頂的玻璃燈罩忽然爆裂，聽眾紛紛走避，後來在主席與工作人員協調之下，立刻找到新的場地；我們坐電梯到達新場地的時候，只見一個空蕩蕩的大廳，但工作人員迅速搬來椅子、講台、投影機、麥克風等設備，讓該場論壇很快就得以繼續進行，讓人印象深刻。

整體來說，那種全球譯者共聚一堂，一同討論整體翻譯產業未來的景像，不但讓人覺得翻譯大有可為，也讓與會者都以身為譯者而感到光榮。在翻譯考試與認證方面，也獲得許多最新訊息，可作為我國未來設計類似標準的參考。而中國翻譯產業的崛起，更值得國內譯者及翻譯產業注意。

國立編譯館編譯論叢徵稿辦法

一、本刊為一結合理論與實務之學術性半年刊，以促進國內編譯研究之發展為宗旨，於每年三月、九月中旬出刊，歡迎各界賜稿。

二、本刊主要徵稿範圍如下：

稿件類別	文章性質	主題	每篇字數
研究論文	具原創性或發展性之學術論文，目的、方法、結論明確具體	翻譯教育與培訓、翻譯評估與測驗、翻譯過程與策略、機器翻譯、翻譯產業、翻譯理論、翻譯與文體、翻譯史、翻譯研究方法、學術名詞編譯、術語學、學術著作編著、學術著作翻譯	15,000 字
論壇	以既有研究之評介及分析比較為主，有助於實務推廣或學術研究	翻譯學領域重要著作	3,000-5,000 字
書評、導讀	評論、引介	各專業領域之譯著	3,000-5,000 字
譯評	翻譯評論	以上主題之國內外相關活動、研討會、最新消息、大事紀要等	1,000-3,000 字
報導	學術動態資訊	以上相關主題	不受字數限制
特殊稿件	如：人物專訪等		

三、來稿請用中文正體字，所引用之外國人名、地名、書名等，請用中文譯名，並於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學術名詞譯成中文時，請參照本館學術名詞資訊網 (terms.nict.gov.tw)，稿件如有插圖或特別符號，敬請繪製清晰，或附上數位檔案；如有彩色圖片或照片，請儘量附上高解析之底片、幻燈片或數位檔案，俾使版面更為美觀。

四、來稿以未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內容為限，其內容物若涉及第三者之著作權（如圖、表及長引文等），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原著作

權人取得授權。

五、投稿前請務必自留底稿資料乙份，符合本刊主題之稿件須送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匿名審查 (double-blind review)，再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決定通過後，始得刊登，本刊編輯委員會對稿件有刪改權，如作者不願刪改內容，請事先聲明。經採用之稿件，將請投稿者以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ifth Edition) 之規定修改格式，並謹奉稿酬每千字新臺幣 1,050 元，及致贈當期本刊 2 冊、抽印本 30 份。

六、來稿請備齊：

(一) 作者通訊資料表 1 份；(如附件 1)

(二) 著作利用授權書 1 份；(如附件 2)

(三) 書面稿件 2 份，請依稿件性質備妥資料：

1. 「研究論文」、「論壇」稿件，含：

(1) 首頁：

① 篇名 (中、英文)；

② 作者姓名 (中、英文)；

③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說明。

(2) 中文及英文摘要 (300 至 500 字)；中文及英文關鍵詞。

(3) 正文。

(4) 參考書目及附錄。

2. 「書評」、「導讀」稿件，含：

(1) 首頁：

① 篇名 (中、英文)；

② 作者姓名 (中、英文)；

③ 書評或導讀之書名 (中、英文)；

④ 書籍作者 (編者) 姓名 (中、英文)；

- ⑤ 書籍出版資料；(含出版地、出版社與出版日期)
 - ⑥ 總頁數；
 - ⑦ ISBN；
 - ⑧ 售價；
 - ⑨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說明。
- (2) 正文。
- (3) 參考書目及附錄。
3. 「譯評」稿件，含：
- (1) 首頁：
 - ① 篇名(中、英文)；
 - ② 作者姓名(中、英文)；
 - ③ 譯評之書名、原書名；
 - ④ 譯者、原作者(編者)；
 - ⑤ 書籍出版資料；(含出版地、出版社與出版日期)
 - ⑥ 總頁數；
 - ⑦ ISBN；
 - ⑧ 售價；
 - ⑨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說明。
 - (2) 正文。
 - (3) 參考書目及附錄。
4. 「報導」、「特殊稿件」，含：
- (1) 首頁：
 - ① 篇名(中、英文)；
 - ② 作者姓名(中、英文)；
 - ③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說明。
 - (2) 正文。
 - (3) 參考書目及附錄。

(四) 稿件之全文電子檔案 (請載存於磁片或光碟中, 或電子郵件之附加檔案) 及相關圖表照片等。

七、來稿請寄：

國立編譯館編譯論叢編輯委員會

地址：1064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79 號

電話：02-3322-5558 ext.693

傳真：02-2357-8937

E-mail：ctr@mail.nict.gov.tw

八、歡迎自本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nict.gov.tw>)「期刊」或學術著作翻譯資訊網 (<http://translation.nict.gov.tw>) 下載相關資料。

作者基本資料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共同著作人	<input type="checkbox"/> 本稿件非共同著作。 <input type="checkbox"/> 本稿件為共同著作：(請列明全體共同作者如下) 第 1 作者 (通訊作者)：----- 第 2 作者：----- (請另填本「作者基本資料表」) 第 3 作者：----- (請另填本「作者基本資料表」)	
服務單位 (或就讀 學校系所)		
職稱		
最高學歷		
通訊處		
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地址		
論文屬性	<input type="checkbox"/> 研究論文：專題研究成果 <input type="checkbox"/> 作者為本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獨力進行研究。 <input type="checkbox"/> 作者非本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需請主持人簽名。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簽名：----- <input type="checkbox"/> 研究論文：博碩士論文改寫 (指導教授：-----，原論文於-----年通過 題目：-----) <input type="checkbox"/> 論壇 <input type="checkbox"/> 書評 <input type="checkbox"/> 導讀 <input type="checkbox"/> 譯評 <input type="checkbox"/> 報導 <input type="checkbox"/> 特殊稿件，請說明：-----	
稿件字數	稿件全文(含中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共-----字	

- 說明：1. 以上欄位請詳實填寫，其中「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通訊處」及「E-mail」等資料均將於著作接受刊登時同時刊載於篇中之用。
2. 每位共同著作人皆須填寫本表，「共同著作人」欄並請依序編號填寫共同著作人的姓名。

《編譯論叢》著作利用授權書

立書人茲以

(請填寫著作物篇名)

為題之著作投稿於國立編譯館《編譯論叢》期刊，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原創性著作，絕未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國立編譯館於本著作通過審查後，以論文集、期刊、網路電子資料庫等各種不同方法形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且得將本著作透過各種公開傳輸方式，提供公眾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等各項服務。國立編譯館並得以再授權第三人進行上述之行為。

立書人同意無償授權國立編譯館及國立編譯館再授權第三人依「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之創用授權條款進行對上述授權著作的使用。

立書人承諾對國立編譯館及國立編譯館再授權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立書人聲明並保證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

本著作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仍擁有上述授權著作之著作權。

此致

國立編譯館

第一作者：_____ (請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

聯絡電話：_____ 電子信箱：_____

地址：_____

共同作者：_____ (請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

聯絡電話：_____ 電子信箱：_____

地址：_____

共同作者：_____ (請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

聯絡電話：_____ 電子信箱：_____

地址：_____

(如不敷填寫，得自行附加紙張載明)

年

月

日

編 譯 論 叢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Volume 2 Number 1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2008年9月創刊

First Issue: September 2008

2009年3月出刊

Current Issue: March 2009

發行人 Publisher	藍順德 Shun-te Lan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Published b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電話 Tel	886 2 33225558
傳真 Fax	886 2 33225598
電子郵件 E-mail	ctr@mail.nict.gov.tw
刊期頻率 Frequency	半年刊 Semi-Annual
售價 Price	新臺幣270元 NTD. 270
電子期刊 E-Journal	free access to on-line full text at ej.nict.gov.tw
政府出版品編號 GPN	2009702205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071-4858(Print) 2071-4858(Online)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國家網路書店 www.govbooks.com.tw；五南文化廣場網路書店 www.wunanbooks.com.tw；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Tel 02 25180207；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6號 Tel 04 22260330。
Exhibition and Distributor of Official Publications: Government Online Bookstore, www.govbooks.com.tw. Wunanbooks Online, www.wunanbooks.com.tw.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ookstore, 1F 209 Sung-Chiang Road, Taipei. Tel 886 2 25180207. Wunan Publishing, 6 Zhong-Shan Road, Taichung. Tel 886 4 22260330.

本刊投稿及編務事宜連絡，請函寄10644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Manuscripts and all 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sent to: 179 Sec. 1, He-Ping E. Road, Da-An District, Taipei, 10644, Taiwan.



除另有註明，本刊內容採「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創用授權條款。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e text of this journal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 Derivatives" license.

Studies

- Space of Translation: On Fu Lei's Theory of "Spiritual Similarity" 001
Hsi-deh Wu
- Simplific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027
Huey-ru Lin
-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053
Chiung-ying Chang
-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ok Archives: An Examin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077
Cheng-shu Yang
- Do Interpreters Need to Sound Like Broadcasters? 101
Feng-lan Chang
- Teaching College Level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151
Clarence M. Davis
Posen Liao

Translation Review

- Portraying K'ang-hsi—Stylistic Analysis of *Emperor of China*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K'ang-hsi* 179
Yichen Chiang

Translation Commentary

- On Different Renditions of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ith a Full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into Chinese 189
Kung-tze Hu

Book Review

-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249
Tze-wei Chen

Reports

- Report on Attending XVIII FIT World Congress, 4-7 August 2008, Shanghai 257
Tzu-yun Lai

研究論文

- 翻譯空間：論傅雷的「神似」理論 吳錫德
- 論日譯漢之翻譯簡化 林慧如
- 結合微觀與宏觀的英漢翻譯教學法——兼探討紐馬克《翻譯教程》適用於大學部英漢翻譯教學之程度 張瓊瑩
- 口筆譯研究典藏分析：以中港臺及日韓大學為例 楊承淑
- 專業口譯需要字正腔圓嗎？ 張鳳蘭
- 臺灣大專中英口譯教學現況探討 胡家榮 廖柏森

譯評

- 繪寫康熙——*Emperor of China*及譯本《康熙》文體評析 蔣宜臻

譯註

- 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 胡功澤

書評

- 口譯評估 陳子璋

報導

- 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 (FIT World Congress) 與會報告 賴慈芸



GPN 2009702205 定價270元